

边地文化丛书

人与森林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

刀耕火种

尹绍亭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边 地 文 化 丛 书

尹绍亭◎主编

50.9523

2593

0037234

人与森林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尹绍亭 /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考古所图书馆



70037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 尹绍亭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6

(边地文化丛书)

I. 人... II. 尹... III. 刀耕火种—文化—考题研究

IV. K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2604 号



责任编辑	高建勤 张 莉 赵 虎
封面设计	向 炜
版式设计	陈 俊
责任校对	马建生
责任技编	汤家力 荣 景

书 名	边地文化丛书 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著 者	尹绍亭
出版发行	云南教育出版社(昆明市书林街 133 号)
印 装	昆明西站彩印厂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7-5415-1794-1/K·43
定 价	24.00 元

2001. 1. 16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2048277

序言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由于远离中原发达地区，历史上被称做荒外蛮徼。中原王朝历来有比较强烈的区分中心和边缘的意识，“中国”一词，就是集中的体现。感觉上地理位置居中，民族便显得尊贵和高傲，文化也自视高人一等，于是就有了“北狄、西戎、东夷、南蛮”的称谓。云南作为南蛮边地的印象，一直沿袭下来，以至很多人今日说到云南，仍然马上会想到山川险阻、瘴疠迷漫以及大象、孔雀、异域人种……

然而，也并非所有的内地人都不了解云南，“美丽、神奇、丰富”，就是内地作家徐迟对云南的由衷赞美。最近几十年，随着交通的改善，信息传媒的发展，云南就像一位美丽的少女，走出了深闺，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边地与内地的不同。对于客观存在的差异，过去都习惯于从进化的角度去审视，即认为差异的原因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使然。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观点，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文化差异现象，于是便有了各种理论的探索，“地域文化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仅从字面上看，“地域文化”就比较科学，以地域区分文化，承认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相对性与多元性，着实是一个崭新的理

5A2071+2 3

念。不仅如此，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兴起的地域研究，还包含着跨学科、比较研究、持续发展等很多内容和方法论。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域类型丰富，民族文化多样性突出，积极开展地域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和极有意义的。

这套“边地文化丛书”，可以说就是地域研究的实践和成果。以地域研究的观点视之，所谓“边地”，并无蛮荒边徼的意思，而是强调地域特征；所谓“边地文化”，也并非是指搜罗原始文化和奇风异俗，而是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的地域和民族的文化。自然，说到云南的地域文化，那是一个宏大、丰富、深邃的渊藪，该丛书只不过是其姹紫嫣红的花海中的几簇花朵。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的特殊，这几簇花朵虽小，却也放射着夺目的异彩，散发着奇异的芳香。《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把我们带进了我国最后的刀耕火种“王国”，透过烟与火的迷雾，深刻地揭示了山地民族与森林的关系的动态演变过程。《原始物象——村寨的守护和祈愿》，搜集、研究了云南各民族祈愿吉祥和幸福的诸多象征物象，读后给人以文化和审美的双重满足。《绿色象征——文化的植物志》，是神奇的植物文化的揭密，是民族植物学领域开创性的研究成果。《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依据石寨山最新发掘的宝藏，从新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享誉中外的滇国青铜文化。从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出，该丛书的选题是比较精彩的，然而从地域文化的整体角度来看，它又显得比较单薄。云南地域文化的研究，理应还有许多重要的领域和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期待着“边地文化”之树苗茁壮成长，枝繁叶茂，百花烂漫。

尹绍亭

1999年10月28日

作者简介

尹绍亭，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民族学的教学与研究。著作有《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等。

目 录

绪论 刀耕火种研究的背景、理论和方法	(1)
一、中国刀耕火种研究概况.....	(3)
二、生态人类学的视野	(10)
三、调查研究方法	(14)
第一章 历史、分布和分类	(19)
第一节 历史的考察	(21)
一、羌系民族的刀耕火种	(22)
二、濮系民族的刀耕火种	(40)
三、苗瑶民族的刀耕火种	(43)
四、越系民族的刀耕火种	(46)
第二节 分布和分类	(48)
一、云南刀耕火种的分布	(48)
二、云南刀耕火种的分类	(57)

第二章 传统刀耕火种志	(71)
第一节 卡场景颇族的刀耕火种	(73)
一、地理环境	(73)
二、土地制度	(75)
三、“营旺”轮歇制	(79)
四、历法与农事	(83)
五、百宝地	(86)
六、农耕礼仪	(95)
第二节 勐海布朗族的刀耕火种	(99)
一、地理环境	(99)
二、社会组织	(101)
三、土地制度	(103)
四、刀耕火种技术	(106)
五、农耕礼仪	(114)
第三节 西盟佤族的刀耕火种	(117)
一、地理环境	(117)
二、社会组织和土地制度	(120)
三、栽培作物及生产技术	(123)
四、打洛寨的刀耕火种	(131)
五、猎头祭谷	(143)
第四节 基诺族的刀耕火种	(148)
一、地理环境	(148)
二、社会组织及土地制度	(151)
三、土地类型及耕作技术	(159)
四、栽培作物	(167)
五、发达的轮作技术	(172)
六、生产节令和生产过程	(179)
七、农耕礼仪	(182)

第五节 独龙族的刀耕火种·····	(185)
一、地理环境·····	(185)
二、社会组织·····	(190)
三、土地制度·····	(192)
四、土地类型及耕作技术·····	(196)
五、栽培作物及各月生产活动·····	(202)
第三章 比较研究·····	(207)
第一节 轮歇类型的比较·····	(209)
一、无轮作轮歇类型·····	(210)
二、轮作轮歇类型·····	(215)
三、人工造林轮歇类型·····	(223)
四、草地轮歇类型·····	(226)
第二节 耕作技术的比较·····	(235)
一、无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235)
二、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239)
三、草地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243)
第三节 迁移方式的比较·····	(248)
一、任意频繁迁移的民族·····	(248)
二、任意缓慢迁移的民族·····	(259)
三、匡定地域内移动的民族·····	(273)
四、定居民族的分寨迁移·····	(281)
第四节 坝子和山地人类生态系统的比较·····	(288)
一、坝子人类生态系统·····	(289)
二、山地人类生态系统·····	(301)
终章 文化、自然与发展·····	(335)
一、不应蔑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337)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340)
三、生存和发展·····	(351)
主要参考文献 ·····	(367)
后记 ·····	(375)



绪
论

刀耕火种研究的背景、
理论和方法

刀耕火种，在寒带和温带已经十分罕见，而在亚热带、尤其是在热带的部分地区，却仍然比较盛行。中国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作为森林农业形态的刀耕火种，在我国产生的历史极为悠久，古代其分布地也颇为广泛。然而，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调查研究还比较薄弱，这种状况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和文献之邦之称的中国是很不相称的。云南目前是中国尚保留刀耕火种较多的地区，多年来笔者一直专心致力于对云南刀耕火种民族的调查研究，作为成果此前已有两本小书出版和若干篇论文、报告发表，本书可以说是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概括和探索的结果。

一、中国刀耕火种研究概况

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古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可以作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情况，其实还谈不上什么研究，仅仅是散见于历史文献中的零星记载。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华阳国志·南中志》，隋、唐、宋、元时期的记载很少，明、清时期才多了起来。综观历史文献，可以让读者大致了解刀耕火种的比较有史料价值的文字记录，大概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明代顾峴所著《海槎余录》对海南黎族刀耕火种的记载：

“黎俗四、五月晴霁时，必集众斫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皓冽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上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又曰具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

他所，用前法别治。”^①

其二是民国初年夏瑚写的《怒俅边隘详情》对独龙江独龙族刀耕火种的记述：

“忙苦渡河以上，惟产收麦、膏粱、小米、苞谷、稗芋之类，以下则产旱谷。……江尾虽有牯牛，并不以之耕田，只供口腹；农具亦无犁锄，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等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耕火种。”^②

其三是20世纪40年代尹明德的《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对景颇族刀耕火种的记录：

“其人多山居，迁徙无常。……种植多杂粮、旱谷、稗子、小米、芝麻、芋薯、苞谷、荞豆之属。无犁锄，惟以刀砍伐树，晒干，纵火焚之，播种于地，听其自生自实，名曰刀耕火种。其法，今年种此，明年种彼，依次轮植，否则地力尽而不丰收矣。”^③

除了以上所举三段文字之外，其他有关刀耕火种的记载虽然很多，然而一般都只是三言两语，使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详。而且，几乎所有关于刀耕火种的历史记载，不是在所谓“诸夷风俗”之中，就是在“杂录游记”之下，而所有志书的“农业志”均不收录刀耕火种条目，甚至连近代若大卷帙的《新纂云南通志》，其《农业考》中也无刀耕火种一字之考。几千年来，中国众多民族的生计方式——刀耕火种，就这样一直被鄙视为“原始习俗”而与“农业”无缘，这显然是封建社会时代的民族和文化偏见。

①（明）顾翰：《海槎余录》，见《元明善本丛书纪录汇编》，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卷一百六十二，二页，1937。

② 夏瑚：《怒俅边隘详情》，见方国瑜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刻印本，六十九卷，一二一页。

③ 尹明德：《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民国二十年（1931年）排印本，三“人种”，七页。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可作为中国刀耕火种调查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绩，主要是田野调查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了对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较大规模的全面调查，调查结果大都汇编入国家民委主持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中。仅就西南地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的粗略统计，就有数十篇报告涉及彝族、哈尼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怒族、傈僳族、独龙族、德昂族、普米族、纳西族、基诺族、苗族、瑶族以及克木人和苦聪人的刀耕火种农业。这些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土地制度、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过程、栽培作物、单位产量等。然而，由于当时所有调查者都受社会形态进化论的指导，都把调查的视点专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判断及其互动关系的考察之土，因此，虽然接触到大量的刀耕火种现象，但是却没有把它视作重要的独立的研究对象——诸如视为特殊的农业类型、生计方式和农耕文化等来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调查，而仅仅只是依据“原始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对其加以取舍。这样一来，所搜集的资料自然残缺不全、不成体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云南少数民族做过大量田野调查的宋恩常教授就曾经不无遗憾地写道：“云南地处高原地区，山多林密，少数民族聚居，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内地。不仅在解放前，甚至在五六十年代，在许多地区仍保留着刀耕火种农业。刀耕火种农业是农业史上值得重视的问题，我在五六十年代进行民族调查时常遇到此问题，惜未深入系统调查。”^① 尽管如此，那一时期的民族工作者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实地调查，仍然抢救、保留下来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对于后人进一步地调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①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载《史前研究》，1985（4），38～44页。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刀耕火种农业受到空前的重视，成为很多学科甚至社会瞩目的对象，而且开始出现专题调查报告。归纳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农业史范畴的研究，另一个是生态环境角度的探讨。

关于农业史视野的调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罗钰的《云南景颇族旱地农业及其农具》^①，王军的《基诺族的刀耕火种》^②，周政华、盘剑波的《略论瑶族的游耕》^③，胡起望的《试论瑶族游耕的发展》^④，宋恩常的《云南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⑤，等等。这里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李根蟠和卢勋的调查研究工作。从1981年至1985年，他们在《农业考古》和《中国农史》两家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九篇报告，其中五篇分别是云南景颇族、怒族、独龙族、佤族和苦聪人的刀耕火种专题报告，有三篇探讨少数民族对中国农业科技的贡献，还有一篇是考证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以下一些论点：

景颇族、怒族、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曾经经历过一个从采集块根植物到人工栽培块根植物的过程。

将原始农业的初期阶段称之为“刀耕农业”，其进一步的发展是“锄耕农业”，再进一步的发展则是“犁耕农业”，即原始农业经历了从刀耕到锄耕再到犁耕这三个阶段的演变。

记述了刀耕火种的生产工具，以此证明在铁制生产工具产生

① 罗钰：《云南景颇族旱地农业及其农具》，载《农业考古》，1984（2），109~116页。

② 王军：《基诺族的刀耕火种》，载《农业考古》，1984（1），87~94页。

③ 周政华、盘剑波：《略论瑶族的游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3），19~24页。

④ 胡起望：《试论瑶族游耕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1），34~40页。

⑤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载《史前研究》，1985（4），38~44页。

之前，人们曾广泛使用过石木生产工具。

认为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初期阶段，从而提出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的论断。

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李根蟠和卢勋于 1987 年合作出版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一书，把对刀耕火种的农史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然而，当代刀耕火种最牵动人们的情感、最令人惶惑不解、最使研究者忧虑棘手的问题，却非古老的农业史问题，而在于它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一涉及当代人类较为关切的环境问题方面。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许本汉的《盈江山区刀耕火种问题研究》^①，尹宜公的《云南省景颇族刀耕火种农业的初步分析》^②，蔡家麒的《当代“刀耕火种”试析》^③，等等。关于刀耕火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刀耕火种并非是森林的“杀手”；而绝大多数学者则持相反意见，认为刀耕火种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因此极力主张立即彻底禁止刀耕火种，以下两段引文就代表了这样的观点。

陈宗仪在《关于西双版纳制止毁林开荒的探讨》一文中说道：

“解放初期，西双版纳森林覆被率为 66.7%，真是茫茫翠海，山川秀丽，四季长绿。像一片绿色海洋包围着一个个坝子，45 万亩水稻田靠‘绿色水库’涵养水土。……那时箐沟小河清水不断。1958 年后大量毁林开荒，20 年来森林覆被率下降到 33.9%，森林减少 600 多万亩，其中毁林开荒占一半左右。现交通沿线，很少看到莽莽的原始森林。边远地区保留的也不是完整

① 许本汉：《盈江山区刀耕火种问题研究》，载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调查研究》，1986（3），4~9 页。

② 尹宜公：《云南省景颇族刀耕火种农业的初步分析》（“热带森林与农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打印本，1987。

③ 蔡家麒：《当代“刀耕火种”试析》，载《民族研究》，1986（5），3~9 页。

的热带、南亚热带雨林和常绿阔叶林，许多地方变成光山秃岭，有山无树，有水不清。1958年后开的新田，有的因水枯竭而荒芜。荒山草地已扩大到800万亩，占总面积的27%，灌木丛林扩大到730万亩，占总面积的25%，植被类型演变出现次生类型，热带季雨林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被破坏后出现牡竹林、竹木混生林、藤冠灌丛、稀树灌木草丛、高草及中草禾草丛。……西双版纳若继续毁林开荒，将使荒山草地、灌木丛以及紫茎泽兰不断扩大，其后果不堪设想。”^①

著名学者于光远一直关注着云南的刀耕火种，他的观点与困惑无疑代表着中国学术界很多学者对刀耕火种的看法。他在给云南社会科学家的一封信中如是写道：

“关于西双版纳毁林开荒的问题，几年来我看到不少资料说这个问题很严重。科学家、记者对此发出了警告，领导同志也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很大的关心。原来我估计情况一定有了好转，可是这次去西双版纳看到的情况却和我原来想像的很不一样，这就是说：在那里毁林开荒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制止，甚至可以说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访问西双版纳的几天中，在我所到的勐腊、景洪、勐海三县，多次看到林木中熊熊燃烧的烈火，在那里一大片一大片已经烧过尚待开荒的土地到处可见。至于种过一两年后丢荒许多年的土地已不再是一片一片的，而是整个山头了。看到这些情况迫使我思考：为什么毁林开荒的现象制止不了？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我看到这些情况使我相信，如果不作更深入的研究，找到有效的措施并付诸实施，尽管舆论界和领导机关多次提出制止这种现象的要求，毁林开荒在事实上是停不下来的。而现在究竟应该采取

^① 陈宗仪：《关于西双版纳制止毁林开荒的探讨》，载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西双版纳经济问题研究专辑》，1987（10），5页。

什么有效措施，并未明确地提出来，因此就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这种研究必须迅速进行，因为西双版纳的森林在以往的30年中已经毁坏得很严重，再也经不起年复一年的耽搁了。毁林开荒这种现象一定要很快地制止。对于这种状况大家都很着急。研究工作应该走在实践的前面。我觉得我们社会科学界，特别是云南社会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责任，应该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当做一个紧急的工作来抓。……看到西双版纳毁林开荒的严重情况，对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快’！”^①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如上述那样的批判刀耕火种的文章很多，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看问题。而这一期间也出现了几篇观点新颖、立论客观、调查深入的研究报告，例如裴盛基的《用民族生态学的观点初探滇南热带地区的轮歇栽培》^②和尹绍亭的《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③。

以上介绍了中国刀耕火种调查研究的概况和面临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国刀耕火种的调查研究，是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刀耕火种完全被视为原始民族的原始习俗而不能登入“农业”的殿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刀耕火种则被作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而受到一定的注意，并获得了部分田野调查的资料；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后，刀耕火种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农业史研究领域若干调查报告相继发表，而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则是来自环境保护方面的热烈讨论。

① 于光远：《于光远给云南经济研究所的一封信》，载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西双版纳经济问题研究专辑》，1987（10），1页。

② 裴盛基：《用民族生态学的观点初探滇南热带地区的轮歇栽培》，载《农业生态系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6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

③ 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载《农业考古》，1988（1），109~127页；1988（2），128~146页。

二、生态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农史学家从来都把刀耕火种视为原始农业。然而，为什么原始社会和原始民族早已不复存在，而作为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却不肯消亡，一直沿袭下来，至今依然盛行？对此，农史学家没有做出解释。关心刀耕火种的其他学者，例如生态学者、林业专家等等，他们之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承认刀耕火种是“农业”，而把它叫做“毁林开荒”，或视为“原始陋习”，并且主张采取严厉措施加以禁止，然而又为屡禁不止而感到大惑不解。

刀耕火种究竟是什么？为什么盛行至今？今后将如何发展演变？这是刀耕火种研究者应该而且必须回答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们之所以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些基本的问题，我认为那是因为我们的调查研究存在着某些缺陷的缘故。

调查研究的缺陷，首先表现于研究者着眼点的偏差。我们看到，很多人研究刀耕火种，他们关注的对象，往往是刀耕火种本身，而对于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及其相关的社会和文化，则置之度外。他们完全不了解从事刀耕火种的少数民族，对他们的生存、愿望和发展毫不关心。这样研究获得的结果，自然难以避免偏颇和错误。其次，我们的研究者总习惯于用自身熟悉的“先进民族”和“先进地区”的模式去衡量和评判一切，他们从来不曾怀疑过对于“原始、落后、愚昧”的刀耕火种民族的蔑视和指责的“正确性”，更没有想到是否应该转换一下立场，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第三，由于对刀耕火种的看法已经先入为主，即成见在先，因此调查研究难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适己之用，能证明己论的材料便收罗之；不适己用，有悖己论的材料便弃而不用。第四，走马观花式的调查者多，深入细致的调查者少。总而言之，严重的民族或文化偏

见，紧跟形势注重宣传效应的参与动机，缺乏对研究主体的关怀，先定论后论证的“研究”方法，没有主位和参与概念的片面和肤浅的调查，在刀耕火种领域可谓表现得十分地突出。

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取消了文化人类学（或称民族学），认为它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资产阶级文化学科”。然而从刀耕火种的研究来看，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许许多多民族问题和民族文化的研究来看，如果说有所不足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不重视学习和应用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结果。

我们知道，文化人类学反对民族和文化中心主义，不轻率地以“先进”和“落后”、“好”与“坏”的价值观去简单地评判事物，而常常是以文化相对论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同时提倡主位的参与性的长期的调查方法，这些基本的原则，无论对于研究刀耕火种还是别的文化事项，都是十分重要和不可缺少的。而从刀耕火种所具有的突出的生态学意义来看，应用作为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的生态人类学的观点进行分析和研究，也许更为有益。

所谓生态人类学，简而言之，就是探讨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种方法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保护和利用，是这种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人类可以认识自然，掌握自然的规律，并根据自然规律开发和改造自然，从而求得生存和发展。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无疑是积极的主动的因素。然而人类在自然面前又远非是万能和无所不能的，在很大的程度上，人类还受制于自然的规定与约束。例如，人类在海洋环境中只能从事渔业而不可能去从事畜牧业；在干旱地带只能从事旱地农业而不可能开发大规模的水田。同样的道理，具有丰富森林资源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为人们提供的最便捷的生存方式就是刀耕火种农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社会以前人类的所有食物生产方式都是人类对于不

同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适应利用方式。刀耕火种也不例外，它并非是什么特定的原始社会的产物，而是森林民族的生存方式，是他们适应利用森林环境和森林资源的表现形式。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次进行考察。一个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人类，是指只有生物属性的人类，他们和其他动物一样，只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高级消费者”。这一层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作为高级消费者的人与低级消费者动物和生产者有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或它们）共同组成食物链，进行着简单的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这种纯粹的生物属性的人类，除了猿人时代之外，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第二个层次是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人类生态系统，简单而言就是反映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系统。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人，是指具有社会和文化属性的人类，这样的人类已经超脱出自然生态系统的范畴，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高级消费者与低级消费者及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生态系统中，人类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形式和技术等文化手段谋求实现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而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反作用之下，又不得不通过文化的手段尽可能地适应自然，并避免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人为的破坏。迄今为止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绝大部分就是这种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以文化为纽带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类的任何食物生产方式或生计方式都不是简单地向大自然的攫取，而是“文化”的行为。以此观之，刀耕火种也应是一种文化，是森林民族创造的独特的森林农耕文化。

那么，刀耕火种这一森林农耕文化有哪些文化要素呢？从大的方面看，它包括生态环境要素、社会文化要素、技术要素、产出要素、辅助生计要素、商品交换要素等，每一个大的文化要素之中又包括若干次一级的小的文化要素。这样的文化体系，可以

刀耕火种生态人类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各个子系统既有相对独立的功能，相互之间又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如果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那么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子系统甚至整个系统失去平衡。而当系统陷于紊乱状态时，系统可以依赖自身的调节机制的调适，使其恢复平衡，从而达到新的良性循环的状态。而如果系统的破坏超过了其所具有的调适限度，那么系统就将崩溃，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状态。刀耕火种，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平衡与失衡、有序与无序矛盾的动态的人类生态系统。

根据以上的理论，本研究将摆脱传统观点的束缚，跳出“原始”的视野，摒弃“落后”的偏见，从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相互关系的角度去考察、审视刀耕火种，同时运用“生态人类系统”的概念进行分析和整合，并探讨研究系统中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状态及其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从而达到揭示人与自然、人与森林和谐相处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规律的目的。

三、调查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刀耕火种是山地森林民族的生业，是他们对于山地森林生态系统的适应方式，简单地说是他们的生存行为。因此，研究刀耕火种就必须以山地民族为中心，即必须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而不应该像很多自然科学者那样，见物见事不见人，把山地民族这一刀耕火种的主体撇在一旁，而一味单纯地去考察刀耕火种对森林、土壤、河流、生态系统的影响。那样的研究成果，显然是不可能获得全面、正确的结果的。另一方面，以人为中心考察刀耕火种，又必须重视人类的社会文化属性，将其摆在重要的位置。社会文化是联系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的纽带，刀耕火种所反映的人与自然、人与森林的关系，其实是通过社会文化来表现的，

刀耕火种的矛盾运动及其演变的过程，也就是人类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研究刀耕火种，不仅必须以人为中心，还应该紧紧抓住社会文化这个关键。

既然研究刀耕火种必须以刀耕火种民族及其社会文化为基本的着眼点，而前人又没有为我们留下多少系统的文献资料，那么除了进行田野调查之外，是没有其他途径可走的。然而面对云南众多的刀耕火种民族，在开始调查的时候，又不能“普遍开花”，而只能先做小范围的定点的调查研究。笔者于1983年最早去的地方，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地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通过对西双版纳的几个刀耕火种山区进行了解和比较之后，决定把景洪市（当时的景洪县）的基诺山（基诺族聚居的山区，行政区划则是基诺族乡）作为调查对象。为什么选择基诺山？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基诺山的基诺族是历史悠久的典型的刀耕火种民族，这种状况直到目前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基诺族的刀耕火种，无论从轮歇类型还是从生产技术、栽培作物等方面来看，都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从自然方面来看，基诺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而从人文情况来看，该区又是一个单一的基诺族聚居区，便于调查研究；基诺族目前正经历着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过程，面临着传统刀耕火种变革的一系列问题；基诺山有一批具有丰富的刀耕火种生产经验，通晓本民族历史文化，对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并具有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的干部和群众；基诺山是我的老师杜玉亭教授数十年的调查基地，他在基诺族中的崇高威望和与基诺人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为笔者深入调查提供了很多便利。从1983年到1987年，笔者于不同季节六次去了基诺山。在与基诺族共同生活和劳动的过程中，通过访谈、观察和体验，不仅获取了丰富的资料，而且深切地了解了基诺族对刀耕火种的看法，认识了其社会文化与刀耕火种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对于笔者学术观点的形成，起了关键的作用。通过四年的

调查研究，笔者发表了《基诺族的社会制度及农耕礼仪》（1987年）、《基诺族传统刀耕火种经济文化的变迁》（1987年）、《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1988年）等几篇研究报告。

研究刀耕火种这样的课题，定点研究是基础。通过对一个地点一个民族的深入考察，大体上可以了解刀耕火种的一些基本的文化特质。然而，如果只进行定点研究那是很不够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一个地点、一个民族的事例，只是一种类型，它并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状况。如果欲充分了解刀耕火种文化类型的多样性，欲从整体上把握刀耕火种及其演变的规律，那么就必须在定点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多地区、多民族的比较调查研究。为此，在基诺族的调查暂告一个段落之后，从1987年秋天到1992年末，笔者又八次赴滇南、滇西南、滇西和滇西北进行比较调查研究。这一期间调查过的地区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瑶族聚居的瑶区、哈尼族和克木人分布的勐棒乡、哈尼族和瑶族聚居的麻木树乡，勐海县哈尼族聚居的南糯山乡，景洪市的哈尼族村寨曼贺冬、拉祜族村寨安麻老寨以及三达人的村寨等；思茅地区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的瑶族村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糯福乡，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打洛等村寨；临沧地区沧源佤族自治县的永和、糯良等村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景颇族和傈僳族杂居的卡场乡，潞西县景颇族和德昂族杂居的三台山乡，梁河县山区的德昂族村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自治县北部的独龙族、傈僳族村寨和藏族、怒族杂居的丙中洛乡，福贡县的老母登村、水古甲村等怒族和傈僳族村寨，泸水县勒墨人（白族支系）聚居的洛本卓乡、傈僳族和景颇族杂居的片马乡等。

刀耕火种的比较研究，涉及这样一些内容：民族历史、社会组织、村落形态、人口、生态环境、气候、土壤、植被、土地类型、资源管理方式、生产工具、耕作方式、生产节令、栽培作

物、生产技术、生产过程、采集狩猎、经济作物、市场交换、农耕礼仪、社会变迁等。从以上内容可知，刀耕火种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因而在整个调查研究过程中，都要尽可能地吸收和借鉴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农学、农业史、林学等学科的知识 and 有关的科研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具有一定水平的研究成果。

从1988年起，笔者开始发表比较研究的文章，代表性的论文有《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类型及人类生态学比较》（1988年）、《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1989年）、《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兼与其它刀耕火种民族的比较》（1992年）等。1991年，第一本研究专著《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出版。1994年，第二本专著《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出版。1996年在日本东京，应东京学艺大学的白坂蕃教授（现为立教大学教授）和他的学生林红女士之约，写了名为《云南刀耕火种研究》的书稿交其翻译。几年来，除了日本学者对拙著比较感兴趣之外，东南亚和欧美的同行也非常希望了解云南的刀耕火种，为促进学术交流，美国福特基金会决定资助出版拙著的英文版，译者选择了瑞典学者马思中博士。为了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云南刀耕火种的状况，笔者遂决定在原有著作的基础上再次编写新的本子。从1997年开始，历时两年多，断断续续，编写成了现在这本书稿。

本书分绪论和四章。绪论谈中国研究刀耕火种的状况和笔者的方法论。第一章追溯了云南刀耕火种的历史，介绍了当代云南刀耕火种的地理分布，并根据轮歇方式等要素对云南刀耕火种进行了分类。第二章是笔者所调查的几个典型的刀耕火种林区的调查资料，它们构成了本研究进一步深入讨论的基础。第三章分别对刀耕火种的几个最重要、最基本的文化侧面进行比较研究，这一章可以说是本书的重点所在，笔者的若干学术观点在本章得到

了较为充分的表现。终章“社会、文化和发展”是对全书的概括和总结，亦即对刀耕火种历史演变规律的概括和总结。同时，在行将结束本研究的时候，笔者当然不会忘记目前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的云南众多的山地民族，如果本研究能够使人们对他们的生业和文化多一些认识和理解，如果本书的一些观点和建议对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够产生些许积极的影响的话，那么笔者也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第一章

历史、分布和分类

刀耕火种，宋代以前叫做“畚田”。中原地区，“畚田”较早见于唐代诗歌之中。元稹《酬乐天咏通州诗》云：“田仰畚刀少用牛”，“水种新秧被，山田正烧畚。”刘禹锡《咏三峡竹枝词》云：“银川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畚。”温庭筠《烧歌》云：“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自信焚越谷，烧畚为旱田。”西南地区畚田的记载比中原地区早一些，晋代常璩所著《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牂牁郡，……俗好鬼巫，多禁忌。畚山为田，无蚕桑。”西汉牂牁郡地望在今云南东南和贵州西南一带。所谓“畚田”，就是刀耕火种。宋代范成大的《劳畚耕并序》说得明白：“畚田，峡中刀耕火种之地也。”宋代之后，“畚田”用得少了，“刀耕火种”一词在文献中逐渐流行起来，并一直沿用至今。那么，云南各民族刀耕火种的历史大致是什么样的状况呢？过去和现在的分布情况怎样？能够划分出多少种类型？这是本章欲考察的内容。

第一节 历史的考察

刀耕火种农业，古代曾分布于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而当代则仅仅残存于中国西南边境地带。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的云南省，是中国刀耕火种残存最多的省份。对于关心这一农业形态或文化形态的研究者来说，云南十几个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堪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内容丰富的文化宝库。然而在进行现状实态的考察之前，却有必要对其历史的状况有所了解。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偏见和歧视，古代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均被弃之于正史之外，大多数归到“奇风异俗”之列。即使如此，辑录者也不屑多着笔墨，往往不过三言两语，而且其中似乎夹杂着道听途说、沿袭抄录的成分。因此，对云南刀耕火种的历史，很难进行深入系

统的研究，而只能依据一些零零星星的记载粗略地勾划其轮廓。为了叙述方便，本文拟采用民族史家所划分的云南民族源流系谱逐一进行考察。

一、羌系民族的刀耕火种

秦汉之际，滇西北连接川藏的“西自同师以东，北至牂榆”的地区，分布着属于羌人族系的“昆明人”和“僇人”。^① 西汉以后，“昆明人”逐渐向东移，东汉时一部分进入滇中，魏晋时到达滇西北、黔西，进而成为西南地区的“大种”。“昆明人”和“僇人”以及后来不断南下入滇的羌系民族，流动性强，活动地域广，自魏晋之后，分化日益显著，形成了具有不同称谓的众多的山地民族。

彝族 彝族先民魏晋至唐宋期间他称为乌蛮，元代继称乌蛮亦称罗罗，明清称罗罗，近代始称彝族。彝族是“昆明人”、“僇人”后裔中人数最多、支系最为复杂、分布最广的民族。其农业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山地刀耕火种和坝区灌溉农业两种类型。彝族的灌溉稻作农业，最早可能产生于魏晋时迁居坝区的部落之中。杨慎《滇载记》说诸葛亮征服南中之后，“诸夷慕武侯之德，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②，这里的“诸夷”也许包括彝族先民在内。此后至清代，陆续有由山人坝向灌溉稻作民转变的彝族。唐朝初年，滇西有“耕于巍山之麓”，“孳牧繁衍，部众日盛”的乌蛮。^③ 元朝，由于滇中官吏重视发展农业，

① (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世界书局影印本，五一六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② (明)杨慎：《滇载记》，影明刻本历代小史，卷一百五，一页，商务印书馆，1937。

③ 蒋彬：《南诏源流纪要》，近代抄本，二页，云南省图书馆藏。

于是“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①。明代，出现了“近滇池”，“濒池捕鱼”的罗罗。^②入清之后，坝居彝族更众，文献称他们为“海罗罗”、“坝罗罗”、“水田罗罗”。如雍正《云南通志》说：“海罗罗，亦名坝罗罗，以其居平川种水田而各名也。土人以平原可垦为田者呼为海，或称为坝，故名。”^③又《清职贡图》说：“海罗罗，一名坝罗罗，或曰即白罗罗也。与齐民杂处，勤于耕作，急公输税。”^④倪蜕《滇小记·滇云夷种》亦言：“坝罗罗，寻甸有之，以其居平川、种水田而名之也。”^⑤

综观云南彝族，自魏晋迄明清虽不断有部落分化下坝，然而大部分仍然一直居处山林。山地彝族各部落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刀耕火种农业在各部落中产生的时间和发展程度也有显著不同。《新唐书·南蛮传》载：“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⑥又载广布于川滇交界地段的乌蛮：“其种分七部落。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有髻，女子披发，皆衣牛羊皮。”^⑦据此分析，唐代大多数山地彝族似乎还过着以畜牧为主的生活。此后的宋、元、明三代，这种状况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例如，《宋史·叙州三路蛮》说：“叙州三路蛮：……俗椎髻、披毡、佩刀，

① 《元史·张立道传》，一版，三九—五页，北京，中华书局，1976。

② （明）郑颺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卷一《云南府昆阳州》，五二页。

③ （清）鄂尔泰：雍正《云南通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影印原书版，卷八，1988。

④ 《清职贡图》，近代抄本，卷七，六三页，云南省图书馆藏。

⑤ 倪蜕：《滇小记·滇云夷种》，云南丛书刻本，六二页，1914。

⑥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南蛮传》，一版，六三一—八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⑦ 同上书。

居必栏棚，不喜耕稼，多畜牧。”^① 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说：“罗罗即乌蛮也。……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数千，少者不下数百。……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嵩皆比类也。”^② 明谢肇淛《滇略·夷略》说：“楚雄之一罗婺，居山林高阜，以牧羊为业。”^③ 自明以后，在一些部落中刀耕火种农业有所发展。如“罗婺”部落，明时还“以牧养为业”，入清之后，虽仍然“喜山居”、“暇则射猎”，但“耕者助力”，农业已有进步。又如“母鸡”部落，天启《滇志》卷三十言其“迁徙无常”，万历《云南通志》卷二临安府引《旧志》说其“藏匿山林，惟事剽掠”，而雍正《临安府志》卷七《风俗附种人》则说母鸡部落“刀耕火种为食”，雍正《阿迷州志》卷十一亦言该州母鸡部落“耕山食莽，暇则射猎”，母鸡部落明清之际的发展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除上述“罗婺”、“母鸡”之外，明清两朝从事刀耕火种的彝族支系还有不少，兹辑录部分于下。

《云南图经志书》卷《马龙他郎甸》：

“境内有车苏者，居高山之上，垦山为田，艺荞稗，不资水利。然山地硗薄，一岁一易其居，以就地利。暇则猎兽而食之。”^④

《滇略·夷略》：

①（元）脱脱等撰：《宋史·叙州三路蛮》，一版，一四二三八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

②（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王叔武校注本，八九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③（明）谢肇淛：《滇略·夷略》，钦定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校本。

④（明）郑颢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卷三《马龙他郎甸》，一七页。

“曲靖之夷曰黑白爨，椎髻衣服，居深山，虽高岗磽坳，亦力垦之，种甜苦二莽自贍，善畜马，牧养蕃息。”^①

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三《志蛮》：

“黑罗罗……男子耕牧，高岗磽坳必火种之，顾（故）不善治水，所收菽稗，无嘉种。”^② “撒弥罗罗者，……山居耕瘠贩薪。” “阿者罗罗，……耕山捕猎，性好迁徙。”^③

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

“小列密，云州有之，刀耕火种，精于射猎，遇雀鼠则以弓取而烙食之”。^④

雍正《富民县志》卷一：

“邑治原无土司，四山僻有黑白保罗……二种，无稻田，种山地，编茅为屋，刀耕火耨……”^⑤

乾隆《东川府志》：

“干罗罗，最勤苦，近皆畏威怀德，一洗从前旧习，……刀耕火种，农隙则樵牧渔猎。”^⑥

乾隆《开化府志》卷九：

“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猺猺，……依山谷险阻者皆是，

①（明）谢肇淛：《滇略·夷略》，钦定四库全书本，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校本。

②（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本，卷十三《志蛮》，三—五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③ 同上书。

④（清）鄂尔泰、靖道溥纂修：雍正《云南通志》，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卷二十四。

⑤（清）杨体乾、陈宏谟纂：雍正《富民县志》，传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清雍正九年（1731年）刻本，卷一。

⑥（清）方桂修、胡蔚纂：乾隆《东川府志》，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刻本，卷八，一—三页。

……大略寡者则刀耕火种。”^①“刺溪，性愚，居深山，火耨刀耕。”^②

《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五：

“利米蛮，……妇女青布裹头，短衣跣足，时出樵采，负薪而归，刀耕火种，土宜莽稗。”^③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

“白保保，即白伊伊，思茅、威远、他郎有之。……刀耕火种，并好游猎。”^④

刘慰三《滇南志略·广南府》：

“扑喇，……居高山峻岭，……刀耕火种，数易其土，以养地力。”^⑤

光绪《丽江府志稿》卷一：

“伊伊散处荒山，刀耕火种，皆鹤庆海西子种。”^⑥

上述记载说明，绝大多数山地彝族的刀耕火种农业兴于明清两朝，尤以清朝为盛，而其分布则远比今日广泛。彝族实为古代云南最大的刀耕火种民族。

哈尼族 唐朝初年，原称“乌蛮”中的一部分以“和蛮”之名见于文献，这是有关哈尼族的明确记载。据哈尼族口碑传说，

①（清）汤大宾修、赵震纂：乾隆《开化府志》，传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卷九，八页。

② 同上书。

③（清）鄂尔泰、靖道谟纂修：雍正《云南通志》，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卷一百八十五。

④（清）郑绍谦纂：道光《普洱府志》，清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卷十八，二八页。

⑤（清）刘慰三：《滇南志略·广南府》，传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清光绪初抄校稿本。

⑥（清）陈宗海修、李福宝等纂：光绪《丽江府志稿》，传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稿本，卷一。

其先民原住北方的“努美阿玛”，约秦汉之际，分两路南下迁徙：一路自川西到昆明一带，再往南至滇东南；一路从滇西北进洱海区，进而陆续南下到哀牢山、无量山区。

据哈尼族迁徙史诗记述，其先民在北方发源地之时已有栽培作物。现居西双版纳勐腊县麻木树乡的哈尼族，系自红河地区迁去。1985年笔者到该乡调查，坝落寨老人达努能背诵近五十代家谱，并说他们过去世代保持着这么一个传统：由于经常因打猎、战争等原因而迁移，所以男子总是随身带着三穗小米（粟），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把小米种下，来年便可收获。以此观之，哈尼族从事农业的历史是比较悠久的。

哈尼族中发展较快的支系，又是比较早的水田稻作民，并以善开梯田而闻名。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描述哀牢山区哈尼族的梯田是十分壮观的：“依山麓平旷处，开作田园，层层相间，远望如画，至山势峻急，躐坎而登，有石梯蹬。山源高者，通以略杓，数里不绝。”^①《蛮书》卷四也有类似的记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②哈尼族开垦梯田的技术，也许在唐代就达到较高的水平了。

与彝族“海罗罗”、“干罗罗”的分化一样，整个哈尼族的发展也极不平衡，其中有耕种梯田者，亦有不少从事刀耕火种的。乾隆《开化府志》说窝泥“多处山麓种地”^③；乾隆《景东直隶厅志》卷三说哈尼支系喇乌“山居，亦务种植”^④；道光《普洱

①（清）江俊源纂修：嘉庆《临安府志·土司志》，清光绪八年（1882年）补刊清嘉庆四年（1799年）刻本。

②（唐）樊绰：《蛮书》，浙西村舍清刻本，卷四，三〇页。

③（清）汤大宾修、赵震纂：乾隆《开化府志》，传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卷九，八页。

④徐树闾修、张习政等纂：乾隆《景东直隶厅志》，传抄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清乾隆末年本，卷三。

府志》卷十七说：“黑窝泥，宁洱、思茅、威远、他郎皆有之。……在宁洱者，刀耕火种”^①；《滇南志略·临安府》说哈尼支系糯比“居处无常，山荒则徙，耕种之外，男多烧炭，女多织草为排。”^②

另有一些“巢居”或“藏匿”于“极险山林”的哈尼族，则长期过着主要以狩猎采集为食的生活。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说安南州（今双柏县）“西南有和泥蛮者，衣不掩胫，〔妇女〕不谙女工，惟打猎捕雀以供其夫。”^③康熙《新平县志》卷二《新化州风俗》说新平一带的哈尼支系喇乌“居深山茂林，不种田，种棉花，采芦捕猎为生理。”^④《滇南志略·临安府》说哈尼支系卡堕“女事耕作，男佩刀枪，以捕猎为生。”^⑤

古代哈尼先民的南下大迁徙，至今史诗般地流传于世。在这一迁徙过程中，或因外族的影响，或因地理环境的制约，有的很早便成为灌溉稻作民，有的则从事刀耕火种，采集和狩猎，并一直延续至今。

傈僳族 傈僳族名最早见于《蛮书》。《蛮书》卷四载：“粟粟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⑥《蛮书》没有谈到这一民族的生活方式，宋元两代亦少有傈僳族的记载。从明清史料看，远不说元代以前，就是明代该

①（清）郑绍谦纂：道光《普洱府志》，清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卷十七，二二页。

②（清）刘慰三：《滇南志略·临安府》，传抄上海徐家汇藏书楼藏清光绪初抄校稿本。

③（明）郑颢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卷四，一二页。

④（清）张云翮修，舒鹏翮纂：康熙《新平县志》，传抄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本，卷二《新化州风俗》。

⑤ 同②。

⑥（唐）樊绰：《蛮书》，浙西村舍清刻本，卷四，二一页。

族也未必有多少农业可言。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有名栗栗者，亦罗罗之别种也，居山林，无室居，不事产业。常带药箭弓弩，猎取禽兽，其妇人则掘取草林之根以给日食。岁输官者，唯皮张耳。”^① 天启《滇志》卷三十载：“力些（栗栗），惟云龙州有之。男囚首跣足，衣麻布直撒衣，披以毡衫，以毳为带束其腰，妇女裹白麻布衣。善用弩，发无虚矢。”^② 杨慎《南诏各种蛮夷》载：“力些，即傈傈。衣麻布披毡，岩居穴处，利刀毒矢，刻不离身，登山捷岩猿猱，以土和蜜充饥，得野兽即生食，尤善弩，每令其妇负小木盾前行，自后射之，中盾而不伤妇，以此制服西番。”^③ 又乾隆《瓦江府志略》上卷亦言傈傈：“崖居穴处，或架木为巢；身着麻布，披毡衫；猎取野兽为食；食尽即迁，居无定所。”^④ 据此可知，直到明末清初，傈傈族还是比较典型的狩猎采集民族。

16世纪中叶以后，傈傈族曾多次大规模往西和往南迁入澜沧江和怒江等地。不断地迁徙，扩大了和其他民族的接触与交往，有利于傈傈族向农业社会发展。到了清朝，有关该族农业的记载已见诸文献。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言傈傈：“喜居悬岩绝顶，垦山而种，地瘠则去之，迁徙不常。”^⑤ 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云龙州风俗》载：“栗栗，于诸夷中最悍，依山负谷，射

①（明）郑颢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卷四，三二页。

②（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古永继点校本，卷三十，九九九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③（明）杨慎：《南诏各种蛮夷》，见《南诏野史》，清光绪六年（1880年）云南书局刻本。

④（清）管学宣修、万成燕纂：乾隆《瓦江府志略》，清乾隆八年（1743年）刻本，上卷。

⑤（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艺海珠尘》本（《丛书集成》本），《云南备征志》收入。

猎为生，长刀毒弩，日不离身。祭赛则张松棚燃炬，剥獐鹿诸兽而已。亦事耕种，饶黍稷莽稗。”^①《永北直隶厅志》卷七《兰坪土千总》说：“劳步（傣傣，笔者注）一种，住居高山，刀耕火种，采樵营生，……”^②《永昌府志》载：“劳步居住高山，刀耕火种，无农具，每届秋末，砍伐树木，以火焚之，插以杂粮，谓之刀耕火种。春冬即以游猎为生。”^③

清嘉庆七年（1802年）云贵总督觉罗琅玕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傣傣有家野之分，家傣傣住澜沧江内，耕田住屋，各有村寨头人，能通汉语，服官管束，惟种有青稞、苦荞，并无粮钞，每遇冬季江水浅涸之时，即过江在山后一带打牲为食。”清朝后期出现的“耕田住屋”的家傣傣，是分布于靠近丽江、大理、保山等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受汉族、白族、纳西族影响较多的部分；而大多数居住于怒江峡谷的傣傣族则较长时期地继续着刀耕火种兼行采集狩猎的生活方式。

拉祜族 在拉祜语中，“拉祜”是烤吃虎肉的意思，以“拉祜”命名，是取“猎虎的民族”之意。在拉祜族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原住洱海以北地区，公元10世纪以后，才陆续南迁至滇南澜沧江两岸。关于迁徙的情形，拉祜人是这样叙述的：在不断追捕马鹿等野兽的过程中，其祖先一面往南搬迁，一面试种小红米，希望找到土地肥美、资源丰富的地方。

从传说来看，拉祜族在10世纪后已有农业，然而文献却缺乏这方面的佐证。清朝初年，拉祜族才以“傣黑”等名见于文献。各地“傣黑”的生业有所不同，大抵从事刀耕火种，亦有多

① 转引自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1版，50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② 同上书，51页。

③ （清）宣世涛纂修：《永昌府志》，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刊本，云南省图书馆残本。

仰赖采集狩猎为生者。如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载：“黑濮，所居多在威远、普洱、江界之间。……耕山力穡，颇知纺织，多作竹器，入市贸易。”^①“倮黑，顺宁有之，亦蒲棘之异派，其俗与棘人不甚相远。蜂、蛇、鼠、蛤无所不噉。然勤于耕作，妇人任力，男子出猎，多居山间。”^②《滇小记·滇云夷种》载：“大猓黑，云州有之，……所食菽稗为上品，余啖树皮野菜藤蔓及蛇、虫、蜂、蚁、蝉、蚓、禽、鸟，遇之生食，不葺芦舍，岩居野处，与野人同类。”^③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载：“野倮，即倮黑，……随身常带枪刀弩弓，不事耕作，以捕猎为生。”^④

清朝末年，各地拉祜族农业发展呈现较大差异。在人口约占该族总数一半以上的澜沧县东北部及双江、临沧、景谷、镇源、墨江、元江等地，由于开发较早，人口密度大，灌溉稻作农业已占主要地位；而分布于澜沧县西南部、孟连县、沧源县、耿马县以及西双版纳等地的拉祜族，则从事刀耕火种。

苦聪人 苦聪人语言近似拉祜族，与拉祜族族属关系密切。《新唐书》中记载的“锅铨蛮”可能是苦聪人的先民，隋唐时期他们分布于楚雄至大理一带，明清时被称为“果葱”、“苦葱”、“苦宗”、“小古宗”，居地已迁至滇南。^⑤关于苦聪人的生业，清代始有较多记载。康熙《元江府志》卷二《彝人种类》说：“苦聪，居无定处，缘箐而居，衣食粗淡，故以苦名。刀耕火种，常

① (清)鄂尔泰修：雍正《云南通志》，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卷二十四。

② 同上书。

③ 倪蜕：《滇小记·滇云夷种》，云南丛书刻本，六二页，1914。

④ (清)郑绍谦纂：道光《普洱府志》，清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卷十八，二八页。

⑤ 参见尤中：《云南民族史》，1版，27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食荞麦。”^① 康熙《新平县志》卷二《新化州风俗》载：“苦葱，性险，居山崖，种荞稗度日。”^② 雍正《景东府志》载：“小古宗，男如小罗罗，衣短衣，以带缠腰，下着麻布密褶裙。织麻布，以叶构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野菜为食，性喜猎。”^③ 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载：“苦聪，爨蛮之别种，今临安、元江、镇源、普洱四府有此种。居傍山崖，男子椎髻，以蓝布裹头，着麻布短衣，跣足，挟刀弩猎兽为食。妇女短衣长裙，常负竹笼入山采药。土宜禾稻，岁输粮赋。”^④ 从这些记载可知，清代的苦聪人完全是典型的刀耕火种、采集狩猎民。

纳西族 史家认为，汉代“牦牛种”和“旄牛夷”为纳西族先民。汉代以来，纳西族又有“摩沙”、“磨些”、“么些”、“摩梭”等称谓，其实是同意异写。纳西族的古代称谓，皆为古纳西语的“牧牛人”之意，以此观之，纳西族先民应是一个畜牧民族。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古代纳西族并非单纯从事畜牧业，而是一个亦牧亦农的民族。如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末步蛮在大理北，与吐蕃接界，临金沙江，地凉、多羊、马及麝香，名铁。……饮食疏薄，已半实粮也。一岁之粮园粮（疑为圆根之误，圆根即蔓菁），贫家盐外不知别味。”^⑤ 余庆远《维西见闻录》“夷人”引《丽江府志》：“夷民不习织纺，男女皆刀耕火种，






















①（清）章履成纂修：康熙《元江府志》，抄北京图书馆藏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刻本，卷二《彝人种类》。

②（清）张云翮修、舒鹏翮纂：康熙《新平县志》，传抄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抄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本，卷二《新化州风俗》。

③ 转引自云南省编辑组编：《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1版，68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④（清）阮元等修、王崧等纂：道光《云南通志》引《清职贡图》，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

⑤（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毛叔武校注本，九三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力作最苦。耕用二牛，前挽中压后驱。平地种豆麦，山地种荞稗，弃地种蔓菁。”^① 纳西族古老的象形文字更能说明问题。在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中，固然有（牛）、（水牛）、（牦牛）、（犏牛）、（绵羊）、（山羊）、（卷角羊）、（马）等牲畜，但也有（葫芦）、（小麦）、（大麦）、（青稞）、（燕麦）、（稻）、（稗子）、（黍）、（高粱）、（苦荞）、（甜荞）、（黄豆）、（蚕豆）、（瓜）、（蔓菁）等栽培作物；既有表示畜牧的，如（牧牛）、（牧羊）、（牧犬），亦有表示农耕的，如（锄地）、（修沟）、（耕地）、（砍树）、（烧树）、（点种）、（撒种）等。下面这一组象形文字，是古代纳西族对刀耕火种农业的描述：



其意义翻译为：

在以往的日子里，
我呀，能干地砍了九片森林，
砍完又烧山，
烧完又播种，
播完又收拣。^②

^①（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艺海珠尘》本（《丛书集成》本），《云南备征志》收入。

^②方国瑜编撰、和志武参订：《纳西象形文字谱》，1版，143、163、52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由此可知，纳西族是农牧并举民族的典型。而其生业的发展史，则大致是从以畜牧为主兼行农业向以农业为主兼行畜牧演变这样一个历史过程。

景颇族 景颇族先民隋唐时期称为“寻传蛮”、“裸形蛮”、“野蛮”。《蛮书》卷四载：“寻传蛮，阁罗风所讨定也。俗无丝棉布帛，披波罗皮（虎皮），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①，“裸形蛮，在寻传城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野蛮。……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作葛栏舍屋，多女少男。无农田，无衣服，唯取木皮以蔽形。或五妻十妻共养一丈夫。终日持弓，不下葛栏，有外来侵暴者则射之。其妻入山林，采食虫菜螺蚬等归啖食之。”^②《蛮书》卷二又载：“从腾冲过宝山城，又过金宝城以北大赅，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其山土肥沃，种瓜瓠长丈余，冬瓜亦然，皆三尺围。又多薏苡，无农桑，收此充粮。”^③《新唐书·南诏传》亦载：“其西有裸蛮，亦曰野蛮，漫散山中，无君长，以栏舍以居。男少女多，无田农。”^④显然，隋唐时期景颇族先民主要以狩猎采集为生。

元明时期，景颇族有一部分名为“阿昌”，其余则叫做“野人”、“野蛮”、“结些”、“遮些”、“羯些子”。从以下文献记载可知，与隋唐时期比较，一部分景颇族仍无多少变化。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野蛮在寻传以西，散居岩谷，无衣服，以树皮蔽体，……不事农亩，入山林采草木及动物而食。”^⑤《滇

①（唐）樊绰：《蛮书》，浙西村舍清刻本，卷四，一八页。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卷二，七页。

④（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南诏传》，一版，六二七—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⑤（元）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王叔武校注本，九五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略》卷九载：“茶山、里麻之外，有一种野人，……男女渔猎为生，茹毛饮血。夜宿树上，逢人即杀。无酋长约束。”^①在天启《滇志》等文献中亦有类似的记载。不过，明代亦开始出现了关于景颇族农业的线索。《滇略》便说：“阿昌，好居高山，刀耕火种。”^②

比较具体地描述景颇族刀耕火种的文献，是李学诗的《滇边野人风土记》。其文载清末民初的景颇族以“耕种为唯一职业，凡稻谷、玉蜀黍皆种山地，每年冬季砍伐森林，春暮干燥，则焚烧之，俟冷熄后，以竹签戳洞播种。”^③近代尹明德在《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中的记述更为详细：“其人多山居，迁徙无常。……种植多杂粮、旱谷、稗子、小米、芝麻、芋薯、苞谷、莽豆之属。无犁锄，惟以刀砍伐树，晒干，纵火焚之，播种于地，听其自生自灭，名曰刀耕火种。其法，今年种此，明年种彼，依次轮植，否则地力尽而不丰收矣。”^④

阿昌族 阿昌族历史上有“峨（娥、莪、萼）昌”之名，唐代称“寻传蛮”。据《蛮书》记载，“寻传蛮”多行采集狩猎。南诏西开寻传（今澜沧江上游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游以东地带），影响了寻传地区社会的发展，至大理时，部分阿昌先民已转而从事灌溉农业。王文凤《云龙纪往·阿昌传》载：“时诸山未知开田，树木丛杂，多产芦子，行商采之获利，客商益众。又四五世至早疆，奘王段氏遣人抚之，疆降，受其诰命，岁有常贡。商贾有不归者，教夷人开田，有喇鲁习其法，于是始有田亩，积岁屡丰。”

处于边远闭塞之地以及在宋元时期越过澜沧江、怒江到达今

①（明）谢肇淛：《滇略》，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卷九。

② 同上书。

③ 转引自李根蟠、卢勋：《从景颇族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载《农业考古》，1982（1），111页。

④ 尹明德：《滇缅北段界务调查报告》，民国二十年（1931年）排印本，三“人种”，七页。

德宏州西北一带的阿昌人，生业状况却有所不同。《滇略》卷九言北胜州（今永胜县）的阿昌：“巢处山林，挟兵带弩，以采猎为生而已。”^①这是较多依赖采集狩猎的部分。而在明代，刀耕火种在一些阿昌族中亦是非常盛行的。如《百夷传》所载：“蒲人、阿昌、哈喇、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又《滇略》卷九所载：“阿昌，一名峨昌，耐寒畏暑，喜燥恶湿，好居高山，刀耕火种。”^②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亦载：“阿昌枕山栖谷，以便刀耕火种也。”^③

明朝中期以后，大量汉族进入德宏一带，受汉族及傣族的影响，不少阿昌族下居坝子边缘，逐渐放弃了刀耕火种生业方式。

普米族 普米族史称“西蕃”。《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四引《清职贡图》载：“西蕃，本滇西北徼外夷，又名巴苴，流入永北、丽江二府，居深山，聚族而处。”^④元朝以前自川、藏不断流入滇西北的普米族，至明朝中期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载：“永宁府所辖四长官司多西蕃民，性最暴悍，佩刀披毡，无室屋，夏则山巅，冬则平野以居，而畜牛马，有草则往，无草则移，初无定所。”^⑤天启《滇志》卷三十载：“西番、永宁、北胜、蒗蕨凡在金沙江北者皆是。……住山腰，以板覆屋。俗尚勇力，善射。……性暴悍，随畜迁徙。又有野西番者，悠去悠来，尤不可制。”^⑥

①（明）谢肇淛：《滇略》，传抄文澜阁四库全书本，卷九。

② 同上书。

③（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学海类编》本（《丛书集成》本）。

④（清）阮元等修、王崧等纂：道光《云南通志》，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卷一百八十四引《清职贡图》。

⑤（明）郑颢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卷四，三二页。

⑥（明）刘文征撰：天启《滇志》，古永继点校本，卷三十，九九九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及至清代，才有关于西番农业的记载。道光《云南通志》引《丽江府志》说：“西番，一名巴苴，喜居高山，善用弩箭。种荞稗牧羊为生，织葛为衣。”^①又引《清职贡图》说：“西番，……地种荞稗，纳粮。”又引《伯麟图说》说：“野西番，垂发，衣氍毹，不常厥居，种麦以食，养牛多生牦，其习俗不同于西番，永北厅有之。”《永北府志》卷二十五亦载：“西番一种，原无姓氏，随口取名，刀耕火种，菽麦资生”^②，“西番一种，居寒山冷谷之中，集众而处，身长跣足，……刀耕火种，菽稗资生。”^③

15世纪中叶以后，亦有部分普米族徙居河谷、平坝，从而成为灌溉稻作民。

怒族 怒族居怒江峡谷两岸陡峭山地。据说怒江因怒族而得名，《元混一方輿胜览》载：“潞江，俗称怒江，出潞蛮。”^④怒族古代为峡谷狩猎、采集、刀耕火种民。光绪《丽江府志稿》卷一载：“怒人，所居皆在澜沧江外，其江深险，四序皆燠，赤地生烟，每二月瘴气腾空，两堤草头交结不开，名交头瘴。以射猎为生涯，或采黄连为业。”^⑤农业记载最早见于明代文献。《百夷传》载：“怒人，颇类阿昌。蒲人、阿昌、哈喇、哈杜、怒人皆居山巔，种苦荞为食。”^⑥清代农业有所发展。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载：“怒子，居怒江内，界连康普、叶枝、阿墩子之间。……覆

①（清）阮元等修、王崧等纂：道光《云南通志》，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

②（清）陈奇典修：《永北府志》，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刻本，卷二十五。

③ 同上书。

④《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元混一方輿胜览》，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版，30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⑤（清）陈宗海修、李福宝等纂：光绪《丽江府志稿》，传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稿本，卷一。

⑥（明）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江应樑校注本，一五二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竹为屋，编竹为担，穀产黍麦，蔬产薯及芋。猎禽兽以佐食。”^①

独龙族 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清代始有文献可查。在滇西南山地民族之中，独龙族是农业产生较晚的民族之一，根据文献记载和民族学资料分析，该族进入农业时代不会早于清朝。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四载：“俅人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② 由此可见清朝前期俅人生活还极为原始。至清朝中期，情况才有了较大的变化。道光《云南通志》卷一百八十五引《清职贡图》载：“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域外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男子披发，着麻布短衣袴，跣足。妇女缀大铜环，衣亦麻布，种黍稷，刮黄连为生。”^③ 又引《伯麟图说》载：“近知务耕植，常为怒人佣工……”

民族学资料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根据独龙族口头传说，约当清初时期，他们的祖先还披着树叶居住在岩洞，从岩洞迁出之后又巢居树上，后来有了刀耕火种农业，才从树上下到河边台地上“结茅为庐”。而独龙族告别岩洞穴居的年代又有先后之别，有的家族长者说，他们搬出岩洞之后竹子已经开过四次花，董棕已经成熟过八次（竹子60年开花结实，董棕30年熟透成粉）；有的家族老人则说，其祖先是在150年前才从岩洞搬出来的。^④

1908年，滇督锡良委派丽江阿墩子弹压委员兼管怒、俅两江事宜的夏瑚巡视独龙河流域，夏瑚在《怒俅边隘详情》一文中

①（清）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艺海珠尘》本（《丛书集成》本），《云南备征志》收入。

②（清）鄂尔泰修：雍正《云南通志》，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卷二十四。

③（清）阮元等修、王崧等纂：道光《云南通志》，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卷一百八十五引《清职贡图》。

④ 参见王均：《独龙族的穴居和巢居时代》，载《民族调查研究》，1983（1），34页。

记述了独龙族的刀耕火种情况：

“忙苦渡以上，惟产莜麦、膏粱、小米、苞谷、稗、芋之类，以下则产旱谷。

江尾虽有牯牛，并不以之耕田，只供口腹。农具亦无犁锄。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麦稗黍等类，则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耕火种，无不成熟。今年种此，明年种彼，将住房之左右前后地土，分年种完，则将房屋弃而他之，另结庐居，另砍地种。其已种之地，须荒十年八年，必俟其草木畅茂，方行复砍复种。”^①

夏瑚之文，记述了独龙族近代刀耕火种的大致面貌。

基诺族 基诺族与其农业的记载，同时见于清朝中期。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人种志》说：“三撮毛，即傈黑派，其俗与摆夷、僂人不甚相远。思茅有之。男穿麻布短裤，女穿麻短衣桶裙。……以捕猎取野物为食。男耕作，妇女任力。”^②“三撮毛”即今基诺族。

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农业源于何时，无从考证。基诺族长者认为，该族是先会种茶后才会种庄稼的，这种说法也许有它的道理。经济作物的栽培利用先于农业的民族不止基诺族，前述阿昌族学会开田，怒族、独龙族以“刚黄连为生”进而从事农业，都是外来民族特别是汉族向边远地区进行商业贸易的结果。基诺族聚集的基诺山，具有适于茶树生长的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那里现在有数百年前的老茶树，是基诺族种茶历史的见证。檀萃《滇海虞衡志》曾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谓六大茶山，

^① 夏瑚：《怒隸边隘详情》，见方国瑜编《云南史料丛刊》，云南大学刻印本，六十九卷，二二一页。

^② （清）郑绍谦：道光《普洱府志》，清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卷十八《人种志》，二八页。

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慢崙，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地。”^①基诺山于清朝初年便是闻名遐迩的“六大名山”之首。在茶叶贸易中，基诺族获得了商人带来的铁刀等生产工具。基诺山现保存着一块磨刀石，据说那是该族古代首领的遗物，传承至今大约已有三百多年了。巴亚寨的长者还记得，他们是第四代时从汉族那里学会打铁的，到他们这一代是第八代，计约二百余年。口碑传说表明，基诺族最早使用铁刀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应在清初茶业盛行之际。

二、濮系民族的刀耕火种

濮人为我国西南远古一大原始族群，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为其主要分布地域。由于受复杂的地理环境及民族关系等的影响，濮人内部文化差异较大。与越人交错杂居于交通便利的河谷坝子中的部分，大概远在新石器时代便会栽培水稻了；而居于交通梗阻的深山幽箐中的部分，进入农业社会的时间却比较晚。虽然他们也被纳入了郡县统治的区域范围内，但统治势力却不能以任何形式进入他们内部，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他们很少与外界交往。隋唐时期，山地濮人分化为“望蛮”和“朴子蛮”等支系，他们是今佤族、布朗族、德昂族以及克木人等的先民。

佤族 《蛮书》卷四所载“望蛮”和“望苴子蛮”，史家认为系佤族先民。唐代，望苴子蛮和朴子蛮所属澜沧江以西地域被南诏讨定，因望苴子“勇捷”、“俗尚勇力”，所以常被南诏征入军中作为前锋。他们“善于马上用枪”、“骑马不用鞍”、“驰突若

^①（清）檀萃：《滇海虞衡志》，宋文熙、李东平校注本，二六九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

飞”，俨然是狩猎民族的强悍气质。元代佧族情况不详。明代佧族名称有古喇、哈瓦等，其农业也于此时见诸文献。《百夷传》说：“哈喇、哈杜、怒人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①又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腾冲司》说：“哈喇蛮者，有名无姓，形陋体黑，服食相类蒲蛮，而性则柔懦，惧官府。巢居山中，刀耕火种，多旱谷。”^②《百夷传》又载哈杜“巢居山林，无衣服，不识农业，惟食草木禽兽，善骑射。冷则抱巨石坡间往复奔走，以出汗为度。”^③可知发展程度亦不尽相同。

明代之后，文献之中再也没有佧族部落“不识农业”的记载了。他们有的进行游耕，如雍正《云南通志》卷四十四所载：“戛喇，永昌、腾越内外境俱有之，耕种类阿昌，形状似傜，凶悍善斗。妇女斜缠棉布于腰，居山巅，户不正出，屋迎山开门。迁徙无常，不留余粟。”^④有的于耕种之外，多辅以狩猎，如道光《云南通志》卷八十七引《他郎厅志》载：“卡瓦，……男穿青蓝布短衣裤，女穿青蓝布短衣裙，均以红藤缠腰。耕种杂粮之外，佩刀持枪捕猎为食。”^⑤

佧族俗有“生卡瓦”和“熟卡瓦”之分。所谓“熟”与“生”，即其生业以农业为主抑或以采集狩猎为主之别也。

布朗族 南北朝之后，从秦汉时期族群中分化出“朴子蛮”，此后继称“蒲蛮”、“浦人”、“朴子”等，当代改称布朗族。《蛮

①（明）钱古训、李思聪：《百夷传》，江应樑校注本，一五二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②（明）郑颢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卷六《腾冲司》。

③ 同①，一〇四页。

④（清）鄂尔泰修：雍正《云南通志》，清乾隆元年（1736年）刻本，卷四十四。

⑤（清）阮元等修、王崧等纂：道光《云南通志》，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刻本，卷八十七《他郎厅志》。

书》卷四载：“朴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袴。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部落首领谓之酋。”^①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载：“蒲蛮一名朴子蛮，其服食好与顺宁府者相同，居澜沧江者性勇健，……髻插弩箭，兵不离身，以采猎为务。”^② 明代以前，山地布朗族大部分以采集狩猎为生。

山地布朗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从明代起逐渐盛行。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三载：“境内有蒲蛮之别种曰车苏者，即蒲喇也。居高山之上，垦山为田，种莽稗，不资水利，然山地硗薄，一岁田一移，其居以就地利，暇则猎兽而食之。”^③ 康熙《楚雄府志》卷一载：“蒲蛮，山居火种，妇人织火麻布为生。”^④ 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载：“蒲蛮，又名蒲人。宁洱、思茅、威远有之。……散处山林，居有定址，若易置他处，即不能居。常耕种为业，剥蕉心煮食，以当菜蔬。”^⑤ 光绪《腾越厅志稿》卷十载：“蒲人，即古百濮，散居山谷，永昌以南所在多有。……皆勤力耐劳，苦事耕锄，所种苦莽、棉花、黑豆。知汉语，通贸易。”^⑥

上述蒲人（朴人），只是布朗族先民中居处山野的部落。其先民中当有一部分具有悠久的坝居历史并很早便从事灌溉稻作农业，只是由于民族间的纷争、侵夺以及封建朝廷的剥削和压迫，

①（唐）樊绰：《蛮书》，浙西村舍清刻本，卷四，一八页。

②（明）郑颢修、陈文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明景泰六年（1455年）刻本，卷六。

③ 同上书，卷三。

④（清）张嘉颖等纂修：康熙《楚雄府志》，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本，卷一。

⑤（清）郑绍谦：道光《普洱府志》，清咸丰元年（1851年）刻本，卷十八，二九页。

⑥（清）陈宗海修、赵瑞礼纂：光绪《腾越厅志稿》，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卷十。

才使这些濮人逃亡山林，从而发生文化的变异现象。例如，至今仍以盛行刀耕火种闻名的西双版纳布朗山的布朗族，便有若干村落是在一两百年前由景洪等坝区被迫迁往山区的。而且据调查，当地坝区民族普遍认为布朗族是该地区最早的土著农耕民之一。

德昂族 德昂族系“蒲蛮”的一个分支，他们是德宏地区的土著民族，古代居住于坝区边缘种植水稻并栽培茶叶等经济作物，元朝中期，“百夷”（傣族先民）迅速强盛，德昂族人民在傣族封建领主势力的侵夺压迫之下，或逃亡于山区，或避难于它乡。到达镇康军弄一带的德昂族，就是在长途辗转流徙之后于二百五十多年前定居下来的。德昂族迁往山区，不得不放弃灌溉稻作农业，变成了垦山而植的刀耕火种民。光绪《永昌府志》卷五十七言：“崩龙，类似摆夷，惟语言不同。男女背负，女以尖布套头，以藤篾圈缠腰。漆齿文身，多居山巅，土司地皆有。”^①德昂族元代以后居处山巅从事刀耕火种农业，是民族征服战争的结果。

三、苗瑶民族的刀耕火种

苗族和瑶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先秦古籍《尚书·吕刑》和《史记·五帝本纪》中便有“苗民”和“三苗”的记载。秦汉时期，苗瑶先民被称之为“五溪蛮”、“武陵蛮”、“长沙蛮”。今黔、湘、鄂连接地带，是苗族和瑶族繁衍的摇篮。由于苗瑶民族形成于中南地区，很早便与汉族等发生频繁的接触与交往，故而其农业的产生是比较早的。然而由于苗族、瑶族好入山壑而不乐平旷，居处深山重阻、人迹罕至之地，因此长期从事刀耕火种农

^①（清）官世洵纂修：光绪《永昌府志》，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刻本，卷五十七。

业，并辅之以狩猎、采集。东汉时，包括苗、瑶在内的武陵蛮强盛起来，于是据其险隘，大寇郡县，结果导致封建朝廷的征服。为避战祸，武陵蛮不得不离开故土。自隋唐迄明清，苗族支系先是大批西走贵州，此后又不断向川、滇渗透，以至远达东南亚半岛北部诸国。瑶族南北朝时称为“莫瑶”，分布在湘西黔东地区。其迁徙路线，大致是向南入广东，向西南达广西、贵州南部、云南南部，最后到达老挝、泰国、越南北部。经过一千多年的分化流动，苗、瑶民族成为中国西南分布最广的两个民族，亦是最著名的游耕民族。

苗族 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苗族早在西汉初年便向汉朝统治者交纳租赋。南北朝之前，由于苗族所在地多深险，也有许多人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后来在向西南流动的过程中，情况便不同了。如清代贵州的花苗、白苗、青苗、红苗、黑苗、九股苗、东苗、西苗、克孟牯羊苗、天苗、谷蔺苗、平伐苗、紫姜苗、阳洞罗汉苗等，有的是勤耕樵，日则出作，夜则纺绩；有的是转徙不恒，为人雇役垦田；也有居依山箐，迁徙无常，不善治田，惟种苡麦稗粱。可见发展很不一致。

苗族经川、黔、桂入滇后，先是分布在滇东北和滇东南地区。入滇的原因，据说是贵州大部分土地已被开发，难以生活，故迁往云南。进入云南的苗族，部分以耕作水田为业。如雍正《东川府志》卷八载：“苗人，有苗氏之遗，禹奉帝命，往征者也。至今其性犹善治田。”^①《昭通县志稿》卷十载：“苗子，有花苗、白苗二种，每附岩结庐，依水凿田。”^②但多数苗族则迁徙不定，刀耕火种。道光《大姚县志》卷七说苗族：“居高山陡

①（清）崔乃镛纂修：雍正《东川府志》，传抄北京图书馆藏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本，卷八。

②（民国）符廷铨等修、杨履乾纂：《昭通县志稿》，铅印本，卷十，1924。

壁，其上下如飞。男女皆衣麻布长衣，以麻布裹腿，带刀辟山地种粮。”^① 光绪《丽江府志稿》卷一说苗族：“开种山田，随地纳赋，食足则居，一岁稍歉则他往，其所居迁徙无常处焉。”^② 《民国邱北县志》第二册《种人》亦载：“苗人，有青、黑、花三种，……喜居箐林，烧火山种植，林败则迁，无定所，好猎善用强弩。”^③

苗族中虽然不乏耕种水田者，但就其整体而言，主要是流动性极大的刀耕火种民。

瑶族 《南史·张纘传》说瑶族是“依险而居”的民族。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瑶族“各自以远近为伍，以木叶覆屋，种禾黍粟豆山芋杂以为粮，……暇则猎食山兽以续食”。田汝诚《行边纪闻·蛮夷》说瑶族：“山田瘠薄，十岁五饥，……飘忽往来，不可踪迹”。清代云南方志对瑶族也有类似记载。道光《他郎厅志》言：“瑶人，自粤迁来，居无定处，每至深山开垦耕种，俟田稍熟，又迁别所开垦如前，不惮劳瘁。”^④ 乾隆《开化府志》卷九载：“瑶人，性犷悍，自谓盘瓠之后。自耕而食，……多处深山，喜猎，善搏虎豹。……所居之处不四、五年即迁。”^⑤ 《马关县志》卷二亦载：“瑶性野而多怯，不轻入城市。刀耕火种，故足迹所至，林箐难存，筹伐尽则他徙。”^⑥ 瑶族是非常典型的游耕游猎民族。

① (清)黎恂修、刘荣黼纂：道光《大姚县志》，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卷七。

② (清)陈宗海修、李福宝等纂：光绪《丽江府志稿》，传抄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稿本，卷一。

③ (民国)徐孝喆修、缪云章纂：《民国邱北县志》第二册，石印本，1926。

④ 转引自《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云南各族古代史略》，1版，32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⑤ (清)汤大宾修、赵震纂：乾隆《开化府志》，传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卷九。

⑥ (民国)张白明纂修：《马关县志》，石印本，卷二，1932。

四、越系民族的刀耕火种

越人系我国南方一大古老族群。《汉书·地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① 所谓古代百越，所知者有“於越”、“大越”、“扬越”、“南越”、“闽越”、“东瓯”、“西瓯”、“骆越”、“山越”、“夔越”、“夷越”、“滇越”、“漂越”等。越人地处卑湿，居“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② 越人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很早便创造了灌溉稻作农业文明。然而由于古代地广人稀，森林丰富，越人也有从事刀耕火种的。《史记·货殖列传》即载：“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③

在越系民族中，最典型的刀耕火种民族是海南岛的黎族。黎族的刀耕火种称之为“砍山栏”，其法在明人顾訥的《海槎余录》中有所记载：“黎俗四、五月晴霁时，必集众斫山木，大小相错，更需五、七日，皓冽则纵火，自上而下，大小烧尽成灰，不但根干无遗，土下尺余亦且熟透矣。徐徐锄转种棉花，又曰具花，又种旱稻，曰山禾，米粒大而香可食。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他所，用前法别治。”^④

除黎族之外，侗族、仡佬族、水族、壮族、傣族也有刀耕火种。《新唐书·南蛮传下》说：“东谢蛮，……地方千里，宜五谷，

①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一版，一六六九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② (汉)班固：《汉书·严助传》，一版，二七七五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世界书局影印本，五六四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④ (明)顾訥：《海槎余录》，见《元明善本丛书纪录汇编》，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卷一百六十二，二页，1937。

为畲田，岁一易之。”^① 唐代“东谢”地区为今黔东南的台江、剑河至黔南的三都一带，“东谢蛮”包括今仡佬族、侗族、水族等先民在内。乾隆《开化府志》卷九载：“喇奚，居深山，火耨刀耕。”^② “喇奚”为壮族先民中的一支。王文凤《云龙纪往》记云龙州：“夷有三种，摆夷十之七，阿昌十之二，蒲蛮十之一，刀耕火种，迁徙无常。”“摆夷”即傣族。自然，从整体来看，越系民族主要还是灌溉稻作民族。

作为本章小结，兹将古代西南主要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归纳列表于下。

古代西南的刀耕火种民族 (1994)

族属渊源	族称	历代主要族称	刀耕火种最早文字记载	文献所记栽培作物
羌	彝 族	乌蛮、罗罗	汉晋时期	荞、稗、稻
	哈尼族	乌蛮、和蛮、窝泥	汉晋时期	稻、棉花
	傈僳族	栗栗、力些	清朝初期	黍、稷、荞、稗
	拉祜族	傈黑	清朝初期	荞、稗
	苦聪人	锅锉蛮、小古宗、果葱	清朝初期	荞、稗
	景颇族	寻传蛮、裸形蛮、野蛮、结些	明朝初期	芋、薯、荞、玉米、稗、豆、瓜、稻
	阿昌族	寻传蛮、峨昌	明朝初期	荞
	普米族	西番	明朝初期	荞、稗、麦
	怒族	潞蛮	明朝初期	黍、麦、荞、薯、芋
	独龙族	攏、俅人	清朝中期	荞、麦、高粱、稷、玉米、稗、芋
	基诺族	三撮毛	清朝中期	

① (宋) 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南蛮传下》，一版，六三二〇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② (清) 汤大宾修、赵震纂：乾隆《开化府志》，传抄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刻本，卷九。

(续上表)

族属渊源	族称	历代主要族称	刀耕火种最早文字记载	文献所记栽培作物
濮	佤族	望苴子蛮、朴子蛮、古喇、哈杜、哈友	明朝初期	莽
	布朗族	朴子蛮、蒲蛮	明朝初期	莽、稗、棉花、黑豆
	德昂族	蒲蛮、波龙、崩龙	明朝初期	
苗瑶	苗族	五溪蛮、武陵蛮、长沙蛮、苗子	秦汉时期	莽、麦、稗、高粱、稻
	瑶族	五溪蛮、武陵蛮、长沙蛮、莫瑶	秦汉时期	稻、黍、粟、芋
越	傣族	滇越、金齿、百夷、摆夷	秦汉时期	稻等
	黎族	骆越、俚、僚	秦汉时期	稻等
	壮族	西原蛮、峒僚、僮	秦汉时期	稻等

第二节 分布和分类

一、云南刀耕火种的分布

当代云南的刀耕火种，绝大部分分布在与缅甸、老挝、越南接壤的云南西南部。这个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94%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其余6%是河谷盆地。这样的地貌条件，对于该地区特殊人文景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海拔约600米以下的河谷和盆地，是傣族等民族经营的历史悠久的水田灌溉农业系统；海拔约600米至1800米的山地和丘陵，则是众多的山地民族所经营的刀耕火种农业系统。居住于该区的刀耕火种民族，有独龙族、傈僳族、怒族、普米族、景颇族、德昂族、佤族、拉祜

族、布朗族、哈尼族、基诺族、彝族、苗族、瑶族等。目前存在刀耕火种的主要地区有滇西北与缅甸接壤的独龙江流域；有傈僳族、怒族等散居的怒江峡谷两岸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的高山地带；德宏地区近年来刀耕火种面积已有所减少，但在景颇族等居住的交通不便的山区和中缅边境地带，刀耕火种还十分盛行；临沧地区西部的永德、镇康、耿马、双江等县山地有较多的稀树草地刀耕火种地；历史上以刀耕火种闻名的沧源和西盟阿佤山区，目前刀耕火种还没有绝迹，一些村寨仍然以此为生；在勐连县和澜沧县境内，有拉祜族等民族的大面积的刀耕火种地分布；勐海县布朗族聚居的西定、巴达和布朗山，刀耕火种至今也还是重要的农业形态，与此相同的地区是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勐腊县地处云南省最南端，那里的哈尼族、瑶族、彝族、苗族、克木人以及外地流民，有不少从事刀耕火种的人；西双版纳以东的江城、绿春、元阳、金平等县，由于瑶族、苗族、哈尼族、彝族、汉族、苦聪人的长期垦殖，森林覆盖率已大大降低，目前较多地呈现出草地刀耕火种景观。

这些地区为什么产生了发达的刀耕火种农业并且延续到现在呢？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这一地区属于亚热带，终年温暖，而且盛行东南和西南季风，雨水充沛，森林资源十分丰富，这样的地理环境，为人们从事以刀耕火种为主兼行狩猎采集的生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该区山地多，山地面积大约占总面积的94%，坝子（盆地）面积积极小。山地地形复杂，难以营造灌溉设施，而且高山气温较低，不少地方山高水寒，山势陡峭，发展灌溉水稻农业十分困难。第三，这一地区在古代远离汉文化中心，且由于山川阻隔，造成交通不便，尤其是曾被称之为“瘴疠之区”而闻名远近，行人视为畏途。^① 汉民族向此移

^① 参见尹绍亭：《说“瘴”》，载《云南方志通讯》，1986（4），69～74页。



云南西双版纳内怒江峡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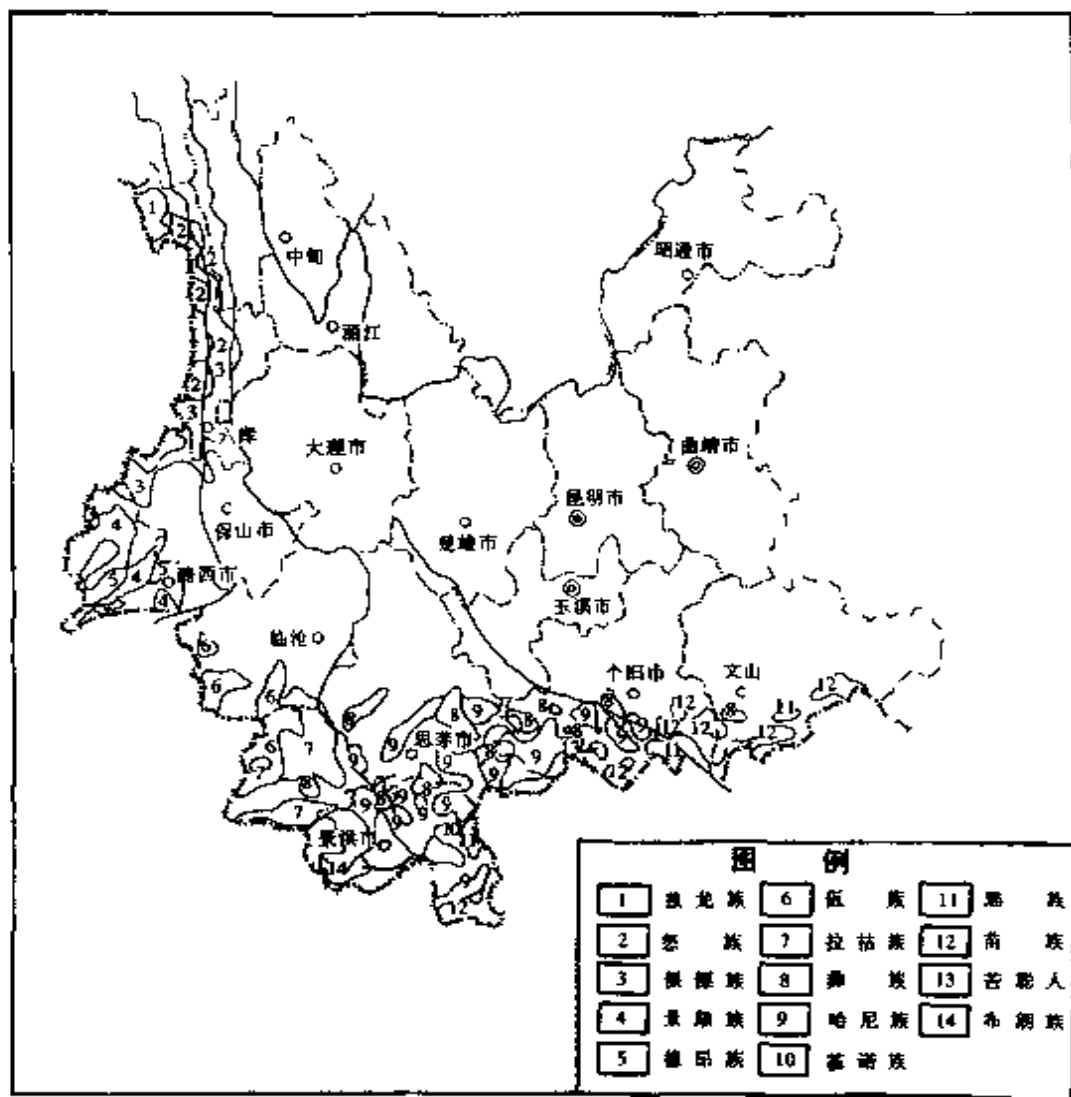


怒江北段的森林和刀耕火种地



怒江中游沿岸的陡坡轮歇地

民困难，土著民族的人口也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森林没有过早地遭受大规模的开发和破坏。例如西双版纳等地，20世纪50年代森林覆盖率尚保持在65%左右。第四，该区山地民族众多。20世纪50年代以前，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且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山区社会表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松散性和相互分割独立的性质。相对而言，开发容易，便于流动作业，并且不必要复杂的生产设施的刀耕火种农业，自然适应了山地民族社会的需要。第五，由于长期从事刀耕火种农业，各山地民族



云南主要刀耕火种民族分布示意图（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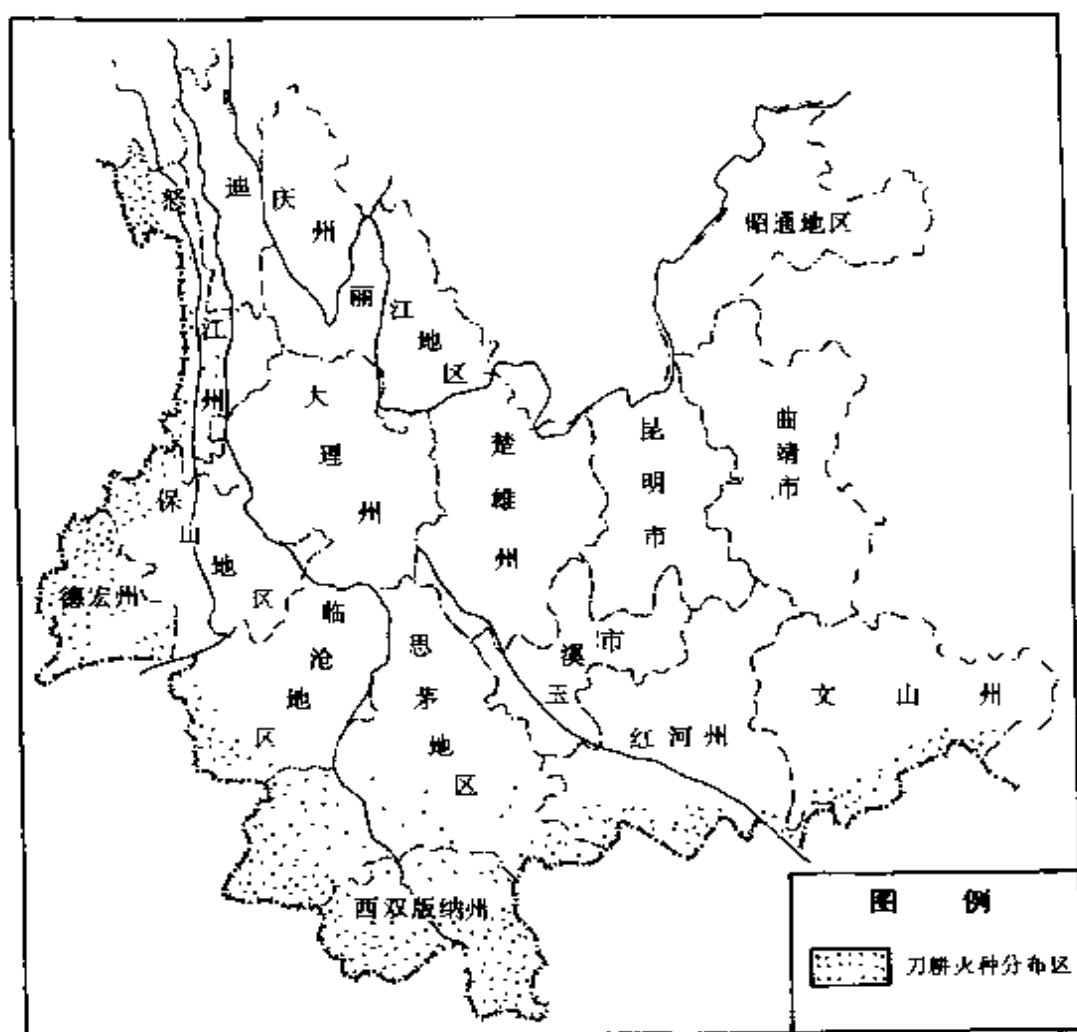
不仅形成了完整的生产技术体系，而且还形成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体系和观念形态体系。要改变这一生业以及社会组织 and 观念形态，是比较困难的，是不可能短期内实现的。尽管如此，与 20 世纪 50 年代相比较，目前云南刀耕火种的规模已经大为减少，其分布状况已从过去的连续带状变为间断的块状，从密集的状态变成稀疏的状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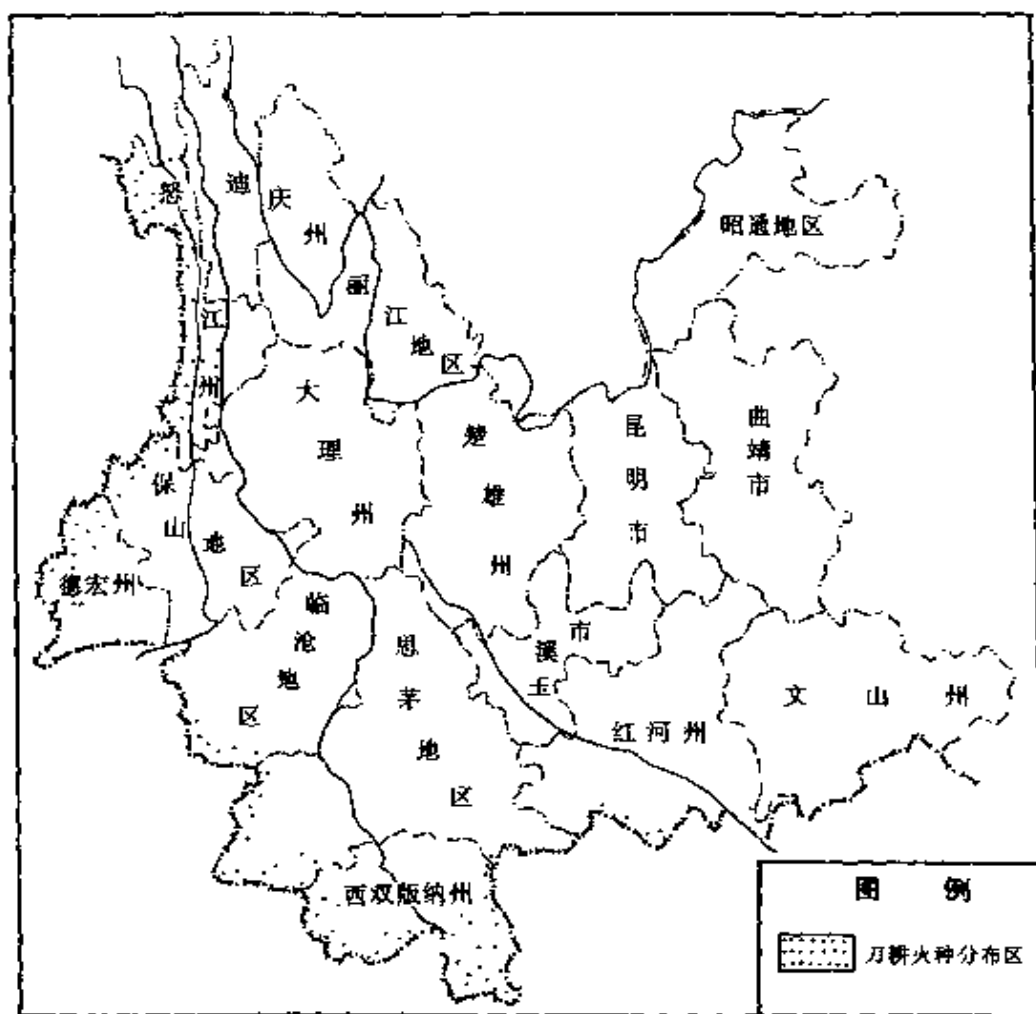
德宏边境山区的刀耕火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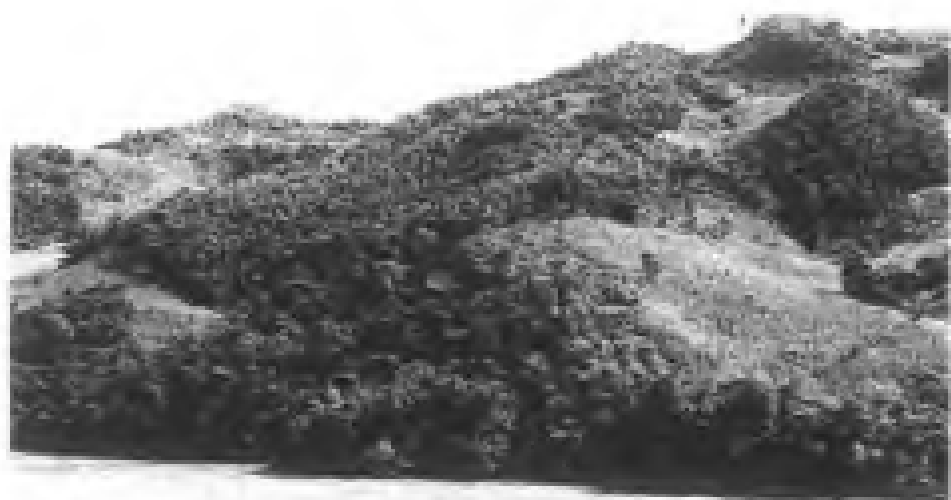
德宏景颇族的刀耕火种地（张有乾摄）



云南省 20 世纪 50 年代刀耕火种分布示意图



云南省 20 世纪 80 年代刀耕火种分布示意图



澜沧江南部沿草山地



西双版纳的刀耕火种地



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地



哈尼族的刀耕火种地

二、云南刀耕火种的分类

刀耕火种农业，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模式。地域和民族不同，刀耕火种方式往往是不相同的。研究者根据调查的资料，对其进行分类，进而分析比较，是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刀耕火种农业的文化生态内容，可以说远比灌溉农业丰富，因而研究者也有种种分类的角度和方法。例如研究东南亚刀耕火种的学者，曾有以下几种分类：^①

(1) 根据耕种期与休闲期之间关系的分类，一般可分为短期耕种短期休闲、短期耕种长期休闲、长期耕种长期休闲三类。

(2) 根据耕种者的历史背景分类，可分为流动拓荒者、固定轮歇耕种者、新的轮歇栽培者三类。

(3) 根据对刀耕火种的依赖程度的分类，可分为完全依赖、主要依赖、暂时依赖、次要依赖四类。

(4) 根据耕地的耕种状态进行分类，可分为简单游耕、周期性游耕、周期性游耕与小面积固定耕地共存、固定耕地耕种四类。

日本学者佐佐木高明先生研究热带的刀耕火种，曾将其分为两个大的地域类型：第一类是“根栽型刀耕火种农业”，其起源和盛行的自然环境是东南亚的热带降雨林地；第二类是“杂穀栽培型刀耕火种农业”，其起源和盛行的自然环境是“非洲、印度热带干草原地域”。^② 日本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还相当盛行刀耕火种农业，其分布遍于从冲绳到东北除了北海道之外的所有

① UNESCD/UNED: "Swidden Cultivation in Asia", Volume Two, the UNESCO Regional office for Education in Asia and Pacific, 1983i - xix.

② 佐佐木高明：《熱帯の焼畑》，34～35 页，古今書院，1970。



勐腊县南腊河畔的竹林刀耕火种地

日本列岛。佐佐木高明先生曾从对刀耕火种的依赖程度、刀耕火种町村的类型、轮作形态类型、经营方式的类型以及地域类型等方面，对日本的刀耕火种农业进行过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① 本文亦试图对云南的刀耕火种农业进行不同角度的分类，以便进行比较和探讨。

1. 轮作形态的分类

按轮作形态分类，笔者曾将云南的刀耕火种分为无轮作刀耕火种和轮作刀耕火种两种类型。^② 这样的分类，类型间的界限比较明确，但感到轮作类型所含的内容过多，故这里另设短期轮作类型，将其与长期轮作类型分开，变为三种类型。

(1) 无轮作刀耕火种类型。

无轮作刀耕火种，其轮歇特点是一块土地只种一季作物（不复种）便抛荒，休闲期短则七八年，长则十余年。无轮作刀耕火

① 参见佐佐木高明：《日本の焼畑》，50～233页，古今書院，1972。

② 参见尹绍亭：《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兼与云南其它刀耕火种民族的比较》，载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17卷2号，268～274页，1992。

种很多民族称之为“懒火地”，意思是种这种地省力，懒惰也能够收获。云南几乎所有的刀耕火种民族，很早以前都只从事单一的无轮作刀耕火种，后来情况变化了，一些民族部分或全部改为从事轮作刀耕火种，目前仅从事无轮作刀耕火种的民族只有盈江县卡场的景颇族和勐海县西定、巴达一带的布朗族了。



云南南部红河沿岸山地的刀耕火种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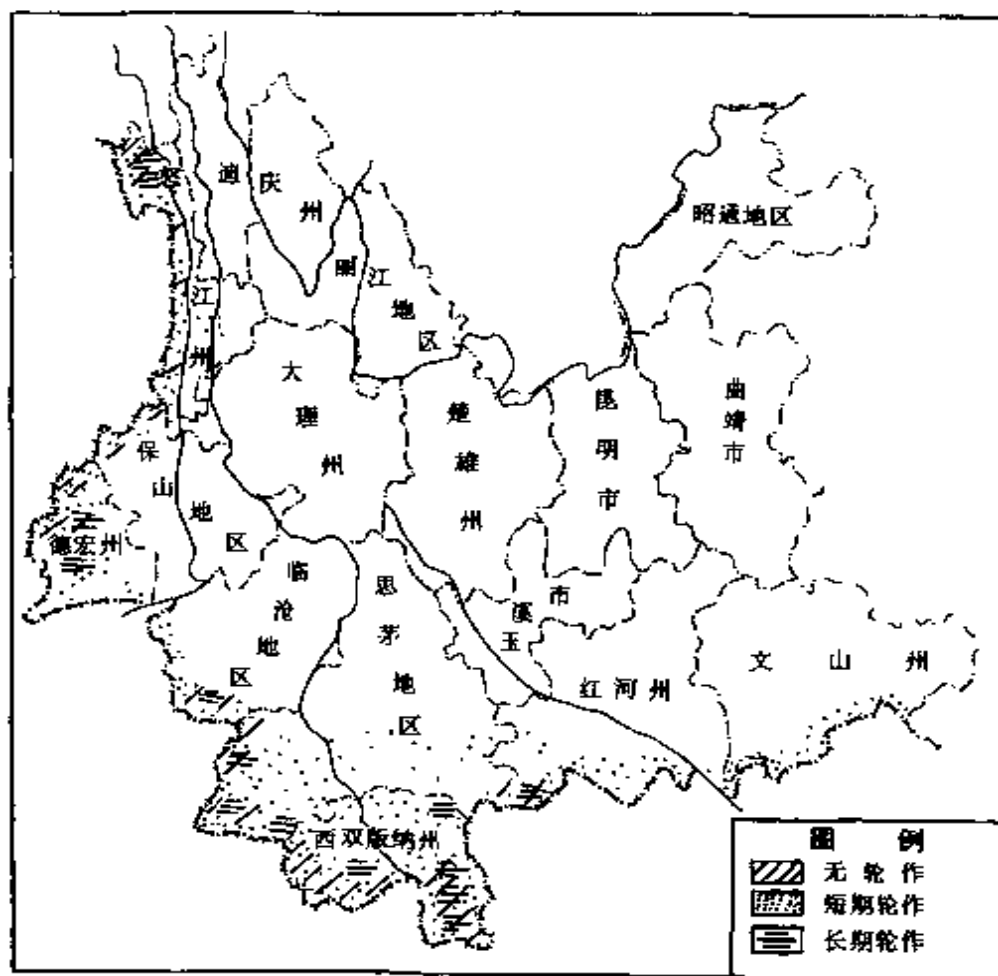
(2) 短期轮作刀耕火种类型。

笔者划分的短期轮作类型，是指连续耕种两年，休闲七八年至十余年的刀耕火种方式。仅从事短期轮作的刀耕火种民族，过去有勐海县的一部分哈尼族等。目前由于土地不足不得不从无轮作转为短期轮作的有西盟打洛的佤族、勐腊回吉的克木人、梭罗寨的哈尼族和景洪曼播的克木人等。

(3) 长期轮作刀耕火种类型。

长期轮作刀耕火种，即轮作三至五年，休闲十余年甚至二十余年，也有少数轮作时间长达七八年甚至十年的例子，但耕种时间越长，抛荒休闲的时间就必须更长。既从事无轮作和短期轮作刀耕火种，又实行长期轮作刀耕火种的民族，有独龙族、德昂族、部分景颇族、部分佤族、部分拉祜族、部分哈尼族、部分瑶族、苗族和基诺族等。

以上三种轮作类型，无轮作刀耕火种无论肥地、瘠地、平地、陡坡地都可以进行；短期轮作不适宜太陡太瘠的土地；长期轮作则要求比较平缓肥沃的土地。



无轮作、短期轮作、长期轮作刀耕火种分布示意图 (1994年)



云南中东部南盘江流域山地



云南中东部南盘江流域的刀耕火种地

2. 休闲方式的分类

按休闲方式分类，云南的刀耕火种可以分为两种类型：自然休闲类型和人工造林休闲类型。

(1) 自然休闲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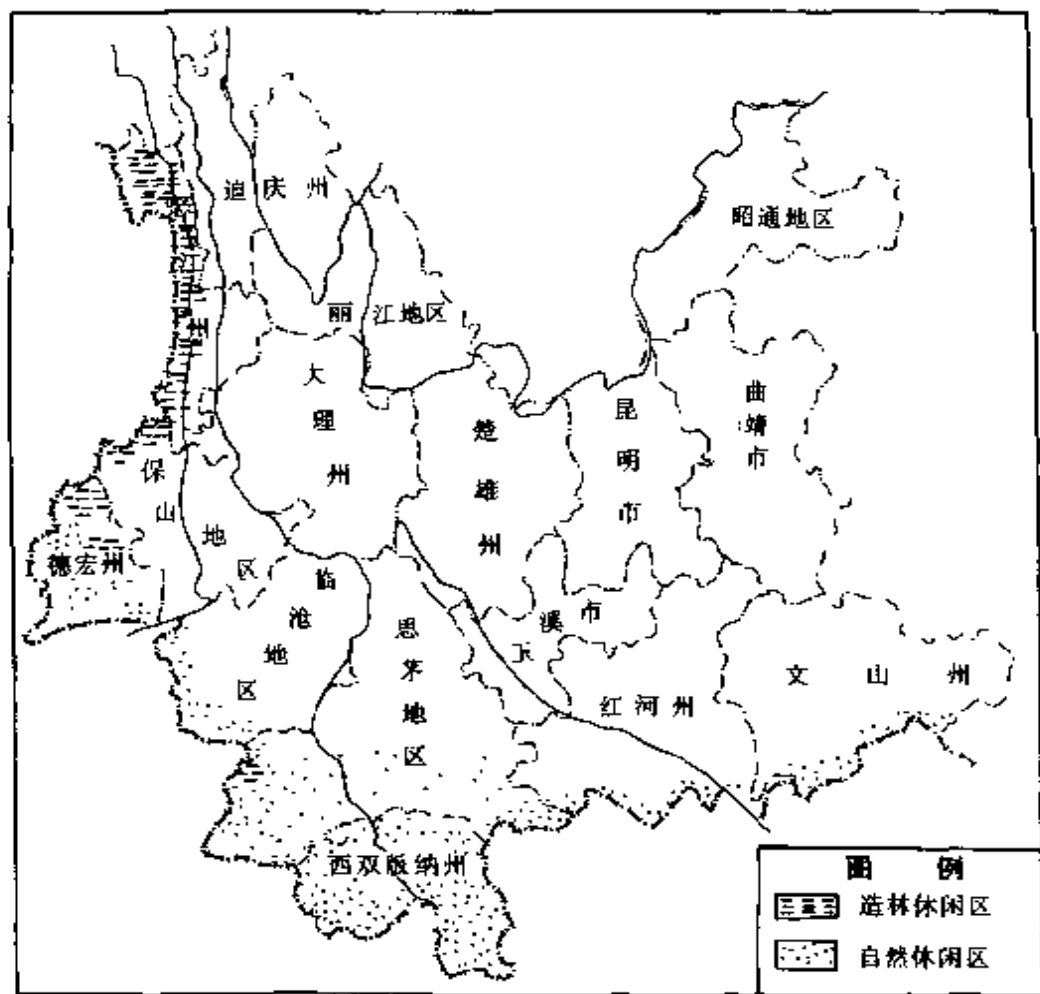
自然休闲类型，是指土地抛荒之后，不进行人工植树，而是任其自然生长树木的休闲方式。在云南西部，特别是在云南南部山地，由于气候比较炎热，雨水充沛，树木生长很快，从小树苗长成直径十厘米的树木，一般只要十年左右。尤其是有一种称为“短命树”的树木，三四年就可以长成大树，但随即便马上枯死，寿命很短。还有水冬瓜树和竹林等，生长也极为迅速。由于树竹生长快，加之过去土地多人口少，可以保证土地有足够的休闲期，所以如基诺族、瑶族、苗族、哈尼族、布朗族、拉祜族、彝族等，都不在休闲地中种植树木，而是任其荒闲。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的着眼点，在于尽可能地保护地中的树桩。比如在砍地时大树只修枝不砍伐；大部分树木砍伐时要留出一定长度的树桩，以利于再生；挖地、犁地时要尽可能避免伤着树根；气候炎热时以茅草等掩盖树桩，以防晒死。

(2) 人工造林休闲类型。

这是在休闲地中植树造林，以培养良好的植被，缩短休闲期或获取林产品的方法。云南山地民族传统种植的树木有水冬瓜树、漆树和松树等。

水冬瓜树系落叶乔木，这种树不仅生长快，而且能够提高土壤肥力。在雨量充沛的地方，只需五年左右，水冬瓜树就可以从幼苗长成直径十厘米左右的树木。由于其根部的根瘤菌具有很强的固氮作用，而且落叶多，因而提高土地肥力的效果是很显著的。哪怕是十分贫瘠的土地，只要种上水冬瓜树，都会变得肥沃起来。云南过去和现在在休闲地中栽种水冬瓜树的民族，有佤族、景颇族、独龙族、怒族等，但栽种方法不同。西盟地区的一

些佤族，过去是在作物收获之后撒播树籽；盈江卡场一带的景颇族，过去是将水冬瓜树籽和陆稻籽种混合起来同时撒播；近似景颇族方法的还有腾冲县南部团田等地的汉族。在耕地抛荒之前，那里的农民便把水冬瓜树籽和松树籽与陆稻种子混合撒播，等七八年后树木长大，便砍伐一部分作木材和柴薪，枝叶则焚烧，然后在林地空隙中栽种作物。独龙族和怒族的方法也很有特点，他们不是播种树籽，而是栽种采集的水冬瓜树苗。怒族和勒墨人（白族支系）除了栽种水冬瓜树还种漆树，漆树栽种八年后可以割浆出售。



休闲类型分布示意图（1994年）



云南东南部的喀斯特山地是石头的世界，
森林消失了，但山火依然不绝

3. 栽培作物的分类

按栽培作物分类，云南的刀耕火种可以分为杂谷栽培和陆稻栽培两种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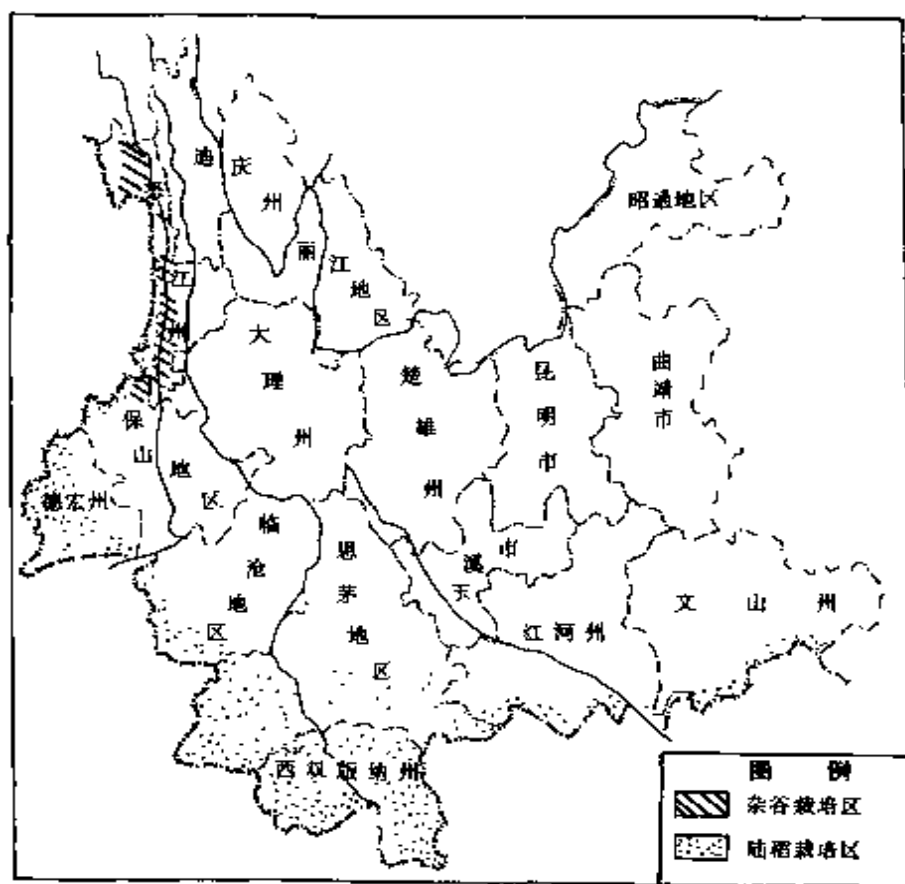
(1) 杂谷栽培类型。

杂谷栽培类型分布于海拔比较高、气候比较冷的怒江峡谷和独龙江峡谷。根据文献记载，峡谷中的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等，明清时期的主要栽培作物是荞、稗、黍、稷、麦、高粱，此外还有薯、芋等。大约 17 世纪以后，玉米栽培逐渐增多，后来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该地区陆稻栽培的时间很晚，目前的种植量也很少。水稻基本上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才开始种植的。传统栽培的纺织原料是麻，经济作物有黄连、漆和贝母等。文献记载怒族、独龙族都曾以“刚黄连为生”，可见黄连在其经济中的地位。据上可知，杂谷栽培类型也可以表示为玉米—麻—黄连栽培类型。

(2) 陆稻栽培类型。

陆稻栽培类型分布于怒江峡谷尾部以南地带。该区是发达的

陆稻栽培地区，过去每个民族都有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陆稻品种。最近40年来，由于发展了水稻农业，加之玉米栽培面积日益扩大，致使陆稻品种逐渐减少。但据农科部门普查，这一地带尚存陆稻品种1000余个。作为粮食作物，除了陆稻之外，尚有玉米、粟、高粱、薏苡、荞等。陆稻栽培地带又是发达的棉花栽培地带。棉花既是衣服和其他纺织品的原料，又是山地民族和低地民族交换生活日用品的商品作物。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内地廉价纺织品的输入，该区的棉花栽培量大大减少了。该区传统的经济作物是茶。滇南的普洱茶闻名天下，基诺山、南糯山等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茶山。近年来，虽然不少民族发展了橡胶种植业，但是茶叶仍然是重要的副业，陆稻—棉花—茶，是陆稻栽



栽培作物类型分布示意图 (1994年)

培类型的鲜明特征。

4. 迁徙方式的分类

按迁徙方式分类，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任意迁徙类型、固定地域内的迁徙类型和定居类型。

(1) 任意迁徙类型。

任意迁徙，即没有地域限制，想到哪里就到哪里的移动形式。习惯于任意迁徙的刀耕火种民族，其迁徙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的。如果森林退化，土地草多贫瘠，作物产量降低，狩猎采集资源减少，那么便寻找深山茂林搬迁而去。这种迁徙其实是为了改变生存环境，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大范围的轮歇方式，即抛弃原住地的土地，然后到新的地方去开垦新地。当然，与定居民族的有秩序的轮歇制度相比，这却是无秩序、随意和盲目的。任意迁徙的刀耕火种民族，其频繁迁徙的原因除了生态因素之外，宗教、瘟疫引发的迁徙也是不容忽视的。生存于山林中的民族，具有很浓厚的鬼神观念。如果发生干旱、洪涝、地震等自然灾害，出现瘟疫或人畜暴死等情况，便认为触犯了神灵，或认为是恶鬼作祟，于是便迁离原住地，以图避灾祛邪。而无论是出于生态还是出于观念的原因，其迁徙形式都不是固定的，有时是一家两家单独搬迁，有时是几家十几家搬迁，有时则是整个村寨的搬迁。迁徙的距离，近者几百米，远者几十千米甚至几百千米。这种任意性的迁徙，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瑶族、苗族、部分哈尼族、部分拉祜族和克木人中十分盛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各地政府重新明确了土地的权属，再也没有无人管理的森林，事实上杜绝了任意迁徙的途径，所以绝大部分习惯于迁徙的民族纷纷定居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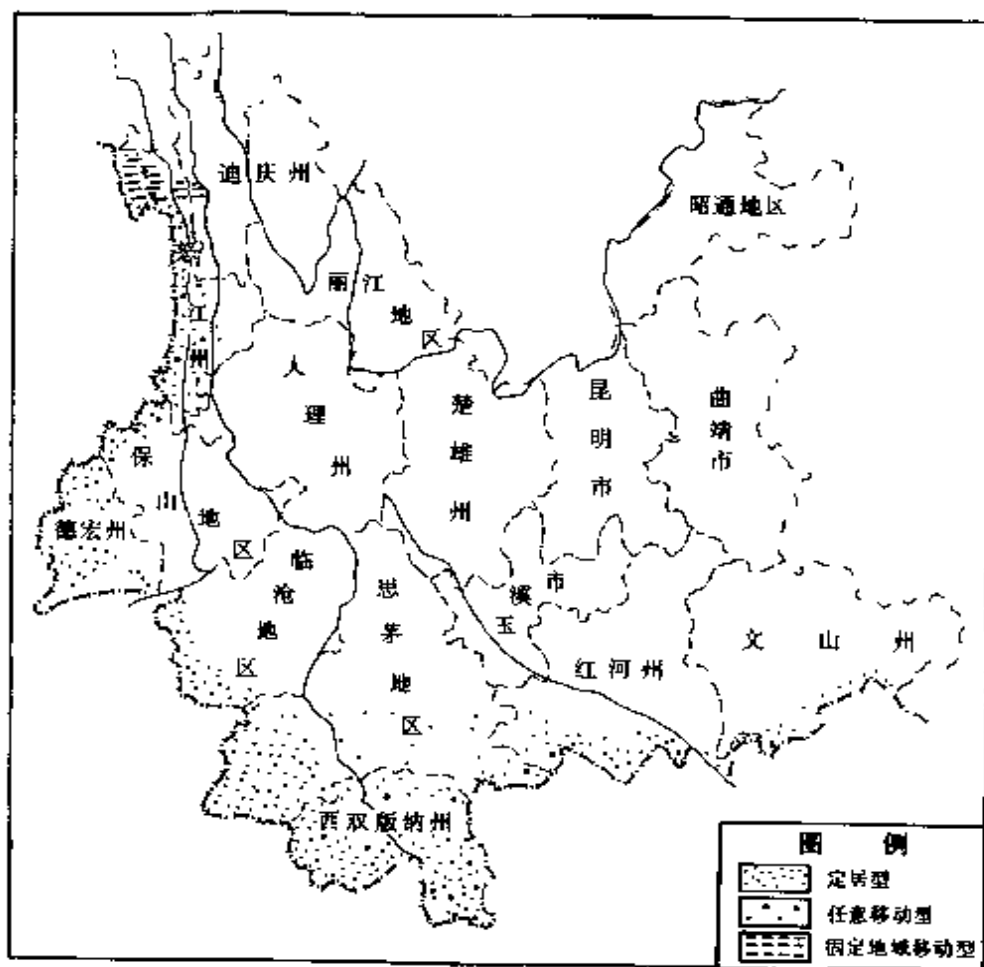
(2) 固定地域内的迁徙类型。

固定地域内的迁徙，是指刀耕火种民族在自己土地范围内的迁徙形式。习惯于这种迁徙方式的民族，往往置居所于两地，随

季节和农事活动的变化而移动住所；或者在一个地方居住两三年，土地需要抛荒休闲了，便搬迁到准备耕种的土地旁另建新居，就近耕作。这种迁徙方式，往往发生在土地分布较远、交通困难的地区，就地而居就近耕作，目的在于减少长距离往返劳作的能量消耗。独龙族、怒族、傈僳族等过去都属于这种类型。随着水田的开发和交通的改善，这种迁徙传统也发生了变化，人随地走的情况越来越少了。

(3) 定居类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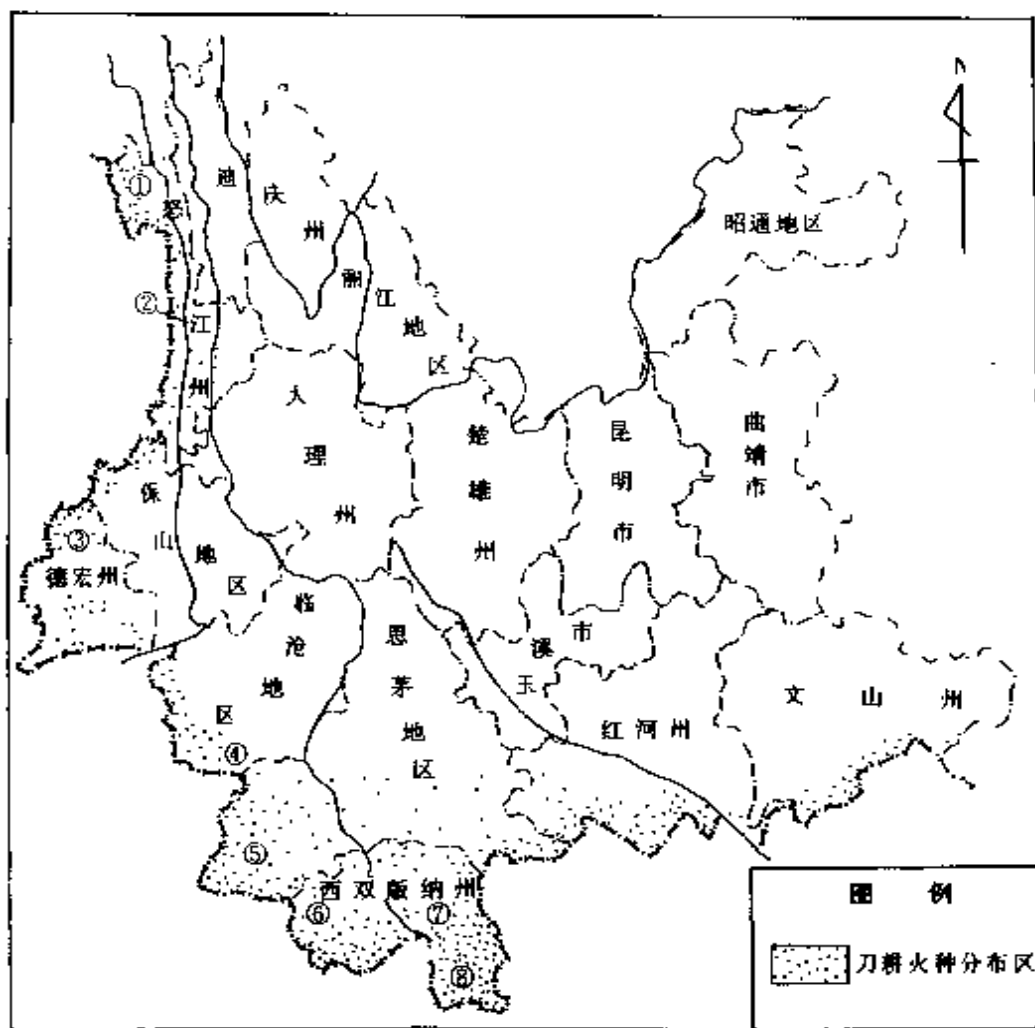
具有严格的土地制度和严守祖先故土的观念以及稳定的村落形态，长期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居住和从事生产，这就是定居类型。



迁徙类型分布示意图 (1994年)

在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中，定居者多于迁徙者，布朗族、佤族、景颇族、基诺族和很大一部分拉祜族、傈僳族、哈尼族等，都是定居的刀耕火种民族。当人口增加、部落膨胀、生活困难的时候，上述民族也会出现分化和移动，例如搬出部分人在村寨的土地范围内另建新寨，但是这样的情况并不经常发生，它与上述两种类型的频繁迁徙具有不同的性质。

以上进行了四种方法的分类，每一种分类方法都可以考察刀耕火种的一个侧面。而如果综合地进行分类的话，那么，云南的刀耕火种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的地域类型：



云南刀耕火种的主要地域类型

①独龙江区（独龙族）——混合轮歇（无轮作、短期轮作、长期轮作并存）、造林休闲、杂谷栽培、固定地域移动型刀耕火种。

②怒江区（怒族、傈僳族、勒墨人）——混合轮歇（无轮作、短期轮作）、造林或自然休闲、杂谷栽培、定居或固定地域移动型刀耕火种。

③卡场区（景颇族）——无轮作轮歇、造林休闲、陆稻栽培、定居型刀耕火种。

④沧源、西盟区（佤族）——混合轮歇（无轮作、短期轮作）、造林或自然休闲、陆稻栽培、定居型刀耕火种。

⑤澜沧区（拉祜族）——混合轮歇（无轮作、短期轮作）、自然休闲、陆稻栽培、定居型刀耕火种。

⑥布朗山区（布朗族）——无轮作轮歇、自然休闲、陆稻栽培、定居型刀耕火种。

⑦基诺山区（基诺族）——混合轮歇（无轮作、短期轮作、长期轮作）、自然休闲、陆稻栽培、定居型刀耕火种。

⑧勐腊区（哈尼族、瑶族、克木人）——混合轮歇（无轮作、短期轮作、长期轮作）、自然休闲、陆稻栽培、任意迁徙型刀耕火种。

第二章

传统刀耕火种志



本章由几个典型刀耕火种社区的田野调查报告构成。云南各民族各地区的刀耕火种，相似之处不少，不同之处也很多，比较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是十分有意义的。必须说明的是，笔者的调查，重点是要搞清楚各民族传统刀耕火种的实态，然而由于近 50 年来频频发生的激烈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冲击，传统的刀耕火种文化体系已然遭到很大的破坏，很多文化要素已经或正在消失，因而下面的几个报告的内容并非完全是现实情况的反映。例如各报告中的“社会组织”和“土地制度”，虽然部分还变相地存在着，然而基本上是通过访谈和文献资料整理的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以前的状况；“农耕礼仪”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很多仪式在历次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销声匿迹了，然而最近十余年来一些消亡的农业祭祀活动又恢复了；至于耕作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则多半是现实田野调查的资料。

第一节 卡场景颇族的刀耕火种

一、地理环境

卡场乡，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包括卡场、黑河、乌帕三个乡，统属原莲山县卡场文化站。20 世纪 60 年代改为盈江县勐弄公社所辖大队，1976 年从勐弄公社分出，成为卡场公社。后又改公社为区，1987 年再改区为乡，现为卡场乡。根据 1987 年底的统计，卡场乡下辖 4 个大队，28 个自然村，33 个合作社。全区共有人口 820 户、5 033 人，其中景颇族 3 319 人，傣族 1 136

人，汉族 573 人。^①

卡场社区位于盈江县西北部，西与缅甸交界，北面是苏典乡，东西和南面是勐弄乡。全区面积 452 390 亩，约为 301.6 平方公里。卡场地处高黎贡山的南端，多中低山山地。区内有勐典河和石竹河两条主要河流，石竹河沿中缅边界由南而北奔流，在该区西北面与自东南而来的勐典河相汇，往北出境注入缅甸的太白江。

卡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有显著的干湿两个季节。5 月~10 月为雨季，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0%~90%，10 月到翌年 4 月为干季。年平均气温 15℃，最热月 7 月平均气温达 25℃，最冷月 1 月平均气温为 8.4℃。由于区内地貌海拔高低悬殊，因而气候垂直差异显著。如石竹河河谷终年温暖湿润，而在海拔 1 800 米以上的高地，冬季则常常发生霜冻现象。



景颇族村寨乌帕

本区植被随地貌高程而变化。在西部石竹河谷，海拔 800 米

^① 资料来源于卡场乡政府统计室。

以下的地带覆盖着热带山地雨林，海拔 800 米 ~ 1 200 米地带为热带竹木混交林；中西部 1 200 米 ~ 1 600 米的地带分布着亚热带山地雨林；东南部 1 600 米以上地带多生长亚热带阔叶林，并分布有少量云南松和杉树等针叶树木。

土壤类型主要是冲积性红壤、森林棕壤、山地红壤、高山草甸沼泽和山地黄壤等。冲积性红壤结构好，肥力较高，主要分布于河谷阶地。森林棕壤有较好的透水透气性，森林残落物堆积较厚，有机质含量较高，一般发育于花岗岩风化严重的陡坡地带。山地红壤多发育于较平缓的山坡丘陵地带，土体深厚，土质较肥，是本区刀耕火种农业的主要分布地带。在海拔 1 900 米以上的山坳洼地中，分布着高山草甸沼泽土。高海拔地带的山坡，则大多是山地黄壤，上层薄，肥力差，很少种植农作物。

二、土地制度

云南德宏景颇族有四大支系，他们是景颇（又称大山）、载瓦（又称小山）、茶山（又称喇期）、浪速（又称浪哦）。卡场景颇族为景颇（大山）支系。据景颇族传说，该族原居住在靠近青藏高原的“木砦省腊崩”一带，南下进入云南德宏的时间大约在 14 世纪末期，卡场地区的景颇族，大致是从三非河流域沿恩梅开江南下，至昔董入盏西，然后到达盈江县的。据卡场乌帕寨长者推算，他们迁入该地大约 180 年了。在那以前，该地曾先后有德昂族、佤族、傈僳族居住过，并遗留着居住遗址。“乌帕”这个寨名，景颇语为“荒地”之意，据说就是因为景颇族初来时见到傈僳族抛荒的玉米地，才以此作为寨名的。^①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三），1 版，1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魔头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20世纪50年代的统计，卡场地区共有山官11人，寨头36人，魔头17人。^①

山官统治前期，土地私有制虽然已经产生，但山官仍然具有许多特殊的权力。例如，山官可以任意挑选耕种属于他人的田地；百姓私有田地虽然可以世代继承，但无买卖和典当之权，而山官却不受此限；百姓家庭迁走或死绝，其田地由山官收管；移民迁入，需向山官贡献礼物，经其同意之后，才能分给田地。山官又有组织生产和排解土地纠纷的职权。村寨土地的规划，每年耕地的选择以及生产环节的实施，均由山官与寨头及长者商定；村民之间出现土地等纠纷，也由山官、寨头按习惯法调解、处理。山官还享有百姓服役的特权。例如每年开荒伐树，百姓必须为山官劳动一天，有的村寨在播种、盖窝棚、除草时，也必须首先集体为山官干一天活。^②

约当20世纪初年，该区山官制度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山官原来享有的很多特权被取消了。例如，私有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典当，不必再受山官的管束；迁出户和死绝户的土地改由近亲继承，迁入户可以自由购买土地或者向土地多的亲戚借地耕种。

卡场地区土地私有制产生较早，水田私有大部分靠买卖关系确立，旱地私有是通过多次圈占同一块耕地而逐渐形成的。各家的旱地分散分布于各个区域之中，以大树、石头等自然标志为地界。人多地少的村寨，常常向相邻村寨租借土地耕种。例如草坝寨，迄今为止，每年要向盆都、砬旁、无牙三寨租借土地。

20世纪50年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在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版，3-1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同上书。



村寨神房中悬挂的牛头



神房旁的祭祀神台

区、村干部领导之下集体耕种，实施按劳分配的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但已不再是以社、队为单位的生产制，而改为实行土地分配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政策了。

三、“营旺”轮歇制

卡场景颇族是典型的只种一年便抛荒休闲的无轮作刀耕火种民族。那里的景颇族村寨都实行林地规划，全村的林地被划分为若干个区域，每个区域称之为一个“营旺”。营旺面积不等，每年村民集中垦种一个大营旺或几个小营旺，其余营旺则处于休闲状态。以乌帕寨为例，1957年该寨人口63户，共352人，其时有10个营旺，地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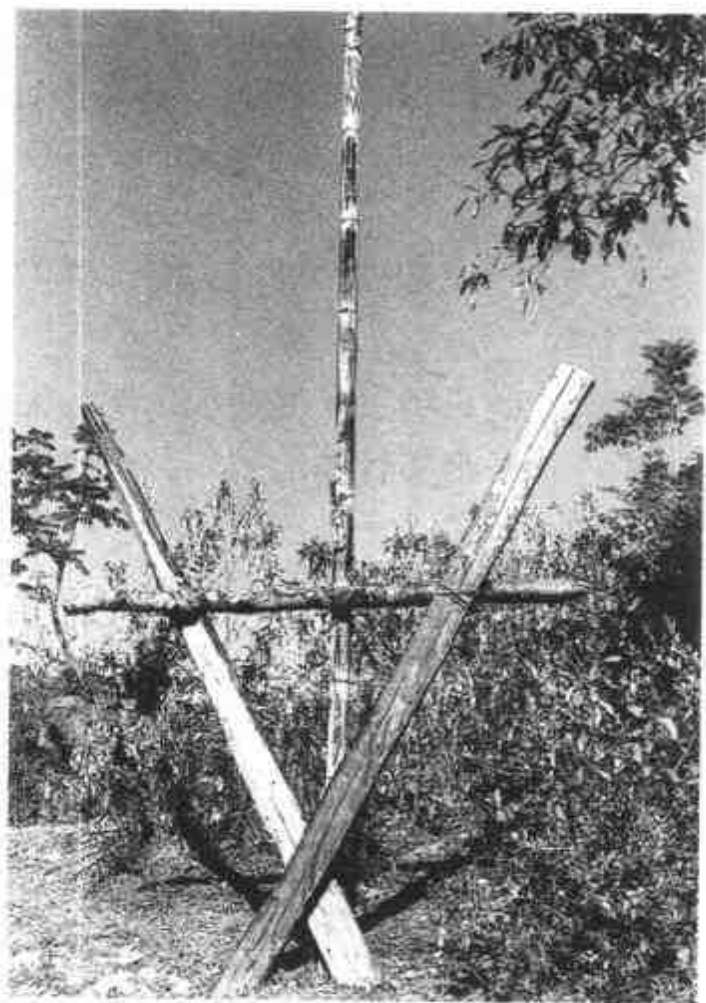
- (1) 劳文广（山梁子地）；
- (2) 盆带崩（山泉流出的土地）；
- (3) 戛强（红土地）；
- (4) 是张（寨子下方的土地）；

(5) 戛木佳（戛木佳为从缅甸迁来的一个村寨，他们最早耕种这块土地，因此得名）；

- (6) 勒阿蒙阿（大石头地）；
- (7) 枯（贫瘠的土地）；
- (8) 杜枯（豪猪洞地）；
- (9) 壹左崩（高山地）；
- (10) 石劳勘（为人名，因为是他开垦的土地，故得名）。

10个营旺总面积约在1万亩上下，人均有地约30亩。

20世纪50年代以前，该寨一年垦种一个营旺，一般十年一轮垦周期，最短八年一个周期。据1986年统计，乌帕寨人口变为61户，397人。由于“石劳勘”营旺于1982年被划为国有林，营旺从十个减为九个，故目前轮歇周期已缩短到九年。



神房旁的祭祀木桩

又如草坝寨子。20世纪50年代初期该寨有50户，300余人，有9个营旺，地名分别是：

- (1) 次南茄（垭口地）；
- (2) 卖保崩（水冬瓜树山）；
- (3) 涉砢（热水山）；
- (4) 格杠榔（祖先迁来途经之地）；
- (5) 龙布勘（山泉流经之地）；
- (6) 吴戛勘（吴戛竹子地）；
- (7) 杜枯（豪猪洞地）；
- (8) 是张（寨子下方的土地）；



砍伐后的刀耕火种地

(9) 木版勘（房屋前面的土地）。

9个营旺面积共约3 000多亩，一年垦种一个，九年一轮。1986年草坝寨有40户人家，277人。营旺减少了一个，“次南茄”营旺已发展成为寨址。

卡场景颇族的营旺轮垦制，是一种对土地既进行利用又着意保护的耕作制度。长期以来，卡场景颇族一直实行这种“营旺”轮垦制，所以迄今为止该区的自然生态并没有因为刀耕火种而显著恶化。尹宜公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卡场地区工作和调查，写过研究刀耕火种的文章，其中的一个标题是这样写的，“一面刀耕火种，一面青山常绿”^①，此实为卡场的真实写照。

许本汉的《盈江山区刀耕火种问题研究》一文对“营旺”轮垦曾进行过具体的抽样调查，其调查资料很能说明问题。^②

① 尹宜公：《云南省景颇族刀耕火种农业的初步分析》（“热带森林与农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

② 参见许本汉：《盈江山区刀耕火种问题研究》，载云南民族研究所编《民族调查研究》，1986（3），3~8页。



乌帕寨景颇族烧地

许氏于 1983 年 12 月 9 日，对草坝寨 1982 年抛荒的 20.39 平方米的两个样方进行调查。样方中有高 1 米左右的树桩 346 个，土地休闲才 1 年，重新长出树枝和枝叶茂盛的就有 322 个，树桩成活萌发率高达 93.1%，经火烧后死掉的不到 7%。接着许氏又对 1974 年垦种抛荒的迹地取样 100 平方米进行统计，样方内长有高达 8 米、围径 0.25 米的木本植物 11 种 32 株，藤本植物 6 种 11 株，还有多种草木，每平方米内凋落物重 0.79 公斤（每公顷 7.9 吨）。经抛荒休闲 9 年，地表又被葱茏的树林所覆盖。

除了严格执行营旺轮垦制之外，卡场景颇族还具有造林的优良传统。人们于秋季到山中采集水冬瓜树籽种，播种时将其掺拌于陆稻籽种之内，混播于地里，树苗与禾苗同时生长，待农作物收割之后，地中已是一片青翠的水冬瓜树幼林。水冬瓜树不仅是速生树种，而且其根瘤菌可以固氮，有非常显著的增肥土地的效果。只种一年便抛荒休闲的营旺轮歇制和人工造林优良传统，可保证地力常新，避免土地资源遭受破坏。卡场景颇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就是依赖“营旺”轮垦制和人工造林才得以较长

时期地延续。

四、历法与农事

卡场景颇族属大山支系，他们具有不同于其他景颇族支系的历法。其历法分 12 个月，每月都有特定的生产生活内容。

这一历法的年代也许比较久远了，可能是该支系未迁入云南之前便已产生，因为其各月事状多晚于现居地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知通达”（4 月~5 月间）为冬天结束月，似乎是北方寒带的状况，而非卡场地区的气候。

在刀耕火种的农事节令中，最重要的是对播种节令的把握。由于伐树和烧地是直接影响播种的两个重要环节，因此也是不能忽视的。该区农谚说：“腊月砍地干又干，三月烧地肥又肥，二月砍地不成器，三月砍地饿肚皮”，又说：“十年早九年好”，“庄稼不哄人，节令赶早不赶迟”。砍树还要根据对象，腊月砍伐大树林，正月砍伐小树林。至于播种，则根据作物而定，玉米、荞必须在清明前播种完毕，陆稻则要在清明后小满前播种，所以农谚说：“三月清明荞盖地，四月小满秧插田。”

卡场景颇族还有根据自然特征掌握节令的丰富经验。例如，当山林间传来“古墩墩”的鸟鸣声，那就该砍树了；三月初，山坡河畔绽出无数粉红和雪白的杜鹃花，这是烧地时节的标志；烧地之后是不能松懈的，必须赶在水冬瓜树落叶之前把地整好；桃花和梨花盛开之时，最适于种荞；听到布谷鸟的高鸣，那是在催促人们播种陆稻，而陆稻播种，是不能延迟到杨梅成熟之后的。

卡场景颇族历法

月份名称	月名意义	对应公历(月)
苦达	在家织布月	12~1

(续上表)

月份名称	月名意义	对应公历(月)
让达	准备工具月	1~2
文达	砍地月	2~3
石腊达	播种月	3~4
知通达	冬天结束月	4~5
森安达	节约用粮月	5~6
施木日达	猴子无果子吃月	6~7
各木舍达	鱼下子月	7~8
各冬达	干旱月	8~9
格腊达	陆稻成熟月	9~10
木鸡达	收谷月	10~11
木夏达	收割结束、下霜月	11~12

现实景颇族各月的农事活动，与上述历法所示不同，具体内容如下表。

卡场景颇族各月农事活动

月份 (公历)	农事活动
1	备耕，砍树
2	砍树，犁秧田，种春荞
3	种春荞，耙田，撒秧，种玉米，修整防火道，烧地，拣地，整地
4	烧地，拣地，整地，播种陆稻、玉米、豆、龙爪稷等，盖守地窝棚，栽早水稻
5	种陆稻、玉米等，盖守地窝棚，栽水稻，收荞，围地
6	收荞，旱地薅草
7	薅草，守地，搞副业
8	守地，薅草，收割早稻、早玉米
9	守地，收割早稻、早玉米
10	收割稻、玉米等，堆谷，打谷，搬运粮食
11	继续秋收
12	修理房屋，盖新房，备耕，砍春荞地

罗钰曾发表过在其他地区调查的景颇族的历法及各月生产活动，兹录于下进行比较。^①

^① 参见罗钰：《云南景颇族旱地农业及其农具》，载《农业考古》，1984（2），363页。

景颇族的历法及各月生产活动

月份名称	景颇语称	名称含义	活动内容
正月	约炳恰	砍地月	除进行砍地外，还有砍柴盖新房，结婚，串亲戚，妇女织统裙
二月	约颖恰	烧地月	继续正月的活动，开始挖老地，结婚的最多
三月	谷得恰	撒谷月	挖老地，种植玉米等
四月	得育恰	祭鬼月	进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春播及繁多的祭祀，紧接着大规模的播种开始
五月	峨落恰	鱼向下游游去之月	旱谷薅一道，铲一道玉米
六月	聪落恰	天亮月之意，喻庄稼快成熟	继续薅谷铲玉米
七月	约苗恰	薅地月	继续薅地，开始收旱庄稼如玉兴等
八月	着六恰	意为守雀月，不让雀鸟来吃快成熟的庄稼	守雀，收割旱谷，收旱玉米
九月	谷作恰	意为吃谷月	收割谷子，堆谷子，打谷子
十月	说播恰	意为樱桃花开之月	收打谷子驮谷子归仓
十一月	知着恰	意为过年月	生产活动进入尾声
十二月	攸冈恰	意为一年完了又进入第二年	旱地生产基本结束。妇女开始织统裙，男人准备盖新房的材料



景颇族妇女播种（张有乾摄）

五、百宝地

景颇族将水田称之为“万年桩”，意思是水田不必抛荒休闲，可以连续长期地耕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在卡场地区水田所占比例仍然很少，有的村寨一直未曾种过水田。有的村寨过去种过，但后来又放弃了，人们视为“命根子”的还是旱地。旱地又叫做“百宝地”，意思是可以生产种类丰富的农作物。百宝地作物栽培很有特点，而且有较高的经济效益。

人类早期的原始农业，似乎多采取多种作物混种的形式，而景颇族的百宝地却非盲目无知、随心所欲地混种。它有地类作物、早熟作物和晚熟作物合理配置的经验，有防灾保收的目的，还有改善地力，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功效。

卡场社区的每个景颇族村寨，都对刀耕火种旱地进行分类利用。乌帕寨坐落于海拔1400多米的山中，耕地大部分分布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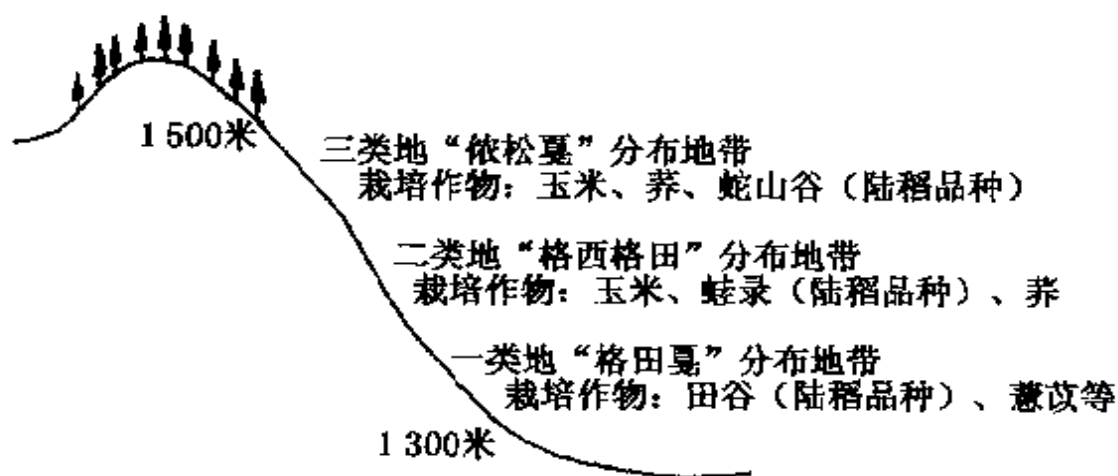


景颇族的竹锄（罗钰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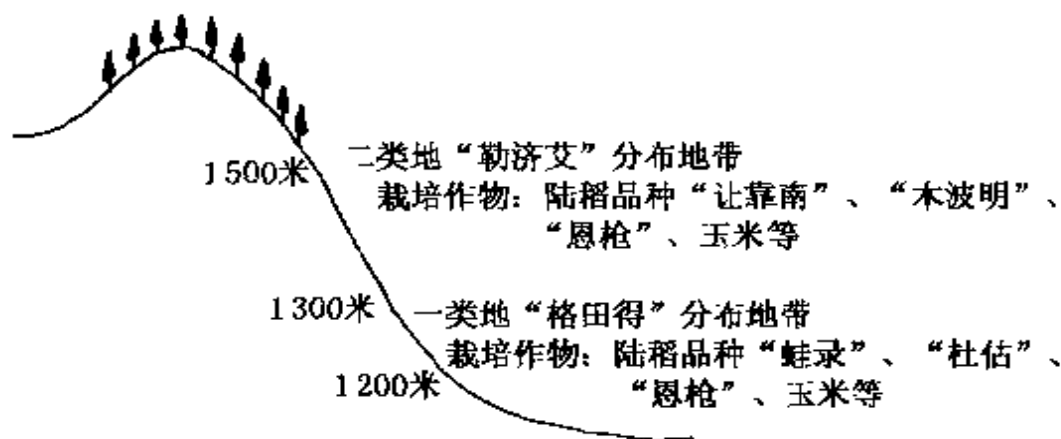


用竹锄和竹帚播种（罗钰摄）

1 300 米~1 500 米的地带。根据高程和土壤状况，旱地被分为三类：一类地叫“格田夏”，意为“坝子边缘比较肥沃的土地”；二类地叫“格西格田”，意为温暖的土地，其分布高于一类地；三类地叫“依松夏”，意为“冷地”，分布海拔最高。这三类地中，第三类地适宜栽种玉米、荞、蛇山谷（陆稻品种），二类地可栽种玉米、“蛙录”（陆稻品种，有黑、黄壳两种）和荞，一类地栽种田谷（陆稻品种）、薏苡，上述二三类地的作物也都适于二类地栽种。草坝寨位于海拔约 1 200 米的缓坡上，旱地分两类：一类地叫“格田得”，意思是“温暖肥沃的土地”，大约分布于海拔 1 200 米~1 300 米之间；二类地叫“勒济艾”，意思是“冷瘠的土地”，分布在海拔 1 300 米以上。该寨常种的陆稻品种有四五个，其名为“蛙录”（白谷，中熟）、“杜估”（白谷，早熟）、“思挤”（白谷，晚熟）、“让靠南”（白谷，晚熟）、“木波明”（白谷，晚熟，糯米）、“恩枪”（红谷，晚熟，糯米）。前两个品种冷热地皆宜，后三个品种不能种于热地。玉米两类地皆可种，其他作物则大多间、套种于陆稻及玉米地中。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罂粟曾经是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它适宜于种植在海拔较高的地类之中，于 1957 年被禁止栽种而绝迹。



乌帕寨的土地分类及其栽培作物



草坝寨的土地分类及其栽培作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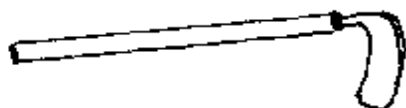
卡场景颇族以大米为主食，玉米和荞是主要杂粮。一个家庭如果一年栽种3亩陆稻的话，那就要种1.5亩荞。春荞在陆稻和玉米之前栽种，于五六月收获。收割后在地中脱粒，等不到晒干便运回家中，置于火塘之上的台架里烘烤，干后磨成面粉，青黄不接之时，大多以“苦荞粑粑青菜汤”为食。陆稻、玉米亦有早、中、晚品种的安排，七八月早稻、早玉米成熟，可以接上春荞。

在陆稻和玉米地中，常有多种作物间种和套种。间、套种作物从六七种到二千余种不等，其中有禾本科的龙爪稷、薏苡、粟、高粱，豆科的黄豆、饭豆、四季豆，茄科的茄子、辣椒、苦子，葫芦科的南瓜、黄瓜、葫芦、辣椒瓜、苦瓜，十字花科的青菜、萝卜、白菜，天南星科的芋头，菊科的向日葵，姜科的姜，百合科的葱、韭菜、蒜头，唇形科的苏子、薄荷，芸香科的打棒香，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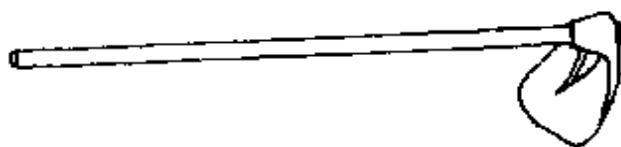
在陆稻地里进行间、套种，先于陆稻种前十余日将豆和黄瓜等种于地边，并搭木架，木架之间空隙种薏苡，遇石堆、土包或凹处则种瓜类，火灰多或土层深厚之处可种辣椒、茄子、芋头、萝卜和山药。播种陆稻时，先撒播龙爪稷，之后才点种混合着苏子和水冬瓜树籽的陆稻种。玉米地的间、套种方法也大致相同，

只是龙爪稷除了在玉米种下之后撒播之外，还可以先育苗后移植。前法省工但产量较低，后法费工然产量较高，而且便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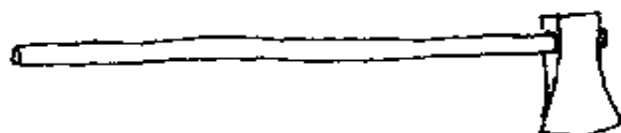
手锄：全长50cm、锄宽4cm、长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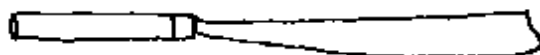
锄：全长1100cm、锄宽16cm、长17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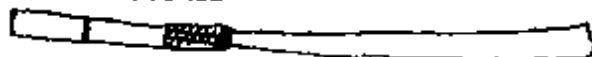
斧：全长1100cm、斧头长17cm、刃部宽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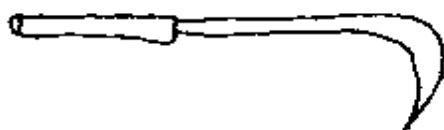
男人用刀：全长80cm、柄长20cm、刀根宽3cm、刀头宽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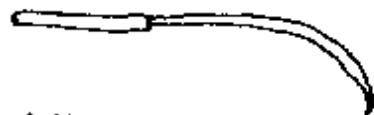
妇女用刀：全长90cm、柄长20cm、刀根宽2.5cm、刀头宽4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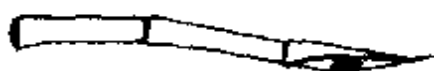
镰刀：全长45cm、柄长15cm、刀根2.3cm、刀叶最宽4.5cm



锯齿镰：全长30cm、柄长12cm、刀根1.2cm、刀叶最宽2cm



点播棒：全长40cm



景颇族的生产工具

耕、间套种黄豆、龙爪稷、粟、高粱、向日葵、苏子、南瓜以及香料作物等的比例，根据经验，在每箩陆稻籽种的播种面积内撒播龙爪稷籽种约6两（300克），玉米种0.5公斤（500克）左右，饭豆种200塘~300塘，其余作物则种于地边。玉米地株行距较稀，间、套种籽种可适当增加。例如在玉米地中间种矮脚饭豆，每箩玉米种的面积可种两碗半豆种（0.7公斤~1公斤）。^①

实行多种作物间种、套种，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点。

第一，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和阳光。景颇族说百宝地里“既有空中吊的（陆稻、黄瓜、豆、粟、高粱、玉米等），又有地面爬的（南瓜等），还有地下钻的（山药、芋头等）”。即高杆、矮茎作物相兼，直立、蔓生作物互依，上层、中层以及地上、地下应有尽有，形成多种作物组成的群体结构，空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众所周知，阳光是农作物生长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单一作物栽培的情况下，光能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多种作物搭配种植在一起，不仅可以吸收直射光，而且还可以利用透射光和反射光，大大提高了对光能的利用率。

第二，可以提高土地肥力并充分利用地力。景颇族说：“我们每一块地都要间种一些黄豆，黄豆长得好，谷子（陆稻）也就长得好。”又说：“栽种水冬瓜树最能肥地，哪怕是一块瘦地，只要种土水冬瓜树，都会有好收成。”栽种豆科农作物和水冬瓜树能够使土地变得肥沃，那是因为它们的根部具有可以固定氮素的根瘤菌的缘故。对于经过焚烧而缺少氮素的土地来说，间种或混种豆类和水冬瓜树无疑是很好的办法。卡场景颇族传统水冬瓜树的种植方法，是将树种子掺拌于陆稻籽种之内，1箩稻种（约25公斤）大约掺拌0.5公斤树种子，播种时与稻种一道播于地内。人们常说刀耕火种农业不懂得施肥，然而这种稻、豆、树混作农

^① 资料来源于盈江县档案馆。

业，不仅可以提高土地肥力，而且还有其他方面的效益。另外，由于同一块地中的作物，有的根深有的根浅（如玉米与豆类），有的是须根有的是直根（如陆稻与山药），因而各层土壤中的养分和水分也能得到充分的吸收。

第三，可以抗灾保收。山地一般坡度大，作物栽种种类多，覆盖率高，既可以减少暴雨、山洪对土壤的冲刷，在干旱炎热的季节还能够荫蔽土地，有利于水土的保持。在地边、路旁栽种玉米、高粱、薏苡等高秆作物以及饭豆和黄瓜等上架作物，会起到“屏障”的作用，减少风灾的危害。传统农业靠天吃饭，年成有旱涝之变。卡场海拔稍高的地带，七八月常有冷风侵袭，往往造成陆稻空秕和玉米瘪粒的状况。栽种单一作物，遇上灾年，很可能严重减产甚至全无收成。而多种作物混作，由于它们的抗逆性不同，成熟期不一，即使灾年也仍然可望“这边损失那边补，不收这种收那种”，多少起到抗灾保收的作用。此外，间作和混作还要考虑早、中、晚品种的栽种比例，利用作物不同的成熟期以避免青黄不接发生饥荒。

第四，可以满足人们生活的多种需求。在“百宝地”中栽种的20多种作物，陆稻、玉米、荞是粮食作物。高粱、粟、龙爪稷、玉米、苦荞既是粮食，又是酿酒原料。景颇族喜欢喝酒，男人可以一天不吃饭，但是不喝酒不行。红薯舂细做粑粑，黄豆做豆豉。在景颇族的食物中，豆豉是不可缺少的咸菜，没有豆豉就吃不下饭。苏子、芝麻是榨油原料。由于过去没有菜园，所以蔬菜也全靠“百宝地”生产。黄瓜、南瓜、芋头、四季豆等，还作为小商品常常到市集出售，所得收入用于购买盐巴等生活用品。

第五，可以节省劳力。陆稻地里间种龙爪稷，玉米地里间种瓜、豆等，因其枝叶茂盛，地面荫蔽，可以抑制杂草滋生。据统计，间种多种作物与只种单一作物两相比较，前者可以减少中耕次数，每箩籽种播种面积可省工20余个（一个成年人劳动一天叫做

一个工)。而且，多种作物集中栽种，也要比分散栽种便于管理。

第六，单位面积的作物产量比较高。卡场地区单一陆稻种植的亩产量，普遍为 100 余公斤。水稻亩产低于陆稻亩产（没有推广杂交水稻以前）为 100 公斤左右，玉米亩产又低于水稻，只有 50 余公斤。而百宝地亩产之和，却远远高于此数。据 1960 年《卡场乡粮食生产情况》报告：在 1 箩籽种的陆稻地里（1 箩籽种的播种面积约为 3 亩~4 亩），除了收获 15 箩陆稻之外（卡场地区箩量不等，低者 1 箩 20 公斤，高者 30 公斤，取中间值 25 公斤，15 箩共计 375 公斤），还生产黄豆 1 斗（15 公斤），龙爪稷 2 斗（30 公斤），高粱 2 箩（50 公斤），玉米 2 箩（50 公斤），饭豆 3 斗（45 公斤），苏子 1 箩（25 公斤），向日葵 2.5 公斤，黄瓜 10 背箩（约 250 公斤），南瓜 15 背箩（约 375 公斤），芋头 5 背箩（约 125 公斤），还有其他蔬菜、香料作物不计，则 1 箩籽种陆稻地共生产农作物 1 342.5 公斤。1 箩种籽面积约为 3 亩~4 亩，以每箩 4 亩计，亩产达 335.625 公斤，而如果以 3 亩计，则亩产高达 447.5 公斤。又据 1961 年《勐弄区卡场文化站卡场乡五个合作社情况调查报告》统计：“景颇新郎（村）王老五在 2.25 亩的旱地内，收获旱谷（陆稻）315 公斤，红米（龙爪稷）75 公斤，小米（粟）7.5 公斤，六谷（薏苡）10 公斤，玉米 7.5 公斤，高粱 7.5 公斤，黄豆 3 公斤，饭豆 12.5 公斤，苏子 5 公斤，向日葵 15 公斤，共 458 公斤，还有其他蔬菜瓜果，平均亩产值 90 多元人民币，等于 3.5 亩水田的收入。”再据盈江县档案馆收藏的一份调查材料中提到的：“我们调查了龙盆景颇社的一块多种经营旱地（即刀耕火种地），面积两箩（约 8 亩），共栽种了十种作物。其主体作物是旱谷（陆稻），播种两箩（约 50 公斤），总产 60 箩，亩产 187.5 公斤。混种作物的栽种量和收获量分别是：种红米（龙爪稷）1 升（约 1.5 公斤）收 12 箩（300 公斤）；种黄豆 1 盒（两手合捧之数量称为 1 盒）收 1 箩（约 30 公

斤)；种饭豆1盒收3箩(约75公斤)；种绿豆1升(约1.5公斤)收4箩(100公斤)；种玉米1抄(单手一捧之数量)收3箩(75公斤)；种山药22.5公斤收800公斤；种芋头22.5公斤收400公斤；种苏子1抄收2箩(50公斤)；种姜1碗收22.5公斤。上述十种作物共收3352.5公斤，每亩地平均产量419.1公斤。”百宝地的作物亩产量，就是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也是十分可观的。

然而，所谓“百宝地”的产出，还远远不只是作物的亩产量，除了耕种土地的收获物之外，尚有不少副产品。许本汉《盈江山区刀耕问题研究》一文有实例说明这个问题：“1982年卡场区草坝寨共有40户、273人，轮伐林地收获面积382亩。逐户调查表明，这些旱地直接生产的作物有22种，产量分别是：禾谷类粮食(旱谷、玉米、龙爪稷、小米、高粱、薏苡)57013公斤，豆类1986.4公斤，蔬菜类(16种)17608.5公斤，油料(苏子、向日葵、芝麻)3056公斤。每亩平均收获量：粮食149.2公斤，豆类5.2公斤，蔬菜46公斤，油料8公斤。以1980年不变价计算，每亩产值分别为：37.3元，3.53元，18.4元，6元，合计65.23元。其他产物还有：①食用菌中的香蕈、木耳。一般从上年砍种迹地上收获，这是重要的商品收入来源。仍以草坝寨为例，1982年主要从上年447亩迹地中采收到木耳378.5公斤，香蕈82公斤，价值分别为4542元、738元(当年商业收购价木耳12元/公斤，香蕈9元/公斤)，每亩产值12元。②柴薪。全年炊事取暖消耗的柴，大多取自火地。以每人一年消耗2立方米计，草坝寨村全年需用546立方米，价值约37674元，每亩提供薪材价值为84.28元。③养用效益。火地混种杞木子(水冬瓜树籽)，不需另行造林，对维护一定区域内基本的生态平衡，减少资源枯竭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上述情况表明，一亩林粮轮作刀耕火种地的产值，实际上应包括收获的粮、油、菜和附产物食用菌、柴薪等，一般162元左右。以上述所引二例的收获量计

算，实际要高于此数，这就是现今盈江山区景颇族刀耕火种经济生活的一个概况。”

诚然，卡场景颇族“百宝地”的间、混种技术也并非尽善尽美，由于完全按照经验和传统习惯行事，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某些不科学的成分。然而它毕竟是景颇族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宝贵知识，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人类适应利用方式。这种貌似粗放的栽培技术，就是与当代化学农业相比，其一些显著的优点也是不言而喻的。令人遗憾的是，景颇族代代相传的“百宝地”种植技艺以及粮林轮作的优良传统，竟然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合作化运动中毫无道理地被当做“原始残余”而被取缔了。20世纪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百宝地”又再现于部分村寨，而粮林轮作的优良传统却一直没有恢复。以至今日与年轻的景颇人交谈，令人感到他们对其祖、父辈的做法已相当陌生。粮林轮作，在卡场过早地变成了历史。

六、农耕礼仪

王箐等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莲山县乌帕乡乌帕寨社会历史调查》中提到：“景颇族信鬼，认为凡生产、生活的一切现象都由鬼主宰。乌帕寨全寨无人不信教。”^①“据我们初步统计，属于公共祭献的鬼即有97种之多。其中有的是管自然现象的，这多半又与生产有关；有的是管理五谷牲畜的；有的是管各种病的；有的是管金银财宝的。”^②“景颇族祭鬼活动非常频繁。每年在生产上必须祭官庙二次，祭旱地鬼四、五次；谷子进仓还得祭

^① 云南省编辑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版，18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② 同上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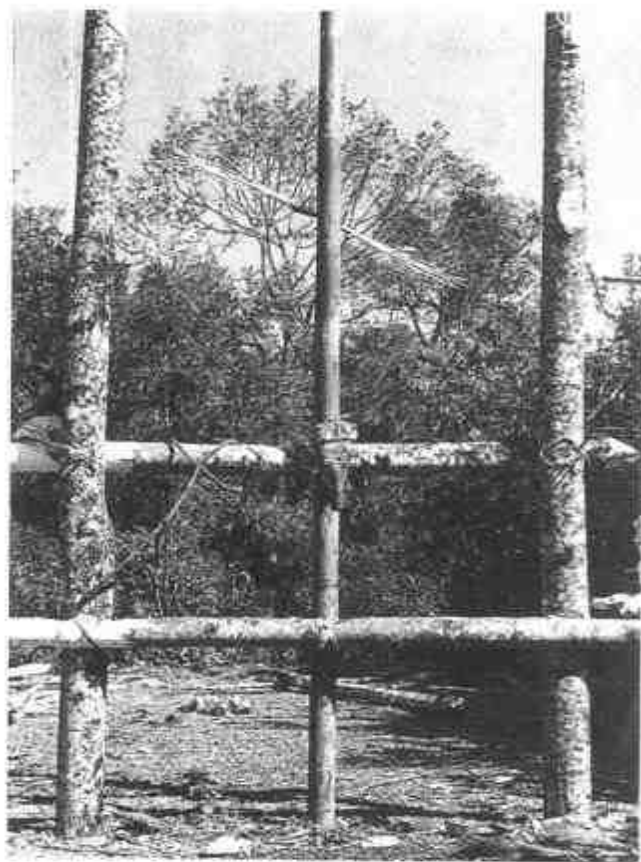
景颇族每家房屋前都搭有祭祀神台

一次谷鬼；吃新谷也要祭一次鬼，感谢谷种鬼，并祈祷明年再丰收。”^① 以上所说的鬼，实际上包括神灵在内，一般农耕礼仪祭祀的对象，大部分就是神灵。

农耕礼仪，既属于宗教的范畴，亦是农耕文化的一部分。景颇族的农耕礼仪，大都由山官、寨头、魔头主持进行。规模较大的活动，在“农常”（亦称“鬼房”、“官庙”）举行；家庭单独祭祀，则在房屋后面搭神台进行。

农耕礼仪从1月的选地开始。选地不祭祀，只选择日子。择日忌蛇日而喜虎日，这大概因为虎皮的斑斓黄色有丰收的象征之意吧。有的村子把选地日定在贺猛（地名）的赶集日，贺猛集日

^① 云南省编辑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三），1版，1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烧地前杀牛祭祀的牛头桩

卖米的特别多，这无疑也是希望能够多有收获。

择地之后是伐木，乌帕寨称砍地仪式为“农常卓”，草坝寨则叫做“纳波衣”。仪式在“农常”集体举行，由魔头打卦祈祷，以牛、猪、鸡作牺牲。有的村寨祭祀完毕后，把牺牲的头埋于地下，埋牛头停止生产八天，埋猪头四天，埋鱼头两天。埋头习俗有供奉地神之意，亦为驱鬼避邪。

烧地仪式乌帕、草坝都称做“纳赤项”。仪式也在“农常”举行，祭品有干鱼和鸡蛋。烧地禁忌虎、蛇、马日，而以牛日为佳。虎、蛇、马跑得太快，牛行缓慢，烧地火热要像牛那样缓缓而行，效果才好。

乌帕四五月播种之后举行盖窝棚仪式，称为“阿蛙克罗”；草坝则于播种之前盖窝棚并举行仪式，名为“纳婆蛙”。内容有



烧地前的祭祀场所

向地神献干鱼、鸡蛋，并作祈祷。各家自行办理。

作物成熟之时举行收获仪式，乌帕叫“衣朗农常卓艾”，草坝叫“木立卓艾”。仪式在“营旺”边集体举行，以猪和鸡作牺牲，其中的一头猪不作杀死，而要吊死，这大概是想以此恐吓偷吃践踏庄稼的野兽吧。

吃新米乌帕叫做“阿麻南沙”，草坝名为“恩冈沙艾”。陆稻成熟之时，各家各户准备新米杀鸡做菜，邀请亲朋到家尝新庆贺。过去草坝村民习惯到山官家聚会，山官家舂新米祭祀神灵，并招待前来尝新的村民。

打完谷子和粮食进仓之后，有的村寨还要举行简单的“阿曼麻罗罗米”仪式，即通常所说的叫谷魂。

上述农耕礼仪，是景颇族万物有灵观念的表现。它有很多象征性的近于荒诞的成分，然而在组织生产活动、调剂肉食（牺牲）消费等方面却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节 勐海布朗族的刀耕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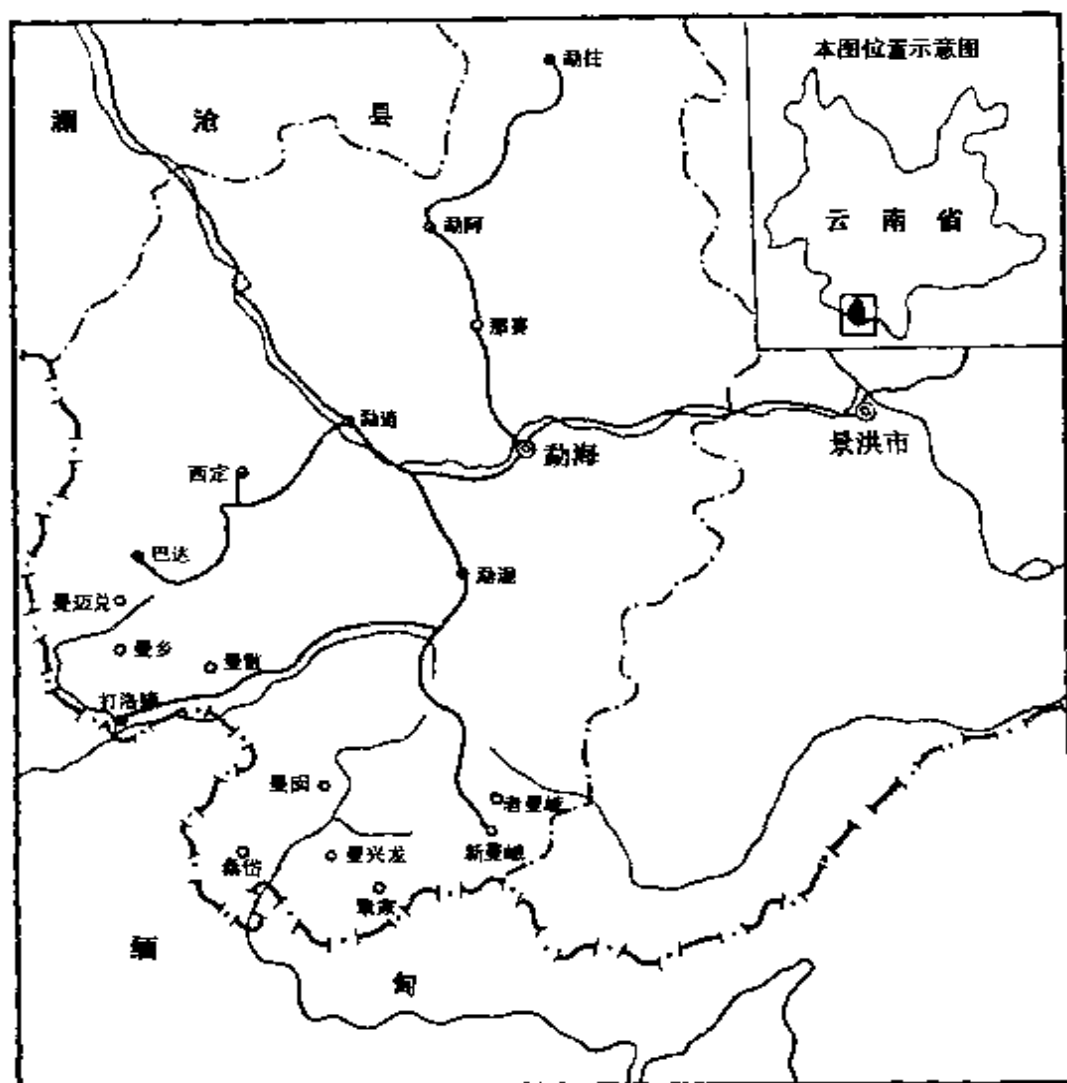
一、地理环境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的布朗山、打洛、巴达、西定地区，是布朗族的主要聚居区之一。布朗族共计58 000多人（1982年），该区分布近30 000人^①，其余散居在临沧地区的云县、镇康、永德、双江、耿马和思茅地区的澜沧、墨江、景东等县。

勐海县西南部地处横断山脉南端，隔南览河、南洞河与缅甸相望。该区主要为中、低山地貌，山脉走向错综复杂，山势起伏绵延。区内河川纵横，南佬河、南孟河、南披河、南木介河、南洞河等河流，皆源于该区中、北部山地，而分别向西、向南注入蜿蜒于中缅边境的南览河。河流沿岸，有冲积而成的阶地和盆地分布。区内山脉海拔高度大多在1 000米~1 500米之间，最高达2 000余米，而河谷最低海拔才有500余米。

本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在海拔900米以下的河谷盆地，年均气温大于20℃，终年无霜，年降雨量1 300毫米~1 600毫米；海拔900米~1 500米的山坡丘陵，年均气温在18℃~19℃之间，年降雨量达1 500毫米~1 700毫米；海拔1 500米以上的地区，年均气温在15℃~17℃之间，冬季有较长的霜期，年降雨量为1 800毫米~2 400毫米。全年分干湿两季，5月~10月为雨季，

^① 资料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局、勐海县档案馆。



勐海布朗族社区示意图

11月至翌年4月为干季。^①

本区植被主要是山地常绿阔叶林。在1300米~1800米地带，因垦殖过度，不少地方植被退化为稀树灌木林和稀树草地。

该区土壤垂直地带性分布较为明显，从海拔500多米的河谷盆地到2000多米的山巅带，依次分布着冲积土、水稻土、砖红壤、赤红壤、红壤和黄壤。

^① 资料来源于勐海县布朗山乡统计室。

该区除布朗族之外，尚杂居着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汉族等。傣族居河谷盆地，布朗族及其他民族居山区。



布朗族村寨纳回帕（王国祥摄）

二、社会组织

布朗族和其他山地民族一样，20世纪50年代至今曾先后实行过区、乡、村制度，公社、大队、小队制度和乡、行政村、自然村制度。20世纪50年代以前，则是农村公社的长老制度。农村公社时期的村落，残留着血亲关系的“戛滚”（氏族）。各村社的戛滚有多有少，有大有小。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巴达区曼瓦寨由5个戛滚215户组成，其中仲龙朗戛滚6户，召曼戛滚36户，仲召国戛滚37户，仲西怀戛滚38户，朗板戛滚98户。

又如打洛山区曼夕寨共有7个戛滚，其中达忍戛滚8户，达利戛滚16户，达赛短戛滚22户，达班（男）、牙（女）戛滚12户，达彪（男）、牙少缀（女）戛滚12户。^①

氏族有氏族头人，名为“高戛滚”，由氏族成员推举氏族中辈分高、年龄大的成员担任。村社的头人，则由全寨成员选举产生，候选人的条件，主要是处事干练、公正待人、夫妇健在等。各地各村社头人的设置数目和名称不大相同。巴达和西定地区的村社头人最多为七级，其名称和职责如下：

老干（一人）：总管寨务；

达曼（一人）：主管生产和宗教；

朗板（一人）：主管公共财物；

达闷（一人）、达先（一人或数人）：协助老干办事，并管理治安；

格朗（一人或数人）：处理男女不轨关系；

布占（一人或数人）：管理宗教事务；

呵西（一人或数人）：负责通讯联络。

布朗山较大村社的头人多达十人，其名称职责如下：

达棒：管理村寨事务，主持村社会议；

达相：管理土地和生产，并负责对外关系；

达奴、达道：协助达相办事；

达曼：主管祭祀和婚姻；

达亥：主管丧事；

达巴：负责收取宗教活动所分派的钱物；

达洪：负责通知开会，也管分派钱物的工作；

乃恩乃康：负责催收钱粮，保管公款；

^① 参见颜思久：《布朗族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研究》，1版，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布占：负责占卜、祭鬼、管理佛寺和赙佛。

头人是村社世俗的直接的管理者，由于该区 20 世纪 50 年代前受辖于傣族土司，所以傣族封建领主又分封若干布朗族大头人为“召卷”，每个召卷管辖几个村社，其时该社区 50 多个村社被划分为 5 个召卷。召卷之下，又设称之为“叭”、“扎”、“先”的三级头人，也都选择布朗人担任。

三、土地制度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卡场景颇族的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每年冬末春初，人们在头人的组织下，到已满休闲期的“营旺”中砍伐自己的土地。勐海布朗族却不是这样，其社会发展经历过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两个阶段。在氏族公社时期，土地全部属于氏族所有，到了农村公社时期，除了氏族公有制之外，又出现了村社公有制和家庭私有制两种土地制度。



布朗族的刀耕火种地（王国祥摄）

氏族公有土地，布朗族叫做“么耳戛滚”。在氏族公社时期，每年开垦林地，氏族长“高戛滚”按各户人口多少分配土地。各家所分土地仅当年有使用权，收获之后土地抛荒休闲，使用权便随之停止。到了农村公社阶段，氏族土地所有制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过分配方式已经有所变化。有的村社在分配之前，必须先由佛爷或村社头人以占卦的方式确定耕种方向；在分配次序上，有的村社则变成先由氏族长挑选，再按辈分高低、年龄长幼进行分配。新移民若要求参加分配土地，必须先向村社头人或氏族长象征性地呈送蜡条、茶叶等礼物，取得氏族成员资格，然后才可能获得土地。

布朗族把私有土地叫做“么耳坑”，它的出现大约在 20 世纪初年。具有私有土地的氏族成员，每年不必再由氏族长分配，只要种的林地确定之后，便可像卡场景颇族那样，按各自的界标垦种。



播种陆稻（徐永安摄）

村社公社的土地称为“么耳庸”，其分布多在村寨周围、道路两旁、水源附近或高山之上。垦殖村社公有土地，通常由村社头人之一的达曼主持分配，方法类似氏族份地。

三种土地制度，以氏族所有制的比例最大。据颜思久等人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巴达曼瓦寨的村社公有地占该村土地总面积的12%，氏族所有地占63%，私有地占25%；布朗山新曼峨寨氏族所有地占52%，各户长期占有不再分配的土地占47.76%。巴达曼卖兑和打洛曼散是土地私有比较突出的村社。曼卖兑村社公地只有两块，面积100亩，占土地总面积的1.7%，氏族所有地为200亩，占3.4%，私有地约5540亩，占94.9%。^①

在同时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的布朗族农村公社里，无论是村社、氏族之间，还是村民之间，土地占有的多少是不平衡的，土地多者耕种不完，土地少者则不够耕种。例如，布朗山、曼因、曼桑、曼邦、新因、香广等寨相对而言土地比较富足，而曼兴龙、章加、郭兴龙等寨土地就比较紧张。氏族之间也存在着土地有多有少的问题，杨毓才等的调查统计，便说明了这种情况。

布朗山章加寨七个氏族土地占有面积比较表^②

氏族名称	户数	土地面积(挑) ^③	占氏族土地面积(%)	土地块数
岩洪康	10	183	18.3	22
岩波哦	8	287	28.7	31
岩温砣	6	60	6	7
岩康安	6	256	25.6	28
岩坎光	3	117	11.7	15
岩荚香	3	30	3	6
岩乌三	3	67	6.7	15

① 参见颜思久：《布朗族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研究》，1版，3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②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版，1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③ 布朗族以“挑”计算土地面积，1挑陆稻籽种的播种面积约为2.5亩。

土地占有不平衡，要求社会具备必要的调节功能。盛行于布朗族农村公社中的讨种、伙种、借种（租种）的习俗，便是几种常见的土地调剂形式。

讨种：讨种即要土地耕种，常见于亲戚好友之间，讨种土地一般不需要付任何报酬。

伙种：在征得有地户同意的情况下，缺地户可以多出劳力与有地户共同耕种其土地，收获的粮食一般对半平分。

借种或租种：缺地户以草烟、蜡条、茶叶等作为见面礼，与有地户商量租借土地。地租有多有少，多者每挑籽种土地面积付一个银元。

如果缺地户是向其他村寨的人讨要或租借土地，那么首先必须带上少量烟、酒、米、鸡等礼物去见该寨头人，得到他的允许之后才能找具体对象商谈。讨要租借土地不仅发生于个体家庭之间，村寨之间也常常发生这种关系。例如布朗山章加寨，1955年全寨有130户、621人，土地总数为3820挑籽种面积（约合9550亩），人均仅有15.4亩，根本不够轮垦，因此几乎每年都要向其他村寨租借土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到1954年的20年间，章加寨曾先后向南车、曼班、新因、香广等村寨集体租借过14片土地。^①

四、刀耕火种技术

与卡场景颇族一样，布朗族刀耕火种的最大特点，就是实行只种一年便使土地休闲的无轮作轮垦制度。为了保证持续有效的轮垦，卡场景颇族是把土地划分为若干“营旺”顺序循环轮垦。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版，16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勐海县的布朗族村寨，也毫无例外地规划土地实行有序的轮垦。下面列举几个村寨的事例。

曼散寨。曼散寨属勐海县打洛乡，原为一个寨子，1968年2月分成老、中、下三个村寨。原寨称老寨，坐落于海拔1250米的高地，1988年有73户、380余人；中寨位于海拔约1000米的山腹，1988年有39户、275人；下寨在海拔600余米的坝子边缘，1988年有58户、390余人。



曼散老寨

笔者于1988年1月到老寨调查，报告人岩胆班（68岁）、康朗布坎（54岁）、岩烘（63岁）告之该寨建寨已历十代。20世纪50年代以前，曼散有五个戛滚（氏族），名为卡腊蒙、岩三哥、岩三张、岩萨、岩布敞。头人有先、扎、培亚、扎勒、火西、波张、召曼七人，管理寨务及生产。

曼散寨有19块土地，每块都有地名：

- (1) 巴老（茅草地）；
- (2) 麻龙（北边寒冷的高地）；
- (3) 罗崩（水源头的地）；
- (4) 帮戈（靠近哈尼族村寨的地）；
- (5) 公毛梭（杀狗祭祀地神的地方）；
- (6) 公来（石头地）；
- (7) 翁公（寨脚靠北的地）；
- (8) 刀登（适宜种棉花的地）；
- (9) 鸠安麻（垭口地）；
- (10) 公巾（开阔的土地）；
- (11) 公萨干（藤子地）；
- (12) 根录梁（平坦的地）；
- (13) 曼帮栏（歇脚休息的地方）；
- (14) 鸠汤（分界地）；
- (15) 来戛都（傣族到该寨赓佛经过的陡坡地）；
- (16) 曼冷（又平又宽的地）；
- (17) 聋孙（平坦有水的地）；
- (18) 崩昂（温泉地）；
- (19) 来梁（红土地）。

此外，尚有两块土地与邻寨曼坎有争议，归属未定。在这19块地中，翁公和崩昂两块最适于种棉花，种了棉花之后再种一季陆稻，此后休闲八年以上。其余土地大多种陆稻，种一季便抛荒，休闲期九年，十年一个轮歇周期。过去地多人少，轮歇周期可长达十几年甚至二千年。

20世纪50年代初期，曼散寨的土地已属私人所有，各家的土地都有明确的界限。每年耕种哪一块土地，由培亚召集头人商量决定，然后通知大家，村民便可前去砍伐指定耕种地域中的属于自家的土地。



曼散老寨的寨桩

杨毓才等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报告《勐海县布朗山章加寨布朗族社会调查》统计章加寨有刀耕火种地 31 片，轮垦周期为八年，各年垦种片数如下表。

 章加寨各年砍种土地面积统计^①

时 间	砍种片数	挑 数	折合亩数	占总面积 (%)
1951	4	500	1 250	13.1
1952	5	506	1 265	13.2
1953	2	370	925	9.7
1954	4	433	1 082.5	11.3
1955	6	308	770	8.1

^①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 版，5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续上表)

时 间	砍种片数	挑 数	折合亩数	占总面积 (%)
1956	3	573	1 432.5	15
1957	2	405	1 012.5	10.6
1958	5	724	1 810	19

其他村寨如布朗山老曼峨寨有地 12 大片，1 年垦种 1 片，12 年 1 个轮垦周期；西定地区的曼瓦寨把刀耕火种地分为 7 大片，7 年 1 个轮垦周期；等等。



勐海县迁往低地的曼夕下寨

布朗族地片的划分，是为了实行有序的轮垦，而所有的土地，又依海拔高低而分类。在曼散、曼夕等村寨，土地一般分为两类。曼散把较低的土地叫做“麻根”，“麻”是地，“根”是低的意思；分布较高的土地则称之为“麻聋”，“聋”就是高的意思。“麻根”适宜栽种“靠达宾”（白米、早稻），“靠目来”（白米、中熟稻）等，“麻聋”大多栽种“达宾量”（红米、早熟稻）、“靠南翁”（红米、中熟稻）等。曼夕高地叫“藤聋”，低地叫“皮斯罗”。

新曼峨寨。新曼峨寨依海拔高低把土地分为三类，1400米的地带称为“腾龙”，1300米地带称为“腾刚”，1200米地带称为“腾环”。陆稻是主要的栽培作物，次为棉花（过去鸦片曾是重要的经济作物）。主要栽培作物与地类的配置如下表。

地类	腾环	腾刚	腾龙
海拔高度	1200米	1300米	1400米
陆稻品种	考莫浪、考兵斤、考拔了（饭米、白、中熟稻）、考糯（糯米、白）、黑糯、棉花	考荒（饭米、红、白两和、中熟稻）亦可科一、三类地品种	考纳温、考吸先（饭米、红、晚稻）
棉花	棉花		

依据海拔高低划分土地类型，主要是考虑气候因素，高地冷，低地热，中部温暖。气候不同，就必须栽培不同的作物或不同的作物品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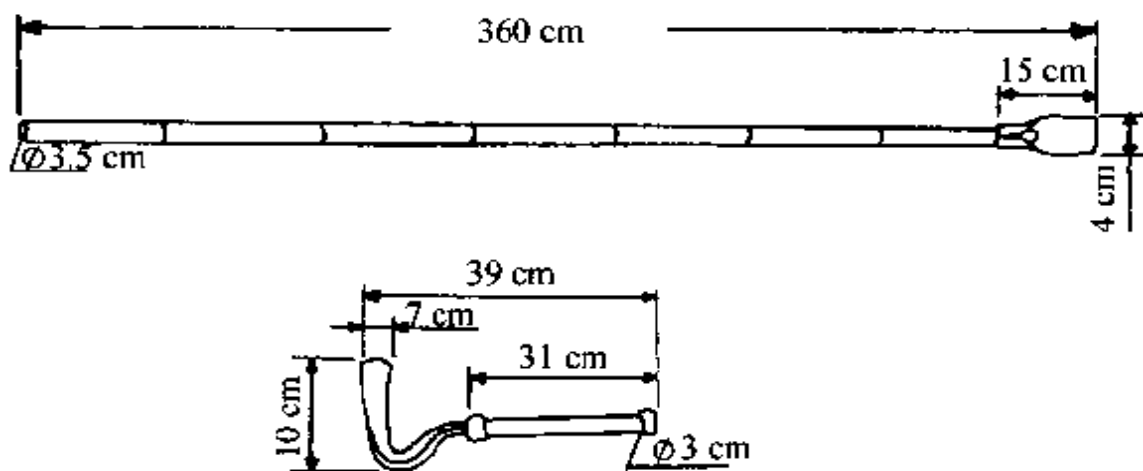
采集蘑菇、竹笋等到路边出售

布朗族传统栽培作物主要有陆稻、玉米、棉花，20世纪50年代以前还有罂粟。陆稻是主粮，播种面积最大；棉花除了自己

使用之外，也作为商品与坝区傣族等进行贸易和物品交换；过去罌粟是最重要的经济作物，是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作物与地类的配置，罌粟种于高冷之地，棉花种于低热之地，玉米种于中、低地，陆稻有耐热和耐寒等多种品种，各类地都有种植。过去布朗山陆稻品种很多，现在每个村寨仍有六七个品种。例如曼散老寨，低热地主要栽种“靠达宾”（白米、早稻）、“靠目来”（白米、中熟），高冷地多栽种“达宾量”（红米、早稻）、“靠南翁”（红米、中熟）。曼夕寨低热地一般栽种“白棍弯”（白米、晚熟）、“靠发”（红米、中晚熟）、“靠糯批”（花谷、晚熟），高冷地常栽种“靠炭”（黑谷、晚熟）、“厄烘”（花红米、晚熟）、“靠勒棍”（花米、中晚熟），两种地类的过渡地带则栽种“曼聋”（紫米、晚熟）、“靠麻勐”（红米、中晚熟）。

勐海县布朗族的刀耕火种地凡陆稻只种一年便抛荒土地。棉花地一般种两年，头年种棉花，第二年种陆稻，然后抛荒土地。而棉花地就像景颇族的“百宝地”，其中间、混种高粱、玉米、粟、瓜、豆、红薯、萝卜、青菜等作物。20世纪50年代以前种罌粟，有的地可以连续耕种，不必休闲；有的地则采取罌粟和玉米轮作的方式，或头年种玉米第二年种罌粟，或先种罌粟后种玉米，然后使土地休闲。

由于地类不同和栽培作物的多样化，所以一年到头生产活动不断。例如新曼峨寨，生产过程由选地开始，选地在公历1月进行。每年选择哪一片已达到休闲期的土地耕种，系由头人“格旁”查日子，看风水和抽签决定。头人占卜选地，各村情况不尽相同。如在打洛乡曼夕寨，头人“捉蛮”选地靠卜谷卦。即在一个小茶杯中装一些谷子，祷念一番，然后对已达到休闲期的林地逐一进行占卜，如卜得谷粒为单数便不能耕种，双数便可耕种。又如在布朗山章加寨，选地是由头人“召曼”到佛寺“打米卦”进行。先量出七筒米，由佛爷念经请寨神、地神、勐混神和景洪



布朗族的点播棒和手锄

神来共同决定种哪几块地。接着把米倒出来又重新量，如米筒被装满，则表示吉祥丰收，就决定耕种；如米筒装不满，则表示不吉，召曼又从达到休闲期的土地中再选几块，并重新打米卦。选地占卜算卦，是布朗族的独特做法，其他民族一般只要由头人、老人商议便可以决定了。

2月伐木，砍伐树木由下往上砍。小树擦地皮砍，稍大的树留30厘米至50厘米的树桩，大树则不砍主干，搭架上树砍枝。

3月烧地，沿地周认真清除干树枝、杂草、败叶，整理宽度达10余米，叫做“防火道”。烧地前，先于早晚天凉之时沿周烧一圈，然后才选择好天气并于中午太阳当顶之时引火。此后要进一步拣烧，即反复地把未烧尽的树木一堆堆拣拢再烧，越烧得透越好，并且平整土地，其间要花费几乎一个月的工夫。

5月开始播种，先种高地和阴坡地，6月~7月播种低地和阳坡地。播种工具为竹木点播棒，有头部安装小铁铲的，也有削尖头部不装铁铲的。播种陆稻时常常互相帮助，多时可达十余对男女，在地中土下排开，从下往上播去。而如果种了棉花之后继续种陆稻，则用手锄挖去棉株，并挖穴播种稻种。棉花点播不如陆稻，一穴仅放三四粒棉粒，而陆稻一般要放入十粒左右。

7月~9月除草。陆稻除草一至三道，棉花除草四五道。除草使用手锄。棉花除草同时中耕培土。杂草的多少与休闲期有关，土地休闲期越长杂草越少。

7月和8月陆稻灌浆，为了增加地温，常在地中或地边烧火。庄稼成熟时，以竹子作响叭，靠风力或水力发声，以驱吓雀类；或在地中烧粗糠破布，借其气味阻止野兽；或在地周设置陷阱；或守于地中敲打铙锣，并在地周围挖出一条空道，以防范动物糟蹋庄稼。

10月和11月收获陆稻。稻子割后，堆于地中露晒数日。脱粒时在地中稍微平坦之外铺垫篾笆，将稻穗置于其上，或男女以赤脚蹉碾，或以竹棍敲打，然后以竹扇扇除碎叶。背运粮食十分辛苦，尤其是远地，体力不支，便分段背运，从地到家，远者分五六段，每一段设一个临时存粮点。运粮一般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新曼峨寨过去不种水田，20世纪70年代始有发展，现已成为布朗山水田比例最大的村寨。

五、农耕礼仪

据布朗山章加寨的调查，该寨与生产有关的神灵有八种：^①

(1) “色傢荒”：大鬼，亦即山林之神，主宰人们的一切生产和祸福；

(2) “扳哈披天”：天鬼，主宰风、雨、雷、电等；

(3) “色傢格洛”：陆稻鬼，又称“三足石鬼”，专管陆稻收成的好坏；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版，4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勐海县布朗山的农耕礼仪之一
——抬活佛到地里念经
(王国祥摄)

- (4) “色傢建芒”：地边鬼；
- (5) “色傢翁”：水鬼；
- (6) “色傢枯”：树鬼；
- (7) “披朋”：棉花鬼；
- (8) “色傢格代”：地鬼。

布朗族的农耕礼仪，各个村寨并不相同。这里仅以布朗山新曼峨村和打洛乡曼散村的资料进行介绍。

选地占卜：前文已有介绍，兹从略。

砍伐仪式：新曼峨称砍地仪式为“亚南”，其做法是在土地选定之后，由几位长者和一个小和尚去地边杀鸡祭祀山神；曼散称砍地仪式为“松芒”，做法大致相同。



曼散老寨布朗族收获后到佛寺燄佛

烧地仪式：新曼峨和曼散不举行此仪式。曼夕等寨在地边举行，杀鸡一只，由头人或老者将鸡血鸡毛等撒于防火道上，祷告天、地神，祈求保佑不发生火灾，并使地中树木全部燃烧。

播种仪式：新曼峨称为“冈”，播种完毕，回寨子杀鸡或猪祭祀一天一夜，此期间禁止所有人到地中去；曼散在播种约半月之后，禾苗长出之时举行，亦杀鸡猪祭祀，名为“罗布”。

祈丰仪式：新曼峨叫做“克干曼”。7月初，大家拼凑钱和米，并以竹子编制的法器 and 六畜，到地里窝棚内祭祀。佛爷念经看鸡卦，祈求丰年。

吃新米：新曼峨称之为“梭莫冲”。早稻成熟，各家各户采谷穗舂新米，备以菜蔬，送往佛寺燄佛。曼散无此仪式，但有名为“乖玛”的做法。那是在陆稻和棉花快成熟之时，选举两个已婚（不能是二婚）的男子，脱光衣服从左到右围地跑一圈，意思是驱逐恶鬼以保丰收。

打谷仪式：打谷子要选择吉日。如果地里葬过死人，则要编制法器插到地中，并祷告祭祀一番。

叫谷魂：新曼峨和曼散无此仪式。有的村寨在陆稻运回寨子装满谷仓之后，要将一包代表谷魂的谷子置于其上，认为“谷子

有了魂才吃不完”。同时还要去地里献蜡条、饭菜等，把氏族神和水神请到仓库居住。

第三节 西盟佤族的刀耕火种

一、地理环境

西盟佤族自治县位于云南思茅地区南部，其东北部和东部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相邻，南部是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西北部和西部与缅甸接壤。该县居东经 $99^{\circ}18'$ ~ $99^{\circ}43'$ 和北纬 $22^{\circ}25'$ ~ $22^{\circ}57'$ 之间，总面积 1 391 平方公里，是著名的阿佤山中心区。我国佤族 1982 年统计为 298 000 余人，分布于云南西部和西南部的沧源、西盟、耿马、双江、镇康、永德、澜沧、孟连等县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盟是佤族的主要聚居县之一，1982 年全县有人口 58 000 人，佤族有 41 000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70.7%。

该县处横断山脉南部，山地纵横。山脉高程多在 1 500 米 ~ 2 000 米之间，最高峰大黑山海拔 2 458.9 米，而南卡河谷最低处仅 600 米。

库杏河、南康河和南卡江为该县主要河流。河谷区植被保存较好，有连续分布的常绿阔叶林和竹子混交林。该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而潮湿。年平均气温约为 15.2°C ，最热月平均气温 17.8°C ，最冷月平均气温 10.2°C 。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为 2 700 毫米左右，5 月 ~ 10 月为雨季，其间降雨量是全年降雨量的 90.7%。

土壤类型有砖红壤、赤红壤、红壤、黄壤、石炭岩土、水稻

土等。砖红壤主要分布在海拔 800 米以下的南康河谷地区，赤红壤分布在海拔 800 米 ~ 1 200 米的地带，红壤主要分布于海拔 1 200 米 ~ 1 500 米的广大山区，黄壤分布在海拔 1 500 米 ~ 1 800 米之间，黄棕壤分布于海拔 1 800 米以上，石灰岩土零星分布于各地，水稻土则分布在河谷低地。^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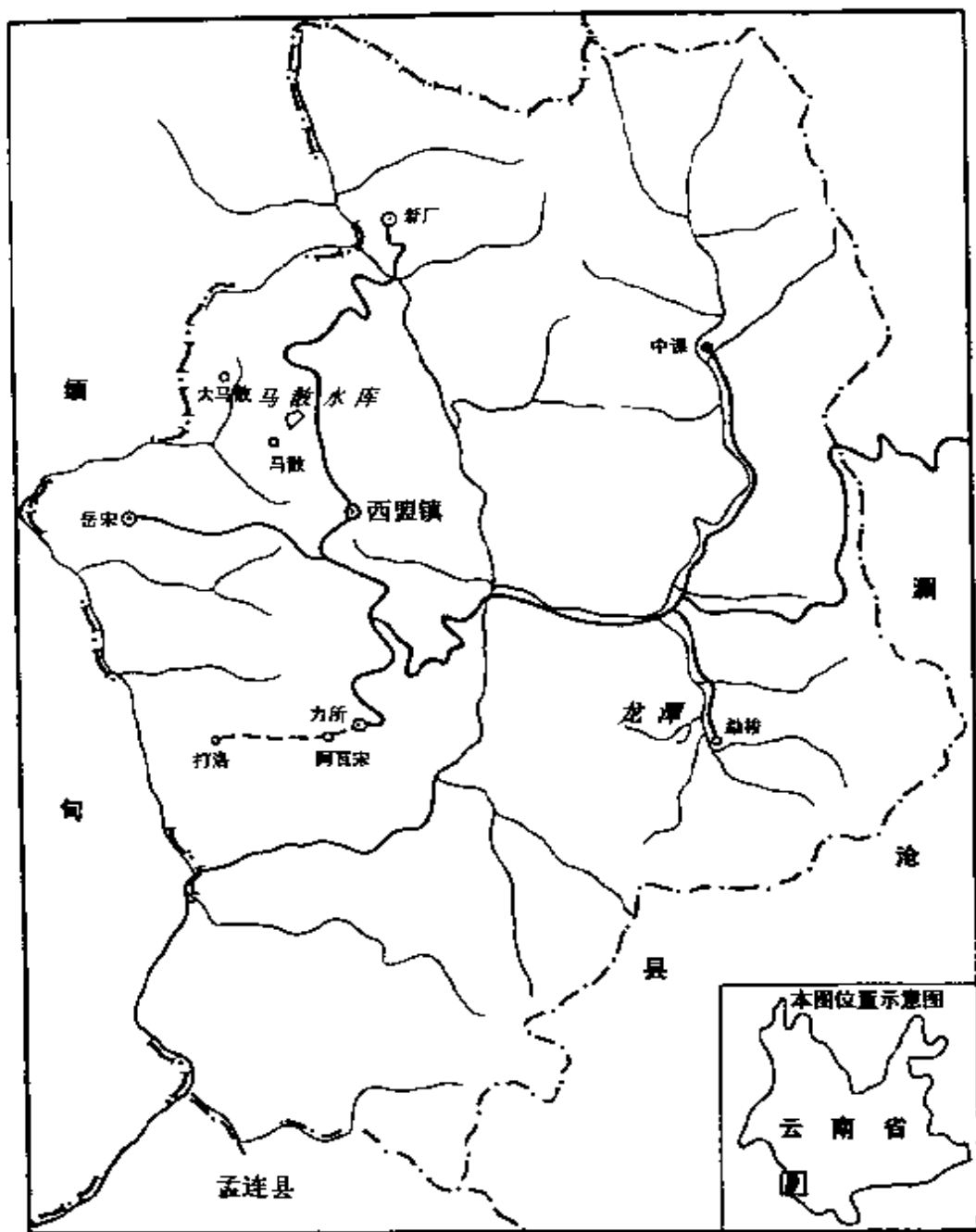
矿藏有锡、铅、银、云母、石棉、石膏等。银矿开采已有数百年历史。

该县有从县城通往澜沧的公路，又有从此主干线通往新厂、岳宋、力所、中课、勐梭等区的公路。然而大多数村寨比较闭塞，交通困难。



阿瓦山区

^① 资料来源于西盟县统计局、农业局。



西盟佤族社区示意图



西盟县岳宋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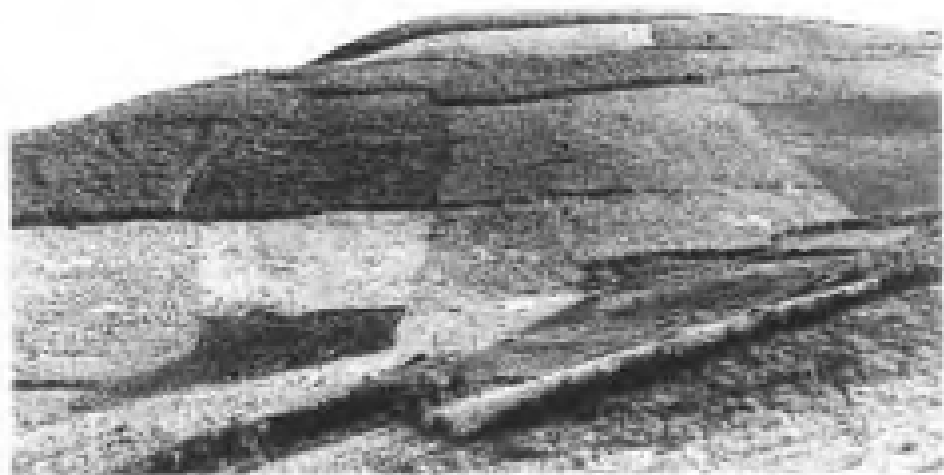
二、社会组织和土地制度

20世纪50年代初期，西盟佤族尚处于农村公社衰落阶段。佤族的农村公社，有与基诺族等民族相似的一面，即佤族村寨也是以地缘关系结合的若干姓氏聚合体。不同之处在于，在佤族的农村公社中，存在着军事部落联盟。军事部落有的只是一个村寨，有的是若干村寨的联合。村寨之间的联盟并非固定不变，只要利益一致便可暂时结合。部落联盟没有常设的盟主，不存在统属关系，村寨仍然是相互独立、自给自足的小社会。^① 由于各部落之间常常发生猎头和械斗，因而每个村寨都修筑有防御工事，这是佤族部落的突出特征。防御工事包括在村寨周围挖壕沟，沿沟边设置障碍，以粗大木头构筑寨门，寨门外挖掘宽约20米~30米、深约2米的通道，上面铺盖圆木和荆棘。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版，42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西盟县佤族的刀耕火种地



西盟县佤族的草地轮歇地

佤族农村公社的首领是窝朗。窝朗有大小之分，大窝朗产生于村寨中历史最悠久和最有势力的姓氏，行世袭制。随着农村公社的衰落，窝朗地位逐渐下降，新的头人应运而生。新头人由村民选举产生，他们大都是生活相对富裕、能说会道、处世干练的人。宗教活动的主持者称之为魔巴，负责卜卦和祭祀。头人、窝朗和魔巴举行的会议和由他们召集的村民会议，是讨论和决定村寨大事的权力机构。^①

约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西盟佤族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开始从氏族公有向私人占有转化。至 20 世纪 50 年代，私有制已在该区占主要地位。与土地私有制并存，每个村寨也还有少量公有土地，不过公有土地都是耕作条件较差的土地。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资料，马散寨 1956 年私人土地占村寨土地的 92%，而公有土地仅占 8%；岳宋寨公有土地仅有两块，此外还有一块距离村寨 7.5 公里的荒地，其余土地均为私有。^② 私有土地界线明确，互相不能侵占，而公有土地却管理不严，村民均可自由耕种。有的公有土地位于几个村寨之间，邻村的村民也可以自由耕种。

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的抵押买卖成为普遍现象。然而体现农村公社和谐互助风尚的租借土地耕种和合伙耕种的习俗仍然存在，尤其是合种十分盛行。据田继周等 20 世纪 50 年代对六个村寨的调查，参加合种的户数在各寨总户数中的比例，最低为 44.7%，最高为 100%。合种的原因，或由于亲戚好友之间的互相帮助，或由于土地为双方所有，或因债务关系，等等。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 版，42～45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② 同上书，14～15 页。

20世纪50年代，是佤族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象征该社会内部互相残杀的军事部落联盟，传统的窝朗头人社会组织以及以私有为主的土地制度，均消失于历史舞台，代而起之的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社队集体生产按劳分配的制度。

三、栽培作物及生产技术

西盟佤族的栽培作物，有陆稻、龙爪稷（小红米）、棉花、荞麦、粟、玉米、黄豆、小豆、水稻、薏苡、高粱、小麦、马铃薯、芋头、蚕豆、豌豆、青菜、白菜、辣菜、辣椒、茄子、姜、香菜、薄荷、茴香、南瓜、苦瓜、冬瓜、洋丝瓜等。在粮食作物中，陆稻和小红米栽培历史悠久，小麦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引进的。

陆稻是佤族的主要粮食作物。和其他山地民族一样，佤族也具有丰富的陆稻栽培经验。根据最近的统计，西盟县目前有陆稻品种64个。每个村寨至少有七八个陆稻品种，其中必须有耐肥和耐瘠、耐冷和耐热、早熟、中熟和晚熟品种以及饭稻和糯稻。

小红米是佤族不能缺少的栽培作物。由于栽培历史悠久、栽种比例较大和用途特殊，因而它已成为佤族农业的重要特征。小红米可掺稻米煮食，但更多的则是用于酿造水酒。其酿法是：先将小红米煮熟，掺拌酒药，装入竹笋内，置10至20天使其充分发酵，饮用时取出一部分装入竹筒或葫芦之中，加以冷水，滤取其汁。佤族特别喜饮水酒，男子每天必喝，一年四季不断。水酒具有消暑解乏的功效，在维系人际关系方面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佤族俗话说：“无酒不成礼”，熟人在一块儿聊天，必以竹筒盛酒互相传递共饮；客人远至，首先也必奉献水酒以示敬意。所以，无论余粮户还是缺粮户，每年都得消耗大量粮食酿造水酒。



佤族的主要栽培作物之一——龙爪稷（俗称小红米）

罂粟过去是西盟佤族的主要商品经济作物，其种植历史大概始于 19 世纪末，而以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最盛。所产鸦片主要用于交换，每当收获季节，外地行商便携带大批牲畜、布匹、盐巴以及小百货进入阿佤山，与佤族进行鸦片交易。西盟街早在 20 世纪初便出现了定期交易的“烟会”，马散等地也形成了五天一次的定期集日。^① 商品交换刺激了鸦片生产的发展，以至各村各寨家家户户都种植罂粟。据李仰松等 1957 年的调查统计，翁戛科寨当年每户平均收获鸦片 27.1 两。^② 又据田继周等的调查，1956 年马散每户平均收获鸦片 41.2 两，约占该寨农业总收入的 32%。由于鸦片交易频繁，在佤族中也出现了一些专业贩卖户，他们往返于阿佤山与内地之间，运输鸦片数量多时高达 3 000 两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 版，33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②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 版，87 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留作种子的龙爪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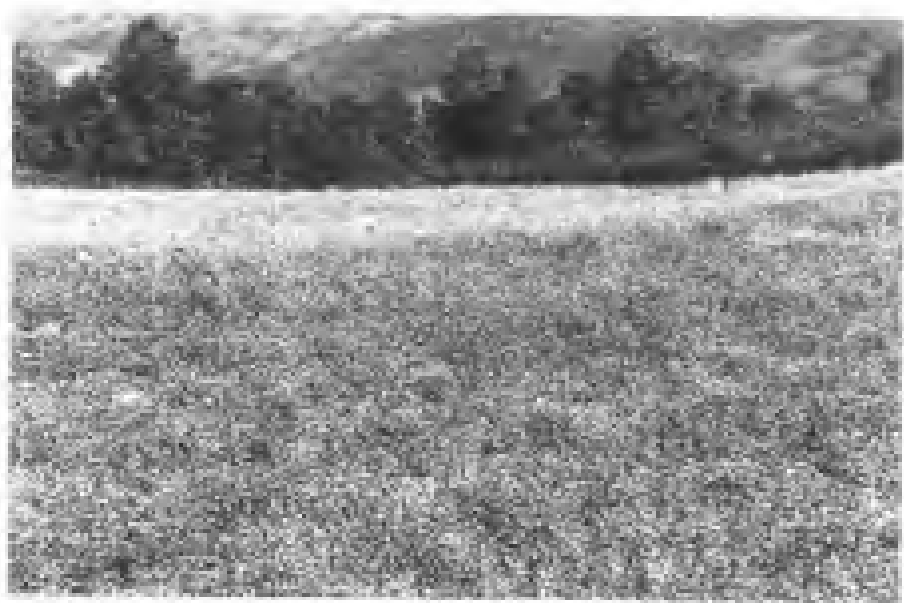
(150公斤)。西盟佤族的罌粟种植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才完全根除。

受傣族、拉祜族和汉族的影响，佤族很早便开垦了水田，不过大面积耕种水田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刀耕火种地佤族语叫“麻略”，按海拔高低大致被分为两类，但各个地区的叫法不同，例如大马散寨将海拔较高气候较冷的地称之为“麻吾”，而把海拔较低、气候温暖的地带叫做“麻丘”。“麻”是“地”，“吾”和“丘”分别是“高”和“低”的意思。两类地的分界线，大约在海拔1500米左右。

两种类型的土地中，高地过去主要种植罌粟，此外种植少量耐寒耐瘠的陆稻品种和黄豆、玉米、荞麦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这类土地上试种小麦成功，并得到推广。低地是多种作物的种



陆稻地里间作的葱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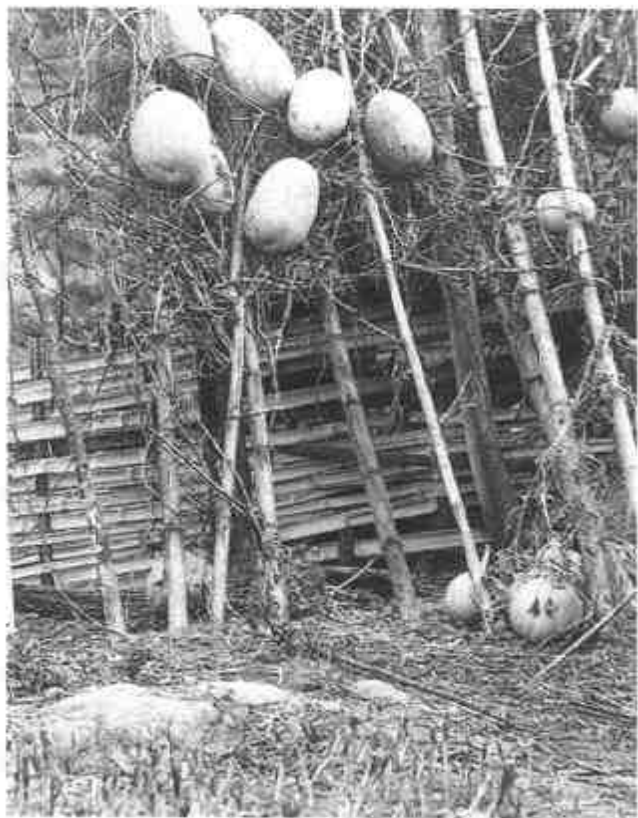


佤族栽种的茶

植地带，陆稻、棉花、小红米、玉米等大都分布于这类土地上。

昔日高地罌粟的种植，大都连续耕种，不轮歇，而且耕作也比较精细。每年10月雨季结束时，便开始芟草、烧草、犁地、耙地或挖地，10月底播种，此后薅草两三道，翌年二三月收获。每亩可产鸦片10至20两（500至1000克）。

陆稻等作物的种植，根据土地肥瘠的不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只种一年便抛荒休闲的“懒活地”（即无轮作刀耕火种地），佤族叫做“麻河母”或“麻卡”；第二类是实行轮作的锄挖或牛犁地，佤族称之为“麻克母”或“麻太”。



佤族园圃里种的瓜

懒活地的耕种方法与其他山地民族大致无异。砍烧点播，不锄不犁，种一年抛荒休闲七八年至十余年。土地亦规划区域，以实现有序轮作。例如，20世纪50年代马散寨有懒活地15块，其

名为共给孜、狄卧、翁配、狄寇、宋凯爱、刀爱打、龙格来、恩打、喷轧牢、翁拍来姆、顿科脱、卧克满衣、拍来吐、诺门、克龙翘。^①岳宋寨分懒活地为六大块，地名是桃肥、打老、打癸、打拉、团洪、米康。岳宋寨一年种一块面积不够，故需要两块，而一年种两块休闲期又太短，所以每块地连续种两年，休闲四年。^②

大约在 19 世纪 70 年代，拉祜族头人“三佛祖”联合部分傈僳族和汉族武装进入西盟地区，结果有不少外来民族定居于阿佤山，在他们的影响下，佤族开始使用锄头和犁具。他们将锄犁耕作技术与传统的懒活地砍种技术相结合，因地制宜，创造了与基诺族相同的砍种、挖种、犁种这一循序渐进的耕作技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配置以不同生态特性的作物品种，从而形成了适宜当地条件的轮作技术。佤族常见的轮作方式有下表所列几种。

西盟佤族的轮作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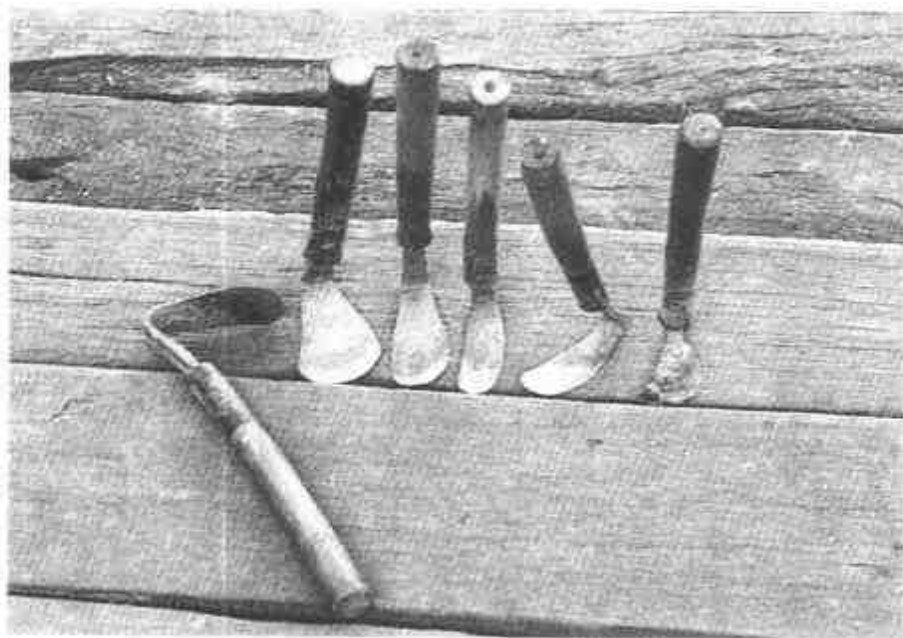
轮作类型	轮 作 作 物			休闲年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	小豆	陆稻 (间种小红米等)	陆稻	十 余 年
2	小豆	陆稻	小红米	
3	棉花	陆稻		
4	小豆	陆稻		
5	棉花	陆稻	玉米	
6	陆稻(白谷)	陆稻(红谷)	玉米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版，7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②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版，5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续上表)

轮作类型	轮 作 作 物			休闲年限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7	荞麦	陆稻		十 余 年
8	陆稻	黄豆		
9	陆稻	陆稻(改品种)		
10	陆稻	棉花		
11	荞麦	陆稻	小红米	



佤族的小铁锄(俗称手锄)

由于阿佤山区雨量较多,杂草繁殖非常迅速,实行长期轮作,草害十分严重。因此,只要土地足够的话,只种一年便休闲的懒活地刀耕火种,仍然是人们首先选择的耕作方式。在尽可能地实行短期耕作以避免杂草蔓延的情况下,如果有人连续耕作三年以上,便会被视为“破坏”行为。因为其土地一旦退化为草场,自然要殃及邻里。这就是轮作一般不超过三年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懒活地的植被的再生速度是比较迅速的。在海拔

大约 1000 米以下的地带，生长着一种阔叶树，也叫“短命树”，这种树一般生长三年直径可达十余厘米，生长四五年后便很快死去。短命树是西盟佤族耕种懒活地所依赖的很好的速生树种。与盈江卡场一样，西盟也是水冬瓜树较多的地区，佤族人民也深知其特性并积极加以利用，过去不少村寨都具有以栽种水冬瓜树进行粮林轮作的优良传统。

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尽管人们极不愿意进行轮作，然而这种趋势一般是不可避免的。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其时一些村寨的轮作地已达到相当的比例。例如，龙坎寨轮作地占村寨全部耕地的 10%，而马散寨已高达 80%，永广寨则全部转变为轮作地了。就西盟全县而言，其时懒活地和轮作地大约各占一半。

西盟佤族的农业，既有懒活地刀耕火种，又有短期轮作刀耕火种，此外还耕种少量水田。其各月的主要生产活动示于下表。

西盟佤族各月的生产活动

公历	佤历	生产内容
1 月	固入安	懒活地砍地，小麦地薅草，收获荞、小豆，轮作地挖、犁地
2 月	奈	懒活地砍地结束，轮作地挖、犁地，犁水田，收获小麦、小豆，栽种马铃薯
3 月	期艾	懒活地烧地、拣地，轮作地整地，犁耙秧田，收获小麦，栽种棉花
4 月	阿母	播种陆稻、小红米、玉米、黄豆等，水田撒秧
5 月	背	播种结束，水稻栽秧，收获马铃薯
6 月	夏扫	薅草，收获马铃薯，水稻栽秧结束
7 月	格拉	砍、芟、烧棉花、冬荞、小豆地，收获玉米、南瓜等，薅草，守地
8 月	阿配	砍、芟、烧棉花、冬荞、小豆地，收获陆稻、玉米，犁冬荞地，薅草，守地

(续上表)

公历	佧历	生产内容
9月	阿代依	收获陆稻、三米、小红米等，栽种冬芥、小豆，芟、烧、犁、挖小麦地
10月	高哈其	秋收高潮，冬芥栽种结束，种小麦
11月	高哈脑	秋收结束，打谷子，背运粮食
12月	各端	小麦地薅草，收获冬芥、小豆，懒活地砍地



除草

在每个月的生产活动中，还有频繁的采集、狩猎活动（除春耕秋收季节外）。佧族采集的野生植物有野菜和野薯两大类，共约百余种。狩猎工具有步枪、火药枪、弩等，狩猎方式有撵山合围、伏猎、设陷阱、伏弩、烧地打猎、下毒饵等。

四、打洛寨的刀耕火种

目前，在西盟县境内，大部分村寨的土地都已退化为灌木丛和草地了，传统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已陷于恶性循环的状态。

然而，在刀耕火种迅速衰落的情况下，也还有个别能够按照传统方式实行有序轮垦的村寨，打洛寨便是其中之一。

打洛寨位于西盟县西南边境，距离县城大约 40 余公里。从县城沿西澜公路行 10 余公里，有简易公路往南通向力所区公所，从区公所又有 1986 年前后修筑的可行驶拖拉机的道路直达打洛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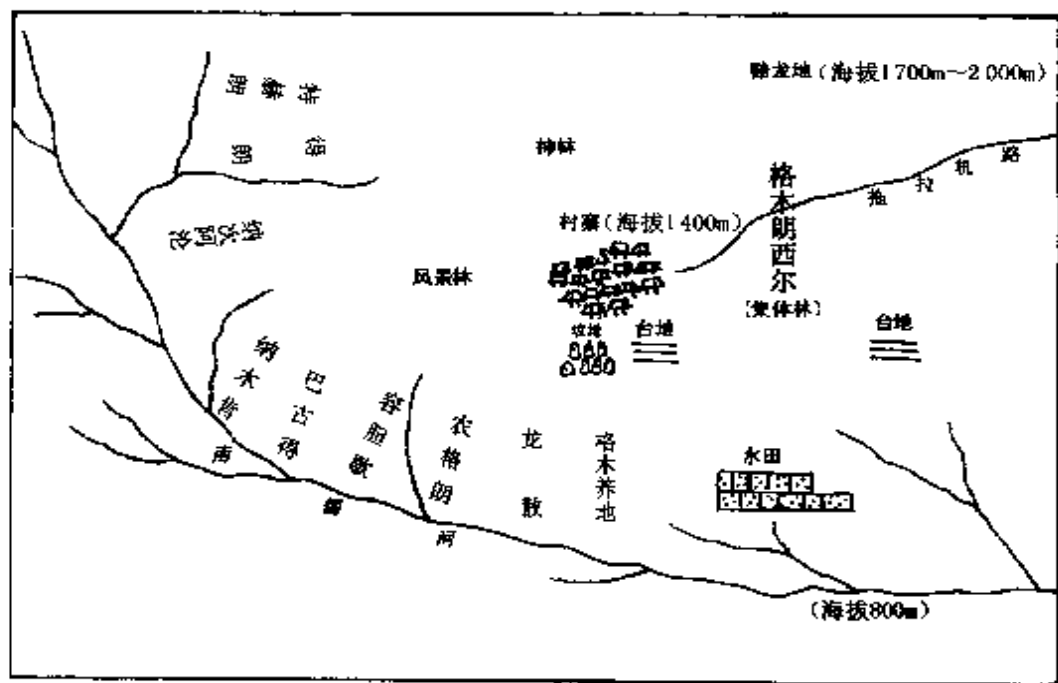
西盟县佤族村寨打洛

打洛寨坐落于南卡江东岸海拔 1 450 米的山腰上，村寨靠山面谷，青山环抱，幢幢茅顶木楼犹如蘑菇掩映于翠竹绿树之中，景致优美。

打洛寨有神林，佤语称其为“赛锁”，面积约五亩，位于寨子上方。神林中有一神石，系建寨时所埋，埋石时有过隆重的杀牛仪式。神石及其周围土木不允许任何人触动，据说一旦触动，便将遭受特大洪灾。村寨又有风景林，位于寨子西侧山峰，山峰峻秀，竹木葱茏，尤如屏障。寨子下方有一箐沟，其西侧是村社公共墓地，东侧是近年开辟的几亩台地。寨子东面是集体林，连结该寨与区公所的五尺小道，即从这片树林中蜿蜒穿过。

20 世纪 50 年代初，打洛寨有 70 余户人家、300 多人。村寨

头人名为岩可，岩可之下有两个助手，一名岩可宰，管理摊派收税；另一个叫岩果，管理民事纠纷和土地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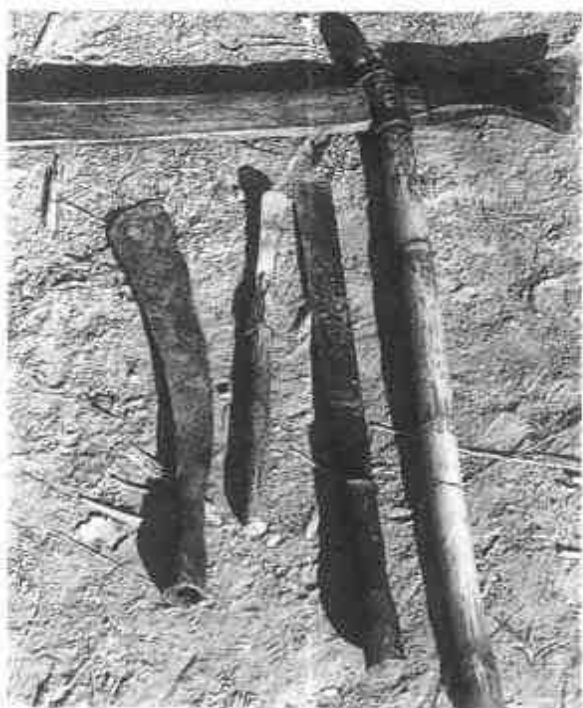
打洛寨示意图

1987年打洛寨有各类耕地共12000亩左右。耕作方式以懒活地为主，辅以短期轮作和少量长期轮作。水田仅有五亩，分属两户人家。

该寨对旱地有两种分类方法，一是依海拔高低而分，大约1500米以上的土地叫“赔龙”，以下的叫“岗龙”；二是依耕作方式而分，懒活地叫“麻卡”，短期轮作的茅草地则叫“麻太”。海拔较高的赔龙地，过去主要栽种罂粟。麻太地有两块，名为“得朗”和“特赫朗”，位于村寨西北部，距离寨子大约3公里，海拔在1400米~1700米之间。麻卡地一般分布在1500米以下。

在几种地类之中，麻卡地和赔龙地最重要，麻太地不太受重视。三类地的比例，以麻卡地最多，大约占全部耕地的75%左右。罂粟传入之前，麻卡地分为十块，一年耕种一块，十年轮歇一周；罂粟传入之后，十块麻卡地划了两块专门种罂粟，其余八

块轮流耕种陆稻。八块麻卡地名称如下：格罗（寨子下面的土地）、龙散（龙散河边的土地）、农格朗（老鹰岭）、容胆（树林茂密、老鼠都钻不进去的土地）、巴古得（去缅甸路边的土地）、纳木肯（栎树地）、纳茨阿（干涸的水箐边的土地）、格木朗吸尔（岩峰下面的土地）。



佤族的生产工具

过去每年岁末备耕之际，由村寨头人召集各姓氏长者商议麻卡地的开垦区域和分配事宜。分配麻卡地，需要花十余天的时间。土地先分到各姓氏，各姓氏头人再根据人口多少、土地好坏逐家划分。麻卡地可以互相借种、合种。栽种罌粟的赔龙地，由于连续耕种，已属于私有，可以抵押买卖。至于茅草牛犁地麻太，则不必分配，谁有劳力畜力都可以去号占开垦。^①号地方式，或在土地四周标出界限，或在地边竖立木棍，将头部劈开插入茅草。

^① 号占土地，也叫“号地”，即圈占土地。

三种地类的耕种方法各不相同。八块麻卡地一般只种一年，可以头年种陆稻，第二年种棉花或者头年种棉花第二年种陆稻。抛荒后休闲七年，休闲期满，植被又恢复为森林。佉族与基诺族一样，休闲期“要单不要双”，即休闲年头要奇数而不要偶数，认为奇数吉利，按奇数年头休闲灾害少，可保丰收。棉花种于低热的麻卡地，棉花地一般间种瓜、豆、玉米及其他蔬菜作物。麻卡地栽培的陆稻主要有“毛秋”（小白谷）、“毛丕”（大白谷）、“毛克龙”（花谷）、“卡好”（糯谷）和紫米谷等。陆稻地通常间种小红米、黑芝麻、薏苡、高粱、粟等。陆稻地12月至翌年2月砍树，四五月烧地、拣地，五六月播种，7月~9月薅草、修树枝、守地，10月~11月收获。棉花地头年8月砍树，3月烧地、拣地、播种，4月~8月薅草，9月~10月收获。

麻太地一般连续耕种2年~3年，抛荒休闲7年。这类地树木稀少，多半是一人多高的茅草。茅草亦非无用，其是盖房屋的材料，屋顶每年都必须加厚或更换茅草，茅草可完全依赖麻太地。麻太地多实行陆稻轮作，第一年可种更散谷、黑谷、力所谷、大白谷等，第二年和第三年栽种小白谷和卡好谷，也可改种黄豆。卡好谷有较强的耐瘠性，常于最后一年栽种。麻太地7月芟地，9月复芟一次，九十两个月焚烧，然后闲置两个月，翌年1月~2月犁地，2月~3月挖地，同时拣烧草根，3月~4月播种，5月~8月薅草、守地，9月~10月收割。耕种麻太地比麻卡地费工费力，产量却并不比麻卡地高。麻太地生产的稻米涨饭，但不太好吃，尤其是第三年所产的大米带有苦味；麻十地所产陆稻虽不如前者涨饭，然而味道比较香甜。

赔龙地过去以种罌粟为主，也栽种一些陆稻、玉米、荞、芝麻等。罌粟地于8月芟草、烧草，9月犁地、抄地，劳力多的人家还要再次清除杂草，然后播种，10月至翌年1月薅草两次，2月收获。到8月复芟草耕种，不抛荒休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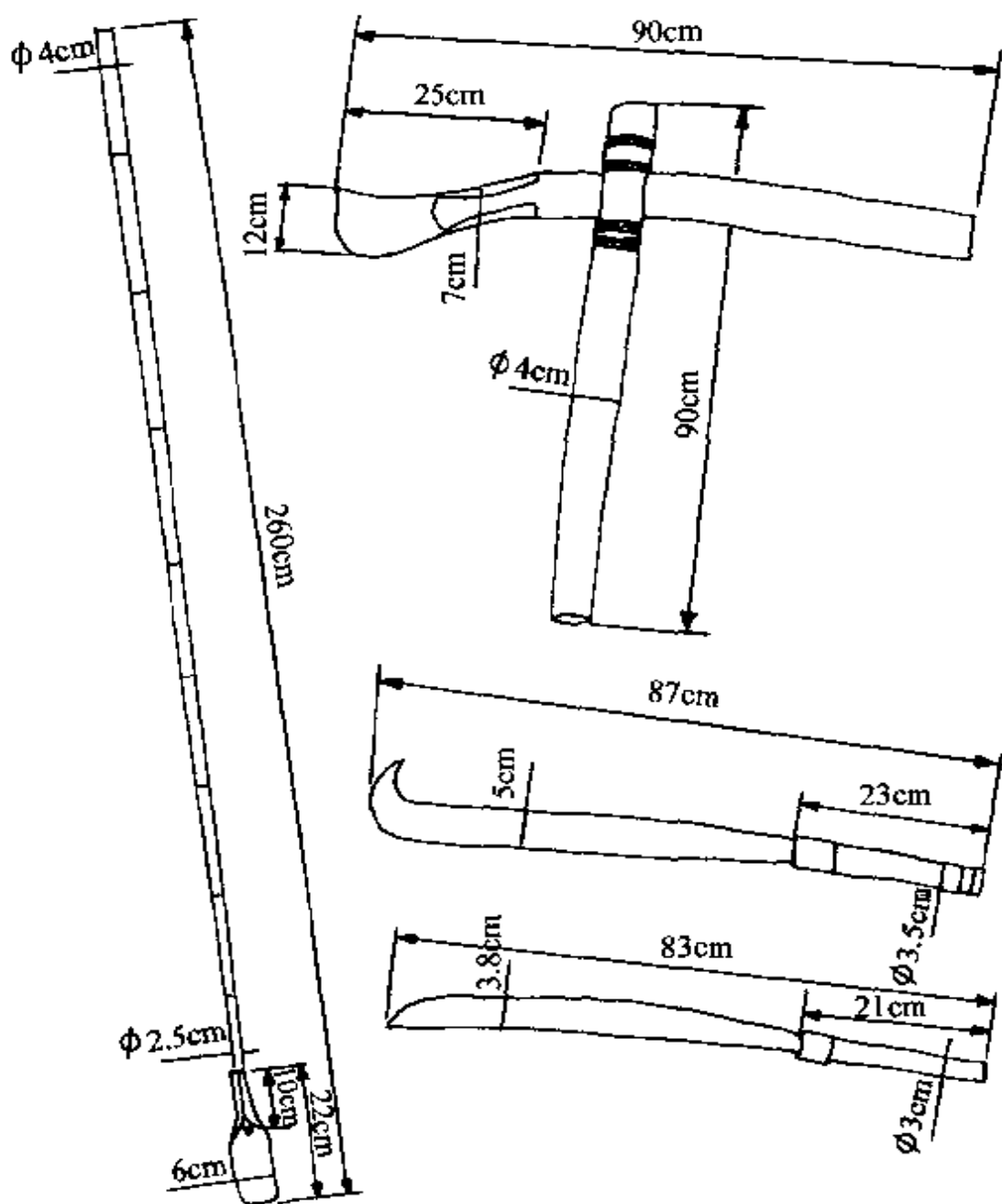


积 肥

打洛寨过去亦盛行农耕礼仪，一年五次。首先是烧地仪式，称之为“勒开亏”，由魔巴主持，杀一头小猪和三只小鸡祭祀。播种仪式叫“冬芒”，各户自行操办，于播种头一天杀鸡祭祀并卜鸡卦。催苗仪式称为“开马”，于5月举行，杀牲献地神。祭谷魂称为“推纳脑”，6月底，拔取数株陆稻青苗回家供奉。吃新米叫做“阿列赫脑”，陆稻抽穗时，采回供奉，并杀鸡相庆。

从20世纪50年代起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现在打洛寨的土地状况、耕作方式以及栽培作物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1964年开始在赔龙地试种小麦，此后小麦成为重要农作物。现在赔龙地除种植小麦之外，还栽种荞、玉米、陆稻、蚕豆、豌豆、油菜等。其耕作法已从过去一年只种一季变为种双季，夏季种陆稻，冬季种小麦。赔龙地有的实行长期耕种，有的实行轮歇，即耕种两年休闲2年~3年。



打洛寨佤族的生产工具

该寨原有的八块麻卡地，现在有七块仍然是刀耕火种地，第八块“格木朗吸尔”（岩峰下面的土地）于1983年划为集体林不再垦种。现七块麻卡地全种陆稻，一年砍种一块，七年轮垦一遍。陆稻栽培，沿袭着间种小红米、高粱、玉米、粟、薏苡等作

物的传统。棉花过去是重要的栽培作物，现在栽培面积已大大减少，原因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廉价的棉纺织品。1983年以后麻卡地按人口分配到户。由于人口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70余户300余人增加到91户400余人（1986年），而土地面积反而有所减少，因此仅靠麻卡地已不能满足需求，于是将麻太地划出一半分配到户以作补充。另一半麻太地仍然留作公有地，可以自由垦种，然而近年来土地趋于紧张，已出现抢种公有土地的情况。1986年，打洛已有水田300余亩。种水田省力，产量较高且稳定。然而由于缺乏灌溉设施，而且土壤多为沙土，渗漏严重，故常常无法正常耕种。早在1969年，该寨便开始了筑造台地的试验，但由于台地杂草繁殖十分严重，故至今发展不大，目前全寨台地面积还不到100亩。



收割龙爪稷

下面列举一个家庭案例，以反映该寨佤族家庭的生产、生活情况。

户主岩那，37岁（1986年，后同），妻子娜道40岁，岳父60岁，五个女儿最小的五岁，最大的19岁。1983年按人口划分土地，该寨每人平均分配八亩（包括水田、台地在内）。岩那家

八口人，共分得 65 亩土地，其中轮歇地 63 亩，台地一亩多，水田一亩。在 63 亩轮歇地中，有种一年休闲六年的麻卡地，有种两年休闲两年的赔龙地和麻太地，还有可连续耕种的少部分赔龙地。每年耕种面积需要十余亩，土地不够，便去开垦麻太公有土地。水田数量太少不便管理，分配后一直荒置不种，1987 年打算退还给村寨。陆稻亩产 75 公斤 ~ 200 公斤（不包括间种小红米等在内），台地管理得好可达 250 公斤。每年可收获粮食 2 500 公斤 ~ 3 000 公斤，基本上是够吃的。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该寨很多人家每年人均口粮都在 500 公斤以上。



收割后的陆稻谷堆

从上述调查情况看，打洛寨的刀耕火种农业是比较有特点的。由于该寨的土地面积尚能满足需要，加之村民们具有努力保护土地资源的高度自觉性，因此面积近 7 000 亩的麻卡地至今仍然实行着传统懒活地的有序轮歇耕作方式。7 000 亩懒活地的存在，对于该寨村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可以年年砍种新地，土地肥沃，所以作物产量高；由于每年都有大面积的休闲地，既维持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又为村民提供了在很多村寨已经不复存在的狩猎采集场所。然而，由于人口的增长，村民仅

靠砍种麻卡地已不足维持生计，所以在打洛以至整个西盟地区，又普遍实行着短期轮作耕种方式，在此基础上，还发展了少量的水田和台地。总的看来，西盟佤族的刀耕火种轮歇方式比卡场景颇族和勐海布朗族的稍微复杂一些，但又不如基诺族的轮作时间长，属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类型。

打洛寨传统土地类型一览表

地类名	麻卡(亦可称为岗龙)	麻 太	陪 龙
海 拔	约 900 米 ~ 1 500 米	约 1 400 米 ~ 1 700 米	约 1 500 米 ~ 1 900 米
所占比例	约占 75%	约占 10%	约占 15%
所 属	公有，分配耕种	公有，自由号占耕种	私有
轮歇方式	最早有十块地，一年砍种一块，十年一轮；罌粟传入后有八块，一年砍种一块，八年一轮，或以棉稻轮作两年，16年一轮；现剩七块，一年砍种一块，七年一轮	耕种两年至三年，休闲七年	连续耕种不休闲，或种两年休闲两年至三年
耕作方式	砍伐树木焚烧	芟草、焚烧、犁地	锄地、犁地
栽培作物	过去以陆稻、棉花为主，并间作小红米、芝麻、薏苡、高粱、粟、瓜、豆、白菜等，现在减少了棉花栽培量	陆稻、黄豆	20世纪50年代前主要栽种罌粟，也栽种陆稻、玉米、荞、芝麻等。现在以小麦代替了罌粟
物产性质	粮食、副食、蔬菜、纺织原料，休闲地产木材、采集植物和狩猎动物	粮食、副食，休闲地所长茅草是不可缺少的建房材料	经济作物、粮食、副食



打谷子（陆舒脱社）



置于屋梁上的贮粮竹筒



粮 仓



舂 米

五、猎头祭谷

猎头祭谷习俗，在古代滇池地区的青铜器上有形象的表现。例如，虎耳细腰贮贝器（石寨山 M12:26）盖上的杀人祭铜柱场面，冯汉骥解释为诅盟仪式，日本学者松本信广则解释为报祭仪式；贮贝器（M20:1）盖上的杀人祭铜鼓场面，冯汉骥和松本信广都解释为祈年、播种仪式。^①张增祺的《滇王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分析：“古代滇池区域的青铜器上也有杀人猎头的图像。如江川李家山出土一件铜斧的銎部，其上刻画着三个‘椎髻’的滇人男子。其中一人骑马，二人步行，骑马者手提人头，正在和一人步行男子说话。看样子，他们刚从某地猎得人头，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而归。另有一件铜剑柄部，其上刻画着一个大嘴、利齿的人，其人一手持刀，一手提着人头，似为巫师在做祭祀活动。”^②

在云南古代文献中，也有关于杀人祭祀的记载。明代杨慎《南诏野史》卷下“卡瓦”条云：“多在顺宁永昌二郡辣蒜江外。貌丑性恶，猎人以祭。商贾出腾越州入木邦者，必经其地，呼为卡利瓦，有生熟二种：生者劫掠，熟者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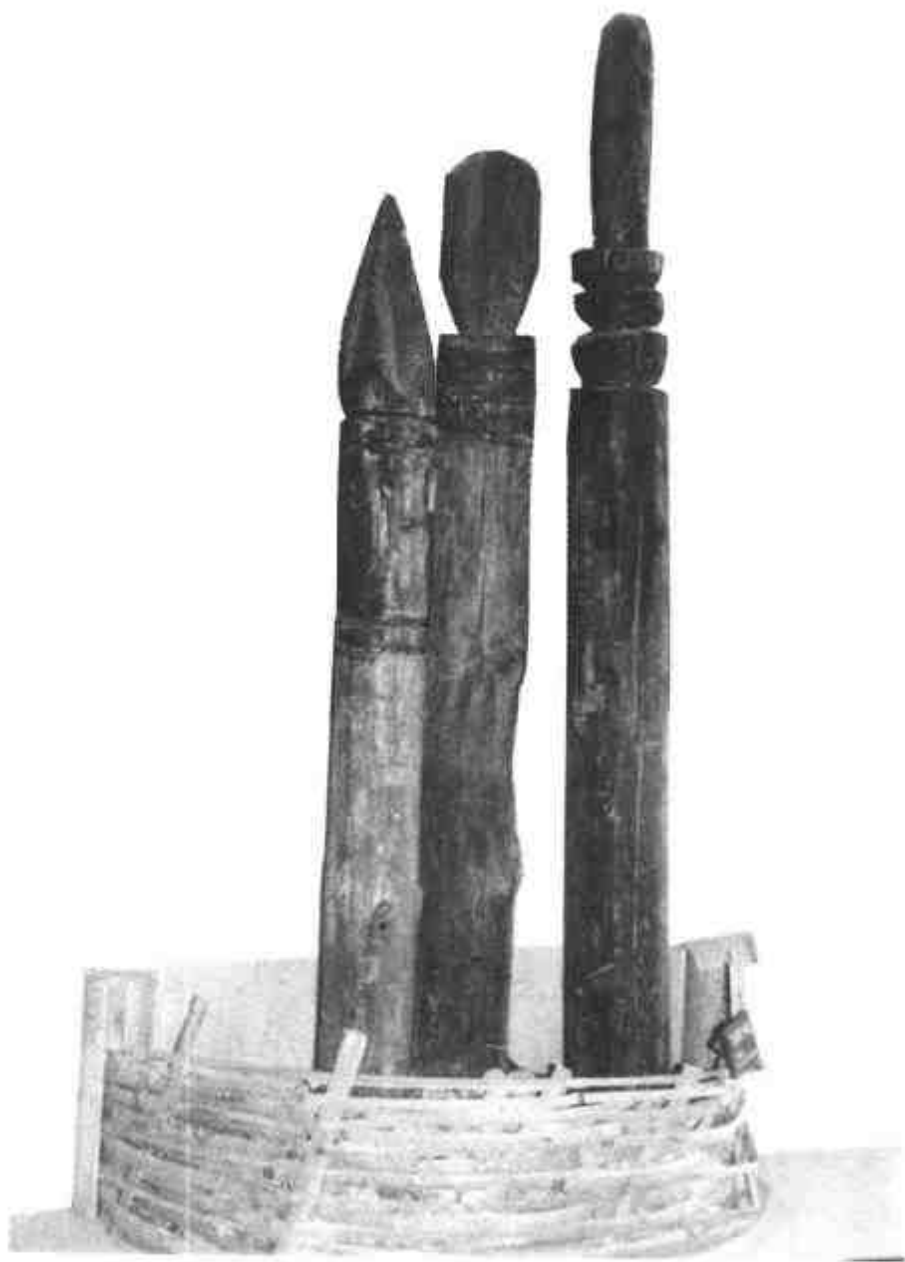
古代滇池区域的青铜器上所刻画的杀人祭祀的人物像，由于年代久远，很难确认其族属，而《南诏野史》则明确记载“卡瓦”“猎头以祭”。现代民族学调查资料说明，云南惟一盛行猎头祭谷的民族就是西盟的佤族，这一习俗一直沿袭到20世纪50年

^① 参见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青铜器研究——若干主要人物活动图像试释》，载《考古》，1963（6）。

^② 张增祺：《滇王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载《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1版，14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代中期。

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西盟佤族的猎头祭谷习俗，是其传统刀耕火种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这个问题的调查，目前只能通过老人的讲述得以了解，而凌纯声先生早年的调查很可能是实际的经历，现将其报告摘录于下：



佤族的寨桩（杨兆麟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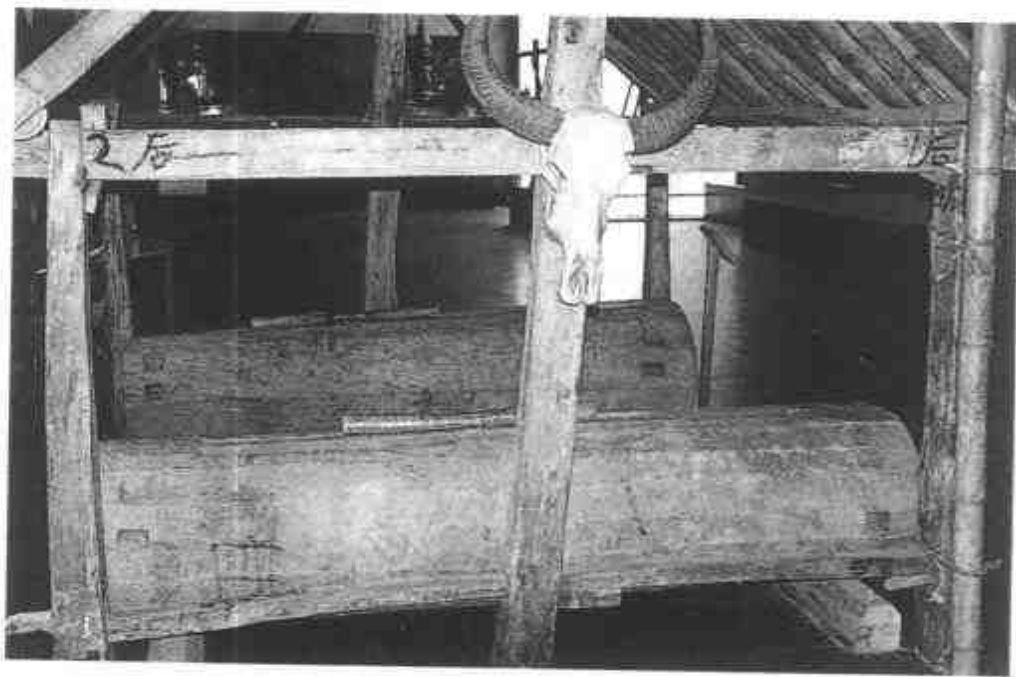
“每年约阴历二三月之间，卡瓦山旱谷苗长至五六寸时，为……猎首季节。卡瓦成群结队，四出砍取人头。猎首队的人数并不多，至多十二人。在未出发之前，一寨的头人与巫师约同合寨的老年人，用鸡数只，各人携带火枪槊标及米少许，聚集在寨中祭神的木鼓亭旁，先竖植一有叉的树枝，将武器依置其上，并在亭旁埋一大铁锅。然后巫师一手拿鸡，一手执刀，口中祷告，大意谓：‘现在我们要去找头颅回来祭你，求神指示我们，向哪一方向去，可以顺利砍得人头？’祝毕，即杀鸡看卦，看卦中所示方向，能得与否，并队员的吉凶。得卦不吉，则再用一鸡，再祷再卜，必得大吉之兆而后已。因此有时杀鸡几只，多至数十只者。卜得一好卦之后，会众即在鼓亭旁用预埋的铁锅，将鸡米合



佤族的猎头祭祀房(云南民族博物馆藏)

煮而食。当晚由寨中头人击鼓为号，召集猎首队员，各人闻声携带武器，聚集鼓旁整队后，依卦上所示方向前进，在黑夜中走一二十公里或二三十公里，见有交通要道，而路旁有丛草或树林可以埋伏之处，即择作猎首区域。由巫师先砍竹竿一根，长稍高于人，横架于路上，并将带来的米、盐、姜若干撒在地上。巫师在选定的要道作法已毕，众人见东方发白，即至路旁树丛中埋伏，以伺行人。如等了半日无人走过，即于附近有水处煮饭充饥，食毕再去埋伏，夜间露宿于此。但最多等待两天，如一无所遇，即需回寨再杀鸡问卜，求神另示方向。

如在埋伏时，见有单身过客或少数商队，即静伏不动，待其走近巫师所撒米、盐、姜的范围内，即先发一箭或一梭标，过客被射倒地，伏者一冲而出，争砍人头，砍得人头者，即张口饮血，弃其尸身于路旁。用草或树叶，将人头包扎，放在一竹篮或背袋内，由得头者背之星夜驰归，沿途欢呼跳跃，并鸣放火枪。



佤族的木鼓（云南民族博物馆藏）

……到寨即将寨中木鼓连击不断，全寨的男女老幼闻鼓声咸来欢迎砍人头的勇士。人头背至寨中，由巫师取下放在木鼓上面，同时击木鼓，又取熟鸡蛋一个剖成四块，酒、肉、饭各一小竹筒，供在人头之前。寨中每家各携酒饭少许来祭人头，撮饭几粒、灌酒少许在人头的口中，大家对之哭泣，悲吊被砍头之人为他们而牺牲生命，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祭了人头，将人头的唇耳等割下一些放在一小筐内，又宰杀牛、猪、狗、鸡以祭他们的祖先，并祝告今年已有人头祭献，应保佑阖寨的人口平安、谷物丰收、六畜兴旺、驱除邪魔。祭毕男女相杂高声叫喊，吹笙击鼓，欢歌狂舞，饮酒作乐，祭期三日，每天大家吃得酩酊大醉，即乱睡鼓亭四周。



佤族的祭祀木桩（云南民族博物馆藏）

……人头在木头上祭供三日；祭期已过，巫师用竹竿一根，长约两公尺，一端劈破成数条，撑开如一罩，作头骨架子，将人头嵌置其中，外以稻草包扎之，插植在鼓亭之旁。人头在骨头架上，日晒雨淋，经若干时日，逐渐腐烂而有雨水下滴于地。时至旱谷苗长尺余，巫师挖取头骨架下泥土，分成若干小块，分送寨中每家一块，各家收到血土再和以泥土，洒在自家旱谷地内，据说一经洒上血土，谷苗即欣欣向荣。”^①

由上述引文可知，佤族猎头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祈求刀耕火种农业的丰饶。这一连续了数千年的习俗，终于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废除了。

第四节 基诺族的刀耕火种

一、地理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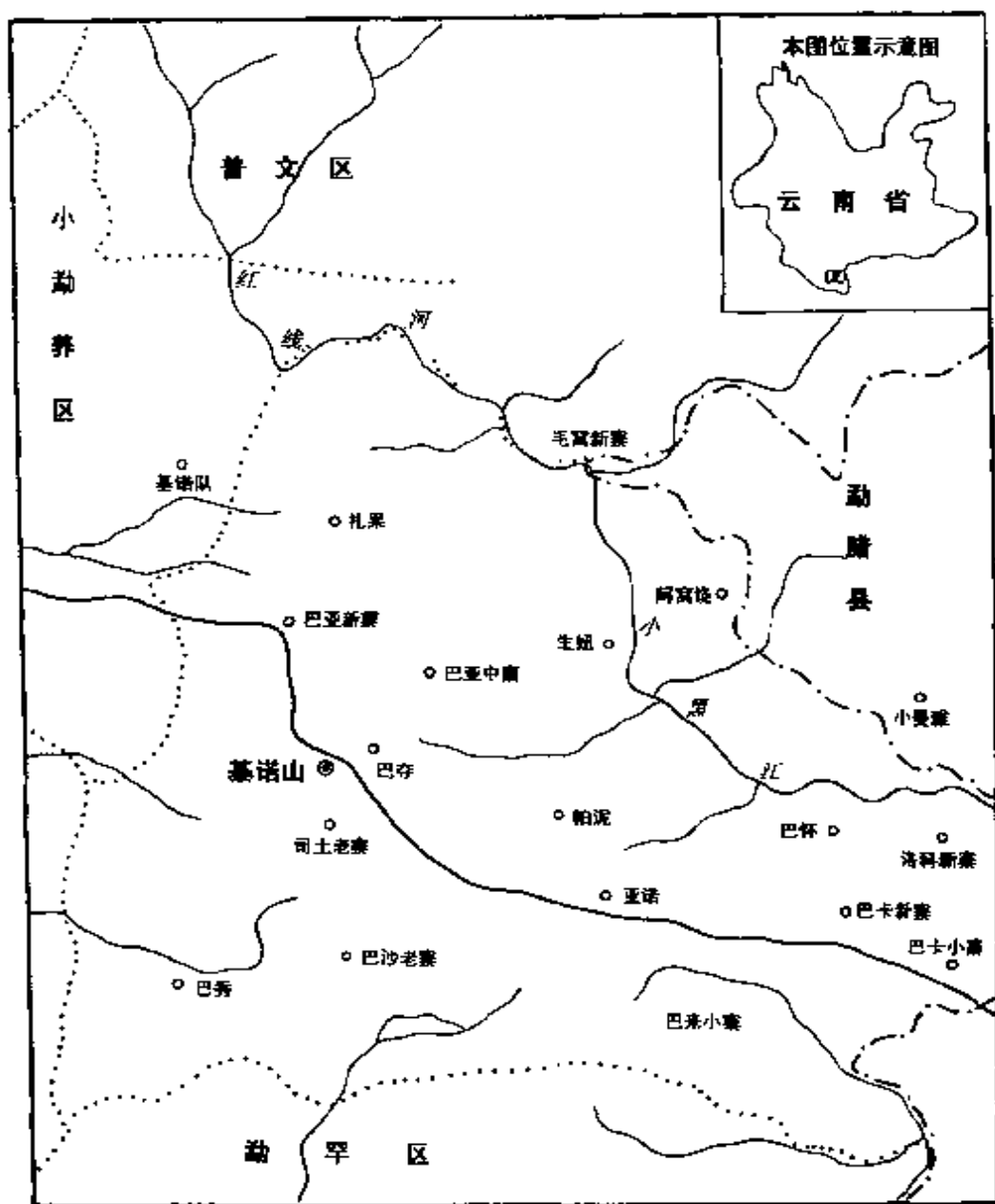
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区，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中东部，总面积610平方公里。其北缘是南线河及小黑江的浸蚀河谷；西、南、东三面分别与景洪市的勐养、勐罕和勐腊县的勐仑盆地相依，盆地中蜿蜒穿流的澜沧江和小黑江环绕于基诺山麓。

基诺山区最高峰亚诺山海拔1691.6米，最低地小腊公路与勐仑盆地交界处海拔仅550米，而大多数山峰海拔高度在1000米以下，属于中山山地地貌。

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有无数纵横交错的河流。小黑江自东

^① 凌纯声：《云南卡瓦与台湾高山族的猎首祭》，载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53（2）。

北入境，在该区东北部汇集了南线河、生妞河、么羊河、龙帕河、石灰窖河等若干河流，经由东南部流向勐仑盆地。在该区西部和南部，勐养河、莱阳河以及无数发源于基诺山的涓涓细流分别注入周围低地。该山区犹如一座“水塔”，以其茂密森林涵蓄的水分，长年浸润着周围的盆地。



基诺山乡示意图



方圆 610 平方公里的基诺山

基诺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大约 19°C ，降雨量大约在 1400 毫米左右，5 月~10 月为雨季，此期间的降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 85% 左右。^①

赤红壤、砖红壤和紫色土为该区三种土壤类型。赤红壤一般分布于海拔 800 米~1500 米的地带，砖红壤大约分布于海拔 800 米以下的地带，紫色土分布海拔较低，分布面积亦较少，主要在该区东北小黑江一带。^②

该区植被分布呈现一定的垂直差异。海拔 1000 米以下地带多分布亚热带季雨林，向阳坡地有成片竹林和竹木混交林，海拔 1000 米以上地带则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

该区交通闭塞，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横穿基诺山的小腊公路修通之后，交通状况始有改善。

据 1991 年统计，基诺族共有 11966 人，基诺区有 45 个村寨，有 10877 人。^③

① 资料来源于景洪县基诺乡统计室。

② 同 1。

③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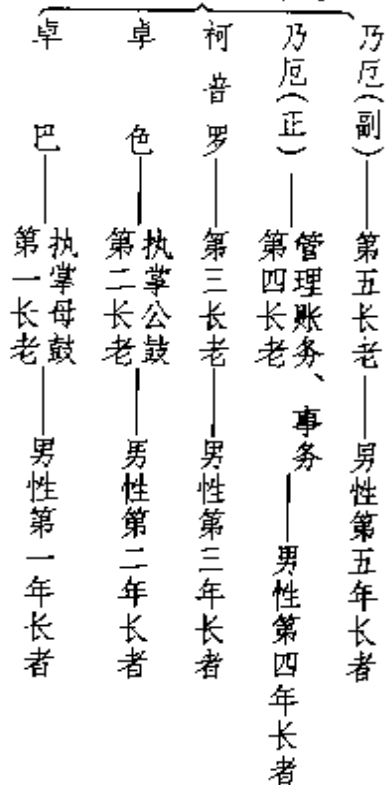


村寨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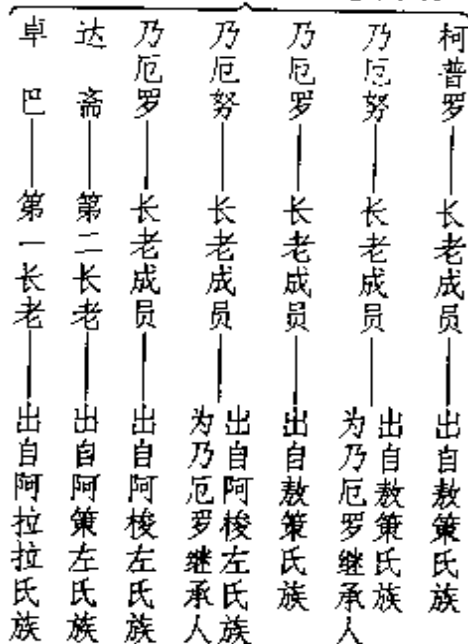
二、社会组织及土地制度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基诺族还比较完整地保持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村落以血缘氏族为内核，一个村寨由一个或几个氏族组成，村寨的长老由各氏族的年长者担任。村寨头人有五至七人不等，名称叫做卓巴、卓色、达斋、巴努、色努、乃厄、柯普罗。七人之中，卓巴居于首领地位，村寨祭祀和节庆使用的重器母鼓，就悬挂在卓巴的家中。卓巴为一寨之长，只能从村寨中历史最悠久或者最有势力的氏族中产生。其他称谓的长老，根据村寨不同，职位职责也不尽相同，通常他们也都固定出自某一个氏族。下面是三个村寨长老的构成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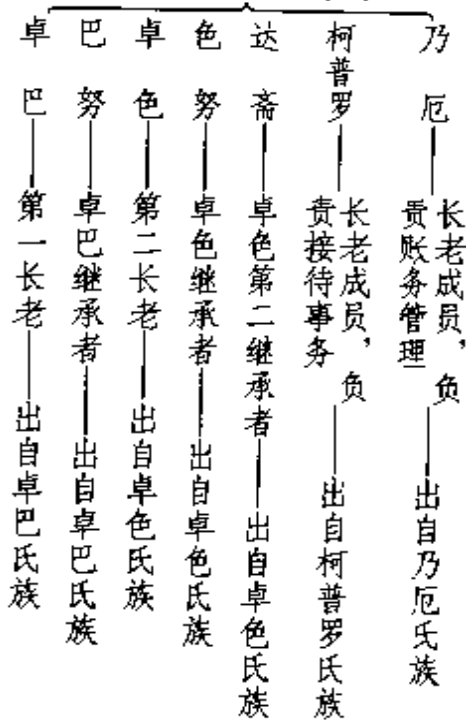
巴卡寨长老构成



亚诺(龙帕)寨长老构成



巴亚寨长老构成





基诺族的生产工具

基诺族长老的职能，主要是维护传统法规，主持宗教祭祀活动，协调和处理村寨内外各种关系，管理土地资源，组织刀耕火种生产，等等。

基诺族传统的土地制度，与布朗族颇为近似。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部分村寨已经同时存在村寨、氏族、私人三种土地所有制。在三种土地所有制之中，氏族土地所有制所占比例最大。

氏族土地所有制，即土地为村寨中各个氏族所占有。组成基诺族村寨的氏族，从一个到七八个不等。例如巴夺寨只有一个氏族，其土地即全部属于该氏族。司土老寨有两个氏族，亚诺寨有四个氏族，巴亚老寨氏族多达八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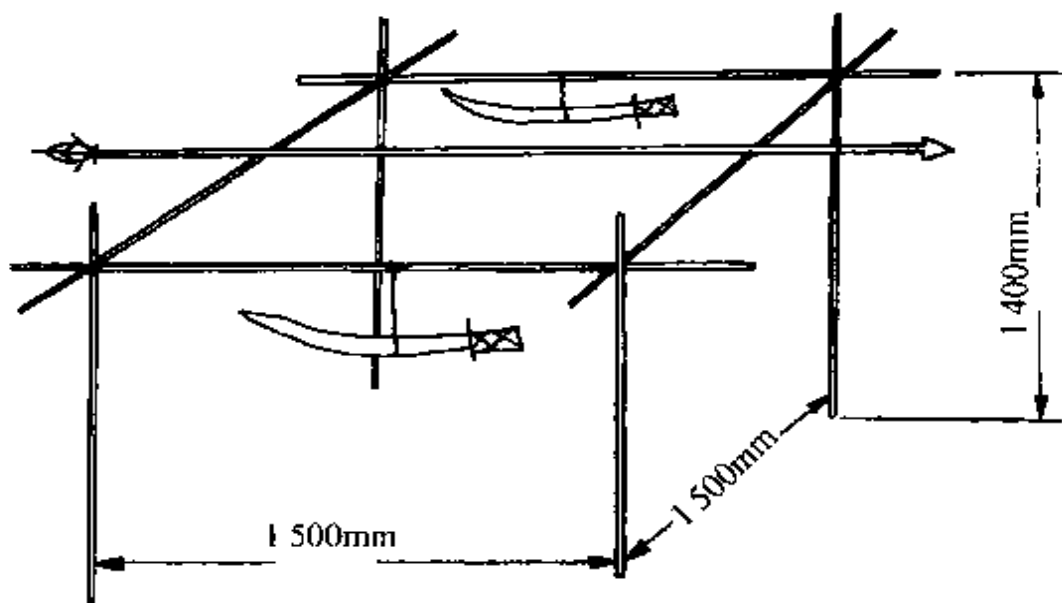
在村寨内部，各氏族的土地之间具有确定的界限，一些特别显眼而且不容易变动的自然物（诸如巨石、大树、箐沟等）常常被作为划分的标志。各村寨之间也有明确的地界，并有特别设置的界标。其做法是在大约一米见方的地上竖立四根碗口粗细、长约1.5米左右的木桩，上架四根横木成“井”字状，在横木上吊挂木刀、木箭等兵器，表示不可逾越。长老每年春季带领人们沿村界巡察一遍，以修复朽倒的界标。

村寨各氏族的土地，并非分布在不同的地点，而是交错分布。氏族成员获取土地，通常采取号地的方式。基诺族过年称之为“特莫克”。“特莫克”一结束，长老做过备耕仪式，各户成员即可到计划好的本氏族的某几片已经达到休闲年限的林地中，选择一定的地类和面积，在其四周较显眼的树上砍出楔口塞入树枝作为标记。在巴亚等寨，人们号地要寻找自己曾经种过的土地，不仅如此，守地的窝棚也要求建于原来的旧址上，而且坐向也要和原来的一样。据说如果改变了地址和坐向，就会遭灾甚至死人。亚诺寨的号地方式又与巴亚等寨颇为不同。与巴亚寨力求号占自己曾经种过的土地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相反，亚诺寨号地的

准则却体现着平均主义的观念，即各户上一轮号占耕种过的土地，下一轮便不能再号占，必须让给别家耕种。这样的规定，可以避免因争号肥地而引起的纠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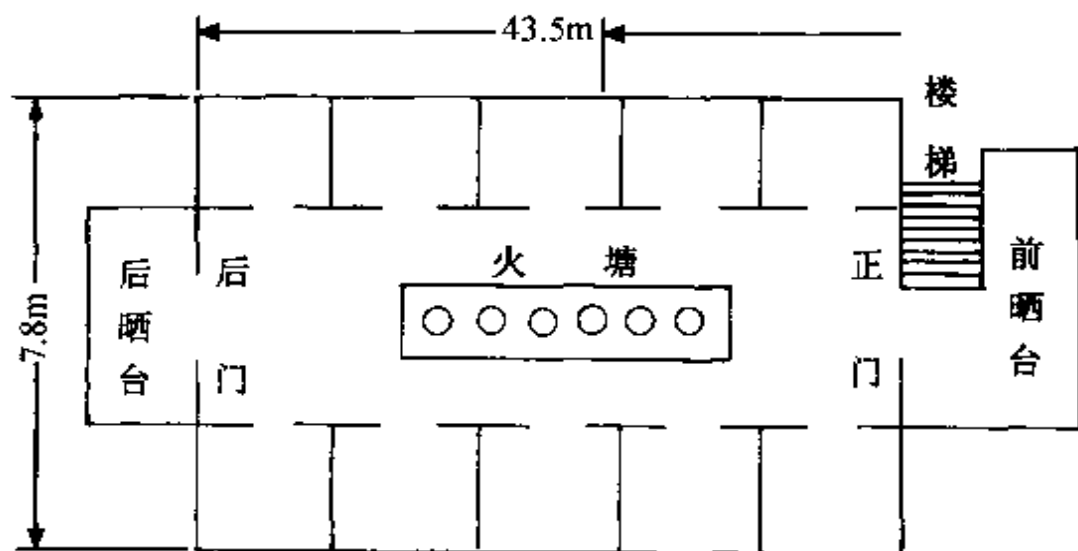


围地的栅栏



基诺族村寨之间的界标

基诺族村寨过去有大家族共同居住的长房。保留着长房的村寨，氏族土地每年先分配到长房，然后家族成员再去号占本长房的土地。亚诺寨是保留长房最久的村寨，1967年以前，还有11座长房，它们分属四个氏族。“阿拉拉”氏族有三座，名为“卓巴玛”、“布罗排玛”、“腊责玛”；“阿策左”氏族有四座，名为“玛莫埃玛”、“达斋玛”、“腊罗埃玛”、“飘策玛”；“阿梭左”氏族有三座，名为“阿梭左”、“上房”、“下房”；“熬策”氏族仅有一座，名即“熬策”。长房家族长称为“卓勒”。每座长房均由具有亲属关系的若干父系小家庭组成，每个小家庭在长房内都设一个火塘，房内有几个火塘，就知道有几个家庭。按照长房的规定，女子成年后必须出嫁异性氏族，而男子则不能搬离长房，一旦成婚之后，即与父母分家自立火塘，自己号地耕种。据亚诺寨长者布鲁者和木腊资介绍，在他们的记忆中，最小的长房有四个火塘十多个人，最大的长房则达到28个火塘128人。笔者于1984年到亚诺寨调查时，尚存一座六个火塘十个房间（四个房间作贮藏室用）的长房，1985年再去时发现已被拆除了。



亚诺寨最后一座长房



基诺族民居

基诺族村寨的土地，除绝大部分属氏族所有之外，还有少量属村寨所有。例如巴卡寨，村寨公有土地有两块：一块名为“景扎”，是从氏族土地中划出以供迁人者耕种的；另一块名为“苏普勒”，不论哪个氏族成员均可自由砍种，但其距离寨子较远，不便管理。亚诺寨也有两块村寨公有土地。据该寨木腊资老人说，两块公地的出现大约距今五六十年，它们原本都是氏族的土地，为了交纳傣族土司和国民党政府的摊派，才划出作为贡赋抵押的村寨公地。

20世纪50年代以前，土地私有的情况已存在于基诺族农村之中。基诺族土地私有制产生于何时，已难以考证。但是根据土地私有产生早、私有比例最大的巴亚、巴卡两寨的老人回忆，在他们的祖父一代已有少量土地买卖，由此推断基诺族的土地私有制很可能产生于20世纪初年。

由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基诺山各村寨、各氏族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差异是很大的。因此，在基诺族中也盛行租地、借地、共耕等可以相互调剂土地的习俗。



基诺族妇女垦地



树木砍伐之后，把一部分树木
运回村寨作柴薪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基诺族的农村公社社会组织形式



“迭”意为“更”或“朝”，“它”是“上”，“迭它”即“高处的土地”之意。分布海拔较高的土地，一般气候较冷，坡度较大，虽不乏肥沃之地，但大多数水土流失严重，土壤瘠薄。二类地“折交”的“交”，意为“中间”，“折交”即“介于—三两类之间的土地”之意。这类地分布海拔高于“折肖”而低于“迭它”，气候、坡度、土壤等都大致介于两者之间。上述三类土地，具有不同的植被特征。一类林地多生长高大乔木和木质藤本、藤蔓；三类林地主要生长质地细密、坚硬的青冈栎类；二类林地为一类和三类林地植被的过渡地带，而其代表植物则是橄榄树和扫帚苗等。

基诺族三类林地的划分，与农科部门土壤普查的结果大致吻合。一类林地主要是砖红壤，三类林地主要是赤红壤的分布带，二类林地赤红、砖红两类土壤兼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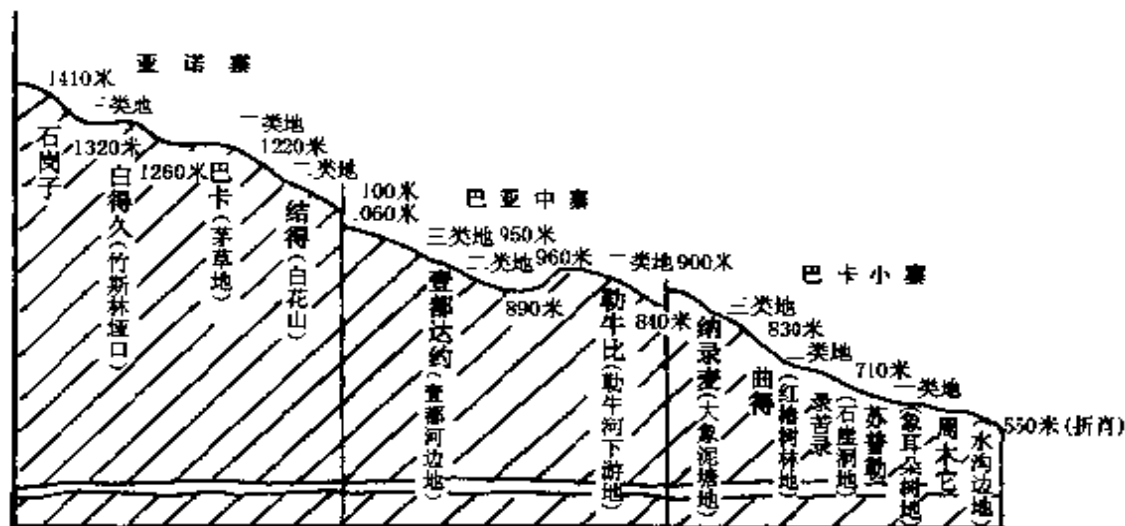
在整个基诺山区，一类林地面积约占 30% 左右，二类林地面积亦占 30% 左右，三类林地面积最大，约达 40%。



拣地——把地中未烧尽的树木拣到一起

据上可知，基诺族的地类划分主要是依据海拔高度。由于决定作物生长好坏的土壤、光热、水分三大要素与海拔高度有关，故基诺族林地类型的划分是比较科学的。

然而，由于地形、坡向等因素的影响，基诺山各地自然条件亦存在着显著差异，因而各村寨划分三类林地的海拔高度便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标准。这种情况从下面的示意图中便可一目了然。图中所举三个村寨，分别是地处基诺山区海拔最低的巴卡小寨、最高的亚诺寨和介于其间的巴亚中寨。^①



亚诺寨巴亚中寨巴卡小寨地类垂直分布示意图

基诺族的地类划分，目的在于因地制宜，即不同的地类施之以不同的耕作方法。

对于三类地“迭它”，通常只实行砍种一年便休闲的无轮作刀耕火种方式，基诺族称这种耕作方式为“肖纳”。在土地足够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村寨都将此类地规划为13大块，每年耕种一块，13年一个轮歇周期。那么，13年这一周期又是根据什么

^① 参见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载《农业考古》，1988(2)，395页。



把烧剩的大树横拦于地中阻挡土壤下滑

而定的呢？首先可能源于祖先崇拜。传说基诺族开天辟地女祖阿嫫小白死后第 13 天安葬，因而不少村寨于农历七月举行“洛毛洛”祭祀活动是 13 天。其次基诺族尚奇数而忌偶数。如果土地不足，无法按 13 年轮歇，也要遵循“荒七不荒八”、“丢三不丢四”（“丢”即是抛荒）的原则。再次可以充分满足土地植被更新所需的时间。基诺山属亚热带山地气候，土地只要抛荒七八年，植被便能再生成林，休闲 13 年，树木已十分茂盛，完全可以再次砍伐耕种了。

对于二类地“折交”，通常实行短期轮作休闲制。在正常情况之下，可以连续耕种二至三年，休闲时间最好在 15 年以上。其耕种方法，第一年纯粹采用刀耕火种，第二年始用小铁锄轻铲表土撒播，第三年改为牛犁撒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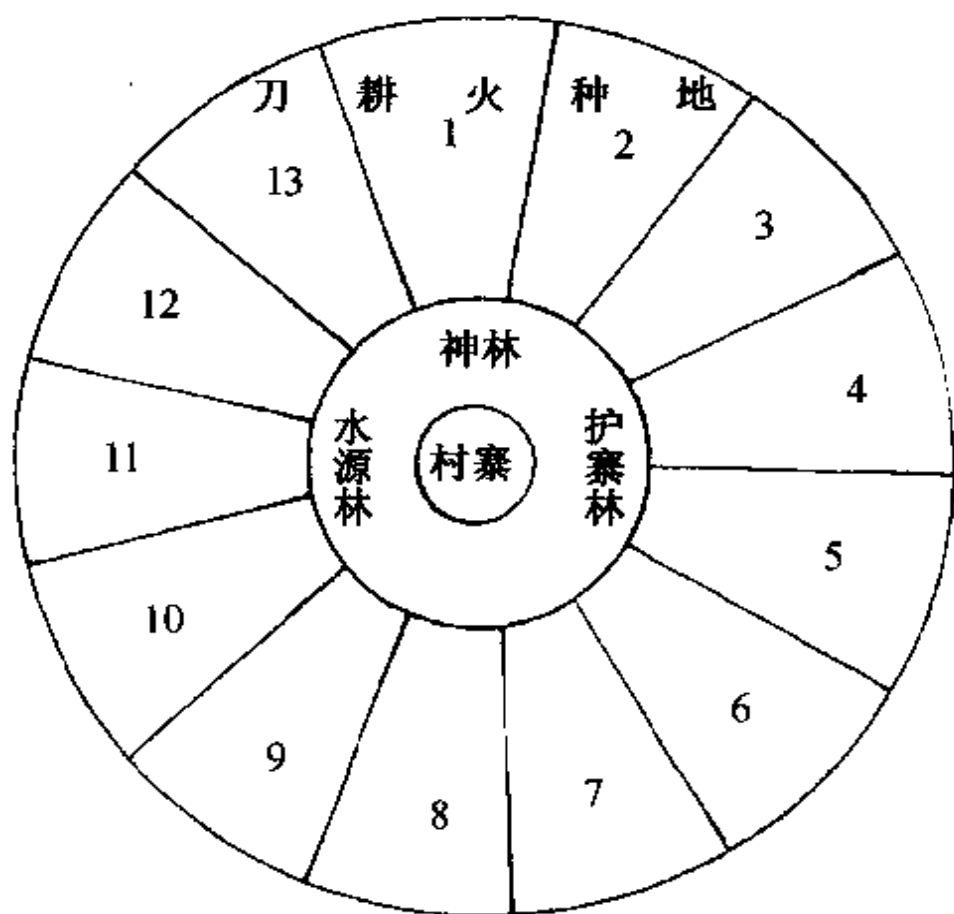
对于一类地“折肖”，通常实行较长时间的耕作制。一般可连续耕种五六年，也有连续耕种十余年的，休闲期最好在 20 年以上。长期连续耕种，休闲后树木很难再生，如果休闲时间不足，则往往退化为稀树草地。一类地的长期轮作，一年采用二类地的耕作方法，此后则连续使用牛犁耕种。



一类地“折刀”使用牛犁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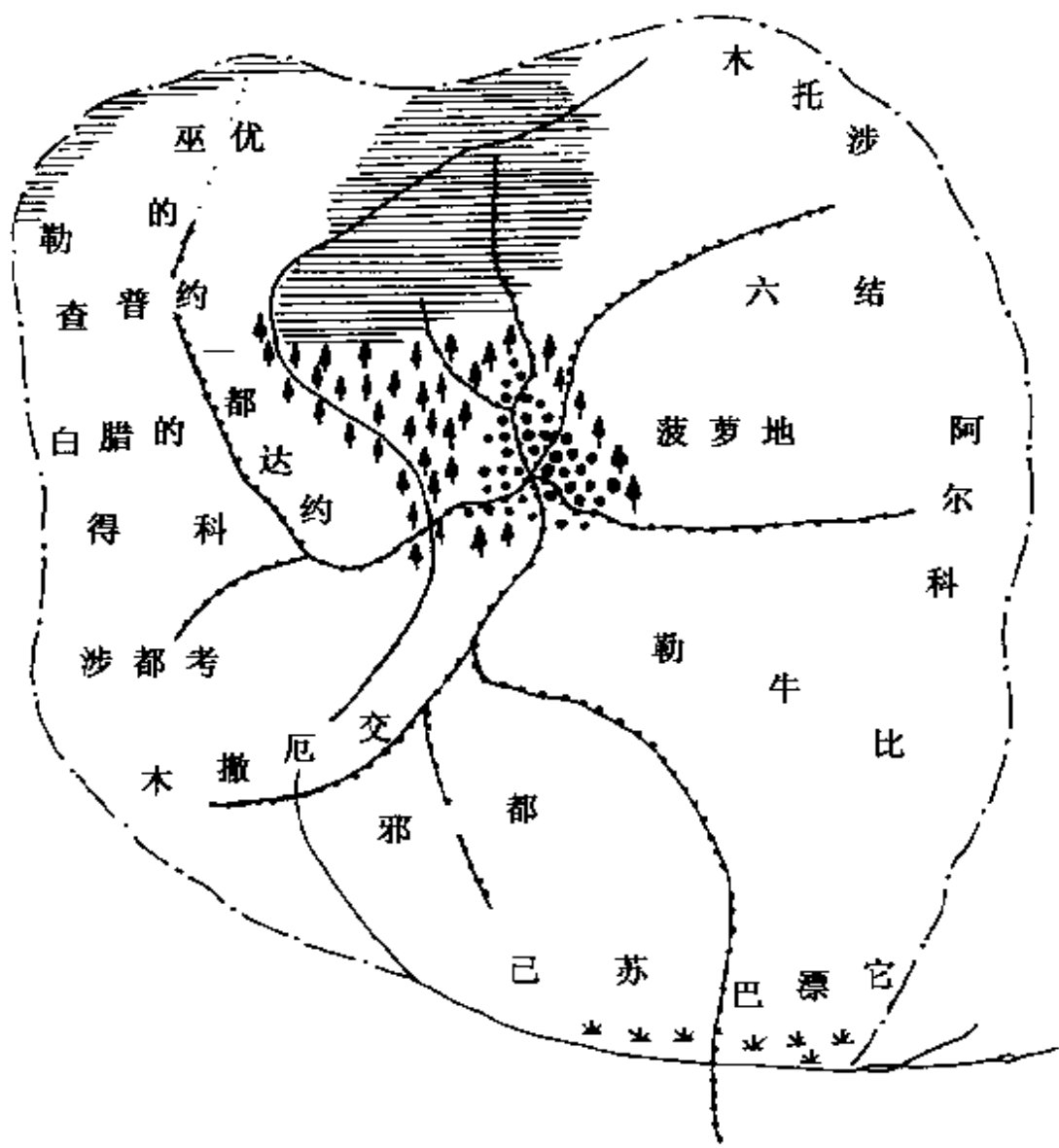


一部分伐剩的树木被运回村寨


 基诺族传统刀耕火种土地规划示意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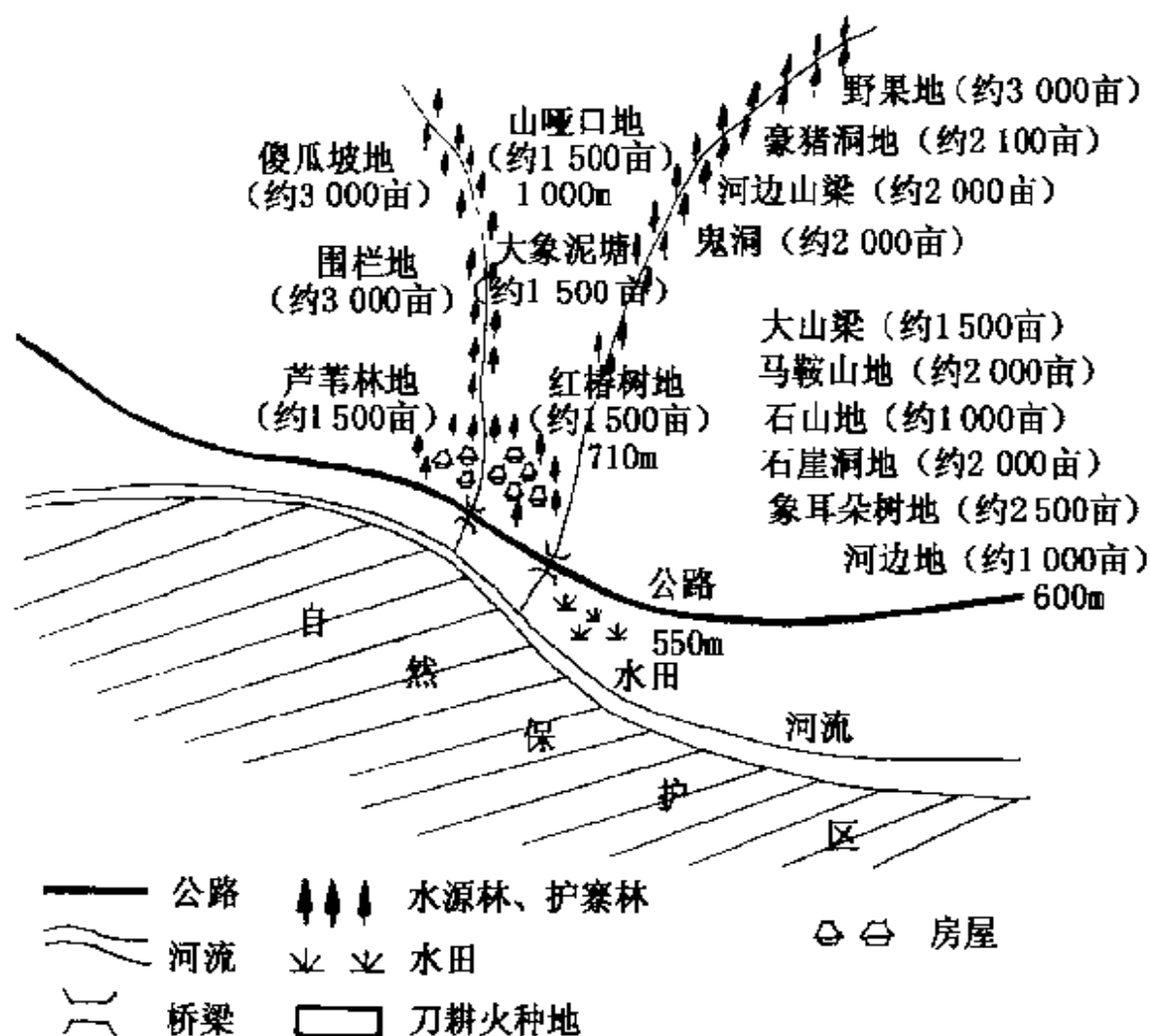
基诺族对于不同的地类，可以施以不同的耕作方式。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当人少地多的时候，人们并不愿意实行采用锄、犁进行耕作的轮作刀耕火种，而只愿意实行用刀斧伐木而不耕作的刀耕火种方式。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不同，播种方式也不同。只使用刀斧不进行耕作，采用点播棒凿穴播种，叫做点播；使用锄、犁耕作，即不用点播棒播种，而是用手撒播。

^① 尹绍亭：《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兼与云南其它刀耕火种民族的比较》，载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17卷2号，271页，1992。



- | | | |
|---------|------------------|-------------|
| --- 寨 境 | *** 水 田 | ●●●● 房 屋 |
| —— 道 路 | ◆◆◆ 水 源 林, 护 寨 林 | □ 刀 耕 火 种 地 |
| —— 河 流 | ≡≡≡ 集 体 林, 白 留 山 | |

巴亚中寨村落示意图



巴卡小寨村落示意图



播种前的除草劳作

四、栽培作物

基诺族的栽培作物，有粮食作物陆稻、玉米、高粱、粟，有经济作物棉花、茶叶、烟叶，有油料作物花生、苏子、芝麻，有杂粮和红薯、马铃薯、黄豆、芋头、南瓜、冬瓜、黄瓜、香瓜、茄子、辣子、饭豆、四季豆、青菜、白菜、茴香、川芎、大蒜、姜、香茅草等菜蔬。

并非三类土地都适宜栽种所有的作物。陆稻有适宜各类土地的品种，黄豆亦可普遍栽种，玉米一般只种于一类地和二类地，棉花只能种于一类地。棉花地是“百宝地”，常常间、套种多种作物。基诺人说：棉花地中只要人吃的什么都有。

据了解，基诺山已失去传统陆稻品种 30 余个，目前尚保存陆稻品种 71 个，其中早熟品种 16 个，中熟品种 35 个，晚熟品种 20 个，糯稻品种 25 个。全区以巴亚陆稻品种最多，达 38 个。适当地计划早、中、晚稻的栽培比例，可以一定程度地避免粮食

青黄不接的情况发生。而众多品种の利用，不同的地类、不同的年份种之以不同的品种，因地制宜，则是为了实现轮作，尽地力，保收成。下表为基诺族的陆稻品种与地类配置的典型经验，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基诺族刀耕火种农业的技术水平。

基诺山区陆稻品种统计表（基诺山农技站 1985 年）

品种名称			饭糯	米色	生育特征			品种名称			饭糯	米色	生育特征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细切	红	谷高	饭	红				白腰	糯	谷	糯	白	早		
靠考		席	饭	白		中		大		卯	糯	白			晚
细	花	网	饭	红	早	中		靠	饭	沙	饭	白		中	
长	毛	谷	糯	白	早			些	饭	节	饭	白		中	
烂	地	谷	饭	红			晚	布	饭	毛	饭	红	早		
老	里	谷	饭	白	早		晚	哈	糯	咪	糯	红	早		
黑	早	谷	饭	红	早			哈	糯	哈	糯	白		中	
大	节	巴	饭	红	早	中		紫	糯	牛	糯	紫	黑		晚
线	白	谷	饭	白		中		养	饭	哈	糯	白		中	
		南	饭	红		中		干	饭	咪	饭	白		中	
	看		饭	红		中		牛	饭	糯	饭	红		中	
	白	糯	糯	白	早			布	饭	谷	饭	红	早		晚
	怀	谷	饭	红			晚	毫	糯	尼	糯	白		中	
	红	大	饭	白				红	饭	且	饭	红		中	
	刀	谷	饭	红		中		黄	糯	妹	糯	白		中	
	糯	谷	饭	白			晚	红	饭	谷	饭	红	早		晚
		谷	饭	红	早			连	糯	糯	饭	白		中	
		谷	饭	红				阿	饭	谷	糯	白	早		晚
		谷	饭	红				毫	糯	婆	糯	白		中	
		谷	饭	白				二	饭	老	饭	白		中	
		卵	饭	红				白	饭	谷	饭	白		中	
		勒	饭	红	极早			细	饭	谷	饭	白	早		中

(续上表)

品种名称	饭糯	米色	生育特征			品种名称	饭糯	米色	生育特征					
			早	中	晚				早	中	晚			
糯切考布曼西地点先毫细南白	谷哥钢娘谷谷飘盟帮寸谷因门谷谷	糯饭糯糯糯饭饭饭糯糯糯饭饭	白红白白白红白白白白白	早	中	晚	黄皮糯 细长鸟些红军细茶早细大	皮毛 嘴音长 红毛 叶 花香	糯谷谷糯鲁谷谷糯谷糯糯	糯饭饭饭饭饭饭糯饭糯糯	白红白白白红白白红白白	早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晚 晚 晚 晚 晚 晚

基诺族陆稻品种与地类的配置

地类 品种 轮作年份	一类(折肖)		二类(折交)				三类(送它)			
	肥地	瘠地	阳坡		阴坡		阳坡		阴坡	
			肥地	瘠地	肥地	瘠地	肥地	瘠地	肥地	瘠地
一年	各种糯谷	勐旺谷	黄糯谷 紫糯谷	勐旺谷 烂地谷	黄糯谷 紫糯谷	大红谷 小红谷	细白谷 黑节巴谷	细红谷 烂地谷	黑亮谷 黑节巴谷	小红谷 烂地谷
二年	大白谷 小白谷	烂地谷	长毛谷		长毛谷 长毛谷		细白谷 小红谷	长毛谷 长毛谷		
三年	勐旺谷		勐旺谷	黑亮谷	烂地谷		烂地谷	烂地谷		

(续上表)

地 类 品 种 轮 作 年 份	一类(折肖)		二类(折交)				三类(送它)			
	肥地	瘠地	阳坡		阴坡		阳坡		阴坡	
			肥地	瘠地	肥地	瘠地	肥地	瘠地	肥地	瘠地
四年	黑节巴谷		烂地谷							
五年	烂地谷									

各村寨陆稻与地类的配置方法，远比上表所示丰富，比如由于海拔高度与坡高的变化，一块土地地头与地脚有气温之差，陡处与平缓处存在土壤厚薄肥瘠之异，所以在一块看起来面积并不太大的土地中，却往往分布着不同作物或者相同作物的不同品种。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一般的基诺族家庭是怎样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配置作物的。



整理停当等待播种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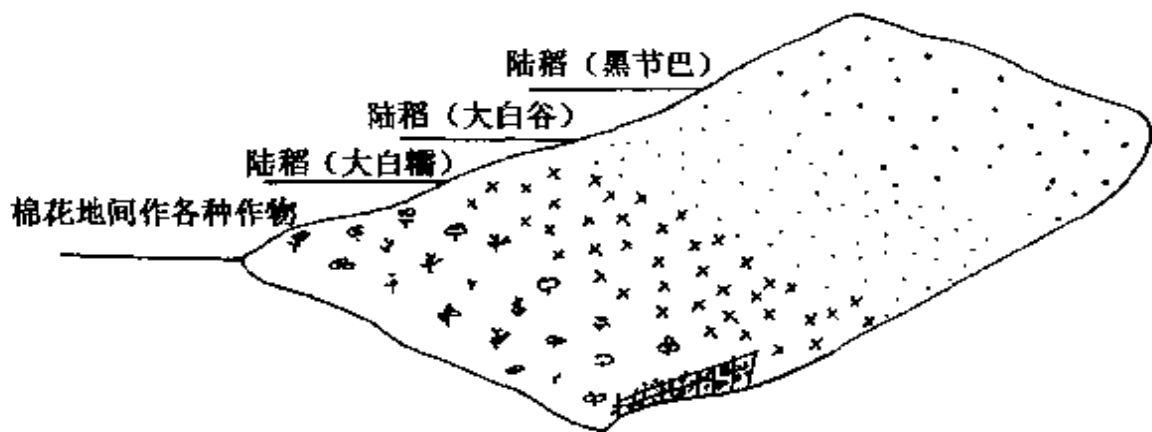
个案之一。调查对象白佳林，巴亚老寨人。1954年全家五口人，哥、嫂、侄儿、侄女和他。其时白家每年种地大约20亩。其中一类地四块16亩：第一块五亩种棉花，同时间种各种瓜豆蔬菜；第二块五亩头年种棉花，当年安排一半种镰刀谷（早稻），一半种勐旺谷和茶叶糯（中、晚稻）；第三块五亩为轮作第三年的旧地，亦安排中、晚稻品种大白谷、二白谷和布且哈咪谷；第四块一亩种玉米。三类地一块四亩，种中熟陆稻品种卡归、卡打和花谷。五块地的分布有一定距离。

个案之二。调查对象标利，扎角寨人。20世纪60年代初全家有12口人，大多数年头种一年的粮食至少够吃两年。每年种五块土地，面积约20余亩。五块土地中，有两块三类地，三块一类地。两块三类地均种陆稻。三块一类地中，有一块栽种玉米；有一块头年种棉花，当年种陆稻；一块是新开地，地头种一部分陆稻，其余种棉花，如果计划第二年改种陆稻，那么上半部分种棉花，下半部分种玉米。棉花地里间种芝麻、苏子、豆类、瓜类、青白菜、高粱、粟、薏苡、向日葵、辣子、茄子、姜、芋头等。五块地亦不集中分布。



点播陆稻

由以上个案可知，基诺族每年进行生产安排的时候，都要考虑好以下几个因素：计划足够的陆稻栽种面积，以保证口粮及品种的选择，既要考虑食用需要并与土地类型相适宜，又要有适当比例的早、中、晚稻；棉花既是穿衣原料，又是和外界交换盐巴、铁具以及交纳赋税的重要作物，因此棉花是每个家庭都不可缺少的；由于陆稻各品种和棉花等对土地类型有不同的要求，而且为了避免一块地遭受灾害便一无收成的情况发生，所以，每户不仅需要选择各种地类，而且还要使土地适当的分散。这样的生产经验时至今日人们也仍然十分珍视。



地类和作物配置及间作的实例（巴卡小寨，1986年）

五、发达的轮作技术

轮作技术十分发达是基诺族刀耕火种的一大特色。要懂得很好地轮作，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需要对土地进行耕作，即必须进行锄耕和犁耕；第二，需要有土地类型划分的知识，即要知道哪种类型的土地不能轮作，哪种类型的土地可以短期轮作，哪种类型的土地可以长期轮作；第三，要有比较丰富的栽培作物的种类并熟悉它们的生态特性，从而充分利用地力和调整地力；第四，还有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例如，卡场景颇族和勐海布朗

族，其实是具备以上几个条件的，然而出于生态方面的考虑等原因，他们都不愿意实行轮作；而有的民族在生态压力之下，却努力去发展轮作，基诺族的巴卡和巴亚等村寨就是这样的典型。

基诺族的轮作，大致有如下几种形式：

(1) 禾本科作物的轮作。以陆稻或玉米两种作物轮作，或以陆稻、玉米、薏苡三种作物轮作，或以不同的陆稻品种进行轮作。一般而言，玉米比陆稻耐瘠，薏苡又比玉米耐瘠，三种作物组合轮作，可以适应逐年减退的地力。以单一的陆稻品种进行轮作，也是根据地力逐年下降的规律，配置以从耐肥直到耐瘠生态特性的陆稻品种系列，从而实现轮作。禾本科作物的轮作，没有提高地力的功效，纯属适应地力的作物利用技术。



陆稻是主要的栽培作物

(2) 禾本科作物与锦葵科作物的轮作。以棉花和陆稻两种作物轮作，或以棉花、陆稻、玉米三种作物轮作，或再加薏苡四种作物进行轮作。棉花为喜热性作物，具有耐瘠、耐旱、抗病虫害力强、能深化熟土和保持水土、能抑制杂草生长并适于粗放栽培等优点，尤其是其落叶量大，可以大大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量。因

此，棉花不仅是基诺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栽培作物，而且也是理想的轮作作物。以棉花作为前作的棉、稻轮作，棉花每亩可收30公斤至50公斤，陆稻亩产稳定在125公斤以上。

(3) 禾本科作物与豆科作物的轮作。以黄豆和陆稻两种作物轮作，或以黄豆、陆稻、玉米三种作物轮作。黄豆根部有根瘤菌，具有固氮作用，而且落叶多，能够提高地力，因而是最常用的轮作作物之一。

(4) 禾本科作物与唇形科作物的轮作。以苏子和陆稻两种作物轮作，或以苏子和芝麻与陆稻轮作。卡场景颇族有一句俗话：不管多瘦的土地，只要种水冬瓜树都会变肥。基诺族也有类似的说法：苏子是个宝，只要栽种苏子，土地就会变肥。20世纪60年代以前，苏子在基诺族的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既是食用油和照明灯油的原料，又是更新地力的重要作物。基诺族栽种的苏子品种，有撒苏、塘苏和紫苏三种。栽种面积塘苏最多，撒苏次之，紫苏最少。油质以撒苏最佳，塘苏次之，紫苏较差。苏子能够肥地，主要原因是残落枝叶多，能堆积很厚的残落物，经犁地埋入土中腐烂，变为有机质。据调查：一块新开的牛犁地，投入50公斤陆稻籽种可获1000公斤粮食，而前作苏子则可收获1250公斤左右，产量可提高约25%。

除了上述几种轮作方式之外，最常见的是禾本科、锦葵科、豆科、唇形科作物的混合组合轮作。例如，1961年景洪县农林水利科的农技售货员曾对基诺山的两块轮作地进行过调查，其轮作作物如下表。

两块典型轮作地的轮作方式

年份 轮作 作物 地号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计划)
一号地	苏子	陆稻	黄豆	陆稻	黄豆	陆稻	黄豆	陆稻	黄豆	陆稻	黄豆
二号地	黄豆	陆稻	陆稻	黄豆	陆稻	陆稻	陆稻	冬芥	陆稻	黄豆	陆稻



多种作物混作的“百宝地”

据笔者在巴夺等寨调查，基诺族常见的轮作有如下几种形式：

- (1) 棉花—陆稻；
- (2) 陆稻—棉花—陆稻—黄豆；
- (3) 玉米—冬荞—陆稻；
- (4) 黄豆—冬荞—陆稻；
- (5) 早玉米—红薯—陆稻。

在巴亚和巴卡小寨调查的轮作方式则如下表。

巴亚、巴卡的轮作方式

村名	轮作	轮 作 作 物						休闲年限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	六年	
巴亚	一	棉花	陆稻	棉花	玉米或陆稻	黄豆或芝麻、苏子	陆稻	有的过去至少在十五年以上，现在因土地不足，有的仅休闲五六年
	二	棉花	陆稻	陆稻（改换品种）	陆稻（改换品种）	黄豆或芝麻、苏子	陆稻	
	三	陆稻	陆稻	陆稻或黄豆、玉米	玉米或黄豆、芝麻	陆稻	陆稻（改换品种）	
巴卡	一	荞麦	陆稻	苏子、芝麻或花生、黄豆	陆稻	玉米	陆稻	
	二	陆稻	黄豆	陆稻	黄豆或玉米、花生、芝麻	陆稻	陆稻（改换品种）	
	三	陆稻（糯）	陆稻	陆稻（改换品种）	黄豆或苏子	陆稻	玉米或黄豆、芝麻	
	四	陆稻	玉米	陆稻	玉米	陆稻	玉米	

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诺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发生了不少变化，其发达的轮作方式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而趋于单调。譬如由于外地廉价的棉布、菜油、煤油等商品的大量输入，基诺族以往不可缺少的经济作物棉花和油料作物苏子等便失去了大量栽培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棉花和苏子栽培量的减少，无疑会严重影响基诺族的轮作技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基诺族传统的发达的轮作技术将会消失。1983年以后，由于土地分配到户承包耕种，各个家庭又可以根据土地状况和生活的需要计划轮作。下面列举两个近年轮作的例子。

例1：调查对象巴卡小寨乔生，38岁（1986年）。该户4口人，妻克妞28岁，儿子董永9岁，女儿董玲6岁。1983年分得土地的类型、名称、数量如下：

一类地 16.5 亩，其中苏普勒（象耳朵树边地）7.5 亩，曲得（红皮椿树地）6.5 亩，周木它（水沟边的地）2.5 亩。

二类地 3 亩，名为普腊者（银厂寨的土地）。

三类地 8.5 亩，其中力比拖拉（河边山梁地）6 亩，亚鸠窝格勒（石崖中的土地）2.5 亩。

此外，还有水田 1.5 亩，自留山 1 亩，砂仁地约 10 亩，橡胶地 10 亩。

其旱地的轮作情况如下表：

巴卡小寨乔生家的轮作

地名	各年耕种土地数量及栽培作物品种			
苏普勒	种 5 亩，种陆稻“细红”品种，余 2.5 亩休闲	继种原 5 亩，种玉米	继种原 5 亩，改种陆稻“叠翠”品种	原 5 亩中，2.5 亩继种“叠翠”，2.5 亩改种玉米
曲得	6.5 亩全种陆稻“黑节巴”品种	休闲	休闲	休闲
周木它	休闲	休闲	休闲	休闲
普腊者	3 亩全种陆稻“勤旺”品种	3 亩改种陆稻“黑节巴”，又向银厂寨借 5 亩地种陆稻“勤旺”	3 亩改种玉米，所借 5 亩改种“叠翠”，再次借 2 亩多种“勤旺”	3 亩休闲，所借 7 亩多地全改种陆稻“黑节巴”
力比拖拉	休闲	休闲	休闲	休闲
亚鸠窝格勒	休闲	休闲	休闲	休闲

例 2：调查对象巴亚中寨沙车，71 岁（1986 年）。该户 6 口人，儿子白腊腰 32 岁，儿媳白腊诗 29 岁，女儿白腊妞 29 岁，孙女 4 岁，孙子 1 岁半。1983 年分得土地情况如下：

一类地 4.08 亩，分布于名为巴漂它（从巴漂买来的土地）的下段。

二类地 25.8 亩，其中巴漂它中段 3 亩，勒牛比（勒牛河下游的土地）9 亩，六结（意为土地）7.8 亩，勒得（边界的土地）6 亩。

三类地 31.8 亩，其中白腊得（黄竹林地）3.6 亩，查普约（蚂蚁堆地）4.8 亩，涉都考（金矿洞地）9 亩，木托涉（朝霞、夕阳都能照射到的土地）7.2 亩，巴漂它土段 7.2 亩。

此外，尚有水田 3 亩，经济作物地 6.8 亩。

旱地的轮作情况如下表：

巴亚中寨沙车家的轮作

地名	各年耕种土地数量及栽培作物品种			
	1983 年	1984 年	1985 年	1986 年
巴漂它下	4.08 亩全部种棉花	改种陆稻	种陆稻，改换品种	种陆稻，改换品种
巴漂它中	休闲	休闲	休闲	休闲
勒牛比	休闲	休闲	9 亩全种陆稻	种陆稻，改换品种
六结	一半种陆稻，一半休闲	一半继续种陆稻，改换品种，另一半休闲	耕作地休闲，休闲地种陆稻	休闲
勒得	休闲	6 亩全种陆稻	种陆稻，改换品种	继续种陆稻，改换品种，借地 3 亩种陆稻
白腊得	3.6 亩全种陆稻	种陆稻，改换品种	休闲	休闲
查普约	4.8 亩全种陆稻	种陆稻，改换品种	休闲	休闲
涉都考	休闲	休闲	休闲	休闲

(续上表)

地名	各年耕种土地数量及栽培作物品种			
	1983年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木孔涉	休闲	休闲	休闲	7.2 亩全种陆稻
巴漂 它上	休闲	休闲	休闲	休闲

六、生产节令和生产过程

刀耕火种农业也和其他农业一样，十分讲究生产节令。基诺族有自己的历法，分一年为 11 个月。其古老的民歌“朴析子”（生产季节歌）一开头便唱道：“一年有 11 个月，一个月有 30 天”。由于与居住于坝子中的傣族交往较多，他们也借用傣族历法。而对于刀耕火种的备耕、播种等重要生产节令的掌握，则多半依据物候特征，例如不同季节有不同的鸟鸣、花开景象等。

备耕的时间，懒活地和轮作地不同。懒活地于农历一月以前砍树，砍得早，干燥时间长，才能烧得透彻。轮作地芟草必须在农历八月以前。基诺族农谚说：“七八月芟地一碗油，九十月芟地半碗油。”地芟迟了，就难以获得丰收。原因是七八月杂草尚未开花结籽，又逢雨季，此时芟草会使其腐烂，来年杂草就少；如果待其开花结籽后才芟草，来年杂草肯定繁盛。犁地亦是如此，农谚说：“十犁金，冬犁银，腊月犁地收成少，年后犁地无收成，要想吃饱饭，趁早把地犁。”提早犁地亦是为了防止草灾。于霜降之前犁地，杂草翻起后，被霜冻死；晒垡时间长，亦可减少杂草害虫。总而言之，不论是早砍树还是早芟草、早犁地，都是为了减少草灾。1960 年，基诺山的一些村寨因修水库耽误了备耕时间，4 月份才匆忙备耕，结果草灾严重，陆稻最高亩产仅



春 米

70 公斤，低者只有两三公斤。^①

播种节令的把握，不用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基诺族的谚语说：“三月棉花四月豆，五六月下种喂斑鸠。”延误了播种时间，自然不会有好收成。总的来看，播种时间要根据地势高低、土质肥瘦、气候冷热、雨水早迟等因素决定。从地类来讲，播种的原则是先播阴山后阳山，先凉山后热山，先远山后近山，先山顶后山脚，先水田后旱地。以品种来看，则先播早熟品种，再播中熟品种，后播晚熟品种；先播饭稻，后播糯稻。具体而言，陆稻于农历三月底至四月底播阴山和冷地，四月下旬至五月下旬播种阳山和热地。玉米夏作于四月底至五月中旬播种，冬作于十月上旬以前播种。棉花三月底至四月底栽种。苏子、芝麻四月中下旬播

^① 景洪县农林水利科调查报告（1961年），景洪县档案馆提供。

种，五月中下旬可移植。花生夏作五月栽，秋作十月中旬以前栽、黄豆夏作五月种，冬作九月种。

由于耕作方式因地制宜，栽培作物比较丰富，所以生产是比较繁忙的。兹将基诺族十二个月的生产内容归纳于下表。

基诺族一年生产状况

月份 (公历)	物候特征	生产内容
1月	桦皮树、大芒果树绽出新芽，豆楂树开花，小黑江长出青苔，澜沧江水发光	森林地砍树、修枝；轮作地犁地、耙地或敲土地
2月	“即即索”知了开始鸣叫	森林地修防火道；开始烧地，轮作地继续耕作
3月	“即即索”知了叫声达到高潮	森林地继续修防火道；烧地、拣地，筑台地；盖窝棚；轮作地继续耕作；栽种棉花、玉米等
4月	“列列”知了鸣叫	栽种黄豆；在棉花地里间、套种高粱、粟、薏苡、蔬菜等；月底是陆稻播种的紧张阶段
5月	“列列”知了鸣叫	继续播种陆稻；在地周围栅栏，棉花地除草
6月		除草；棉花间苗、打尖
7月		除草；修栅栏
8月	“古幽”知了鸣叫	除草；守地护秋；收割早稻、早玉米；轮作地开始砍芟灌木杂草，烧地
9月		收获陆稻、玉米；守地护秋
10月		收获陆稻，穗选良种，堆谷堆；收获玉米、黄豆、棉花等
11月		打谷子；背运粮食
12月		打谷子；背运粮食；轮作地犁地

七、农耕礼仪

农耕礼仪是贯穿生产过程的一系列表达人们祈求丰年的心态的宗教活动。巴亚老寨过去在一年之中举行几次农耕祭祀，兹将其内容简单介绍于下。

(1) 特莫克仪式。基诺语“特”为打之意，指打铁；“莫”是隆重、盛大；“克”是节或活动。特莫克意即打铁的盛大节日。这是基诺族一年的第一个节庆，于正月择日举行。特莫克也如其他民族的过年一样，有辞旧迎新的意义，但围绕铁匠所举行的活动才是节日的主要内容。过节的第二天要由长老任命新的铁匠，第三天全部长老到铁匠房内为铁匠举行打铁仪式。铁匠在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这是不难理解的。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主要依赖的生产工具就是铁刀。当新春到来之际，基诺族又将砍伐森林开辟新地，而铁匠则必须于备耕之前为人们打修铁刀和锄头、犁铧等。基诺族一年之中的第一个农耕礼仪特莫克，其实就



特莫克节日景象

是生产过程的开端。

(2) 砍地仪式。特莫克过后的第一天，卓巴和卓色一大早便去到村寨附近的林地里，象征性地砍伐几棵树木，作为全寨开始砍树开地的序曲。各户在砍树之前，需要在林中挂几个“达辽”^①，并在旧窝棚地址前栽种几块姜和芋头，以驱鬼避邪。

(3) 科比达若仪式。特莫克过后第十三天，举行科比达若（祭鼓）仪式。仪式在卓巴家进行，长老和巫师参加，以猪、鸡、酒祭祀鼓，祷告神灵保佑农事顺利进行。

(4) 苗姐若仪式。正月底，卓巴和卓色同时分别举行苗姐若（砍地结束）仪式。两位长老在其家晒台楼梯口处，简单摆设供品祭献祷告。在此之前，各户的林地大部分已经砍伐，但不能砍完，待长老做过仪式之后，才全部砍掉。

(5) 烧地仪式。烧地仪式在地中举行，临时推选参加烧地者中之年纪最大的男子主持。点火之前，要在地边插“达辽”，并杀狗驱鬼，杀鸡祭风神。

(6) 冬布若仪式。三月初，卓巴和卓色分别举行冬布若（盖窝棚）仪式，做法与上述苗姐若相似。仪式做过之后，村民便可以盖窝棚了。

(7) 恰思若仪式。三月底四月初，全寨杀牛分肉。播种前杀牛祭祀，有祈求丰年的宗教意义，同时即将投入紧张的劳动也需要增加营养。举行恰思若（播种仪式）的日子，天蒙蒙亮卓巴便在晒台上，手执点播棒，一面象征性地做着点播动作，一面向天祈祷。此后各家播种，还要在地里杀鸡祭祀，并首先要在窝棚前面种姜、芋头、金芥花和鸡冠花等，以驱鬼献神。

(8) 贺西左仪式。贺西左（吃新米）在七月，其时早稻已近成熟，每家都到地里采回谷穗，供奉寨神和祖先。

① “达辽”：用竹片编制的圆盘状驱鬼避邪之物，盛行于西双版纳傣族和部分山地民族之中。“达辽”为傣语。

(9) 谷萨苦罗苦仪式。九月，陆稻收割入仓之后，有谷萨苦罗苦（收谷魂）的习俗。人们背着鸡、银手镯、红线、竹烟盒、金芥花、鸡冠花等到地里，将这些东西置于地上，高声喊叫请谷魂回到仓库里去。

基诺山各村寨的农耕礼仪并不完全一样，兹将巴亚、巴卡、亚诺三寨的农耕礼仪列为一表，以便进行比较。

巴亚、巴卡、亚诺三寨的农耕礼仪

月 份 (农历)	寨名 仪 式	巴亚寨	巴卡寨	亚诺寨
正月		(1) 特莫克 (打铁仪式) (2) 砍地仪式 (3) 科比达若 (祭鼓仪式) (4) 苗姐若 (砍地结束仪式)	(1) 特莫克	(1) 特莫克 (2) 蹉陀 (祭天神)
二月		(5) 烧地仪式		(3) 格巴布勒 (烧地仪式)
三月		(6) 冬布若 (盖窝棚仪式)		
四月		(7) 恰思若 (播种仪式)	(2) 肖柏 (播种仪式)	(4) 肖柏 (播种仪式)
五月			(3) 蹉陀 (祭天神)	(5) 蹉陀 (祭天神)
六月			(4) 布朱灵 (灭虫仪式)	(6) 雀色不勒 (祭天神、山神、地神)

(续上表)

月 份 (农历)	寨 名 式	巴亚寨	巴卡寨	亚诺寨
七月		(8) 贺西左 (吃新米)	(5) 洛毛洛 (祭龙刀) (6) 贺西左 (吃新米)	(7) 洛毛洛 (祭龙刀) (8) 格巴达 (祭天神) (9) 贺西左 (吃新米)
八月				(10) 麦考不勒 (收割仪式)
九月		(9) 谷萨苦罗苦 (叫谷魂)	(7) 谷萨苦罗苦	(11) 谷萨苦罗苦

第五节 独龙族的刀耕火种

一、地理环境

独龙族聚居的贡山县独龙江地区，位于云南西北角。其境北通西藏，西、南与缅甸接壤，东隔高黎贡山与怒江峡谷相邻。全区总面积 1 937.3 平方公里，合 2 905 974 亩。^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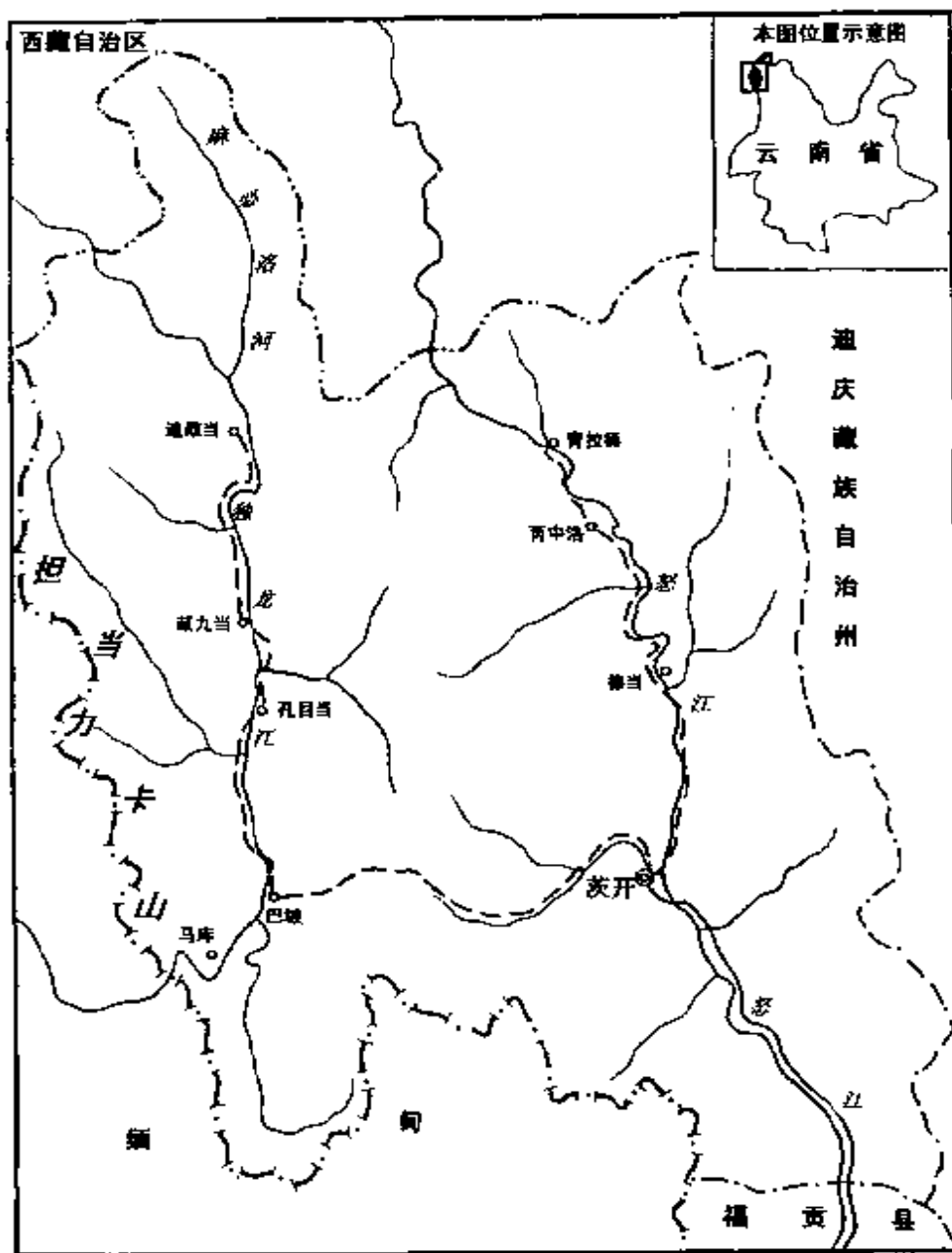
本区属横断山系纵谷区北段，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纵贯

^① 资料来源于贡山县档案室。

峡谷的独龙江，发源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伯舒拉岭东南海拔3 000多米的林海雪原，沿途汇集了熊当河、迪政当河、白来河、迪兰河、丁给河、学前河、猷九当河、木千王河、普卡王河、斯拉落河、麻不里河、明力王河、正色河、老王奇河等支流，奔腾倾泻南下，至下游海拔1 160米的钦郎当，流程约150余公里。出境入缅甸后，称为恩梅开江。独龙江东西两岸是高耸入云的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两山脉夹江对峙，南北绵亘，海拔多在3 500米以上，最高峰戛阿戛普峰海拔5 128米。峡谷相对高差一般为1 500米至3 000米，而最大高差为3 800余米。本区属北亚热带气候，然而由于山高谷深，气候垂直分布带谱十分明显。海拔1 200米~1 800米的江边地带为湿热河谷区，年平均气温14.8℃，最热月平均气温21.5℃，最冷月平均气温7.6℃。从江边至山顶，海拔每升高100米，气温随之下降0.48℃。高山地带，气候寒冷，常降大雪，积雪期长达半年以上。由于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雨水特别丰富，每年降雨量为2 900毫米~3 000毫米，是云南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

该区土壤的分布因受地形、地貌、生物和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据贡山县农技部门勘测，河谷2 000米~2 100米地带为黄壤；江西担当力卡山2 100米~2 500米地带为黄棕壤，2 500米~2 800米地带为棕壤，2 800米~3 200米地带为暗棕壤，3 200米~4 000米地带为针叶林暗棕壤；而在江东高黎贡山2 000米~2 300米地带为黄棕壤，2 300米~2 700米地带为棕壤，2 700米~3 300米地带为暗棕壤，3 300米~3 700米地带为针叶林暗棕壤，3 700米以上地带为亚高山草甸土。土壤有机质含量较高，普遍偏酸，富氮、钾，缺磷。^①

① 资料来源于贡山县档案室。



独龙江丙中洛社区示意图

该区植被：河谷地带多分布阔叶林，主要是栎类、楠木和水冬瓜树。高海拔地带主要是云南松、铁杉、云杉、冷杉等针叶林。森林中蕴藏着丰富的香菌、木耳等食用植物和虫草、黄连、天麻、贝母、茯苓等名贵中草药，还有多达 250 余种的植物花卉。在茂密的森林中，生存着许多宝贵的动物，著名的有云豹、



人背马驮向独龙江运送物资

小熊猫、金钱豹、水鹿、羚羊、马麝、黑麝、林麝、巨蜥、角雉、长尾雉等。

由于地处偏远，高山屏障，本区交通极为困难。说到怒江峡谷，交通已属十分不便，而独龙江地区又被苍莽巍峨的高黎贡山隔离于怒江峡谷之外，形成罕见的封闭环境。从贡山县城至独龙江，需翻越海拔4000米~5000米的陡峭高山，过去全为羊肠小道，路况之险令行者不寒而栗，望而怯步。50多公里的路，一般要走5天至7天，现拓宽修筑为人马驿道，路况有所改善，单程仍需3天。而一年之中，仅6月下旬到11月中旬可以通行，11月后即大雪封山，翌年四五月冰雪才开始消融，长达半年的

时间完全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1964年以来，国家先后组织投入了30多万个工，130多吨炸药，上100万元资金，打通了从县城至独龙江沿途100多处陡峭的悬岩，架起了近百座桥梁，为拓宽道路挖掉了几百万方土石，在沼泽地上铺垫了无数枕木，终于修通了全长60余公里的人马驿道。随后，又在独龙江境内凿通了70多处悬岩绝壁，架设了3座人马吊桥、20多座木桥和10余根钢溜索。独龙江峡谷南北100多公里的路，原有近百处“天梯”，现在已基本上畅通。



攀“天梯”（刘达成摄）



过藤桥

独龙江地区是贡山县的一个乡，下辖马库、孟当、孔日当、献九当、龙元、迪政当6个行政村，共43个合作社。1987年统计人口678户，3583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8人，农耕地9359亩，占总面积的0.15%，是一个人烟稀少，难以开发的地区。

二、社会组织

据 20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在大约 1 500 平方公里的独龙江地区，按血亲划分，共有 15 个氏族，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的独龙族，都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氏族。独龙语称氏族为“尼柔”，15 个氏族的名称如下：

- | | |
|----------|----------|
| (1) 戛木来 | (2) 江勒 |
| (3) 木江 | (4) 凯而却 |
| (5) 陇吴 | (6) 郭劳龙 |
| (7) 马必力 | (8) 木仁 |
| (9) 狄巴 | (10) 暖沙 |
| (11) 哇策 | (12) 滴朗当 |
| (13) 戛木力 | (14) 及木当 |
| (15) 丙当 | |

独龙江两岸陡峭的山坡，承受不了过多的人口压力，不适宜人们密集聚居，因而 15 个氏族并没有明确的地域分布界线，各氏族不断分裂，不断地迁移，交错分布于纵长 150 余公里的峡谷两岸。每个小家族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村寨，这就是独龙族的特殊的家族公社。各家族公社（或村社）之间距离远者近 30 公里，近者 2 公里多。各公社往往以其所居自然环境的特点来称呼其家族名称，如孔当家族是指一块宽大的坝子，学哇当家族是指追马鹿的地方，龙棍家族是指石头多的地方，麻库家族是森林茂密的地方等等。家庭公社最大的只有 15 户，如龙元；最小的仅 1 户，如迪乔；一般为四五户。这与勐海县西南地区动辄 70 多户，甚至 100 多户的布朗族大型聚落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使人强烈感受到峡谷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制约和影响。据不完全统计，50 年代整个独龙江地区大约有 52 个家庭公社，它



贡山县北部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地

们分布在沿江两岸比较平缓的坡地和小块台地上。

独龙族家庭公社的头人是家族长，独龙语称其为“戛桑”，意思是能说会道的人。家族长一般都是家族中能干、公道、较为富裕的男性长者，他们有的是选举产生，有的是自然形成的。家族长的职责是管理家族内部事务，组织领导生产，主持一些重要的宗教仪式，调解民事纠纷，处理对外关系，代表本家族交纳贡税等。各家族公社之间是独立和平等的，没有统属关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常常导致各家族间的不合、仇视甚至械斗。为了有效地解决这种情况，在有的地区，通过各家族长相互商议，也选举产生地域性的大头人管理、协调各家族之间的关系。例如茂顶等 12 个家族，便曾经推举过总头人。

除了家族长之外，巫师在独龙族社会中也具有较高的地位。巫师有两种，一种叫“隆木沙”，专门卜卦看鬼；另一种称为“班瓦当”，专门杀牲驱鬼。刀耕火种的农耕礼仪祭祀活动，规模较大的要由巫师主持，例如秋收前的杀牲祭天仪式等。

三、土地制度

独龙族家族公社时期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家族公社所有制。家族成员通过共耕、伙耕和个人私耕三种形式，进行刀耕火种生产。



独龙江河谷的刀耕火种地（木基元摄）

共耕即全体家族成员参加的集体耕种。实行共耕的土地，独龙族叫做“夺木枯”。“夺木枯”一般是坡度比较平缓、土质比较肥沃的林地。每年春耕之前，家族公社即举行会议，由家族长主持安排有关的生产事宜。开始备耕，家族长根据耕地面积大小按户平均分配劳力，大伙集体砍树、烧山。播种时，籽种由各户均摊。粮食收获后，在地中由一年长的妇女主持按户平均分配，或者先暂时储于公共仓库之中，由专人负责保管，需要时再行分配。

随着家族公社血缘纽带的松弛，家族共耕制度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伙耕制度，独龙族称这种伙耕的土地为“夺木奢”或

“猛吴”。伙耕制与共耕制的差别在于生产组织规模的大小。伙耕不再是全体家族成员的集体耕种，而是二户至五户家庭的自由组合耕种，除此之外，土地家族公社公有，人们在生产中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等，均与共耕制无异。伙耕成员可以是短期的结合，也可延续较长时期；一个家庭可以只参加一个伙耕组，也可以同时参加几个伙耕组。伙耕组大多由一个家族成员组成，然而也有由相邻不同家族成员组成的例子。

根据 50 年代初期的调查，其时家族共耕制在独龙族社区已趋衰落，实行这种耕作制度的土地只占社区总耕地面积的 4% ~ 6% 了；而伙耕却非常盛行，其土地面积占到社区总耕地面积的 50% 以上，这是独龙族公社阶段的主要生产形式。^①

小家庭从事个体耕种，是伙耕和共耕的补充形式。如果伙耕和共耕生产不足以维持生存，那么各小家庭可自行开荒生产粮食。如果开独龙族称之为“目林木”的原始森林，按规定砍伐者有连续耕种三个轮歇周期的权力。在此期间，如果砍伐者死去，其子可以继承耕种权；其他人希望耕种，必须经过占有者的同意，并要赠送一定数量的物品，如粮食、麻布、工具或小猪等，以作为其开垦土地的报酬。

“目林木”经砍伐者耕种三轮之后，便成为公社的公有林地，其名叫做“样沙”或“样伯”。公社成员欲耕种共耕、伙耕之外的“样沙”或“样伯”，则要采取号占的形式。常见的号占方式有这么几种：在林地边缘砍倒几株或一片小树；在林地边割去一片草地；在林地边用两片劈开的竹子立作交叉状；在林地边选择一株或几株大树，剥下树皮，在树干上用刀砍成交叉形或锯齿状；在林地边选择较高大的树木，砍去树梢。对于号占的林地，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版，23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只能耕种一轮，抛荒休闲期满后，任何人都不得连续号占同一块林地，而必须去选择其他林地。

个体耕种者获取当年耕种的土地，除了号占方式之外，一些家族公社还辅以分配土地的办法。每年在备耕之前，公社即举行家族成员会议，将共、伙耕之外的少数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这类分配土地称为“随移”。分配时，要将较好的或较近的林地优先照顾给长者和有小孩拖累的妇女。各小家庭所分到的“随移”，也只能耕一轮，而不能长期占有。



做“号地”的标志竹签（刘达成摄）

独龙族是以栽种水冬瓜树进行粮林轮作而闻名的刀耕火种民族。在耕种过的土地栽种水冬瓜树以缩短轮歇周期和提高地力的做法，无形中冲破了土地家族公有制的藩篱。因为一旦谁付出劳动栽种了水冬瓜树，那么树长成之后也应该归其砍种，其他人未经许可或不向其赠送一定的礼物，是不能擅自去号占砍伐的。而如果人们不断地在同一块林地中栽种水冬瓜树的话，事实上便长期占有了这块土地。遥远而贫瘠的林地，是没有必要长期占有耕



独龙江独龙族的房屋（俗称“千脚落地房”）

种的。此类栽种水冬瓜树的林地，独龙语称为“斯蒙木郎”，它是独龙族家族公社土地私有制萌芽的标志。

大约在 20 世纪 20 年代，独龙江上游村社受藏族影响，开始在房前屋后开辟固定的园圃，独龙族称园圃为“结白”或“格鲁”。园圃围以篾笆，内中多栽种蔬菜瓜豆。虽然各家庭种植面积很少，大都不到一亩，但这却是真正的私有土地。属于私有的土地，还有 1952 年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开垦的水田，但其数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

私人占有的水冬瓜树地以及属于私有的园圃和水田，也可以进行伙耕伙种，有人将其命名为“私有伙耕”。私有伙耕大多是共同耕种、平均出籽种、平均分配，土地占有者一般不享受特殊待遇。不过，自 1948 年起，开始出现土地交易活动，据说最早一个叫孔当朋生的人以一点五斗小米向一个叫丙当滇的换取二亩锄挖地，折合人民币仅三元多。^① 此后类似的交易时有发生，然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 版，23 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而交换价值都很低，至多不过是土地买卖关系的萌芽。

在独龙江地区，也有类似于其他山地民族的借种、讨种制度。当本家族的林地不够耕种之时，其成员也可以到其他公社寻求解决途径。通过馈赠酒肉等礼，征得对方同意，可以借地砍种，亦可以参加对方亲戚伙耕，甚至还可以搬到对方地域内居住。^①

四、土地类型及耕作技术

独龙族的土地分类比较丰富，社区的林地一般被分为四大类共十种类型。第一大类叫“香木朗”（或“香木玛”）。“香木朗”意为“刀砍地”。按植被区分，“香木朗”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森林“香木朗”，二类是竹林“香木朗”，三类是竹木混交林“香木朗”。森林“香木朗”根据树木状况还可以分成三种：其一为原始森林处女地，叫“目林木”；其二是经过几次轮歇，森林植被恢复尚好的林地，叫“样伯”或“样沙”；其三是经过较多次的轮歇，树木稀疏的林地，叫“样奇”。在三类森林“香木朗”中，“目林木”难以开发，然而作物产量最高；“样伯”尤其是“样奇”易于砍种，但产量较低。竹林“香木朗”也按竹类分为三种：其一叫“日久垮香木朗”，“日久垮”是一种大竹名，竹粗如碗，高十余米，有如滇南龙竹；其二叫“久垮香木朗”，“久垮”竹杯子粗细，节短壁厚，枝如扫帚；其三是“格芦香木朗”，“格芦”竹只有手指粗细，竹竿修长，成片密布。三种竹林地中，一、二两类比较肥沃。

“香木朗”实行免耕，不锄不犁，砍伐竹木使用斧头和砍刀。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1版，23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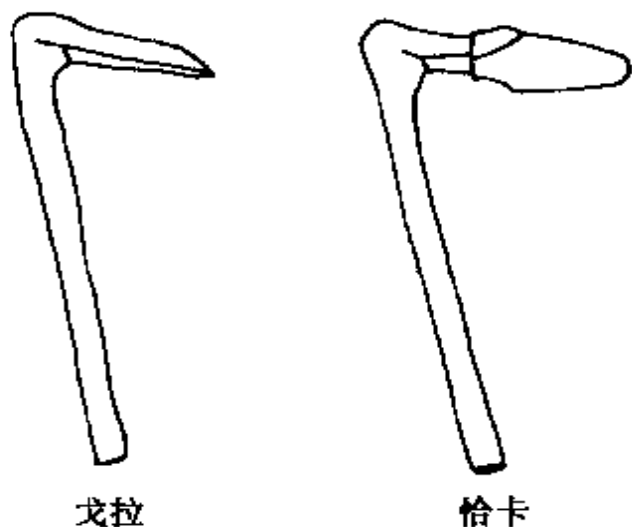
独龙语称斧头为“俄尔”，斧头可能自独龙江源头的藏族地区传入。砍刀叫“香木”，据说系从缅甸和怒江传来独龙江的。砍刀形状与滇南山地民族的大体相似，刀头稍宽，尾部稍窄，男子、妇女、小孩用刀尺寸各不相同，男子用刀长约 45 厘米，妇女用刀长约 35 厘米，小孩子用刀长约 25 厘米。



贡山北部独龙族的木板房

“香木朗”播种作物，有点播和撒播两种方式，玉米、陆稻等作物采用点播，荞、稗、粟等作物则采用撒播。播种工具有“宋姆”、“戈拉”和“恰卡”。“宋姆”是头部削尖的竹木棍子，用完即弃。“戈拉”系木质工具，制作极为简单，选择质地坚硬、形状如钩、粗细适度的树叉，一边分枝取 15 厘米至 20 厘米削尖成鹤嘴状，另一边分枝则取 50 厘米至 60 厘米留作握柄，是一种制作简单的小木锄。“恰卡”是“戈拉”的发展形式，在“戈拉”的鹤嘴尖上包镶一段长约 10 厘米的铁皮，就成为“恰卡”。点播方式是这样的：或男子在前以“戈拉”或“恰卡”整地，妇女在后一手以“宋姆”凿穴，一手放种，并用脚拨土盖种；或男子手执“宋姆”

在前凿穴，妇女在后放种盖土；或一人在前凿穴，一人尾随放种，又一人在后用“戈拉”或“恰卡”覆盖籽种。撒播亦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整理好的地中撒种，然后用“戈拉”或“恰卡”拨土、覆盖；二是先将籽种撒在头年耕种收割后长满杂草的土地上，然后一面拔草，一面用“戈拉”或“恰卡”敲打附于草根上的泥土，以覆盖籽种，这种播种方法多用于后面将要介绍的轮作地类。



“香木朗”播种后不薅草。一般只耕种一年，抛荒休闲期为五年至七年。在独龙族的家族公社时期，“香木朗”是最主要的地类。

第二大类叫“斯蒙木郎”，意为“水冬瓜树地”。独龙族称水冬瓜树为“色给”，他们栽培水冬瓜的方法不同于卡场景颇族、西盟佤族和腾冲的汉族，这些民族一般是将水冬瓜树籽掺拌作物籽种播种于地里，而独龙族却是栽种树苗。水冬瓜树于秋天落籽，如果落籽前在水冬瓜树林中烧荒一次，那就非常有利于树籽发芽和生长。每年12月前后，独龙族人便到山中采集树苗，塌方的上坡上是水冬瓜树苗最为密集的地方。人们将手指粗细、高一米左右的树苗一箩箩背回寨子，将其泡在水沟中，待到清明时节便移种到地里。“斯蒙木郎”一般轮作三年。第一年砍伐天然

森林或前轮栽种的水冬瓜树林。在多数情况下，第一年即将森林全部砍伐殆尽，但要留下约一米高的树桩，以利其来年发枝；然而也有第一年仅修树枝，留下主干，到第二年或第三年才全部砍烧，以延长土地的使用期限。但不管采用哪种方法，待树木全部砍烧耕种后的第二年，便在播种农作物之前栽种水冬瓜树苗，第三年在树木空隙中继续栽种作物，第四年树木荫蔽，停止栽种作物，让土地休闲五六年，水冬瓜树一般便可长成高 10 余米、直径约 15 厘米的大树，那时候又可进行新一轮砍种。

独龙族的水冬瓜地的轮作，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休闲期（年）
玉米	粟	荞	5~6
燕麦	荞	青稞	5~6
稗子	荞	粟	5~6
荞	粟	稗子	5~6
荞	稗子	燕麦	5~6
黄豆	芋头		3~6

水冬瓜地的耕作方法，第一年与“香木朗”相同，只砍烧不耕作，第二、第三年要使用“戈拉”、“恰卡”和怒锄（从怒江怒族传来的铁锄，锄长约 20 厘米，宽约 15 厘米，锄柄长约 100 厘米）挖地或除草，因而也有将这种土地叫做“手挖地”的。

栽种水冬瓜树有不少好处。如“香木朗”种 1 年要休闲 5 年~7 年，而栽种水冬瓜树可连续耕种 3 年才需要休闲 5 年~6 年。而且水冬瓜树砍伐之后并不完全焚烧，可以取作建筑和家具的木材、柴薪。水冬瓜树是肥地的速生树种，栽种这种树的土地的作物产量一般都高于其他林地。据洪俊等 1960 年的调查，该区二村“香木朗”的产量一般为籽种的 19 倍，水冬瓜树地的产

量则为籽种的 21 倍；一村每架（约为 2 亩）“香木朗”的产量是 4 升至 9 升，每架水冬瓜树地产量高达 1 石零 4 升；三村一般林地收获量为籽种的 25 倍~30 倍，而水冬瓜树地则为籽种的 30 倍~40 倍。^①



独龙族的水冬瓜树刀耕火种地（木基元摄）

在整个独龙江地区，“斯蒙木朗”是仅次于“香木朗”的重要的林地类型，而其在各村社中的比重，中北部村寨较多，南部较少。

第三大类叫“阿白木郎”。此类地一般连续耕种三四年，然后休闲一二年。由于休闲期极短，树木不能很快恢复，只有灌木和茅草。这类地只见于独龙江中上游土地较少的村寨，数量不多。

第四大类叫“结白”或“格鲁”，即园地。园地散布于各家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版，30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

房前屋边，种蔬菜瓜果之类，不休闲，锄耕，每家都有，多者一亩到两亩，但大多不到一亩。

每个独龙族家庭，一般都具有包括各种地类的若干块土地，这既是人们生产多种作物的需要，也是防灾保收的措施。而且土地的分布，又充分体现了峡谷民族利用土地的特色，那就是每个家庭都力求具有从江边直到较高海拔地带的垂直分布的几块土地。由于峡谷海拔高低悬殊，垂直气候差异显著，受其影响，各海拔带栽培作物的播种和成熟期有很大差别。利用这一自然特性，可以分散农忙时间，并且可以缩短青黄不接的时期，它与基诺族等经验丰富的早、中、晚稻的变化栽培，有异曲同工之妙。

独龙族的土地分类如下表：

第一类	香木朗 (亦称香木玛， 意为刀砍地)	1. 森林 香木朗	(1) 目林木 (原始森林、难开发、土肥)
			(2) 样伯 (或称样沙，休闲后再种，林相恢复尚好，地力尚可)
			(3) 样奇 (经过多次轮歇，地力较差)
		2. 竹林 香木朗	(1) 日久垮 (大竹子地，比较肥沃)
			(2) 久垮 (一般竹子地，肥沃)
			(3) 格芦 (细竹子地，不太肥沃)
3. 竹木混交林香木朗			
第二类	斯蒙木朗 (水冬瓜树地)		
第三类	阿白木朗 (灌木、茅草地)		
第四类	结白 (亦称格鲁，园地)		

五、栽培作物及各月生产活动

独龙族的栽培作物，有玉米、粟、甜荞、苦荞、狗尾稗、鸡脚稗、小麦、燕麦、青稞、陆稻、芋头、高粱、马铃薯、天雄米、水稻、豌豆、黄豆、四季豆、黄瓜、南瓜、大蒜、青菜、萝卜、葱、韭菜、辣椒等，此外还栽培用于纺线织布的原料麻。独龙族以玉米为主食，称玉米为“达蓬”。据说玉米是80多年前从怒江流域传入独龙江的，在那之前的主粮是粟和荞麦。社区南北栽培作物略有不同，北部和中部不栽种陆稻，亦不种粟和高粱；南部较热，可栽培陆稻，而且栽培粟和高粱，陆稻栽培历史已有90年左右。水稻是1952年才学会栽种的，但社区北部气候较冷，亦不宜种植。



点播玉米（刘达成摄）

玉米主要种于“香木朗”和“斯蒙木朗”之中。栽种顺序先高山、后江边，播种期四五月份；成熟则江边最早，高山最晚，

江边八九月吃青，十月收获，高山可延至十一月，甚至十二月收获。玉米地中可间、套种粟、高粱、天雄米、马铃薯、豆类和瓜类等，一块地间、套种作物多者近十种，与景颇族“百宝地”类似。

粟可间种于玉米地中，亦可单独栽种。一年可种两季，第一季开春播种，六七月收获，是青黄不接之时的度荒粮食；第二季五六月种，十一月前后可食。

荞有甜荞和苦荞，单独种植，一年亦可栽种两季。春荞于春节前后栽种，六月至七月收获；冬荞八九月播种，十二月前后收获。

芋头与马铃薯同时于一二月间栽种。芋头种植方法比较特殊。地中树木砍伐之后即挖塘种下，至四月前后烧树，据说如此先种后烧芋头长得特别好。

麦子八九月播种，翌年春末收获。稗子六七月播种，秋天成熟。



挖地

作物播种期不同，砍地备耕时间也不同。总的看来，独龙江社区林地的砍伐比滇南山地要早。大春作物地从十月便开始砍树，先砍“目林木”之类高大茂密的乔木林，再砍“样伯”之类的灌木林，杂草地可临近播种期再砍芟，到三月初结束。七八月份，又开始小春作物的备耕砍地。

滇南的刀耕火种，烧地后至少要闲置半月以上才进行播种，而独龙族往往烧后即播，这是因为该区潮湿多雨，火灰可以迅速冷却的缘故。这一点怒江峡谷的怒族、傈僳族、勒墨人等也与独龙族相同。



织布

独龙族对于农事节令的掌握，完全根据其长期积累总结的物候历知识。他们也有年和月的概念，一年称为“极友”，一月称为“苏浪”；两次月圆为一月，两度大雪封山算一年；不少月份都有不同鸟鸣花开等自然特征作为标志。下面是洪俊、杨毓才等调查的独龙族的历法和各月生产内容。

独龙族 12 个月的名称及生产活动调查之一：

“(1) 得则卡龙（意为人无农活可做）——山上有雪，男子

打猎女织布。

(2) 阿蒙龙 (意为草开始生芽) —— 山上有雪, 开始栽小麦、小米、青稞。

(3) 阿暴龙 (意为地上有草) —— 砍火山地, 种土豆。

(4) 奢久龙 (意为有些鸟开始叫) —— 砍火山地, 种南瓜等。

(5) 昌木蒋龙 (意为什么鸟都叫) —— 栽秧、种包谷、鸡脚稗等。

(6) 阿累龙 (意为出竹筍) —— 栽秧、薅草、挖贝母、捕鱼等。

(7) 布安龙 (意为麦子可吃, 竹筍光了) —— 挖贝母结束, 薅草、捕鱼结束。

(8) 阿送龙 (意为山上松叶开始黄了) —— 种荞子, 吃青包谷、瓜类, 收小米。

(9) 阿长母龙 (意为山上下霜树叶黄了) —— 收包谷, 砍草。

(10) 曹罗龙 (意为稗子、包谷收了) —— 山上有雪, 收包谷搭包谷架。

(11) 总木加龙 (意为各种粮食收完) —— 山上有雪, 收鸡脚稗等。

(12) 力哥龙 (意为江水清且小) —— 江边有雪, 找柴, 狩猎。”^①

独龙族 12 个月的名称及生产活动调查之二:

^① 云南省编辑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二), 1 版, 30 页,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5。

独龙族各月称谓、意义及生产活动汇总表^①

类别 月份	独龙 称谓	意 义	生 产 活 动
1月	阿猛	过雪月	大家休息，个别户种早洋芋。
2月	阿薄	出草月	山草开始生长，大量种洋芋。
3月	奢久	播种月	开始播种小米、芋头、棉子等作物。
4月	昌木蒋	花开月	桃花开，鹤集中鸣叫，播种完毕。
5月	阿石	烧火山月	大量烧火山，停止下种。
6月	布昂	饥饿月	存粮吃光，荒月，大量采集野粮。
7月	阿茸	山草 开花月	薺草，采野粮。
8月	阿长木	霜降月	山草被冻死，开始收庄稼。
9月	单罗	收获月	收获小米、包谷、稗子、荞子。
10月	总木甲	降雪月	收获完毕，储粮，山巅降雪。
11月	勒梗	水落月	河水降落，找冬柴，砍苦荞，准备过冬。
12月	得则砍	过年月	又叫“罗奢什腊”，妇女砍活麻、织麻布、跳牛舞。

^①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版，28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

第三章

比較研究



第二章里，介绍了五个社区的刀耕火种实态。通过对这几个典型的刀耕火种社区的了解，可以感受到刀耕火种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内涵之丰和外延之广肯定会超出一般人的想像。然而，不管刀耕火种多么复杂，究其实质，可以说只是反映了一种关系；究其过程，则是一连串动态的演变。什么关系？那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一点，即山地民族与森林的关系。什么样的动态演变？是人地矛盾不断激化又不断缓和的动态演变，也可以说是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不断危机、失衡又不断调适、平衡的动态演变。那么，山地民族与森林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人地矛盾的动态演变的过程又是怎样的状况呢？本章将通过对轮歇类型、耕作技术、迁移方式、山地和坝区、人类生态系统的比较，以阐明这一关系和演变过程。

第一节 轮歇类型的比较

轮歇，顾名思义，“轮”是指“轮换”或“轮耕”，“歇”就是“休闲”或“抛荒”，意即耕种与休闲交替进行，是一种用养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刀耕火种是典型的轮歇农业，轮歇是刀耕火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连续耕种不使土地休闲，土地上长不出树木，不能砍树烧地，也就没有刀耕火种可言。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部分里，曾经按轮作方式和休闲方式对刀耕火种进行过分类。按轮作方式分，有无轮作、短期轮作和长期轮作三种类型；按休闲方式分，则有自然休闲和人工造林休闲两种类型。而轮作方式加休闲方式，就是轮歇方式。如果按轮歇方式分类，那么刀耕火种又可以分为无轮作轮歇、轮作轮歇和人工造林轮歇三种类型。下面将从无轮作轮歇类型开始，考察各种轮歇类型的特

征、差异和联系。

一、无轮作轮歇类型

所谓无轮作轮歇类型，就是一块土地只种一季作物便抛荒使之长期休闲的轮歇方式。这是云南刀耕火种民族的传统的、基本的轮歇方式。对土地进行规划，并进行有次序的轮歇，是这一轮歇类型的显著特征。实行这种轮歇方式的村寨，都将本村寨的土地规划为若干区域，全体村民每年集中砍种一个区域，年年更换新地，顺序轮耕，循环利用。规划区域数目的多少，主要取决于人口和土地面积的多少，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通常是把土地规划成 10 余个甚至 20 余个区域，这样便能使每个区域抛荒之后都有足够的休闲时间，从而达到恢复森林植被的目的。不管规划的区域是多是少，村民们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划的顺序进行砍种，任何人要单独随意地去选择土地砍种，除了没有纳入规划的土地之



澜沧江畔的无轮作刀耕火种地

外，是绝对不允许的。云南从事刀耕火种的民族，都曾经长时期地按这种轮歇方式经营，他们把这种轮歇方式叫作“种懒活地”。目前这种轮歇方式依然存在，例如前面一章所介绍的盈江县卡场地区的景颇族和勐海县布朗山、西定、巴达、打洛的布朗族，就是典型的只从事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的民族。此外如德昂族、独龙族、傈僳族、怒族、佤族、拉祜族、哈尼族、基诺族、苗族、瑶族等民族，也都是曾经从事过或还在部分从事着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的民族。



勐腊县麻木树地区的无轮作刀耕火种地

一块森林地，很辛苦地砍伐树木，反复焚烧，开辟成农地，为什么只种一季作物便抛荒呢？通常认为是土地肥力降低的缘故，这样看未免过于简单了。无轮作轮歇方式，至少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优点：

首先，只种一季作物便使土地休闲，有利于树木再生。耕种的时间越短，保留于地中的树根就越不容易枯死，抛荒之后，树木就会迅速恢复生长。我们在调查中常常可见，只种一季作物的土地，经过多雨的夏季，在秋天农作物收获之时，被砍伐的树桩

大多发出许多枝叶，基本上又是一片葱绿了。而且，按照传统的方式，土地抛荒之后，必须休闲 10 年以上。在亚热带和热带山地，如果有 10 年以上的休闲期，地表就可以恢复森林植被；而如果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佤族等在耕种的同时就种上速生的水冬瓜树的话，那么只需休闲六七年便可成为茂密的树林。只种一季作物便使土地长时期地休闲，可以说是维护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平衡和良性循环的根本措施。

其次，实行无轮作轮歇方式可以有效地防止杂草蔓延，可以节约很多劳动力。由于每年都砍伐新的森林地，树木多，焚烧火势猛烈，地表土壤烧得透，杂草和草籽大部分被烧死，所以在作物生长过程中杂草比较少，不用花太多的力气去除草，有的甚至可以不除草。凡调查过刀耕火种的人都知道，在热带、亚热带山地进行较长期的轮作或者实行不休闲地连续耕种，就会产生严重的草害。为了保证收获，人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去进行中耕除草。而陆稻地谷草混杂，除草可以说是最辛苦的农活。所以云南很多刀耕火种民族把无轮作轮歇地叫作“懒活地”。所谓“懒活地”，意思是耕作省力的地。为什么省力？草少是主要原因。



景洪市基诺山的无轮作刀耕火种地

第三，无轮作轮歇方式不仅杂草少，而且虫灾也少。烧地烧死杂草，也会烧死土壤中的害虫。

第四，由于耕种时间短，植被恢复快，可以大大减少水土的流失。

第五，每年抛荒旧地更换新地，保证了地力常新；新地树多，有机物堆积层厚，焚烧之后火灰多，土壤疏松；火灰呈碱性，热带、亚热带的红壤一般呈酸性，火灰有改良土壤的功效。由于以上几个原因，可使农作物的产量高于轮作地和一般旱地。

从以上五个优点来看，无轮作轮歇方式无疑是山地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和生态条件之下利用森林资源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只有认识到它的这些优点，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种轮歇方式曾经被人们长期地、广泛地利用。

然而，无轮作轮歇类型的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也和别的类型的人类生态系统一样，并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化的、活动的，经常发生平衡与不平衡矛盾运动的动态演变的系统。为什么是动态的？那是因为系统的构成要素都是变量而非定量的缘故。具体而言，在云南西南部山地，如果一个村寨能够使每一个人拥有 40 亩以上的土地（1 年 1 人耕种 4 亩，



红河沿岸的刀耕火种地



福贡县木古甲村怒族的无轮作刀耕火种地

抛荒后使土地至少休闲 9 年) 的话, 那么就能够稳定地按照无轮作轮歇方式从事刀耕火种, 就能够保证这一系统的平衡和良性循环。如果因为人口增加或土地减少而导致人均拥有土地不足 40 亩的话, 虽然仍可以维持系统的平衡与良性循环, 然而如果遇到自然灾害等情况, 就可能出现危机。如果人均拥有的土地面积下降到 30 亩以下, 土地抛荒后休闲期缩短到 7 年, 那么系统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 而且系统的调节机制也将变得十分脆弱。再假设人均拥有土地面积下降到 25 亩甚至 20 亩以下时, 土地休闲期只有五六年, 树木难以生长, 遍地杂草滋生, 那么无轮作轮歇方式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这一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就将陷于崩溃。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 在适应森林生态环境、保护森林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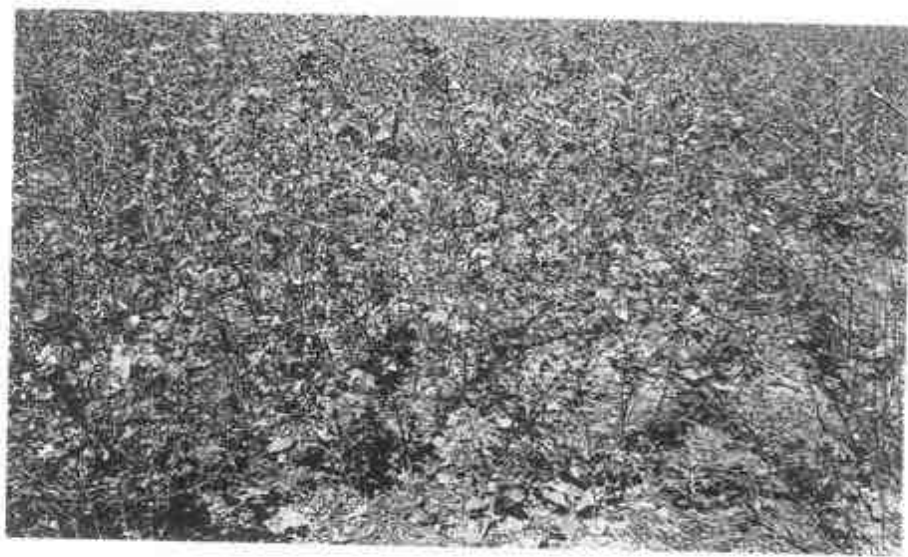
方面，具有长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和知识，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缺乏限制自身人口过快增长的措施，而且他们亦不可能阻止时代的改变和移民的涌入，因而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或迟或早总要发生。而当生态环境和生态条件趋于恶化，无法再按照无轮作轮歇方式从事刀耕火种的时候，他们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改善生态环境，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生存困难呢？

二、轮作轮歇类型

当人口数量增加，土地资源减少，导致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陷于崩溃的状况之时，常见的取代方式，就是选择轮作轮歇类型的刀耕火种。轮作可以分为短期轮作（2年至3年）和长期轮作（5年以上）两类。轮作轮歇类型的优点，是可以节约土地，轮作时间越长，可节约的土地就越多。例如实行轮作3年、休闲15年的轮歇方式，每个人只需要24亩的土地便能够正常地循环运转，与无轮作轮歇方式人均需要土地40亩相比较，人均所需土地面积可以减少16亩；而如果采用5年轮作、休闲20年的轮歇方式的话，那么每个人只需要20亩土地，只相当于无轮作轮歇方式所需土地的一半，效果是十分可观的。当然，这只是理论的推算，在实际情况下，有一些土地并不适宜轮作。然而，每个农户哪怕只有部分可轮作的土地，也可以大大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正因为如此，近50年以来，轮作轮歇方式在很多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例如前章介绍过的西盟佤族村寨打洛，该村佤族把土地分成三类：一类是实行无轮作轮歇方式的“麻卡”地；二类是过去种罂粟，现在种小麦，分布海拔比较高的“赔龙”地；三类则是实行轮作轮歇方式的“麻太”地。“麻卡”地过去只种一季作物便抛荒休闲，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土地资源不足的情况日益严重，故而被迫



景洪市郊山区的轮作刀耕火种地



景洪市曼贺冬村哈尼族轮作栽种的棉花

改为耕种2年、休闲6年的短期轮作轮歇方式。“麻太”地一般也只是轮作2年至3年、休闲7年。轮作作物有陆稻、棉花、龙爪稗、荞、豆、玉米等。独龙族把土地分成四大类，除了经营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之外，也实行2年至3年的短期轮作。轮作作物有芋头、粟、荞、麦、稗、豆、玉米等。基诺族的巴卡和巴亚两个村寨有很高的轮作技术，他们把土地分为三类，第三类地不

适宜轮作，第二类地适宜进行二三年的轮作，第一类地则可以实行五六年的长期轮作。轮作之物有棉花、陆稻、豆、苏子、芝麻、花生、玉米等。其他一些山地民族的轮作方式如下表：

云南几个山地民族的轮作轮歇方式

族名	地点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休闲期 (年)
景颇族	潞西县 三台山	豆	陆稻	玉米	陆稻		10~20
		豆、苏子 或芝麻	陆稻	陆稻	荞或豆	陆稻	10~20
	瑞丽县户 育山区	陆稻或 玉米	陆稻				8~10
		苏子或 棉花或豆	陆稻				7~10
	陇川县帮 瓦地区	棉花或豆	陆稻	陆稻或 休闲			7~10
		棉花	陆稻	黄豆			7~10
德昂族	潞西县 三台山	黄豆	陆稻	陆稻			3~8
		苏子或荞	陆稻				3~8
	镇康县 大寨乡	苏子	陆稻	陆稻或荞			40~50
拉祜族	澜沧县 糯福乡	陆稻	陆稻				3~5
		陆稻	陆稻	陆稻	陆稻	陆稻	5
	勐海县布 朗山等地	陆稻	陆稻	玉米或 休闲			7~8
瑶族	金平县、 屏边县	棉花	陆稻	棉花	陆稻或玉 米或休闲		10余年
		陆稻	玉米	棉花	陆稻	玉米	10余年
	勐腊县 瑶区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玉米	10余年
		陆稻	陆稻	陆稻			10余年

(续上表)

族名	地点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休闲期 (年)
哈尼族	勐海县布	陆稻	陆稻				10余年
	朗山区	棉花	陆稻				7~10
	勐海县格 朗河地区	陆稻	陆稻	陆稻			10余年
		陆稻	陆稻	陆稻	陆稻	陆稻	10余年
		棉花	陆稻				7~10余年



景洪市基诺山轮作栽种的陆稻

如前所述，和无轮作轮歇类型相比较，轮作轮歇类型的最大优点是节约土地。然而轮作也有两大缺点，第一是劳动力投入多，第二是草灾严重。

从事轮作轮歇类型的刀耕火种，其每年投入的劳动量大约是从事无轮作轮歇类型的刀耕火种的两倍以上，这是笔者在很多地方调查获得的共同结论。轮作为什么费力？那是因为土地连续耕种会造成地力下降、土壤板结，所以必须使用锄具或犁具反复耕土，而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一般情况下却没有必要使用锄、犁耕土。此外，轮作地杂草多，而且轮作时间越长杂草越多，除草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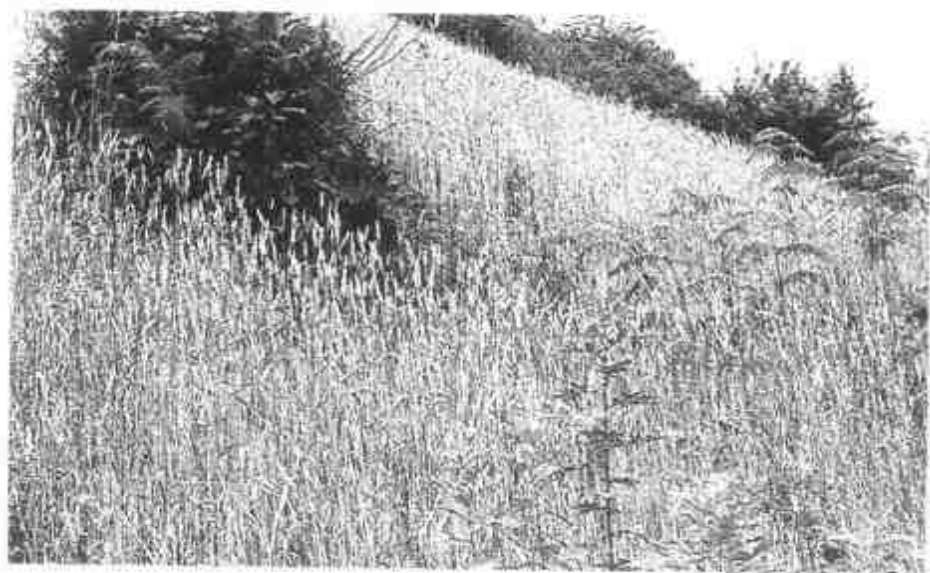
勐海县南糯山哈尼族轮作栽种的蕹苡和芋头

须花费很多时间和大量劳动力。下面的统计资料清晰地反映了上述情况：

基诺族无轮作刀耕火种和轮作刀耕火种劳动日的比较

无轮作刀耕火种 (20 亩)		轮作刀耕火种 (20 亩)	
生产过程	劳动日	生产过程	劳动日
伐木	20	伐木、芟草	20
清理防火道	3	焚烧、反复拣烧	8
焚烧	1	耕作 { 犁耕 锄耕	16 40
多次拣烧	10	整地	50
播种	20	播种 { 犁耕 锄耕	7 40
除草	40	除草	180
收割、脱粒、搬运	120	收割、脱粒、搬运	120
总计	214	总计	401 ~ 458

杂草太多，可以说是一种灾害，而且是一种最常见的灾害。西盟县有一个统计数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该县 1984 年因为杂草太多造成颗粒无收的土地面积就达到 12 000 余亩。



贡山县城郊傈僳族轮作栽种的小麦

亚热带、热带山地杂草的繁殖滋生状况，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这里有必要介绍王益谦和思茅地区农科所调查的两份资料。

根据王益谦 1985 年 4 月至 5 月间的调查，思茅地区（属滇西南刀耕火种带范围内）有杂草 51 科 237 种，仅澜沧县就有 12 科 39 种。其中，对陆稻危害最严重的是禾本科杂草唐草、狗尾草、蟋蟀草、稗草、双穗雀稗、狗牙根；莎草科杂草香附子和荆三棱；阔叶杂草藿香蓟、辣子草、酸浆草、蕨菜、田旋花和三叶鬼针草等。每平方市尺（约 0.33 平方米）陆稻土地面积上一般有 200 株至 300 株杂草，最多达 500 株。苗草比一般为 1:10 至 1:15，最高达 1:30 至 1:40。下表是 1985 年思茅地区农科所调查的数据。

陆稻出苗后 40 天的杂草数量

种类 数量	禾本科草		莎草科草		阔叶草		合计
	(市尺) ²	占总草%	(市尺) ²	占总草%	(市尺) ²	占总草%	(市尺) ²
苗数	209	63.5	96.5	29.3	23.5	7.2	329
鲜重(克)	387.75	86.5	38.45	8.6	22.25	4.9	448.4

轮作轮歇类型使用锄具和犁具反复耕作土地，容易导致地中残留的树桩枯死；轮作使土壤长期裸露，水土流失严重；轮作地杂草多，土地抛荒休闲后短期内难以长出树木，而如果休闲期太短，那么就将变成杂草地。由于轮作轮歇类型对生态环境具有破坏性，因而很多山地民族过去一般不从事轮作，有谁贸然从事轮作，还会遭到邻里的批评和反对。例如西盟佤族，在一些人少地多可以进行无轮作轮歇方式的村寨，如果有谁实行轮作，人们就



福贡县山区傈僳族轮作栽种的高粱

会指责他是“破坏分子”，因为那样做会使杂草滋生并蔓延开去。只是在人口增加，土地资源不足，难以维持生计的时候，一些民族才不得不采用轮作轮歇方式。然而情况也不绝对如此，例如第

二章中介绍的盈江县卡场的景颇族和勐海县的布朗族，就坚持实行无轮作轮歇方式而不采用轮作轮歇方式。人地关系发生矛盾，生活出现困难，则开拓水田，以弥补刀耕火种产出的不足。有趣的是，在绝大部分经营刀耕火种的农民都认为无轮作轮歇方式省力而且具有良好的生态效益的同时，也有极少数农民只愿意从事轮作方式而不愿意从事无轮作方式。例如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瑶区的瑶族，虽然是同一个地区的同一个民族，然而对于轮歇方式的选择竟然也背道而驰，并各持己见。多数村寨选择无轮作方式，可是有几个村寨就不愿意选择无轮作方式而只选择轮作，其理由是无轮作方式从砍树到焚烧这个阶段需要晴朗的天气，如果天公不作美，连续下雨的话，砍伐的树木干不了，焚烧不成，便会延迟播种的时节，导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他们认为那是靠天吃饭的懒汉生产方式，所以即使森林土地很多，也不愿意按此方式经营。他们的方法是在开辟农地之时，把树连根除去，使土地不再生长树木，以便于使用犁具耕作，从而能够及时播种，不误农时。这样做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经他们耕种后抛荒的土地，都变成了茅草地，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



景洪市曼贺冬村哈尼族轮作栽种的玉米

三、人工造林轮歇类型

人工造林轮歇类型，也被叫做粮林轮作轮歇类型。这种轮歇类型也和轮作一样，是无轮作轮歇类型的演变形态。即在人口增加，土地减少，轮歇周期缩短，森林资源遭受破坏，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无轮作刀耕火种的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有的民族选择了轮作，也有一部分民族选择了人工造林的轮歇方式，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在轮作的同时亦进行人工造林。人工造林轮歇的基本方法，就是在抛荒休闲的土地上栽种树木。因为人工造林比天然长得快、林相好，可以缩短土地的休闲期，从而达到节约土地的目的。举例而言，如前所述，按1人1年砍烧4亩土地，10年1个轮歇周期计算，1个人需要的土地总数是40亩。如果土地一经抛荒休闲便栽种树木，把休闲期缩短到8年，那么1个人需要的土地总数便下降到32亩；如果休闲期缩短到5年，那么就减少了一半，只需要20亩了。而从实际的情况看，人们通常都会选择生长很快的树木栽种，例如水冬瓜树就是最常见的人工造林树种。这种树四五年就可以长成直径十余厘米、高达七八米的大树，而且其根部有根瘤菌，可以吸收氮素，对于增加土地的肥力有显著的效果。所以喜欢栽种这种树木的民族都说，不管是多么贫瘠的土地，只要栽种水冬瓜树，都会变得肥沃，都能够有好收成。除了栽种水冬瓜树之外，有的民族还栽种经济树木漆树和油桐等，也有栽种松树、杉树等用作建材树木的。

在轮歇地中进行人工造林，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方法。例如第二章第一节介绍过的盈江县卡场地区的景颇族，其造林方法是将于秋天到山中采集的水冬瓜树的籽种掺拌于陆稻籽种之中，四五月份把它们一块播种到地里，使树苗与禾苗同时生长，秋天收割陆稻时，地里的水冬瓜树已是一片翠绿，抛荒休闲五六年或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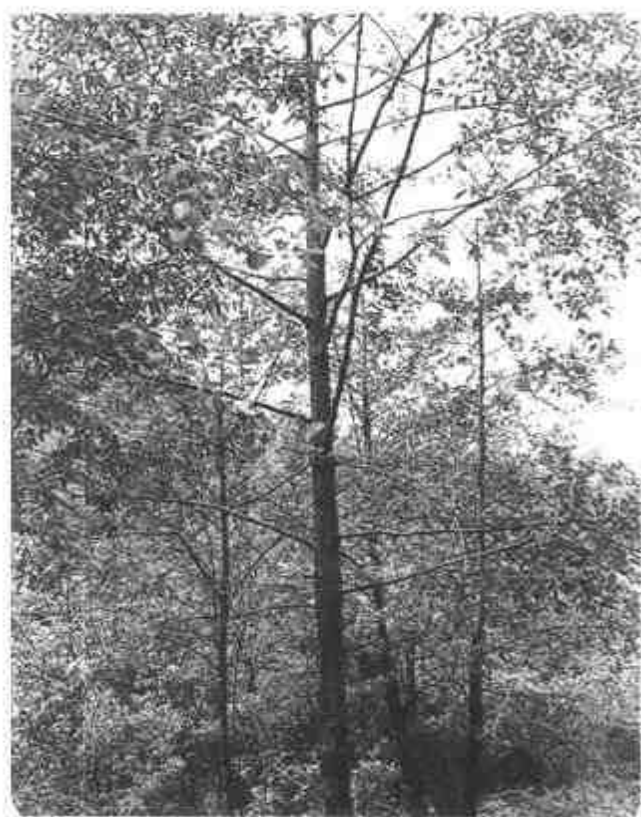
八年，便可以砍伐焚烧树木，播种谷物。正因为卡场景颇族具有人工造林的优良传统，所以才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成为云南目前少数几个无轮作刀耕火种地区之一。



独龙江独龙族栽种水冬瓜树的轮歇地（木基元摄）

独龙族栽种水冬瓜树的方法和卡场景颇族不同，他们不是播种籽种，而是栽种树苗。水冬瓜树秋天籽种成熟掉落，人们在落籽之前先到水冬瓜树林中烧去树下的杂草，这样树籽落到地上后便很容易发芽生长。冬末春初，独龙族人到山里采集水冬瓜树苗，将其集中泡于水沟之中，待清明时节便移栽到抛荒休闲的地里。栽种树苗无疑比播种树籽更能缩短土地的休闲时期，一般休闲五六年甚至三四年后便可再次砍种。

聚居于怒江州泸水县洛本卓乡的勒墨人（白族支系），和该州的独龙族和怒族一样，过去也从事种植水冬瓜树的刀耕火种，不仅如此，由于善于利用漆树，所以又发明了栽种漆树的轮歇方式。栽种漆树，要先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上选择比较肥沃的土地，把树桩清除，晒干焚烧，用锄头翻土，并施鸭粪。二三月



独龙族栽种了五六年的水冬瓜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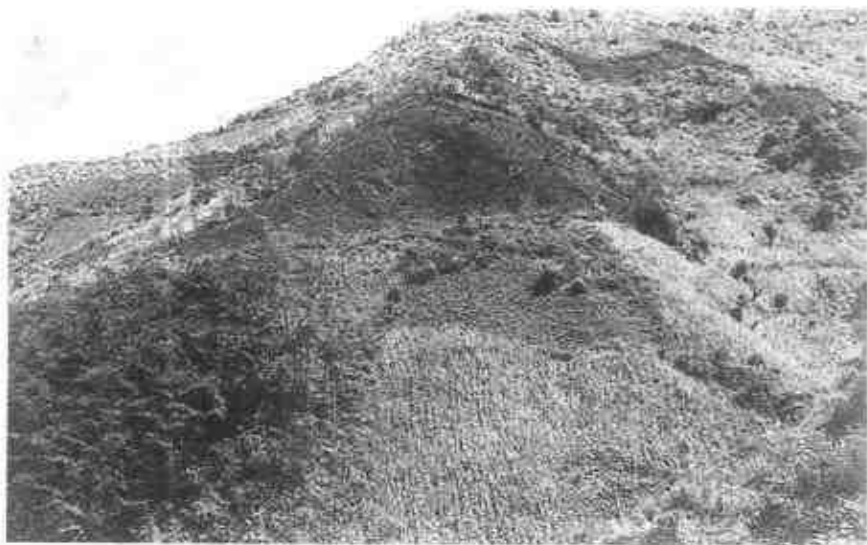
间，把漆树籽撒播到地中。到第二年的3月，漆树苗长高到50厘米左右，便移植到海拔1000米~1900米地带的轮歇地中。1亩比较肥沃的土地，一般栽种40株~50株漆树，比较贫瘠的土地，则可栽种50株~60株。为了增加土地的肥力，也常常同时栽种一些水冬瓜树苗。四五月份，又在漆树和水冬瓜树苗的株行距中种上玉米等农作物。农作物可以连续栽种三四年，此后因为漆树和水冬瓜树长大了，便停止栽种玉米，但是根据情况仍然可以栽种粟或南瓜等作物。水冬瓜树一般生长7年后砍伐，枝叶烧于地里，主干可以用作房屋和家具的木材。8年后漆树开始割漆，每株漆树每年可得漆乳14公斤左右。漆树可以连续割漆七八年，好的可达10余年。树木老化之后，便砍倒烧尽，再栽新苗。



怒江州怒族和勒墨人（白族支系）等栽种的漆树

四、草地轮歇类型

草地轮歇类型，是指轮作2年至4年、休闲2年至4年的轮歇方式。由于休闲期太短，休闲地里长不出树木，只生长杂草，再次耕种时已经不像传统的刀耕火种那样可以砍树烧树，而是芟



怒江峡谷的草地轮歇地

草、烧草，所以叫做草地轮歇。目前，在云南山地，草地轮歇农业分布很广，远远多于森林轮歇农业，在云南农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么多的草地轮歇农业呢？

人口迅速增长，森林农用地急剧减少，是草地轮歇农业不断扩大的原因。云南西南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口比较稀少，而且疾病流行，被称之为“瘴疠之区”。据地方志等文献记载，叫作“瘴疠”的疾病很多，有交头瘴、黄茅瘴、冷瘴、热瘴、哑瘴等等，危害极大。疟疾为瘴害之首，此外还有鼠疫、痢疾、霍乱等十几种传染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对于防治热带传染病的工作极为重视，在各地设置了防疫站和卫生院，并派遣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宣传预防疾病的知识和进行改变不良卫生习惯的教育工作，同时免费供应各种预防药品。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有效地控制了疟疾、痢疾、鼠疫、天花等瘴疠，结束了历史上常常发生的瘴疠肆虐、尸陈遍野、万户萧疏、于村废弃的悲惨景象。所以自50年代后期开始，各山地民族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下表列举了几个主要的山地民族的人口增长数字：

云南山地民族5次人口普查的统计^①

民 族	1953年(人)	1964年(人)	1982年(人)	1990年(人)	1995年(人)
苗 族	359 992	427 496	752 122	896 712	918 100
彝 族	1 839 770	2 122 358	3 352 732	4 054 177	4 195 600
瑶 族	72 317	85 856	147 147	173 114	179 100
哈尼族	452 353	624 527	1 058 386	1 248 106	1 296 300
傈僳族	219 757	260 200	467 869	557 144	585 600
佤 族	286 161	200 237	298 516	347 738	360 200

^① 资料来源于云南省统计局。

(续上表)

民 族	1953 年(人)	1964 年(人)	1982 年(人)	1990 年(人)	1995 年(人)
拉祜族	121 408	193 860	301 131	408 203	412 800
景颇族	102 811	57 222	92 876	118 322	121 900
布朗族	18 833	40 271	58 328	81 768	85 000
普米族	12 458	14 293	24 141	29 302	31 000
怒 族	12 736	15 041	22 837	26 583	27 000
德昂族	2 926	7 252	12 274	15 399	17 000
独龙族	2 501	3 085	4 599	5 536	6 000
基诺族	3 860	5 903	11 954	17 843	18 000



澜沧县拉祜族的草地轮歇地

除了少数民族自身人口增长之外，还有来自内地的移民。下面再看几个主要的刀耕火种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

德宏州 1952 年农业人口为 320 367 人，1987 年增长为 711 708 人，1995 年增长到 829 100 人；

怒江州 1953 年农业人口为 195 718 人，1985 年增长为 359 837 人，1995 年增长到 398 800 人；

西双版纳州 1949 年人口总数为 199 300 人，1986 年增长为

705 934 人，1995 年增长到 817 800 人；

思茅地区 1950 年总人口为 1 044 322 人，1986 年增长为 2 116 753 人，1995 年增长到 2 258 900 人。

从以上的统计资料不难看出，40 多年来，云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和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十分惊人的。



景洪市安麻老寨拉祜族的草地轮歇地

人口的过速增长，必然会带来土地资源不足的困难。加之建立自然保护区、划定国有森林、设立农场、修筑公路、大量种植橡胶树等原因，山地民族能够利用的农地比原来明显减少了。

很多山地民族服从国家和自然保护的需要，让出了大面积的森林，或者举寨搬迁到保护区之外，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设立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保存生物多样性等，是十分必要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不断有大批移民从中国内地的湖南、四川等省迁到云南西南部定居。这些移民直接迁往山地之中的数量不多，绝大部分作为农场工人安家于低地。然而由于盆地为傣族所居，所以农场移民只能向盆地边缘的低山山地发展。移民虽然居于低地，但是他们盖房所需的木材以及做饭、烧制砖瓦、石灰等的燃料，其实是取自山地，对山地森林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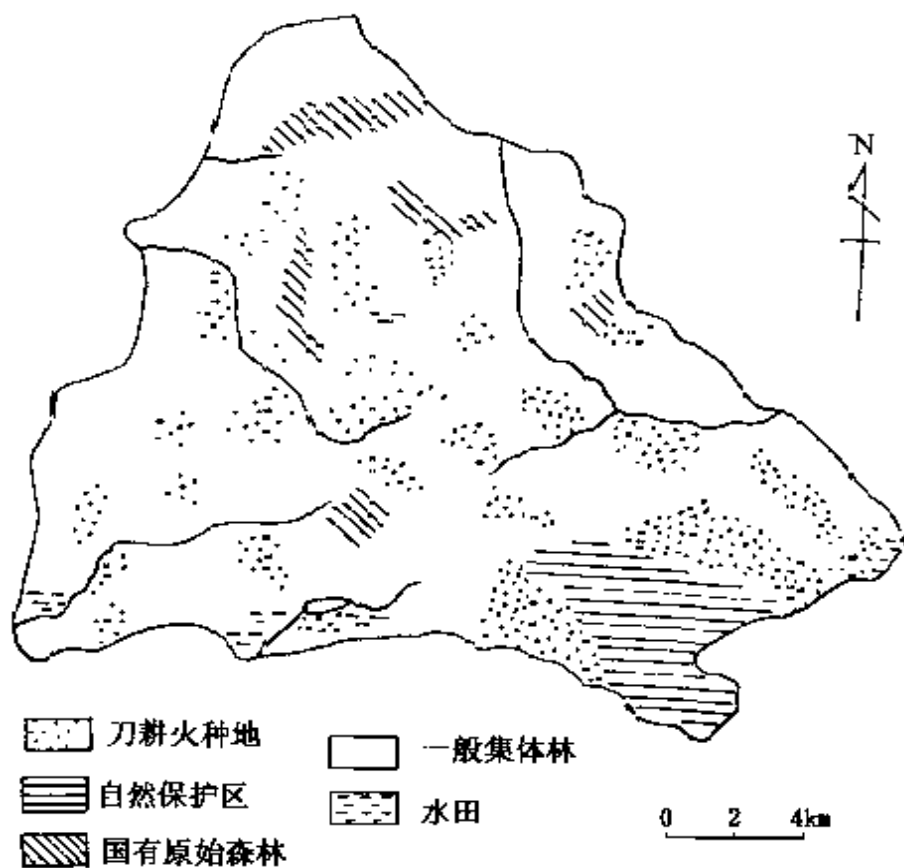


勐海县格朗河乡哈尼族的水田和草地轮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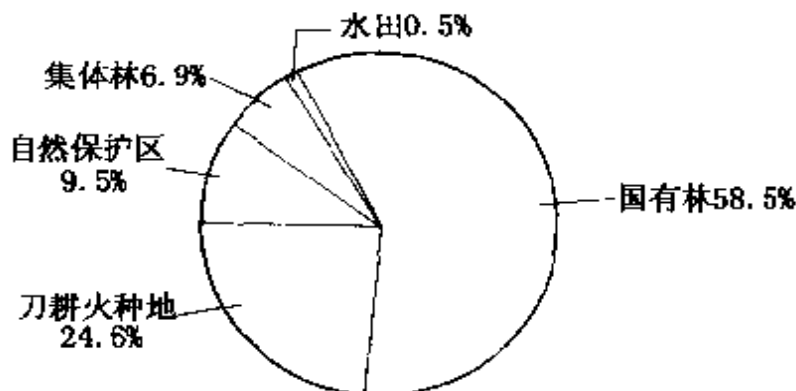
80年代初期，为了扩大森林保护面积，国家颁布了新的森林土地管理法。新法规把国土资源划分为国家森林、以村寨为单



位的集体利用的森林和农业用地三大类。经过严格细致的土地划分，山地民族的农地面积进一步减少了，很多村寨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按照传统的轮歇方式从事刀耕火种。以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基诺乡为例，该乡 1983 年统计全乡总面积为 610 平方公里，约合 91 万亩（据说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的面积要比这大）。1983 年确定位于该乡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的面积为 86 251 亩，约占全乡总面积的 9.5%；国有森林划定 533 800 亩，约占全乡总面积的 58.5%；集体林为 63 000 亩，约占全乡总面积的 6.9%；农业用地（包括农户的薪炭林和用材林）为 224 316 亩，占全乡总面积的 24.6% 左右；此外还有水田 4 244 亩，约占全乡总面积的 0.5%。



基诺乡土地分布示意图 (1988)



基诺乡地类比例图 (1991)

基诺族目前可以利用的土地，不足全乡土地的 1/4，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相比，差别是明显的，所以有的村寨的土地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例如巴亚中寨，1985 年有农户 40 户，277 人，全村的轮歇地大约为 2 600 亩，人均有地只是 9.39 亩，每人每年耕种 2 亩至 3 亩，平均轮歇周期只有 3 年至 4 年。亚诺寨轮歇地总面积约为 4 100 亩，1985 年有农户 76 户，339 人，人均有地约 12 亩，平均轮歇周期亦不过 4 年至 5 年。巴卡小寨轮歇地总面积大约有 1 320 亩，1985 年有 50 户，255 人，人均 5.2 亩，平均轮歇周期仅为 2 年至 3 年。

盈江县卡场乡景颇族的土地状况似乎要比基诺乡好一些，1985 年该乡各生产队的土地轮歇周期统计如下表：

 卡场乡各队土地轮歇周期统计表^①

大队名称	小队名称	轮歇地面积 (亩)	轮歇地周期 (年)
卡场大队	卡场	980	9
	老卡连	825	5
	麻竹、岭干	830	9
	咱巴石	400	4

^① 摘自 1985 年卡场乡统计室统计的有关资料。

(续上表)

大队名称	小队名称	轮歇地面积 (亩)	轮歇地周期 (年)
卡场大队	小新寨	(属卡场)	
	景颇 新郎	3 800	10
	汉族 新郎	1 100	4
	傈傈 新郎	(属景颇新郎)	
	龙洞	2 000	10
五排大队	卡连	7 000	10
	五排	14 102	8
	景颇 河底	12 000	8
	傈傈 河底	17 291	12
	石竹河	8 667	10
	奔龙苦	12 481	11
	余德寨	(属奔龙苦)	
乌帕大队	乌帕一队	15 722	7
	乌帕二队	(属乌帕一队)	
	景颇 罗斯塘	10 562	9
	汉族 罗斯塘	(属景颇罗斯塘)	
	景颇 麻迈	12 481	10
	傈傈 麻迈	(属景颇麻迈)	
	丁林寨	7 984	8
草坝寨大队	草坝 一队	6 702	8
	草坝 二队	(属草坝一队)	
	卖东	7 487	4
	小拱老	9 452	8
	无雅	23 728	8
	盆都	2 801	10
	东朋洋一队	13 982	5
	东朋洋二队	(属东朋洋一队)	
	东朋洋三队	6 750	3
	腾那拱	10 963	7

从这个统计表可知，迄 1985 年，卡场乡轮歇周期为 12 年和 11 年的村寨仅剩 2 个，10 年的还有 6 个，9 年的 1 个，8 年的 6 个，7 年的 2 个，5 年的 1 个，4 年的 2 个，3 年的 1 个。轮歇周期下降到 7 年以下甚至 5 年以下，土地抛荒之后没有足够的休闲期，变成杂草地，地力恢复不了，再次耕种产出减少，陷于恶性循环的状态之中。

以上谈了四种轮歇类型。无轮作轮歇类型，是刀耕火种的最基本、最典型、也是绝大多数山地民族最愿意经营的一种类型。人少地多是这一类型存在的条件。在云南，这一类型盛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目前，我们已无从调查这一类型产生的时代，它肯定经历过漫长的时期。然而，我们却可以判断，它并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形态，因为在原始农业的早期阶段，人类尚不可能如此自觉地去实行有秩序的轮歇。人们开垦出一块耕地之后，很自然也希望一直耕种下去，只是在遇到太多的杂草和土地肥力急速下降的困难而无法解决的时候，才不得不抛荒土地。而当人们反复观察、实践，总结经验，进一步认识到只耕种一年便抛荒才能获得最佳的生态和经济效益，抛荒休闲期最好在 10 年以上并建立起循环轮歇的规则之后，无轮作轮歇类型才被确立起来。

轮作轮歇类型和人工造林轮歇类型，是云南刀耕火种的两种重要的类型。然而从变迁的角度看，它们却是无轮作轮歇类型的演变形态。为什么会产生轮作和人工造林的技术呢？那是因为这两种技术可以降低人均利用土地的面积，可以一定程度地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和生存的困难。

草地轮歇类型是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失去平衡，陷于崩溃的结果。这一类型尽管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基本特征——轮歇和烧垦，然而由于它不能够按照传统轮歇所要求的年限进行，因而导致生态的破坏，从而使刀耕火种走向衰落。

以上四种轮歇类型的交替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刀耕

火种民族)与自然(森林)的关系及其演变的历史。通过对轮歇类型的考察,我们看到了生态环境是怎样从广袤、茂密的森林逐渐变成荒凉、贫瘠的草地,也看到了刀耕火种民族是怎样从富饶、优裕走向贫困和危机。一部刀耕火种的轮歇史,便是一部森林民族的人类生态史。

第二节 耕作技术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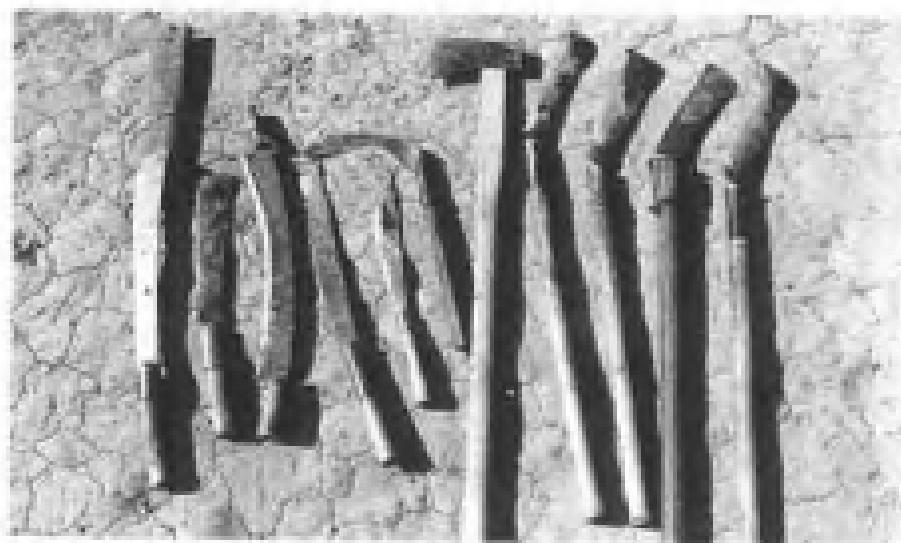
刀耕火种有多种轮歇类型,不同的轮歇类型又有与之相应的不同的耕作技术,即无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和草地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一、无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都曾经营过或还在经营着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他们的耕作技术类似,技术特色大致体现于刀耕、烧地(火耨)和点播这三点之上。

1. 刀耕

所谓“刀耕”,不过是中国农史学界的习惯用语,是相对于“锄耕”和“犁耕”的说法,其实并不存在“耕”,指的就是砍伐树木。刀耕火种的伐树季节,因民族、因自然条件而有所差别,大致在12月至3月(公历)之间,而以2月为主。一般而言,北部比南部砍得早,高地比低地砍得早。在农事活动不忙的情况下,早一点砍伐比较好,那样可以多一些时间让树木干燥,有利于焚烧。然而也并非越早越好,如果砍得太早,荒置时间过长,那么就容易孳生杂草。



景洪市安麻老寨拉祜族的生产工具



澜沧县南段村拉祜族的砍刀

砍树通常要砍两遍。第一遍大都从下往上砍，树向下方倒，便于操作；也有从上往下砍的，那是想利用上方倒下的树木把下面的小树压倒。小树一般是挨着地皮砍，稍大的树木留下40厘米左右的树桩，以利其再次生长。大树一般不砍伐，只修去树枝。第一遍砍伐之时，由于地面有草和树叶覆盖，有些小树桩留得比较长，第二遍再将它们砍去。树木砍完之后要断树，即把树木砍短，越短越容易晒干和焚烧。断树要从上往下断，这样操作比较方便。

砍伐树木的工具，有铁斧和铁刀。砍伐大树用铁斧，铁斧有一般的长柄斧和十字柄斧两类。铁刀种类较多，有的民族男性、女性、成人、少年所用刀具的形状、大小都不一样。

2. 烧地

烧地在3月至5月间进行，以3月底4月初最为适宜。烧地和砍树一样，时间不宜过早也不宜过迟，过早烧成的火灰容易流失掉，而且杂草会乘势生长，过迟则会耽误整地和播种。

为了防止烧地时酿成火灾，烧地之前需要清理防火道。所谓防火道，就是把沿土地周边数米宽的地带中的茅草、树叶等全部清除干净，使火不容易蔓延到地外森林中。烧地之前要再次认真检查防火道，不能有丝毫的疏忽。点火一般先从高处点起，然后扩大到四周点火，使火从外往里烧。烧地时往往大家一齐出动，分派到地四周监视火情，防止发生火灾。

第一次烧地，不可能把树木全部烧尽，还要把残树余枝拾到一起再烧，如此反复进行。但是要注意变换位置，以免某个地方烧土过度，破坏土质。烧地之后，一些过长的小树桩又会露出来，还需要把它们齐地砍去。

在反复烧地的同时，还有整地的活儿。容易受山洪冲刷的地方，要挖掘排水沟（使水集于沟中流往坡下）；在坡陡的地方，打桩横栏树木，以阻挡土壤被冲刷，防止滑坡。最后，要把因

不够干燥而无法烧尽的树木拣到地外，如果土地距离村寨较近，则运回村寨作为柴薪使用。

3. 点播

土地焚烧和清理完毕便进行播种，播种时间因地区而异。在云南南部山地，3月栽棉花，4月种豆，农民的话叫做“3月棉花4月豆”。陆稻是南部地区的主要农作物，一般在4月至5月播种，先播高地、冷地，后种低地、热地。在云南的西北部的独龙江、怒江峡谷，主要的农作物是玉米，那里雨水多，4月底5月初才能烧地，烧地之后即马上播种。



勐腊县麻木树乡哈尼族的铲头点播棒和锥头点播棒

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采用叫做“点播”的播种方式。所谓点播，就是在地面挖穴放入籽种再覆盖上土壤的方法。挖穴的工具有小木锄、小铁锄、铁刀、竹棍、木棍、铁锥式点播棒、铁铲式点播棒等。滇西北独龙江、怒江峡谷的独龙族、怒族、傈僳族以



勐腊县麻木树乡哈尼族播种

及滇西德宏州的景颇族、德昂族，习惯使用小木锄、小铁锄、竹棍、木棍、铁刀进行播种。挖穴、放种、盖土可由一个人连续操作，也可以由两个人配合操作。滇南的佤族、拉祜族、布朗族、基诺族、哈尼族、克木人等，使用的播种工具是铁锥和铁铲式的点播棒。播种由男女二人配合操作，男人在前面挖穴，女人在后面放种和盖土。播种多采取互助合作的形式，一家播种，亲戚朋友都来帮助，这样可以避免因播种时间过长而造成禾苗生长参差不齐的状况。

二、轮作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轮作轮歇类型（包括人工造林轮作类型）是无轮作轮歇的演变形态。轮歇方式改变了，耕作技术也要随之改变，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了锄和犁的耕作以及撒播播种技术。

锄、犁耕作技术，大致有四种方式。

1. 独龙族的耕作方式

独龙族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有了水田之后才开始有犁耕的，

而在传统的刀耕火种中，只有刀耕和锄耕。独龙族对于实行轮作的土地，休闲期满后第一年耕作仅使用刀耕而不使用锄耕，第二年轮作开始，才使用锄头耕作，是一种刀耕与锄耕相结合的方式。



消除焚烧后的余烬（刘达成摄）

2. 基诺族的耕作方式

基诺族的轮作耕作技术，根据土地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方法：



基诺山巴夺村基诺族播种陆稻（罗廷振摄）

基诺族的轮作耕作方式

年序 土地类别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1	刀耕	锄耕	锄耕	休闲	
2	同上	锄耕	犁耕	犁耕	犁耕或 休闲
3	刀耕之后锄 耕或犁耕	锄耕或犁耕	锄耕或犁耕	锄耕或犁耕	休闲

基诺族的轮作耕作技术，采用了刀耕、锄耕和犁耕相结合的方式。



基诺山巴卡小寨基诺族犁地

3. 哈尼族（西双版纳勐海县、景洪市）的耕作方式

勐海县布朗山、格朗河等地的哈尼族，过去一般实行两年短期轮作方式。第一年砍树、烧地之后，便使用锄头很浅地把土地挖一遍（这与很多民族不同，上述独龙族、基诺族第一年是不耕作土地的）。5月播种之前，又浅挖一遍，边挖边把杂草除去。

播种之后紧接着再挖一遍，这次挖地是为了把撒播于地面的籽种埋于土中并再次除草。第二年连续耕种，仍然只使用锄头耕作而不使用犁耕，但是挖土的深度要超过第一年。哈尼族第一年便使用锄耕而且连续使用锄耕的方式，与周围的布朗族、基诺族等大不相同，所以别的民族称他们为“挖地民族”。

4. 瑶族的耕作方式

勐腊县瑶区的瑶族，是善于犁耕的民族。过去他们每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便放火烧山，把树烧死，然后砍树，再烧地，并用刀清除树根，接着便犁地。大树、石头周围犁不到的地方，则用锄头挖。播种之后，再犁地一次，以便把籽种埋于土中，同时除去杂草。整个过程要犁地两次，挖地一次，耙地两次。此后轮作三四年或四五年，犁、挖、耙的次数还要增加。瑶族的耕作方式与基诺族等大相径庭，基诺族等为了使耕种过的土地很快恢复植被，一般尽量避免轮作，而且尽可能避免使用锄耕和犁耕。而瑶族每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希望尽快把一部分森林变成草地，以利于他们放牧耕牛和进行犁耕，同时还可以解决建盖房屋所需茅草的来源。当然，当生态环境恶化之后，他们又会迁移到别的地方。

轮作轮歇类型的播种方式是撒播。所谓撒播，就是用手撒种。就像点播播种是与刀耕相配套的播种技术一样，撒播播种则是与锄耕和犁耕相适应的播种方式。把籽种撒于地面，然后用锄头浅挖或用犁浅犁土地，既可以再一次松土除草，同时又能覆盖籽种，一举两得。

点播和撒播两种播种方式，各有优缺点。点播不必耕地，省力省时间，点播有株行距，薅草方便；但是点播使多粒籽种集于一穴，会影响禾苗生长，而且对土地面积的利用率也相对较低。撒播可以充分利用土地面积，由于籽种分布均匀，所以有利于禾苗生长；然而撒播籽种分布较密，又无株行距，故薅草比较困



基诺山巴亚中寨基诺族撒播陆稻

难，从省力省工的角度看，犁耕撒播效率最高，而锄耕撒播却比较费力费工，因为锄耕播种至少要挖地两遍。从前一章对基诺族的调查统计资料可知，以 20 亩地为单位，点播播种需要 20 个劳动力，锄耕撒播需要 40 个劳动力，而犁耕撒播只需要 7 个劳动力。

从技术的角度看，撒播无疑要比点播复杂困难得多。撒播不像点播按穴放种，而是要靠熟练的技巧才能把籽种撒均匀，而这种技巧是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实践和学习才能获得的。据基诺族的经验，为了使撒出的籽种均匀分布，手抓一把籽种不能一次撒完，要分三次撒出，籽种的疏密程度则视土地类型而定，肥沃的土地在一个脚印的面积上分布三粒至五粒为宜，中等肥力土地六粒至七粒，瘠地八粒至九粒为佳。勐腊县麻木树乡哈尼族的撒播则以手掌面积衡量，一个手掌面积以均匀分布三四粒籽种为宜。

三、草地轮歇类型的耕作技术

草地轮歇包括稀树草地轮歇类型，是森林轮作轮歇类型的演

变形态。如果轮作时间过长，抛荒之后又没有足够的休闲时期的话，那么森林地就会蜕变成为稀树草地或草地。目前，在云南西南部山地，孳生最快最多、分布最广的杂草是飞机草（*Eupatorium odoratum* Linn）和紫茎泽兰（*Eupatorium coelesticum* Linn）。这两种草都是于20世纪50年代从云南南部的邻国传来的，因传来



采 集（刘达成摄）

的时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因而这两种草被人们称之为“解放草”。飞机草又因为其茎枝形如飞机而得名。飞机草和紫茎泽兰，生长迅速，生命力极强，土地一旦轮作抛荒，很快便会被它们占领，如果土地不能长期休闲，就将成为两种杂草的世界。现在无论是在基诺山、布朗山还是阿佤山，大片分布着高过人头、密不透风的飞机草和紫茎泽兰。虽然都是杂草，但两种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飞机草可以说是良性杂草，具有绿肥的功效，焚烧后的草灰有较高的肥力，所以农民并不讨厌这种杂草。而紫茎泽兰就不同了，这种草大量消耗土壤肥力，长得快，烧不死，除不尽，没有一点用处，牲畜吃了还会中毒，对于这种恶性害草，目前尚无有效的消灭方法。稀树草地



和草地的耕作方法，又与森林轮作地不同，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 思茅地区镇康县大寨乡德昂族的耕作方式

该乡德昂族稀树草地的耕作始于八九月间，第一道工序是芟草，大约晒一个星期即可烧草，接着犁地一遍，然后荒置。待到冬末春初，才砍伐树木。翌年3月焚烧树木，再犁地、播种。^①

2. 思茅地区澜沧县糯福乡拉祜族的耕作方式

该乡拉祜族于六七月份备耕，先芟草、烧草，然后犁地一次。八月至十月砍树。翌年二三月间将已经干燥的树木砍短，堆成若干小堆焚烧，烧后整地、犁地，再用锄头挖土、碎土一遍，然后播种。^②

3.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满乡拉祜族的耕作方式

该乡拉祜族的耕作方式与前者又有所不同。砍树是在八九月间。十一二月烧地，烧后马上犁地，以免荒置时间过长土质变硬。春节过后以锄头敲碎土块。过一个月待杂草长出后撒播籽种，然后挖地覆盖籽种，同时除草。

4. 勐海县格朗河乡哈尼族的耕作方法

格朗河乡哈尼族九月芟草、烧草，接着挖地、敲土块、捡草根。十二月至翌年一月砍树，并将树砍成小段铺于地面晒干。二月底割去土地周围的杂草，铺于地面使之干燥。三月烧地，四五月播种。

5. 景洪市基诺乡基诺族的耕作方式

八月砍树、芟草、烧地，翌年一月至三月挖地、犁地、敲土块、除草，四月至五月播种。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1版，46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

^②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1版，1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草地轮歇类型的生产工具，除了砍刀、锄犁之外，芟刀是不可缺少的。芟刀柄长，便于站立芟草。目前杂草越来越多，芟刀也便成为农民必备的工具，一般农家都有四五把甚至七八把。至于芟草的方法，从上往下芟和从下往上芟都不方便，而要沿等高线横向进行。

本节比较了与三种轮歇类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第一种是与无轮作轮歇类型相配合的刀耕，刀耕不使用锄、犁耕作土地，是一种有意识的免耕之法。为什么要免耕？因为无轮作轮歇地休闲时间长，树多，焚烧效果好，火灰多，土壤表面烧得透、烧得疏松，草、虫大部分被烧死，这样良好的土壤状况应该立即播种，直接加以利用，而不必再进行耕作。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硬要使用锄和犁去翻土的话，那样就会破坏土壤表层的良好状态，就会把火灰和熟土弄到土壤下层，而把下层含有虫卵并缺少肥力的板结生土弄到表层，这对于农作物的生长是十分不利的，可以说是弄巧成拙。

锄耕和犁耕是与森林地轮作和草地轮作相适应的耕作技术。为什么轮作需要锄耕和犁耕？因为轮作地从第二年便开始无树可烧，不烧地土壤就会板结，杂草就会大量生长，因此要通过耕作翻土使土壤疏松，并翻埋杂草。

通常人们一提到刀耕火种，便认为不过是“砍倒烧光”而已，这显然是不对的。据上文可知，刀耕火种既有纯粹的刀耕，也有刀、锄相结合的刀、锄耕，还有刀、锄、犁相结合的刀、锄、犁耕。由此可见，“砍倒烧光”四个字是远远不能概括刀耕火种的丰富内涵的。

不少人认为刀耕属于原始农业，而锄耕和犁耕则是非原始的传统农业，这种观点也不对。我们说过，从事刀耕的农民，并不是不知道和不能掌握锄耕和犁耕的原始人，而是不愿意选择锄耕和犁耕。把刀耕说成是原始农业，其实是不懂得免耕的奥妙。

还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刀耕、锄耕、犁耕是农业史上先后进化的三个阶段。并把云南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作为刀耕的实例来加以证明。农业史上是否有这样的进化规律，那是另外一回事，而如果把云南的刀耕火种说成是农业史上原始阶段的刀耕，那就错了。在云南，刀、锄、犁同时存在于刀耕火种农业之中，它们各有各的功能，很难判定谁先谁后。诚然，在轮歇一章中曾经论述过，无轮作轮歇类型向轮作轮歇类型演变，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轮歇方式改变了，耕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即纯粹的刀耕会转变为刀、锄、犁相结合的耕作方式。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无轮作轮歇类型是刀耕火种农业或广义农业的原始形态，因为无轮作轮歇类型的刀耕是当代少数民族使用铁刀和铁斧的刀耕，而非原始人使用石刀、石斧的刀耕。而且如前章所述，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已经具备资源规划和循环轮歇的管理水平和一套完整的生产技术，所以已非原始农业可以相提并论。此外，如前所述，由于使用锄、犁进行连续耕种的方式具有很大的弊端，即对生态环境和森林资源有较大的破坏性，而且劳动力的投入相对较多，因此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使用锄、犁进行连续耕种的方式也会向仅从事刀耕的无轮作轮歇方式转变。再者，就当代所发生的刀耕向锄耕、犁耕演变的情况来看，与其说是进化倒不如说退化更为合适。因为这种演变并不是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选择的结果，即并不是高水平技术对低水平技术的取代和淘汰，而是生态破坏后的被迫选择，是生存危机的无奈。引申而言，人类历史上所有生存技术的发明和创造，自然有人类自觉的追求和努力，是天才的产物和智慧结晶，然而人类在生存危机重压之下的改革，亦是不能轻视和低估的。

第三节 迁移方式的比较

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大部分是长期在一个地方生存的定居的民族，但是也有一部分是非定居的习惯于迁徙的游耕民族。为什么要经常移动？历史上有因民族压迫和战争的逃亡，有鬼神观念的驱使，有躲避瘟疫的搬迁，然而频繁发生的现象，却是为了改善生存状况，寻求可以很好从事刀耕火种的森林。

前文说过，刀耕火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轮歇。习惯于迁移的刀耕火种民族与定居刀耕火种民族的不同之处，也可以说就在于轮歇范围的不同。定居民族有村寨土地范围的概念和约束，他们的轮歇是在固定的村寨土地范围内的轮歇；而游耕民族却没有村寨土地范围的概念和约束，他们希望把整个森林世界都当做自己的轮歇范围，只要原住地的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只要重新发现没有归属的茂密的森林，不管是近还是远，他们都会抛弃故地，迁往新的森林中，进行砍伐烧垦。然而，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游耕民族的迁移方式也是有差异的。有的习惯于任意、频繁地迁移，四五年甚至二三年便迁移一次；有的则是缓慢地迁移，十余年、二十余年才迁移一次。说到村寨的搬迁，其实并不仅仅发生在游耕民族当中，定居民族也有移动，只不过他们的移动不是随意的、远距离的移动，而只是在村寨所有土地范围内的移动罢了。

一、任意频繁迁移的民族

习惯于任意频繁迁移的刀耕火种民族，有瑶族、苗族和一部

分拉祜族、傈僳族、哈尼族和克木人等。这些民族过去都是依赖刀耕火种、狩猎和采集为生，他们和森林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一样。从这些民族的历史来看，他们之中有的是从中国内地迁来的，例如瑶族和苗族；有的则是比较弱小的受歧视的民族支系，如黑拉祜、克木人等。这些民族与原住民和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地盘，在自然条件较好的低地和盆地没有他们立足的余地，他们只能辗转迁徙于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之中，时间长了，便形成了居无定所、流动无常的民族性格。下面举两个任意频繁迁移的实例。



拉祜族村寨南段

例一：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乡那赛寨的拉祜族。

拉祜族主要分布在思茅地区以澜沧县为中心的地区，西双版纳等亦有分布。那赛寨位于勐海县北部，距离县城约 16 公里，有公路可通。该寨与一个叫翁因的傣族村寨共同坐落于一个小坝子内，坝子海拔约 1000 米，一条小河从中穿流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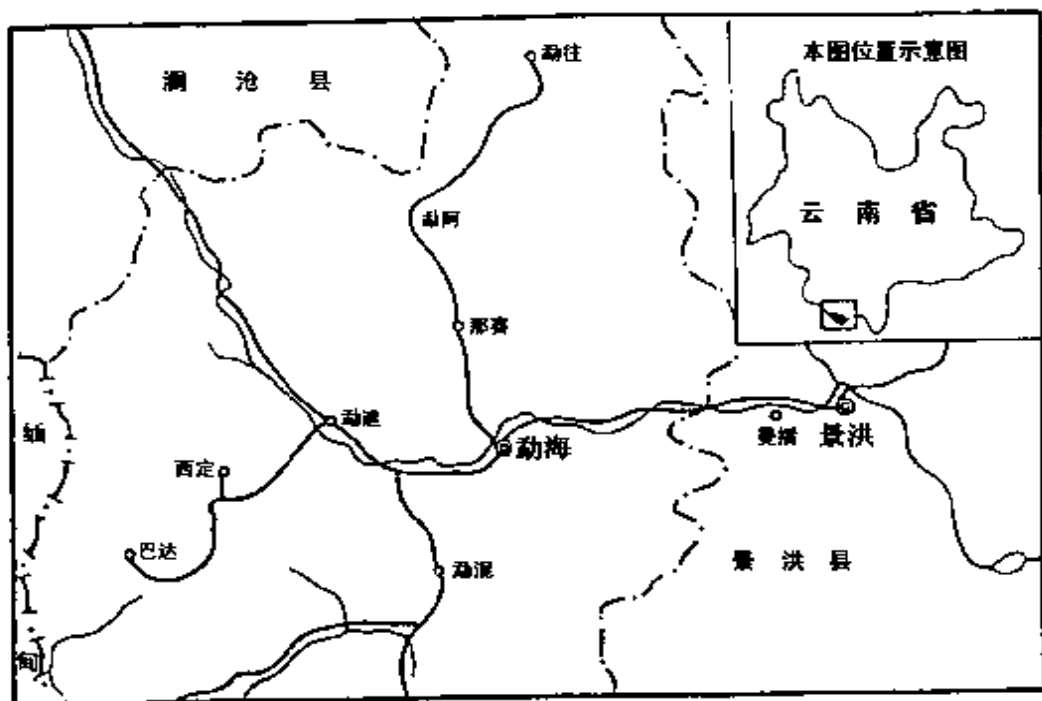
1985 年 3 月笔者到那赛调查，全寨共有 39 户 195 人。那赛寨的拉祜族来自不同的地方，大部分是拉祜纳（黑拉祜），此外还有少数拉祜西（黄拉祜）和拉祜普（白拉祜）。那赛的拉祜族

虽然已经从山区迁移到坝区居住，周围又都是傣族和汉族，然而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仍然十分显著。紧邻的傣族寨子翁因全为高大宽敞的红瓦木楼，而那赛却全是破烂矮小的篾笆糊泥的草屋，大多数房屋面积仅 10 余平方米，有的才 7 平方米~8 平方米。拉祜族室内家当极为简陋，一般仅有一两床草垫和棉絮、一个粮囤、一个火塘。有的人家甚至猪、鸡与人共居一室，作为猪饲料的芭蕉芋和魔芋也堆于屋内。从服饰打扮来看，傣族的妇女穿红着绿，束髻插花，那赛年长妇女则身着长袍，腰束宽约 20 厘米的树皮腰带，手执长约一尺余的烟斗，头戴瓜皮小帽，头发剃光，仅留一撮长毛。据说长毛是命根子，绝对不能剪掉，如果被剪掉，那么灵魂就守不住了。而且据说每遇头痛之时，只要轻轻拉几下头上的那一撮长毛，便能止痛。



景洪市从高山迁到低地的拉祜族人家

生计方式也完全不同，翁因寨的傣族是定居水田稻作民，而那赛寨的拉祜族却是典型的游耕游猎民。仅从 1949 年至 1976 年，那赛的拉祜族就在方圆数十公里范围内的大蛮黑、那今、那东、蛮迈庆、回锅更、蛮兴、回头场、大凹槽、梁子头、回格楼等地进行过 18 次全寨性的大搬迁，而三两户人家搬出搬回的情况



那赛寨地理位置示意图

则不计其数。直到 1985 年，该寨原有的大部分人家才基本上又聚到了一起。那赛的拉祜族为什么如此频繁地迁移呢？据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刀耕火种的迁徙。那赛的拉祜族传说，开天辟地之时，名为“旺”的神征求拉祜人的意见，问他们愿意上山种地还是愿意下坝耕田，拉祜人摸了一下犁头，犁头沾满了泥土，又摸了一下斧头，斧柄光溜溜的，于是便选择了斧头上山刀耕火种。那赛的拉祜族虽然世代在山区刀耕火种，然而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常说：“老黑（拉祜族自称）没有田，老黑没有地，靠山吃山，毁林开荒。”正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哪里无人就到哪里，哪里树多就到哪里耕种。

刀耕火种的栽培作物有陆稻（常种的有三个品种）、玉米、黄豆、花生、苡仁、高粱、芝麻等。生产工具主要有斧头和砍刀。这里的拉祜族崇尚乞讨，譬如籽种，认为栽种讨来的才会丰

收。打制工具的原料也以“讨”的方式获得。拉祜人讨铁，三年进行一次。讨时做好饭菜，请全寨人来吃，外寨亲戚朋友也请。客人到来，忌讳说“来我家坐”等语。客人吃完饭，给主人留下带来的废铁料。拉祜人认为，姓虎的拉祜人使用讨来的铁打成的工具，才会获得丰收。生产工具还通过交换的途径获得，不过拉



拉祜族的生产工具

祜族的交换方式却颇为特殊。过去，拉祜族非常害怕外地人，甚至见到外地人的脚印，也会惊惶躲避，即使是对经常交往的傣族和汉人也惧怕三分。需要坝区的砍刀、盐巴、针线等物资，决不敢到市场上去进行交换，而是将兽皮、兽肉等物带到坝区悄悄地放到熟悉的人家的门前，然后躲在远处观看，等到人家发现东西并拿回家去，这才返回山寨。按习惯，拿了东西的人过后会找到

山寨登门寻问放物之人，这种时候才说出自己希望交换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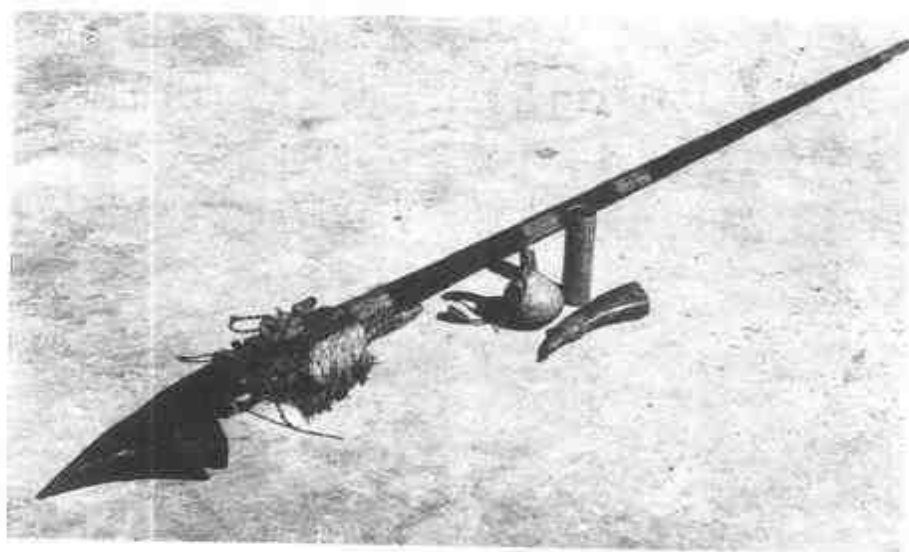
农事活动从一二月砍树开始，三月烧地，四月播种陆稻，播种完毕到地里杀鸡献天地，不薅草。九月底十月初稻谷成熟，到地中采摘谷粒吃新米。稻谷打收之后从地到家沿途抛撒谷粒，意为请谷魂回仓。



拉祜族的刀耕火种地

那赛寨的拉祜族完全实行无轮作轮歇刀耕火种，种一年抛荒后即另找新的森林开荒。新辟林地较远，往返不便，就搬家靠地而居。每遇虫兽袭扰，老人便告诫不能杀虫伤鼠，只能捉虫送出地外，老鼠也只能捆住脚送到路上，他们认为这样以礼相待它们就会自己离去。虫兽严重之时，则点蜡烛于竹笼中献地神和家神，并杀鸡看鸡卦。无济于事，便认为住地不吉利，又搬迁到别的地方。即使无灾害，时间稍长，地中所砍树桩糟烂，也视为不祥之兆，避之惟恐不及。搬迁之状，各家将刀、斧、弩、锅、被等物集于一担，带上猎狗，推倒草屋，付之一炬，一走了之，正所谓来去无踪。

狩猎也是其频繁搬迁的重要原因。那赛寨的拉祜族酷爱狩猎，狩猎分集体进行和个人进行两种方式。集体撵山，行前必须



拉祜族的猎枪

由村寨头人“昭旺”杀鸡祭献、看卦。打到野兽，全寨平分。个人狩猎，每天必不可少，农忙季节也不例外。傍晚出发，一去就是半夜，有的则彻夜不归。一天不去串山，便觉头痛，浑身不适。冬季农闲，则携儿带女全家进山。打到野兽，就地宰割，烧烤而食，余下部分装入竹筒带回；打不到野兽，则用竹筒或冬叶煮食所带大米，或挖山药、野芋和采集野菜充饥。夜晚宿于山中，烧数堆篝火，排成一行，人睡于其间。雨天宿于大树之下，在树枝上覆盖树叶以避雨。狩猎方法，由妻子吆喝、追赶，丈夫则隐蔽伺机射杀。发现熊洞，妻子投石入洞把熊引出，丈夫持枪等待，在熊站立起来扑人的当儿，射其胸膛，一枪便可毙命。如果熊伤而不死，不可顺坡往下逃跑，因为熊下坡作滚动状，速度比人快，而要斜着跑。遇老虎打不死，须绕道而行，不能径直往回走，据说受伤的老虎会抄小路追上来进行报复。打野猪不能从正面打，要从侧面打，正面打不死，野猪会冲上来拼命。拉祜人熟悉动物的习性，动物也了解拉祜人的特征，只要一闻到拉祜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烟草味，动物便逃之夭夭。因此他们伏击野兽要查看风向，只能在风尾而不能在风头。长期的狩猎生活，形成了

拉祜人沉默寡言、勇猛刚健的性格。他们习惯于大山的幽寂，对于风餐露宿的生活处之泰然、自得其乐；而对于坝区的喧闹却难以忍受，对于定居农耕生活则格格不入，无所适从。适应性的改变，是不可能短期内实现的，那赛人下坝居住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习惯，忽去忽归，那是强烈地留恋着森林中的刀耕火种、狩猎和采集生活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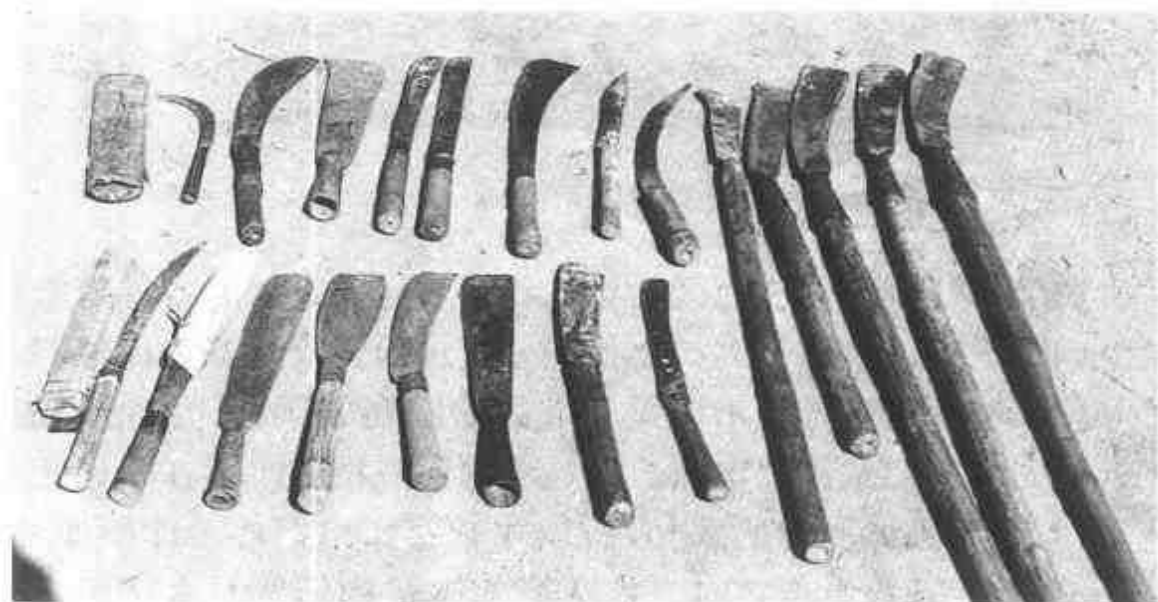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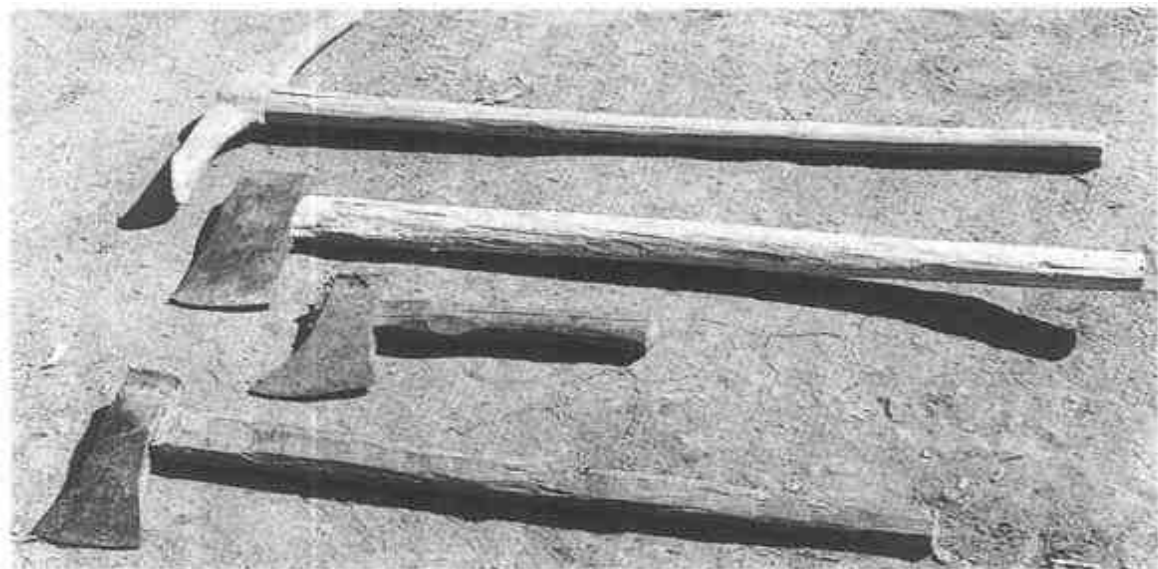
拉祜族的坟山

对于那赛寨和周围地区的拉祜族，政府一直采取各种措施帮助他们实现定居生活，例如给他们分配水田，资助经费让他们建房等。那赛寨拉祜族的水田是相邻的翁因寨的傣族让给他们的。傣族原先并不愿意让出水田，但是考虑到拉祜族继续在附近任意流动开荒，会破坏周围的森林，所以才甘愿作出牺牲。即便如此，直到1985年笔者调查之时，那赛寨的拉祜族仍然不太稳定，村长早晨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又有村民不知去向的情况时有发生。

例二：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回吉寨的克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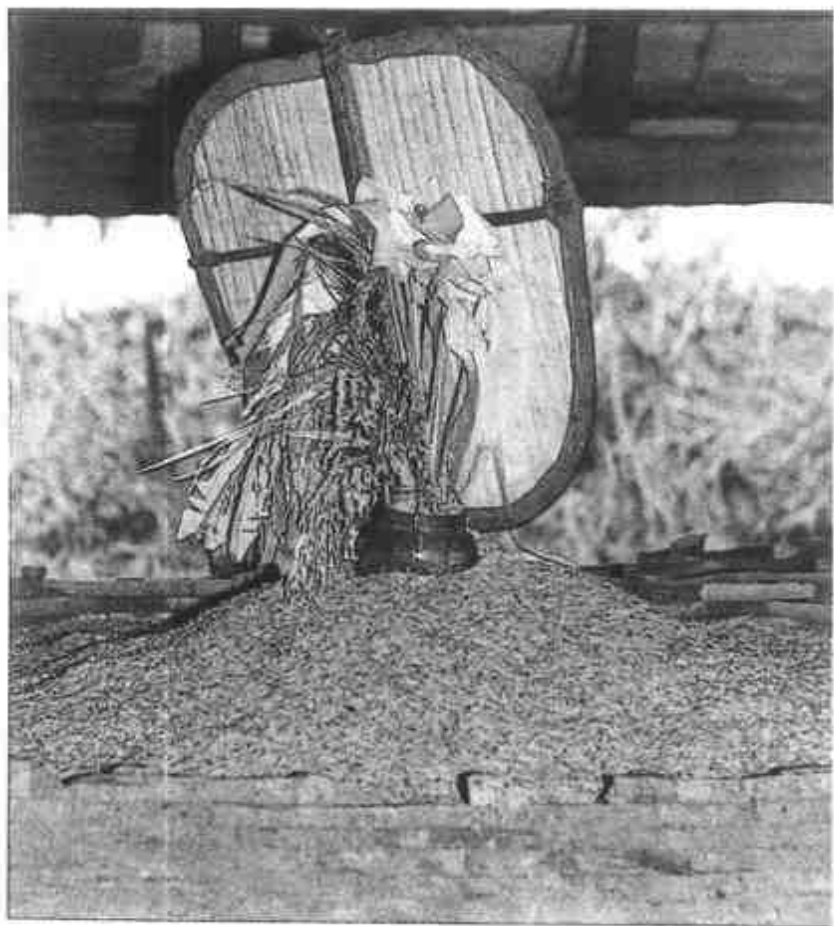
克木人共有1700余人（1982年），大部分居住在西双版纳

州的勐腊县。勐腊县位于云南省最南端，与老挝、缅甸接壤。在该县南部的南腊河流域，分布着曼岗、曼种、曼迈、回伞、回吉、蚌索、暖养、王士龙、东阳、南西等 18 个克木人村寨。其中的回吉寨位于南腊河畔，距离县城 30 多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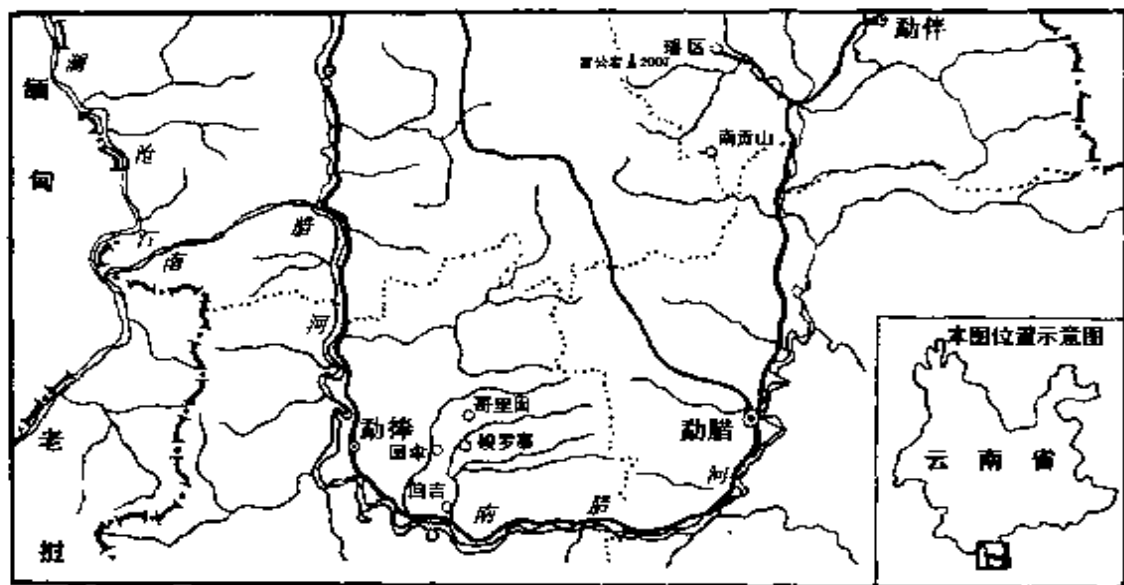


克木人的生产工具

回吉克木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完全从事刀耕火种农业。陆稻是主要的栽培作物，其他有玉米、棉花、豆、瓜、芋、薯之类。生产工具与基诺族等基本相同，只是点播棒头不是铁铲而是铁锥。生产过程从一月砍地开始，四月烧地并拣烧二次~三次，五月播种陆稻，天旱则六月播种，六七月份薅草，九十月间收获。一年之中有两个农耕礼仪，一个叫“凉勒”，时间在七月，其时禾苗长至一尺余高，各家到地中杀鸡祭祀，祈求山神保佑庄稼不受动物糟踏。另一个叫“赫果”，即叫谷魂，时间在打谷子时节，人们于中午到地中去叫唤，把留在地中的谷魂请回谷仓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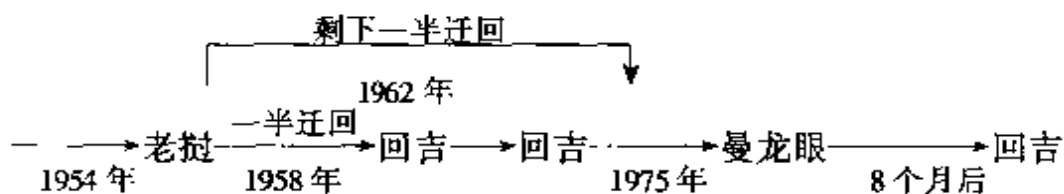


克木人祭祀粮仓



回吉寨地理位置示意图

回吉克木人的刀耕火种轮歇方式，与景颇族和布朗族相同，为单一的无轮作轮歇方式，一年耕种一个地区，休闲七八年至十余年。土地不够轮歇或距村寨太远，就搬到土地多的地方居住。据该寨老人回忆，他们是20世纪50年代前从老挝迁来的，最初的寨址是在现住地西南边约3公里的曼种。在那里居住了10余年，又搬到现住地10余年，再搬到现住地北部约4公里的地方住了几年。大概在1954年，全寨迁往老挝，1958年迁回一半，另一半除两家之外，4年之后也都回到了现在的回吉。此外，单家独户搬走搬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回吉寨克木人迁移图示



克木人播种陆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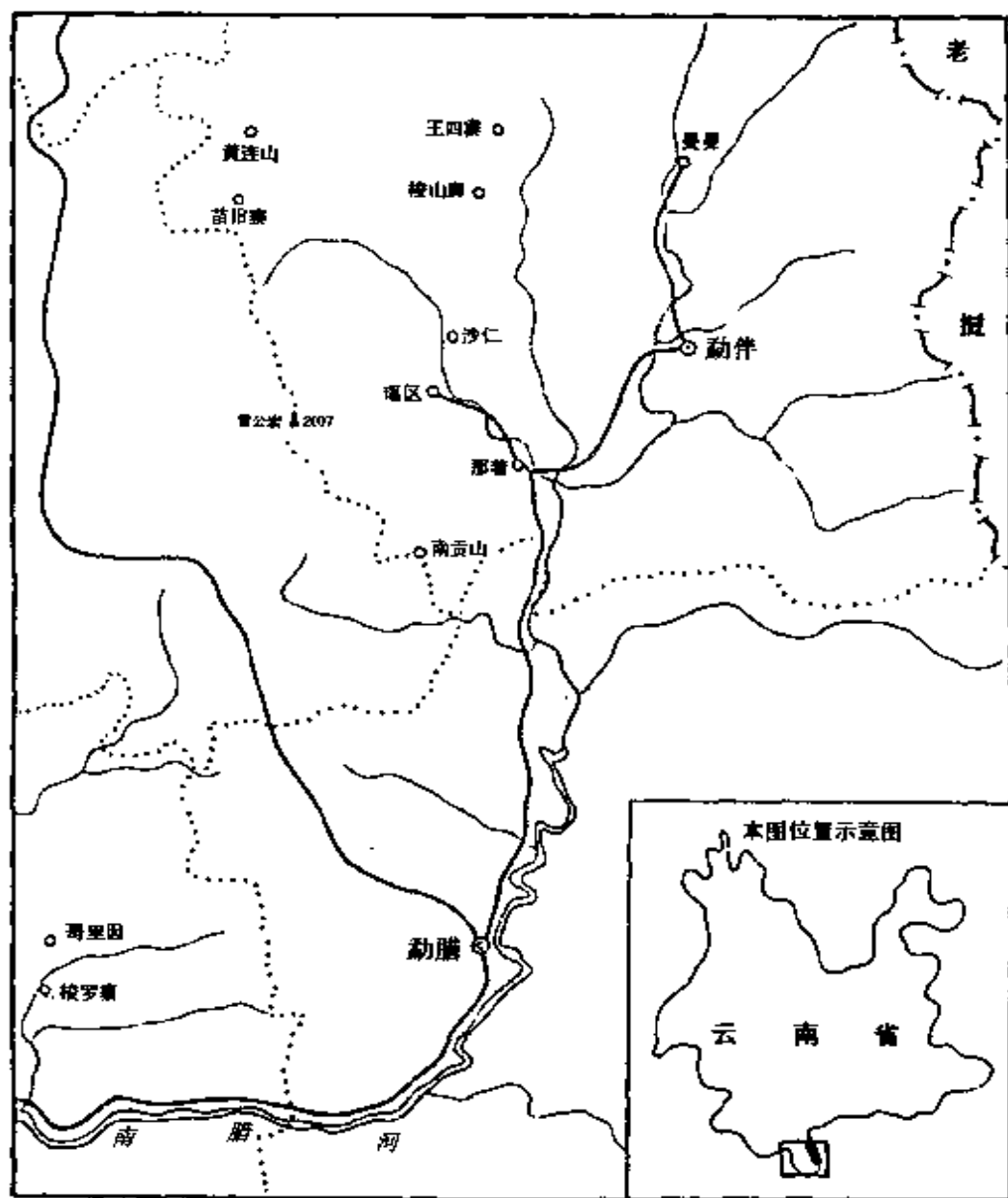
该寨最后一次搬迁是在 1975 年，原因是一些哈尼族从北部的麻木树区搬迁到回吉北部建寨，名为哥里因，经当地政府做工作，回吉克木人分出一半水田给哈尼族耕种，田少了，粮食不够吃，于是全部迁往勐满区的曼龙眼。原想那里地势平坦，可以种水田，然而由于缺少水源，不能灌溉，故无法耕种。八个月后，除了三户之外，其余人家又只好返回现住地。经此折腾，元气大伤，此后便再不搬迁了。

二、任意缓慢迁移的民族

西双版纳州哈尼族、瑶族、苗族的迁移不像拉祜族、克木人那样频繁，他们在一个地方通常要居住八九年甚至十余年、二十余年才会迁移一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不仅善于从事无轮作轮歇方式的刀耕火种，而且还善于从事轮作轮歇方式的刀耕火种。实行轮作，可以一定程度地延缓人地关系的紧张，这样便可以延长在一个地方的居住时间。另一方面，哈尼族等的移动也不像拉祜族那样你来我去，自由进出，缺乏组织性，而多半是有组

织的搬迁或全村移动，最常见的是分寨式的迁移，即让一部分人家留在原地，另一部分人家搬迁出去另建新寨。不过，哈尼族、瑶族、苗族与拉祜族、克木人等在“任意迁移”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他们没有地域的限制，想到哪里便迁移到哪里。

例一：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瑶区南贡山寨的瑶族。



勐腊县瑶区示意图

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瑶区设治于1952年，当时为西双版纳州易武县瑶族自治区，区公所设于梭山脚村。1966年区公所迁到现址沙仁村。1984年原瑶区分成了瑶区和勐伴两个区，后来又改区为乡，但人们仍习惯于称瑶乡为瑶区。



勐腊县麻木树乡的瑶族村寨

南贡山寨位于瑶区西南部，村寨位于海拔1500米的山区。据老人们回忆，他们童年时该寨还在思茅地区的布藤坝，后来搬迁到勐腊县麻木树乡的藤篾山，1974年搬到瑶区的南贡山。在藤篾山时，由于粮食歉收，便派人外出寻找搬迁地点。第一次派出13人，他们到达南贡山后，发现这里森林茂密，周围又没有人居住，山头上地势比较平缓，而且山箐中有泉水，既可饮用又可以修建水碓，便返回村寨建议迁到南贡山。后来村里再次派出包括队长、会计在内的9人到南贡山仔细调查，认为确实是比较理想的生存地，于是全村分出18户107人迁到此地。

瑶族搬迁到新的地方，虽然森林土地多了，但是为了便于管理，为了不破坏资源，村寨首先要进行土地规划，村民们每年按规划集中砍烧一个地域，形成循环利用的模式。农户每年通过号

占的形式获取土地。号占方法是在所需要的土地四周砍断几株小树，把小树劈头剖开，夹入一束树枝，这就是号占土地的标志。

南贡山瑶族从事犁耕，认为犁耕收成可靠，不采用犁耕的无轮作轮歇方式容易耽误节令，是懒汉耕作方式。该寨 1974 年迁到南贡山之后，第一年砍伐森林开荒便开始犁地。为了便于犁耕，将小树根用砍刀剜出，只留下无法清除的大树根。不过该村也有少量无轮作地，作为牛犁地的补充。

自搬到南贡山之后，由于土地宽广，抛荒地有足够的休闲期，所以粮食产量较高，好的牛犁地亩产可达 350 公斤，无轮作地亩产也有 250 公斤~300 公斤，种一年够吃两年。而且森林多，野兽、野菜也多，有很好的狩猎、采集条件。然而南贡山属于国家自然保护区，近年来政府和林业部门一直动员该寨搬迁。政府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坝子边缘专门划出一块土地供他们建立新寨，并且发给每户建房费 3 500 元，加上搬迁费等，每家可得 8 000 余元的安家费。新划的村寨面积只有南贡山面积的 1/3，但每人可开水田 3 分，而且海拔较低，气候炎热，可种植砂仁、橡胶等经济作物，交通也比较方便。1987 年，南贡山瑶族纷纷下坝到新寨址平整房屋地基，1989 年已全部搬迁下坝。

例二：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瑶区苗新寨的瑶族。

苗新寨位于瑶区中部，距离乡政府所在地大约 6 公里，寨子建于海拔约 1 200 米的山坡上。该寨寨址早先为苗族所居，故名苗新寨。后来苗族搬到勐腊县南部的尚勇去了，瑶族才迁到此地。

据该寨 56 岁（1988 年）的杨三说，他的父亲原是梭山脚（梭山脚寨在苗新寨西面，距离苗新寨约 4 公里）人。20 世纪 40 年代末梭山脚已有 70 余户，人多地少，于是分出一部分人家另建龙巴寨（龙巴寨位于苗新寨西北方，距离苗新寨约 7 公里）。50 年代以后，龙巴寨又分出 26 户搬到苗子寨（苗子寨位于苗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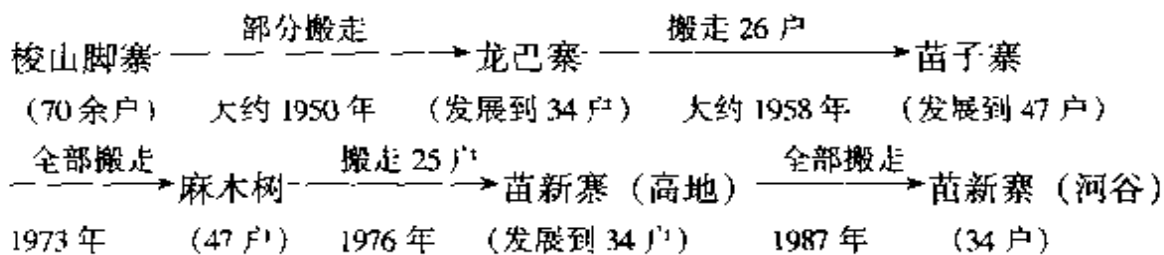
寨西北，距离苗新寨约 16 公里，原为苗族所居之地，故名苗子寨)，龙巴寨剩下 8 户人家。从 1973 年到 1974 年，苗子寨 47 户人家又全部搬迁到西边几十公里的麻木树乡。居住了 3 年，有 25 户人家返回瑶区到苗新寨安家，一直住到 1987 年。



建于高地的瑶族村寨苗新寨



高地苗新寨的破旧房屋



苗新寨瑶族迁移图示

该寨瑶族过去有“盘甲长”、“梁哥”等村寨头人，村寨搬迁等大事都由寨老们商议决定。过去瑶族村寨没有村界，哪里山高林密无人烟便到哪里。村寨内部亦无严格的土地制度，在每年集体耕种的地域内，谁愿意种多少便号占多少。

苗新寨瑶族的迁徙，是随意性的，土地不足，粮食产量不够，便迁往别的地方。过去每逢搬到新的地方，便放火烧山，毁林开荒，促使森林地变为茅草地。茅草地必须年年烧，茅草才长得快，烧山时间在4月。

苗新寨瑶族与南贡山瑶族一样，过去刀耕火种只行犁耕轮作方式而不采用无轮作方式，亦不耕种水田。牛犁地分片耕种，每年耕种哪一片，由头人和老人们商量决定。牛犁地种陆稻一般连续种三年，第一年种长白谷，第二年黑节巴，第三年小红谷；玉米连续种四五年；棉花地只种一年。牛犁地抛荒后休闲期一般都在十五年以上，但由于耕作过度，很难恢复为森林。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林业管理部门的禁止，该区瑶族不可能再大规模地烧山开荒。经过30多年的蓄养，过去大面积的草山草坡变成了森林地。草地的消失，给瑶族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首先是牛耕难以在森林中进行，其次是茅草一旦消失，不仅无法养牛，而且覆盖屋顶的材料都无法解决了。其结果，在生产方面，苗新寨只好改变传统的犁耕方式，而采取无轮作轮歇方式了。从犁耕变为单纯的刀耕，有悖于进化论，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现象。1983年，苗新寨重新确定土地



1987年迁往低地的苗新寨新建房屋

范围，其所属的土地共有10片，8片是实行无轮作轮歇的森林地，1片是集体林，1片划为国有林，实际上可以耕种的只有9片。

8片轮歇地加1片集体林，总面积为6548亩，每人平均有31亩，每人每年平均耕种3亩~4亩，8年1个轮歇周期。此外尚有水田138亩，每人平均0.65亩。从以上数字看，土地是比较充足的。然而由于缺乏严格的分配管理制度，土地没有分配到户，仍然采取自由号占的方式，每年各家都抢种、多种，加之有的土地与外寨地界不清，为避免纠纷暂时不能耕种，因此轮歇周期很难保证8年。

1988年2月，笔者到苗新寨调查，正好遇上该寨瑶族搬迁。在距离原村寨大约3公里多的山谷里，已经建起了四五幢新瓦房。新寨址海拔910米，村民计划于年内建好房屋，1989年全部搬迁下山。问及迁移的原因，一说由于不准烧山，茅草已败，没有牛犁地耕种，草房也盖不成了，不如下到山脚，靠近水田；又说山上交通不便，条件较差，没有发展前途，下坝以后，可以栽种一些砂仁、紫胶等经济作物，扩大畜牧业，再增开一些水田，生活会有所改善。笔者在与若干瑶族干部交谈中了解到，20世

纪 70 年代以前瑶族喜居山头，不愿下坝，政府曾想尽办法让他们下山，都没有奏效。“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动员六七个村寨下坝定居，然而有的没住多久便弃家跑进了深山。而到了 80 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很多村寨下坝定居，但是山多坝少，加之近年坝区又增加了一些外来移民，因此迁往低地变得十分困难了。



瑶族儿童担木

例三：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捧区梭罗寨的哈尼族。

梭罗寨原来属勐腊县麻木树乡，麻木树乡是哈尼族的聚居地。据该乡坝落寨 62 岁（1985 年）的达努等介绍，他们的祖先原居红河一带，离开红河到这里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过去他们在一个地方一般居住十余年，然后合寨或部分人家迁往新的地方，有时则又回到原住地，反复辗转，逐渐向西南推移。

村寨搬迁，首先必须选择去处。哈尼人过去喜居山地，不愿住坝子河谷。其原因一方面是低地多为傣族等所居，哈尼人难有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则因其长处山林，难以适应低地的暑热。哈尼人说，住坝子河谷容易生病，过去还有这样的说法，居住低地会头痛、掉发甚至变成哑巴。该区哈尼俗话说：“鱼上树不会动，老鼠下河会淹死，哈尼下坝不会生活。”所以过去哈尼族迁来迁

去总离不开高山。选择寨址，最好森林茂盛、阳光充足、靠近水源。搬迁之前，需派人四处察看比较，最后由陇巴头等头人或村干部作出决定。到了新的住地，先确定神林、水源林和坟山。神林需高于寨址，找其中两棵大树，一棵为地神，一棵为山神，树前搭神台。此后每年在神林中举行两次宗教活动，2月杀鸡献地神，8月杀猪献山神。除了两次祭祀之外，平时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神林。神林、水源林均严禁砍伐，据说如果有谁砍了其中的树木而不以猪、鸡去祭献、忏悔的话，那就会生病、遭灾。坟山亦是重地，尤其忌讳外寨人人内砍烧草木，然而一旦村寨迁走，也便抛弃不管了。坟山要低于寨址，其阳光照射的阴影不能投到寨内。



勐海县佤尼人新建的村寨寨门

寨子尽可能建造在平缓之处。清理树木之后，首先在寨旁建造供奉寨神的神房，继之在寨中心建造陇巴头的房屋，然后各家才分别造屋。接着竖陇巴门，一个村寨通常有三道陇巴门，两道是寨门，一道是送死人出寨的鬼门。陇巴门以方木竖立，呈门形，横木上吊挂着草绳串连的竹编法器“达辽”和木刀，并有4只头朝寨外的木雕乌鸦。最后，在陇巴门旁杀一头大猪，分配猪

肉，庆贺新寨成立。

梭罗寨现属勐腊县勐捧区。寨子坐落在海拔 730 米的山坳之中。梭罗寨的母寨是麻木树乡的旧龙寨，是 1982 年从旧龙寨分化出的若干子女寨之一，到 1988 年已有 27 户 150 人。旧龙寨位于麻木树乡北部海拔 1 000 多米的高地上，至 1988 年，建寨已有 93 年的历史。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旧龙寨有王、刘、张、杨四姓，有四个头人，一个是傣族土司任命的“老叭”，哈尼族称为“格巴”，一个是陇巴头，叫做“折麻”，另外两个分别叫做“乃厄”、“乃哈”。1957 年，头人制度被废除了。



哈尼族传统的竹草房

旧龙寨原有轮歇地 150 000 亩左右。根据森林长势，村寨每年集体砍伐一块林地，供村民号占耕种，土地不够，人们还可以到别的地方自由砍种。土地按海拔高低称为“蒿冬”、“折卡”、“折巴”三类，各类地都有相应的作物配置。旧龙寨在 1947 年以前完全按无轮作轮歇方式耕种，即所有土地都只种一年便抛荒休闲。1947 年以后牛犁地逐渐增多。牛犁地的发展，是人口增长，森林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大约在 1942 年，旧龙寨出现了第一次分化，30 多户人家从

老寨分出，搬往老寨东边的大约3公里的山坡上建立了新寨。那次分化，老寨留下了多少人，人们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不过在1947年至1948年期间，一些老人还记得老寨有40户200余人。自那以后的30年间，老寨和新寨虽时有少量人口流动，然而再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迁移。1972年，新寨发展到96户680余人，土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于是不得不把一部分人分到别的地方去另建新寨。这部分人下到楚捧公路旁边安家，因那里有20公里路桩，故取名为“20公里寨”。1982年，有15户人家再次从旧龙新寨分出迁往数十公里之外的勐捧乡，取名为“回比寨”。

自1942年分出新寨之后，30年间，老寨的人口翻了近3倍，1972年达到82户580人。人口迅速增长的结果，导致生态环境进一步严重恶化，轮歇地大部分蜕变为茅草地。人多地少，只得缩短轮歇周期，土地的休闲期一般只有三四年，加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影响，人们对农业生产和环境保护的态度变得十分消极。因此生产连年歉收，陆稻亩产仅50余公斤，最高产量才85公斤，粮食严重短缺，生活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为求生存，老寨于1972年再度分化，有36户230人下到公路边建立新寨，也因为那里有17公里路桩，所以取名“17公里寨”。1982年，17公里寨又有部分人家搬到7公里外的地方建立了名为“大青树”的寨子，而17公里寨也离开了原址，移到距离公路5公里的山中。

老寨于1972年分出17公里寨，到了1979年，又发展到53户。同年又有27户迁到10公里外的梭罗河边建立新寨，居住3年以后，该寨再次长途跋涉南下到勐捧乡现住地。

1988年，老寨只剩下17户人家了。经过近百年的垦殖，原先覆盖着茂密原始森林的土地已变得黄土裸露、茅草遍野、一片荒凉。而大量村民迁走之后，近年来，一些荒芜的上地上又长出了树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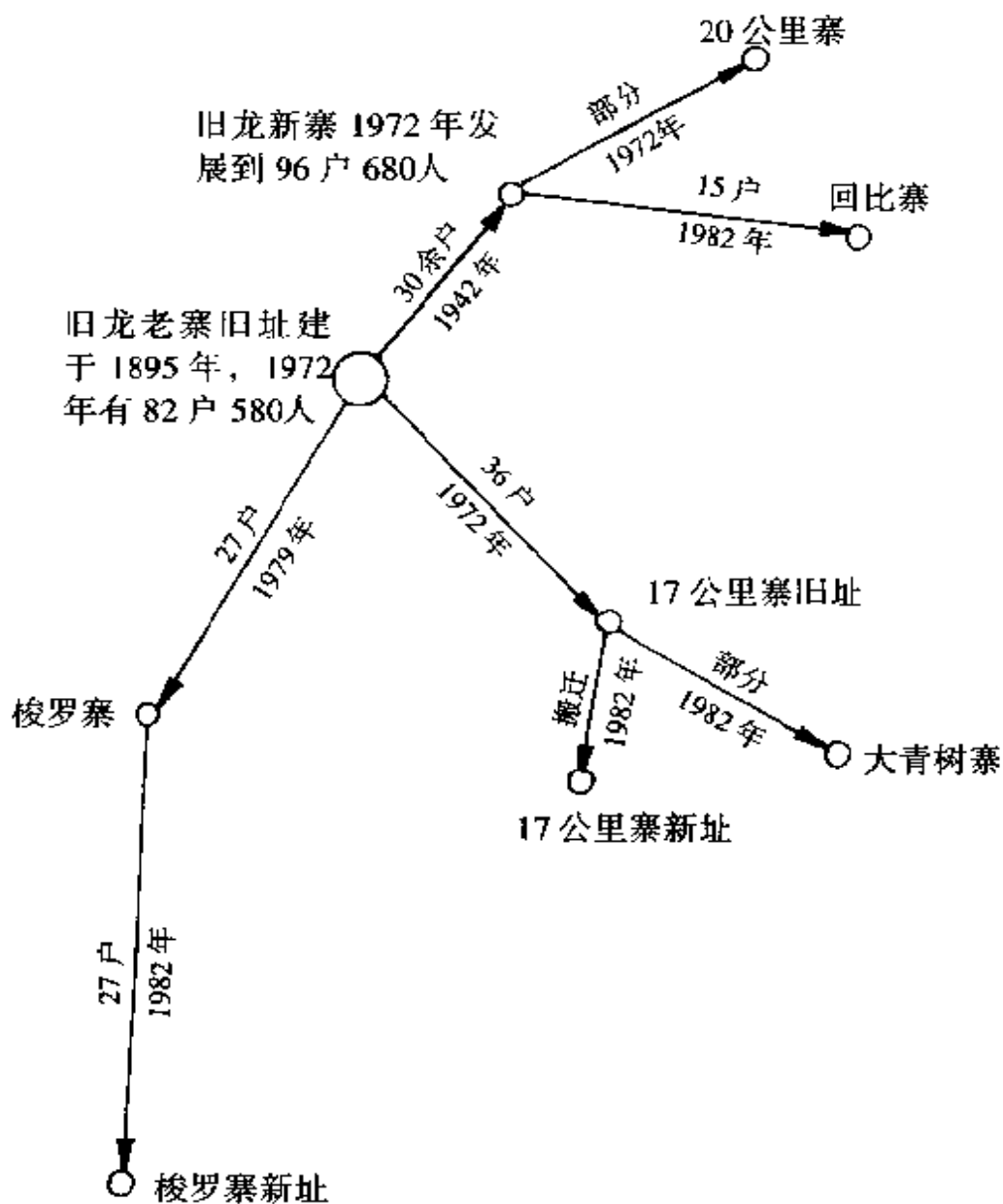


迁徙低地的哈尼族村寨

值得注意的是，哈尼族现在选择迁徙地的条件已经跟从前不大相同了。虽然寻求森林仍然是基本的出发点，然而人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惧怕低地，更不会一味地往高山上跑。哈尼族开始认识到居处高山的不利：高地寒冷，不能种植橡胶、甘蔗等经济作物；交通不便利，农副产品难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很多村寨没有学校，有的虽然有小学，但仅有中低年级，而没有高年级，十一二岁的孩子读书就要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十分困难；生病就医尤其不便，一人生病，需要十几个人轮流抬往坝区，几十公里山路，且不说抬人者的辛苦，病人往往因长途抬运不能及时抢救而丧生。尽管梭罗寨的哈尼人尤其是老年人对过去幽静的山寨和丰富的采集、狩猎生活充满着无限的眷恋，然而又十分庆幸能够搬到坝子边缘安家落户。因为现在寨址距公路仅6公里，从村寨到公路可骑自行车，也可开拖拉机，出售农产品以及购买货物比较方便。相距1公里处有国营农场的一个小队，公路边是农场的分场所在地，小病可到小队就医。生活条件的改善确实已非昔日可比了。

梭罗寨现住地原属国有林范围，1967年，麻木树乡的哥里

因寨搬迁到此，开荒垦种。梭罗寨步哥里因寨的后尘，多次派人到此观察，于1982年2月，先移部分男人到此地砍伐森林，备好耕地，4月举寨搬迁。对于梭罗寨的迁移，麻木树乡政府出于



麻木树乡旧龙寨分化迁移图

与邻乡关系的考虑，事前并不同意，但无法阻止。勐捧乡政府开始拒不接纳，当地村寨也极力反对，希望他们返回故地。然而梭罗人坚持不走，径直开荒种粮。1984年勐捧乡政府被迫承认其为乡属寨村，于是划给6200亩山林作为耕地。由于不适于开辟水田，所以全为旱地。

村寨干部根据具体情况，对6200亩林地进行了规划。以2500亩作为轮歇地，栽种粮食；以1000亩作为集体林，以蓄养木材；经济林600亩，发展橡胶等经济作物，另有300亩专门种植甘蔗；风景林500亩，保持村寨环境的优美；水源林300余亩，以涵养水源；此外还有荒山不宜农地1000亩左右。2500亩轮歇地，每人平均可分约15亩，每年全寨砍伐垦种一块土地，面积约在100亩上下。砍伐之前，各户家长集中到地里，由村干部丈量土地分配。一俟分定，今后即长期归其使用。从1984年



笔者与哈尼族的打猎队

到1988年5年间，2500亩轮歇地已经经过了一个循环周期，而且已经全部划分到户。目前的轮歇方法，每块地耕种两年，一年种一块新地和一块旧地，皆种陆稻，新地种长白谷，旧地种短白谷。由于轮歇周期只有5年，因此林相恢复较差。粮食则家家富

足，一般家庭人均产粮 500 公斤左右，少数人家人均产粮 1 000 公斤至 1 500 公斤，粮食多的人家每年可出售余粮 2 000 公斤至 2 500 公斤。经济林 600 亩计划全部种植橡胶，1985 年已定植 300 亩，可惜大部分被牛糟踏。为了避免畜害，该寨不再饲养大牲畜，但是邻寨哥里囤的黄牛还是常常闯入地里，两寨的关系较难处理。1987 年试种甘蔗 50 亩，因灾害较多，管理不善，产量不高。今后计划重点发展橡胶和甘蔗，待两类经济作物有一定产量之后，便可适当减少粮食生产，重新规划林地的轮歇周期，尽可能将其休闲年限延长到七八年，以利于保护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



新平县到低地打工的哈尼族妇女

三、固定地域内移动的民族

所谓固定地域内的移动，是指在本村寨或本民族的土地范围内的移动，而不是像上述民族那样，无视村界、族界、县界甚至省界、国界的任意迁移。在固定地域内移动的民族，不是去寻找新的不属于自己的森林，不是想扩大本村或本民族的土地范围，而是为了靠近农地，就近耕作。由于很多村寨所辖面积大，范围

广，一些农地距离村寨很远，每天劳动往返要行走二小时甚至四五小时，浪费时间，消耗体力，田间管理也跟不上，作为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家迁移到农地附近，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地随山转，人随地走”式的短期迁移。

在固定地域内进行短期移动的民族，有独龙族和怒族等。



怒江峡谷

例一：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边的独龙族。

独龙族的迁移方式，与其居住的地理环境有极大的关系。独龙江峡谷山高、谷深、坡陡、水急。交通梗阻，给独龙族的生产活动带来严重困难。独龙族有一首歌谣充分反映了该区自然环境的险恶：

越丫口、过悬岩，
脚踩天梯手攀藤，

老鹰见了吓破胆，
猴子见了泪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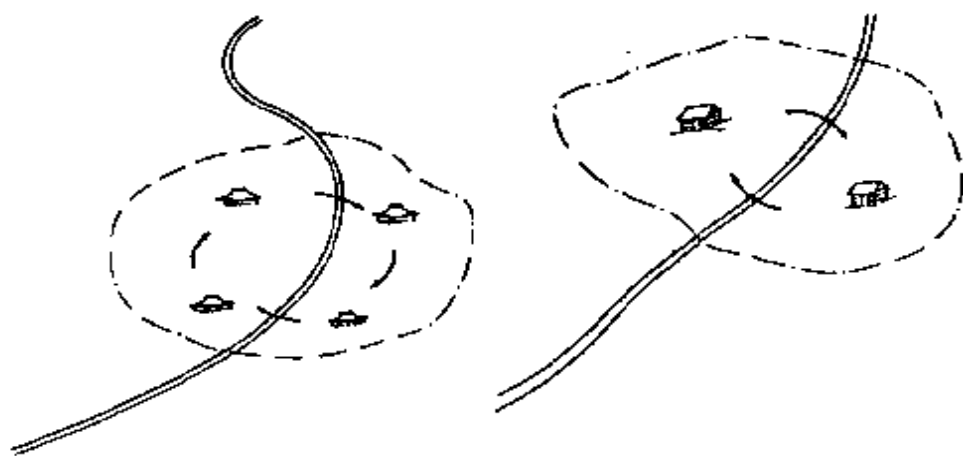
在滇南山地，农地距离村寨远达十余公里，并非少见，人们鸡鸣则起，手执火把上路，日落收工，披星戴月而归，虽然十分辛苦，然而由于山路并不十分险恶，所以还能克服。而在独龙江峡谷，若身背农具、干粮、籽种攀天梯、过栈道、滑溜索，起早摸黑行走几十公里，已是手软脚乏、精疲力尽了，哪里还有干活的时间和体力！秋收后运输粮食将有多么困难，也便可想而知了。因此，独龙族常常采取人随地走、就地而耕的方式从事刀耕火种。像这样经常性地移动住所，自然是很麻烦的，但是和定居往返劳作相比较，可以减少很多的辛苦和大量的往返时间，而且还可减少坠崖、坠江丧生的危险。



怒江溜渡

独龙族的迁移方式，北部和南部有些差别。北部的龙元乡和迪政当乡，森林覆盖率高于南部，气候也比南部寒冷，而且受藏族生活方式的影响，住房形式是以圆木垒叠或以木板镶围而成的坚固的木楞房。建筑这种房子费工费料，不可能轻易抛弃，亦不可能拆卸搬走。于是，那里的独龙族一般都在江东和江西同时建造两座房屋，耕种江东之地时住江东，耕种江西之地时则住江西，4年~5年搬迁一次。20世纪50年代以前傈僳族头人常深入独龙江流域进行掳掠骚扰，在江东居住的独龙族为了免受其害，夏秋两季也常常避处于江西，春冬时期大雪封山，强盗难以进山，则又搬回江东。

社区南部的孔目、孟底、马库一带，气候比较温暖，生活方式与缅甸北部的民族接近。所居房屋是所谓“千脚落地”的干栏式木竹楼，房屋四壁仅以篾笆装围，上覆茅草，极为简陋。这种房屋取材方便，建造容易，使用寿命很短，连续居住三年，即破旧不堪，即便周围耕地还可以继续耕种，房屋也必须重新修盖了。由于没有房屋因素的束缚，南部独龙族迁徙比较频繁，每个住址最多三年，少则一年，住址选择完全取决于耕地，哪里方便耕作和生活，便搬到哪里。



独龙江南部迁移示意图

独龙江北部迁移示意图

独龙族固定地域游耕的两种方式 (1992)

独龙族除了上述这两种迁移方式之外，还有季节性的移动。譬如有的土地稍远，往返不便，又不必完全搬迁，于是待农作物播种之后，家庭全部成员或部分成员便搬到地里窝棚中居住，一面管理、守护庄稼，一面采集、狩猎，一直到秋收才搬回村寨。

例二：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的怒族。

在贡山县北部，沿怒江分布着丙中洛、喇嘛寺、切空当3块台地。在这3块台地中，以丙中洛面积最大，它是怒江峡谷唯一称得上比较开阔的地方。丙中洛台地海拔约1450米，坐落于怒江西侧，从高黎贡山脚下倾斜延伸至江边。这里杂居着藏族、怒族、傈僳族、白族等民族。50年代前丙中洛仅有30多户人家，而1987年已经增加到100多户了。



怒江边怒族的石片瓦房

丙中洛地区的怒族与南部福贡等地的怒族之间具有较大差别。从房屋建筑来看，北部怒族居住土筑墙上覆石片的平顶房或圆木垒叠上覆木板的木楞房，南部怒族则多居住干栏式竹篾房；从语言上来看，北部怒语近似独龙语，其发音和语法均与南部怒语不同；从生产技术看，北部怒族受藏族影响较多，使用锄犁耕种水田，且有积肥、施肥以及复种等生产技术，南部则比较

粗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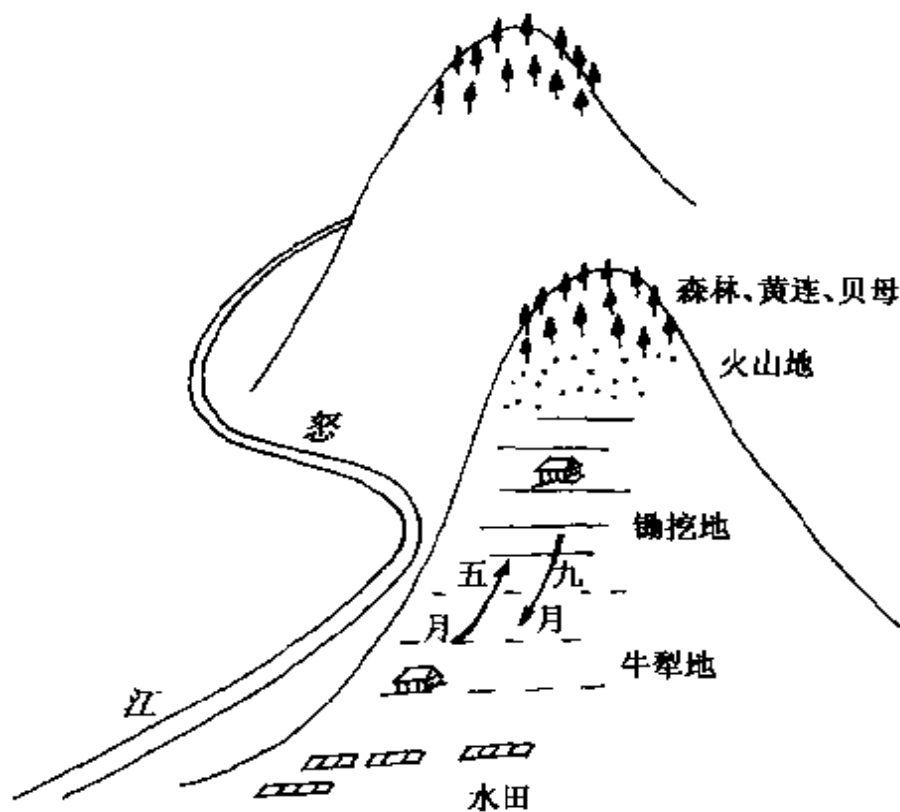
然而，在生产方面，北部怒族和藏族仍然有所区别。藏族完全不从事刀耕火种农业，而怒族直到 80 年代还部分沿袭着这种生产方式。其土地类型也与南部一样，分为火山轮歇地、锄挖地、牛犁地和水田，只不过居住江边台地的以牛犁地和水田为主，而居住于高山的则以火山轮歇地为主。

三类旱地有不同的耕种方法。牛犁地和部分锄挖地是不轮歇的固定耕地，一靠施肥，二靠作物轮作。轮作方式第一年种荞，第二年种玉米，第三年种麦子或继续种玉米，三年一轮，一直循环下去。但如果是肥沃的好地，可一直栽种玉米；如果土地贫瘠，则可连续栽种荞。牛犁地又多实行复种，四五月间种玉米，



漆树是怒族种植的重要经济林木之一

九月收获，十月接着播种青稞，翌年五月青稞又熟，一年两季，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除了复种，间、套、混种也是传统的生产技术。火山地一般种一年玉米抛荒三年，或头年种玉米，第二年再种玉米或芋头，然后抛荒三年至五年。怒族学习独龙族，也在火山地中栽种水冬瓜树进行粮林轮作。砍烧森林种植一年后，即栽种水冬瓜树苗。树苗于冬天进山采集，背回村寨泡于水沟之中，清明时节移栽到地里。由于有植树的习惯，所以过去还有人专门采集树苗，每十棵捆成一把，作为商品出售。



丙中洛怒族的垂直迁移示意图

该区怒族 50 年代以前最突出的耕作特点，是季节性的垂直游牧游耕。由于水田、牛犁地、锄挖地、火山地以及黄连地五种地类依次从江边分布到高山，上下远距离往返耕种运肥、运粮颇为艰难，而且峡谷气候垂直差异十分显著，夏季深谷闷热，冬季山顶严寒，皆不宜长年久居。所以过去丙中洛一带几乎所有的怒族

人家都建有两处居所，一处江边，一处高山。一年之中，根据农牧业的需要和气候的变化，时而居于江边，时而迁往高山，形成了有规律的季节性垂直游耕游牧生活方式。下面记述该地一年的生产过程，从中可以了解怒族季节性垂直游耕游牧方式。

1月和2月，山顶积雪，河谷温暖，人畜住于江边。年头的农事活动有积肥、砍火山地、犁头道秧田、栽种马铃薯、薅青稞地等。积肥以绿肥和厩肥相结合，从山中采集大量绿肥铺垫于畜厩之中，过一段时间又从厩内取出堆于户外。肥料是保证水田和牛犁地收成的关键，因此每家于每年春天都要投入大量劳力从事此项工作。火山地于头年秋冬之际开始砍伐，1月继续砍树。

3月继续积肥、薅青稞地、种马铃薯，同时开始撒秧、犁板田、铲田埂、挖麻地、栽种瓜豆，并在抛荒的火山地上栽种水冬瓜树。

4月收割青稞、小麦、豌豆、蚕豆，开始烧火山地并播种玉米。水田栽秧，麻地撒种麻籽，牛犁地施肥、犁地、播种玉米。

5月继续烧地、背肥施肥、犁地，播种玉米、栽种芋头、收小麦。山顶积雪消融，全村的大牲畜集中由专门指定的放牧者赶到高山草场放牧。

6月进入雨季，水稻、玉米地薅完头道草之后，大部分人便搬迁上山居住。上山可避免洪涝、泥石流、滑坡等灾害，也便于守护高山上的火山地，使之免受野兽的糟踏，同时到高山地挖采黄连、贝母。

8月割麻、收早玉米。

9月收玉米、割打稻谷、割麻。

10月继续收获玉米，割麻，犁麦地、青稞地。此时气候渐趋寒冷，牲畜从高山牧场转入深谷，人们也陆续搬回江边，于10月底以前全部回到江边居住。

11月山顶下雪。播种小麦、燕麦、青稞、豌豆、蚕豆等，

开始砍火山地。

12月砍火山地、采集水冬瓜树苗、砍柴、积肥。

《新唐书·南蛮传下》载：“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怒族不仅“随水草畜牧”，而且还随林而耕，随经济作物而移。目前，丙中洛一带的怒族虽然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这种垂直移动的生活方式，但是相似的状况尚存在于其他民族之中。例如迪庆州的中甸县东部九龙等地的彝族，其村寨建于山谷之中，每年2月赶牛、羊、猪迁往高地，在海拔3000米~4000米的森林地带砍伐杉、松等树木建筑房屋，圈围畜圈，放牧牲畜，并栽种蔓菁（生长期5月~10月）。7月先送羊下山，10月收了蔓菁便与全部牲畜一同返回低地村寨。

四、定居民族的分寨迁移

云南有一部分喜好迁移的刀耕火种民族，然而也有比较多的刀耕火种民族不习惯迁徙，过着长期定居的生活，遵循着不能轻易离开祖先故土、故居的规矩。但是在最近的50年当中，在这些定居民族中也出现了可以称做迁移的现象。他们的迁移与前述哈尼族等的迁移有某些类似之处，即都是以分寨的方式进行移动，而且这种分寨移动也都是因为人口膨胀、村寨拥挤、土地紧张、生存条件恶化造成的。不同之处在于，哈尼族、瑶族等的迁移是随意的，没有边界的，而定居民族的分寨移动则是在村寨所有土地范围内的移动。定居民族的范围不大的移动，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人地关系的矛盾。例如搬迁一部分人家到本村远离村寨的地方就地耕作、建立新寨，以减少长途耕种的辛苦，缓解村寨的拥挤状况；或者到本村比较远的未开垦的森林中另建新寨，开辟农地，以解决土地不足的困难；或者到本村的河谷低地中建

造住所，开垦水田，以减少对刀耕火种农业的依赖。云南刀耕火种民族的分寨现象，较多地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期这一段时间，主要原因有三点。第一，50年代以来，山区卫生医疗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各民族人口增长迅速，土地资源不足的问题变得突出了。第二，50年代中期之后，农村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各民族大多不再以原有的村寨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和政治社会活动，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从事各种社会和经济的活动。一个村寨可以是一个生产队（小村），稍大的村寨则往往被分成两个或三个生产队，生产队代替了原来的村寨的功能，村寨的分化已经成为既成的事实。第三，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不断地鼓励和要求山地民族迁出深山，下到低地或交通便利的地方，有的地方还派遣了工作队具体督促指导此项工作。在以上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以来一直恪守不离开祖先所居寨址的传统，喜居凉爽、清净的高地，并对低热生态环境和低地民族怀有恐惧心理的山地民族，终于改变了观念，采取分寨的形式把一部分人迁移到了低地。

目前在滇西南山地，到处都有叫做老寨、新寨或上寨、中寨、下寨或大寨、小寨或一队、二队、三队这样一些名称的村寨，这就是近50年来村寨分化的结果。下面略举几个分寨移动的例子：

例一：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乡布朗族村寨曼散。

曼散寨坐落于海拔1250米的山林中，该寨从建寨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经历了10代人。曼散原来是一个村子，1968年2月分成了3个村寨：老寨、中寨和下寨。老寨留于原地，中寨搬迁到海拔约740米的半山地带，下寨迁往海拔600米的昆洛公路旁边，一个村寨变成了垂直分布的3个村子。分寨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增加，村寨拥挤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和困难；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尽可能地开发利用本村分布于各个高度带的土地。曼散的分寨式的迁移，只是在本村原有范围内的移动。中寨

和下寨虽然已经移往低地，但是两村的村民仍然不放弃原有高地的刀耕火种地；而老寨人也不愿意放弃原本属于自己的低地的水田，人们仍然是从山上到山下往返劳作。由于低地水利条件好，交通便利，有利于经营水田和发展热带经济作物，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寨尤其是下寨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明显优于老寨，因此原先不愿意下山居住的老寨村民也强烈希望搬迁到低地。笔者1988年初春到老寨调查之时，他们已决定来年迁移。曼散布朗族营造了两百多年的清幽的森林中的老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例二：德宏州盈江县卡场乡的景颇族村寨。

卡场的景颇族，一直实行着无轮作轮歇方式的刀耕火种。总的来看，该区大部分村寨的土地面积比较大，村寨的范围比较广。从聚落形态来看，也很有特点，大多是散村形态，村寨中各家房屋之间的距离都比较远，原因主要是可以防范大规模的火灾发生。土地多，村寨散，可以说是一种潜在的分寨因素。最近50年来，由于人口增加、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原因，分寨现象变得显著了。例如乌帕寨分成了两个队（寨），东明洋寨分成了三个队（寨），草坝寨分成了两个队（寨），卡连寨分成了两个寨，卡场寨分成了两个寨。每个村寨的分化，都是人口分布的一次重新调整。

例三：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乡的基诺族村寨。

基诺族是定居的刀耕火种民族，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他们一般是不轻易迁移的。例如巴亚寨，传统的观念认为，无论是土地、村址还是房屋的地基，都是祖先选定传下来的，是不能变动的。因此每家每年去选择土地要尽量找到自家曾经种过的土地，在地里盖窝棚也必须盖在原来的位置上；修房或重新建房，不能挪动原来的地基，甚至每一根柱子的位置也要和原来一样，不能偏移。就是这样一个民族，5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人口等的变化，传统观念也随之改变了，打破了不能移动的禁忌，自1961年开始，相继发生了

分寨移动的现象，下表记录了基诺乡分寨移动的情况。

基诺乡分寨迁移一览表

原村寨	分化村寨	分化、移动时间	移动方向
巴亚	巴亚新寨	1961年	低山地
	巴亚中寨	1974年	中低山地
	巴亚老寨	1974年分、1976年移	原高地
司土	司土新寨	1964年	低山地
	司土小寨	1964年	低山地
	司土老寨	1964年分、1971年移	原中山地
巴卡	巴卡新寨	1965年	中低山地
	巴卡小寨	1971年	低山地
	巴卡老寨	1971年分、1976年移	原高地
曼海	曼海小寨	1971年	低山地
	曼海中寨	1971年	低山地
	曼海大寨 (下寨)	1971年	低山地
石咀	石咀新寨	1962年	中山地
	石咀大寨	1962年	中山地
曼伞	小曼伞	1968年	低山地
	大曼伞	1968年	中低山地
巴沙	巴沙小寨	1965年	中低山地
	巴沙新寨	1974年	中低山地
	巴沙老寨	1974年	中山地

60年代至70年代，基诺乡除了表中所记的村寨发生过分化移动之外，其余村寨也都在本村的范围内搬迁过。据统计，1958年整个基诺乡有32个村寨，经过20年的变迁，现在已达到45个了。

本节从迁移的角度考察刀耕火种，通过对云南刀耕火种民族的几种迁移方式的比较，以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从迁移的角度审视，云南的刀耕火种同样表现出较大差异性。有的是任意频繁地迁移，有的是任意缓慢地迁移，有的是在固定地域内经常性地移动，还有近40年来不断出现的分寨现象。迁移方式的差异，源于民族源流和族属的不同以及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态环境、社会和人口的变化等多种原因。

第二，在刀耕火种民族之中，既有喜好迁移的民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尚有很大一部分民族是不迁移的，是长期定居的。对此并非人人都能了解，因此学术界不少人把刀耕火种叫做游耕，把刀耕火种民族称之为游耕民族。什么是游耕？顾名思义，就是居无定所、到处迁徙耕种的意思。把刀耕火种统统称之为游耕，显然是一种误解，误解的原因，多半是把迁移和轮歇混为一谈了。例如历史文献记载刀耕火种，常有这样一些说法：“数易其土，以养地力”，“每岁必易其土，以养地力”，“今年种此，明年种彼，依次轮植”，“连收三、四熟，地瘦弃置之，另择它所”等等。对于这类记载，很多人都误解为迁移，即游耕，然而稍加分析却不难看出其所言并非迁移而实为轮歇。抛荒旧地，耕种新地，并不一定要迁移。游耕和刀耕火种的关系，就像游牧和畜牧一样，游牧不完全等同于畜牧，游耕也不完全等同于刀耕火种。游耕在刀耕火种范畴内，只是它的一种类型，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低一层次的概念。如果按照定着性来分类刀耕火种的话，那么除了游耕之外，还有定耕即非游耕的类型。在云南的山地民族中，定耕刀耕火种的比例甚至比游耕更大，布朗族、佤族、景颇

族、基诺族和很大一部分拉祜族、傈僳族、哈尼族、怒族等，都是定居耕作的民族。

第三，刀耕火种民族的迁移，不管采取哪种方式，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资源、为了生存。前面几章说过，当人口与森林资源的矛盾变得突出起来，当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遭到破坏，当人们的生存陷于困难和危机，人们便不能再按照传统的方式活下去，就要想办法找出路，就必须进行改革。或放弃无轮作方式而选择轮作，或向人工造林轮歇的方向发展，或开垦水田或增加林业产品以减少对于刀耕火种的依赖，而最简单最便利的方法，就是迁移。正因为如此，迁移便成了一些刀耕火种民族惯用的摆脱生态困境的方法。而长期频繁地依赖迁移，必然又会对人们的社会、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事实上，当我们接触到游耕民族的时候，在其文化的方方面面，都会使人深刻感受到迁移的烙印和影响。对于游耕民族而言，迁移实际上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和形式，而是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了。

第四，当迁移不再只是一种生存手段，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之后，事情就变得十分复杂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政府出于对游耕民族的关心，曾经想出各种办法希望他们不要再东奔西跑，餐风露宿，与人世隔绝，希望他们走出深山，下到低地，过定居的生活。为此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诸如为他们建盖漂亮的现代住房，给予他们优厚的安家费用，给予他们粮食和衣服等救济，给他们分配水田并教其耕种水田的技术等等。然而，这么多优厚的条件并没有使游耕民族感动和高兴，他们仍然坚持要在深山老林中游荡。如果要强行使他们走出森林，迁往低地，住进政府为他们盖好的房屋，那么不要多久，他们又会悄然返回山林，不知去向，只剩下座座空房。无数事实说明，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的改变，是不可能

短时期内完成的。不了解这一点，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杜绝和消灭游耕现象，那只是一种主观的愿望，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还会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

第五，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是不可以强行改变的，然而这并非是说它们是不可改变的。任何文化都不是静止、僵化的，而是动态的、演变的，迁移也是这样。40多年来，云南刀耕火种民族的迁移，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方面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70年代以前，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一般都不愿意迁移到低地，习惯于任意迁移的民族更是视低地为畏途。如前所述，西双版纳的哈尼族就有这样的说法，住坝子、河谷容易生病，会头痛，甚至会变成哑巴。他们还有一句俗语：“鱼上树不会动，老鼠下河会淹死，哈尼下坝不会生活。”正因为如此，所以过去哈尼族迁来迁去总离不开高山。但是到了80年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由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市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低地居民大量种植热带经济作物，现金收入大量增加，生活很快富裕起来。看到低地的巨大变化，山地民族也开始感到居住山区的不利。由于山区海拔高、气温低，很多村寨不能种植经济作物，而且交通不便，医疗和孩子教育等条件也远远比不上低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山区和低地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在这样的形势下，山地民族自然会产生对于低地的羡慕和向往，而这种情绪在40岁以下的新生代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年轻人仰慕现代文明，不愿意像老辈人那样过与世隔绝的森林生活，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很多村寨向政府提出了向低地迁移的请求，有的是获准搬迁的，有的并没有得到批准便自发强行闯入了低地，于是引起了很多的纠纷。从视低地为畏途，政府怎么请他们也不下山，到视低地为福地，积极要求下山甚至强行搬迁，可谓思想观念的一个巨大转变。这样的变化使我们感受到，虽然有的刀耕火种民族依然希望利用迁移来改变生存的环境和状况，然

而迁移的内容和实质都与传统相去甚远了。

和许许多多文化现象一样，迁移游耕也是一个历史范畴。几乎就在一些山地民族认识到必须迁往低地生活的同时，迁移的条件却不复存在了。由于各民族人口和移民的增加，到了 80 年代，云南西南地区的人地矛盾已经相当突出，任何外来移民的迁入都会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另一方面，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森林也因管理体制的完善和法制的健全而基本上杜绝了随意毁林开荒的现象。1983 年，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森林土地政策，在每个县、每个乡、每个村都严格划定了国家、集体（村寨）、农户的土地范围，这样一来，所有的森林土地都有了明确的权属和严格的管理。这项政策的实施，客观上起到了合理限制游耕的效果。因为任何地方已经不可能再找到可以任意砍伐耕种的森林土地，所以只能实行定居耕种。这样一来，迁移游耕这种千百年来一直为很多刀耕火种民族惯用的生态调适方式，由于其依存的社会和生态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终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四节 坝子和山地人类生态系统的比较

在云南的西南部，垂直分布着两类截然不同的人类生态系统：一类是坝子或称盆地的傣族的生态系统，另一类是高地或称山地的刀耕火种民族的生态系统。坝子的人类生态系统，是习惯于在炎热的气候中生存、喜好临水而居、具有悠久的水田灌溉农业历史的傣族与海拔低、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炎热的盆地或称坝子这样的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产物；山地的人类生态系统，则是众多习惯于在比较凉爽的气候中生存、喜好大山和森林并具

有丰富的山地资源利用知识的民族与海拔高、森林茂密、气候凉爽的山地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产物。比较研究两个人类生态系统，能够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山地民族及其刀耕火种农业的生态文化内涵，能够进一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坝子人类生态系统

坝子，是云南人对盆地的叫法。云南西南地区的坝子，与山地相比，面积很少，只占该区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左右。但是坝子海拔低、地势平、土壤肥沃、水源丰富，生存条件十分优越。在云南热带、亚热带坝子中居住的民族，主要是傣族。傣族是当地的土著民族，他们的先民是越人，秦汉时代叫滇越，越人是最早种植水稻的人类集团。

水田灌溉农业，是傣族生态系统的核心。傣族种水稻，吃大米，依赖稻米为生，是典型的稻作民族。20世纪50年代以前，傣族地区人稀地广，人们于三四月育秧，五六月栽秧，十一二月收获，然后使水田休闲，在田里放养鸡、猪、牛。鸡食虫类和掉落于田中的谷粒，猪牛吃草，家畜粪便归田，半年的休闲，可使地力恢复，所以傣族种田不施肥料。50年代以后，内地汉族去了西双版纳等地，用汉族的种田方法和傣族相比较，立即得出下述三个结论：第一，傣族太懒，有那么好的自然条件却只种一季稻而不种双季稻；第二，傣族不懂科学，种田不施肥，种的是“卫生田”；第三，傣族耕作技术落后，不进行深耕细作。后来一些傣族地区在压力之下改种一季稻为双季稻，不料双季稻的收获量还不如只种一季稻的收获量（指五六十年代），而且田变瘦了，人也十分辛苦。由此可见，傣族恐怕不是不懂“科学”，他们的“懒”和“落后”自有他们的道理。



西双版纳傣族村寨

西双版纳傣族村寨



耕作水田



插秧

傣族是糯食民族，与山地民族区别明显，山地民族喜食没有粘性、比较硬的粳米，而傣族却喜食糯米饭。傣族传统的水稻品种大部分是糯米和软米，糯米有白糯、紫糯等很多品种。德宏一带傣族的软米，颗粒细长，白中带绿，晶莹剔透，煮出饭来，雪白粘软，清香四溢，过去曾经是敬献给皇帝的贡米。

自 60 年代以来，由于当地人口和移民的增加，傣族人均所有水田面积越来越少，依靠传统农业维持生计也越来越困难了。于是不得不进行改革：改种一季稻为种双季稻，以高产的杂交稻代替传统水稻品种（保留少量传统品种供自己食用），为了保证收成而施用化学肥料。傣族传统的有机农业正在向现代化学农业转变。

傣族的水田稻作农业，尽管 50 年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它作为傣族人类生态系统的核心结构这一点仍然没有改变。围绕这一核心结构，还有园圃农业、渔业、林业、手工业、家畜饲养等副业。

傣族的园圃，分布于住居房屋的周围和村寨附近，用于栽培蔬菜。常见的蔬菜种类有白菜、青菜、四季豆、豇豆、蚕豆、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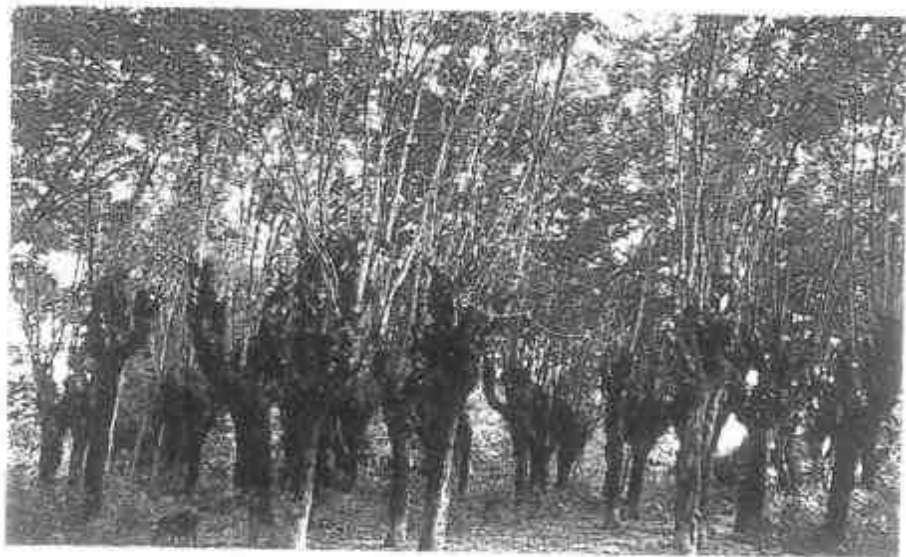
庭院中栽种的多种植物

豆、辣椒、茄子、南瓜、黄瓜、西红柿、韭菜、苦瓜、萝卜、莴笋、芋头、马铃薯、姜、葱等。所栽的蔬菜除了自己消费之外，还到市场出售，是重要的小商品作物。傣族有出售农产品的传统，在坝子的集市中，出售小商品的人最多的就是傣族妇女，她们卖大米、蔬菜、水果，还卖糯米饭、糯米粑粑、酸笋、酸鱼等食物。傣族卖菜，完全不像汉族那样大堆大堆地随意堆放，而是分置、捆扎得十分整齐精致，体现着傣族妇女纤细、柔美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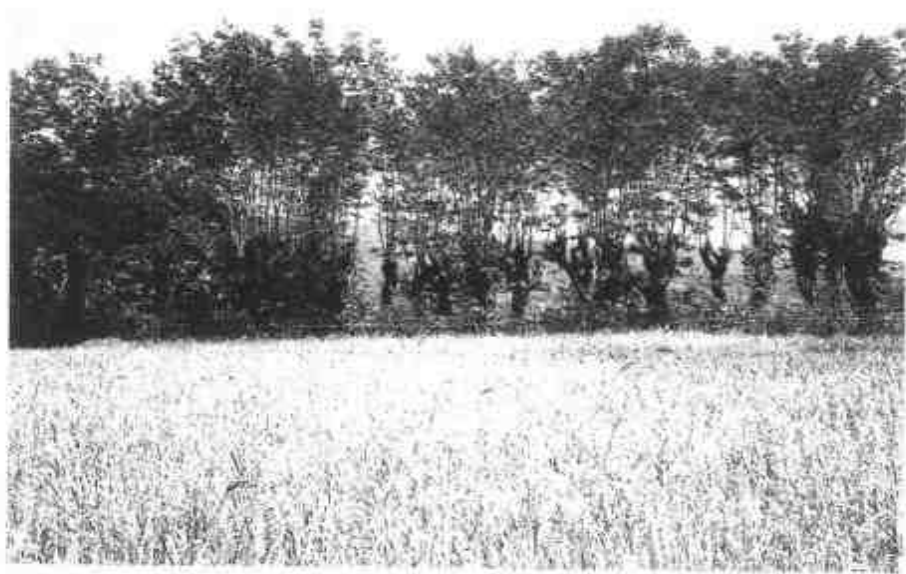
市场出售的小商品作物，不只是园圃的农产品，还有庭院产品。傣族住宅宽敞，几乎每家都有一个庭院，庭院中通常栽种香蕉、柚子、芒果、椰子、槟榔、菠萝蜜、木瓜、西番莲等水果，此外还有药材、香料、染料、竹子等植物，种类多达数十种。庭院植物种类多，用途广，经济效益也很好。山地民族的一部分刀耕火种地是“百宝地”，傣族的庭院也是“百宝地”。

说到傣族的园圃和庭院，还应该特别提到他们的薪炭林。傣族具有人工种植薪炭林的优良传统，人工种植薪炭林，不仅可以解决生活燃料及部分建筑材料的来源，而且还能够美化和优化环

境。薪炭林一般分布在村寨附近，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园圃和庭院周围以及田边地头都有种植。薪炭林的树种是黑心树，因其树心呈黑色而得名，也有人把它叫做铁刀树，那是因为这种树木质坚硬。黑心树含油脂，易燃耐烧，而且具有旺盛的生长力，砍去主杆，不仅不会死去，反而会发生很多枝条。每家只需种植数十棵，便不愁烧柴的问题了。大凡到过傣族村寨的人，都会对黑心树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树林与傣族的干栏式住房、庭院、园圃、水田融为一体，构成了傣家特殊而美丽的风景线。西双版纳景洪市有一个曼厅公园，面积很大，栽满了粗大的黑心树，那是对傣族薪炭林的新开发、新利用。目前在中国内地旅行，很多地方一眼望去到处是光秃秃的山坡、干巴巴的泥土村寨，没有青山，没有绿水，没有竹子，没有树木，一派荒凉景象。有的地方为了烧柴，必须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寻找，山穷水尽，活得很累很苦。然而他们为什么不像傣族那样种植薪炭林呢？是文化的失落和缺陷？还是缺乏生存的智慧？不管怎么说，傣族的这个传统确实是特别的优秀，尤其值得其他民族很好地学习。



薪炭林（铁刀木）



田边地头栽种的铁刀木



捕 鱼

傣族种植水稻，临水而居，自然有渔业之利。池塘养鱼，稻田养鱼，河流、水田之中可捕鱼、捉螃蟹、摸泥鳅、夹黄鳝。鱼类是傣族食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傣味菜谱中的特色菜。例如酸笋鱼、香茅草烤鱼、螃蟹酱等就非常有名，不仅傣家人喜欢吃，外地客人到来也必定点名要饱此口福。就像山地民族酷爱打

猎一样，傣族亦酷爱捕鱼，男人们只要几天不去打鱼坝、设鱼笼、搬罾、撒网，便手痒难耐，浑身不自在。



鱼塘捕鱼



沐浴和洗鱼

傣族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传统副业，榨糖就是其一。傣族居住的热带坝子，适宜种植甘蔗。傣族吃糯米，糯米食品加红糖既有营养又十分好吃。傣族好客，客人来访必以红糖招待。傣族信奉佛教，红糖是啖佛的重要供品。红糖除了自己消费之外，还作为商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所以种甘蔗、榨红糖在傣族民间是十分普遍的。傣族传统的榨糖方式和木制榨糖机，完全可以构成一座“传统制糖博物馆”。从机械的角度看，既有直立式直齿二滚轴木榨机，又有直立式人字齿二滚轴木榨机，还有直立式弧形齿三滚轴木榨机，甚至还有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消失了的卧式人字齿水力木榨机。从动力的角度看，既使用人力驱动，又使用牛力驱



榨 糖

动，还有利用水力驱动的。如此丰富的传统的榨糖技术和机械尚比较完整地保存于傣族之中，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它们对于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近年来，由于现代大型制糖厂的建立，对傣族传统的制糖业冲击很大。与现代榨糖技术相比，传统榨糖方式效率低，出糖率也较低，现代技术取代传统方式，那是必然的趋势。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注意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制陶业也是傣族的一项传统副业。很多学者把傣族的传统制陶业视为原始制陶术，原因是傣族制陶尚保持着使用脚踏转轮和以明火烧陶等古老的技术。目前由于市场上可以买到各种金属和塑料器皿，所以傣族的制陶业已经不如过去兴旺，但是陶器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和纺织一样，制陶也是傣族妇女的工作，她们利用农闲时间制作和出售陶器，可以增加一些现金收入。

傣族的副业还有造纸业。和制陶一样，傣族的造纸业也被视为原始造纸技术。傣族不愧是善于发明简单实用工具的能手。例如只使用一对木锤，便可在石板上把构树皮敲烂做纸浆；用几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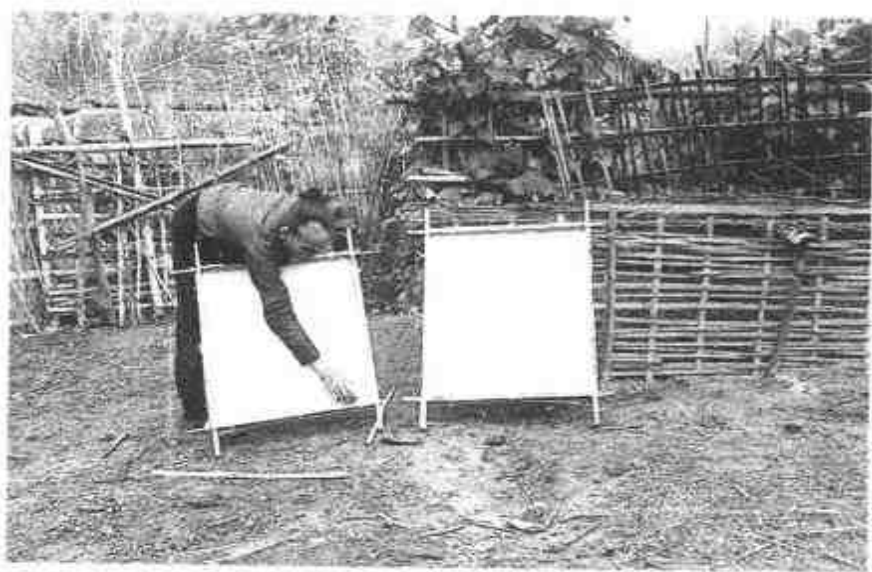
制 陶



出售陶器



晾 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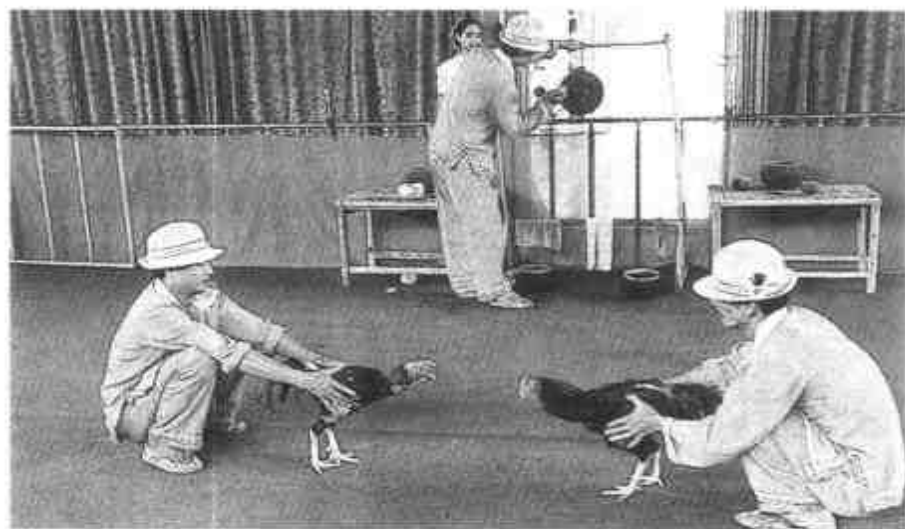


抄纸浆

木头和一块纱布，就可以做成抄纸浆的抄纸框；在小水沟中拦一个小坝，便成为抄纸水池。这些工具和设备看似十分地原始、简陋，然而却能生产出一张张雪白的棉纸。纸的用途，寺庙买去抄写经书，老百姓买去制作宗教用品或给孩子练习毛笔字，还有的用作包装纸等。傣族造纸也和制陶一样，有世代相传的造纸户，也有世代传承的造纸村。由于具有传统的销售市场，估计傣族的造纸业还会存在下去。

家畜（禽）饲养业在傣族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通常的饲养对象有水牛、黄牛、猪、鸡、鸭等，然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饲养斗鸡。傣族是云南少数民族当中唯一具有斗鸡习俗的民族。西双版纳被认为是原鸡的起源地，傣族饲养的本地斗鸡，就是与山林中的原鸡极为近似的一种比较矮小、大部分羽毛呈红色、鸡冠肥大的十分惹人喜爱的公鸡。传统傣族斗鸡多半是一种游戏，是人们劳动之余的一种消遣方式。在西双版纳，最近斗鸡已成为旅游业的一个表演项目。为了使之更具娱乐性和竞技效果，传统的个子矮小、力量较弱的本地斗鸡便难以满足需要，于是一些人把国外的斗鸡引了进来，其中有特别高大雄壮但是不太聪明灵活

的越南斗鸡，有既骠悍强壮又聪明灵活的泰国斗鸡，还有个虽不太大但是头脑特别好使的缅甸斗鸡，而几类斗鸡相互杂交，又生出了新的斗鸡品种。饲养斗鸡利润比较高，在西双版纳，一般的鸡 1 公斤仅能卖 20 元至 24 元，而不足 0.5 公斤的一只小斗鸡便可以卖到 40 元至 60 元，大的比较好的斗鸡则可以卖到 500 元以上。有利可图，斗鸡饲养业随之兴旺起来。



斗鸡比赛

以上诸项，既是傣族的传统副业，又是傣族有特色的文化。但是如果只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这些副业的收入其实是有限的，因为传统的傣族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副业的收入，只是起到对农业的补充作用。然而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情况便大不一样了，商品经济开始在傣族社会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使傣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商品经济不是传统副业的发展，而是新兴的橡胶种植业。

橡胶种植业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从外地引入到云南南部的。橡胶是热带植物，云南引种橡胶成功，扩大了世界橡胶的种植地带，这是中国科学家的一个杰作。在西双版纳地区，只有海拔 800 米以下的坝子、河谷和低山坡地才适宜种植橡胶，显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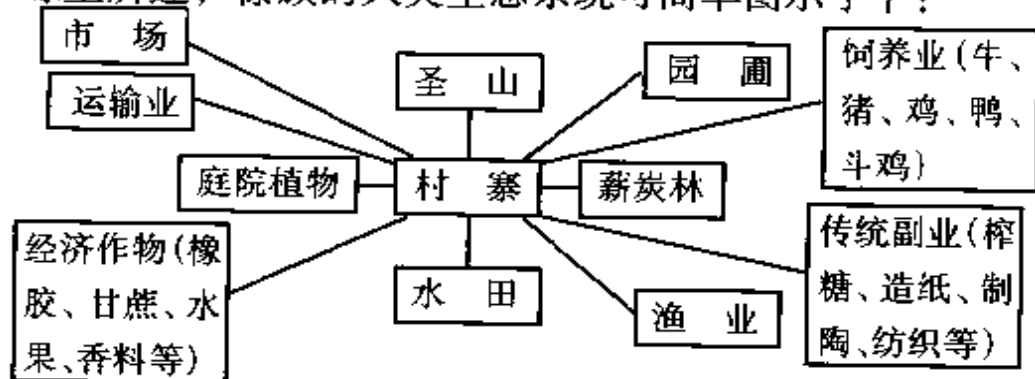
这样的自然环境主要是傣族居住的地区。在政府的大力倡导、支持和科技人员的指导之下，傣族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天时、地利等条件，种植了大量橡胶。从60年代到80年代，橡胶市场价格一路上扬，给傣族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橡胶成了傣族的摇钱树。



傣族种植的香料植物

目前傣族比较重要的经济作物，除了橡胶之外，还有香蕉、椰子、芒果、柑橘、菠萝、西番莲等水果产品。上面说过，甘蔗是传统的经济作物，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傣族地区相继建成了一些制糖工厂，对甘蔗的需求量很大，所以甘蔗种植业已经成为傣族地区的一项支柱产业。

综上所述，傣族的人类生态系统可简单图示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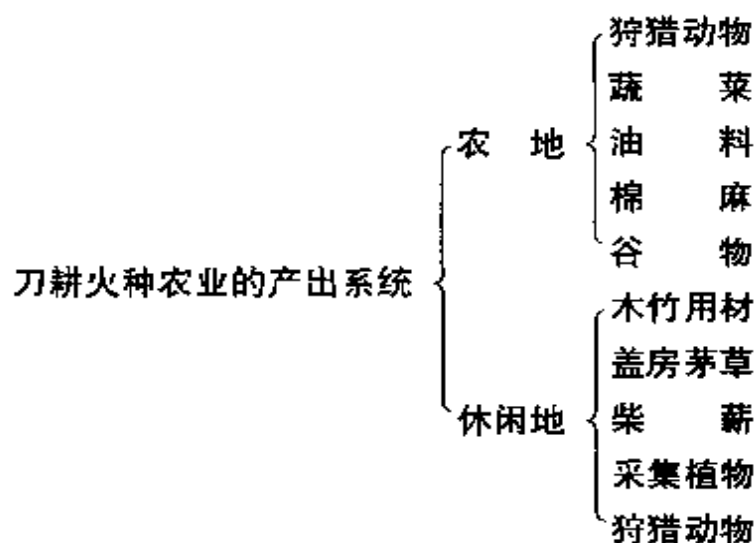


傣族的人类生态系统示意图

二、山地人类生态系统

云南西南部的山地，面积约占该区总面积的 94%，海拔高度在 600 米至 2 000 米之间，气候比坝子凉爽。山地中分布的 10 余个民族，有土著民族，也有从遥远的北方和东北方迁移来的民族。山地民族适应山地森林自然生态环境，千百年来，一直依赖刀耕火种、采集、狩猎为生，形成了和坝子傣族截然不同的人类生态系统。

山地和坝子人类生态系统的差异，首先是农业的差异。坝子的水田种水稻，需要灌溉，需要精耕细作；山地的刀耕火种地主要种植陆稻和玉米等作物，没有灌溉设施，作物靠雨水生长，不需要过多地耕作，甚至不需要耕作，但是必须砍树和烧树。从两种农业的产出来看，水田的产出比较单一，而刀耕火种的产出都非常丰富。仅从稻谷的品种来看，80 年代笔者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勐罕坝调查，了解到傣族的水稻品种只有 10 余种，而紧邻勐罕坝的基诺山却有陆稻品种 70 余种。在本书的第二章里曾介绍过几个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的产出，由于刀耕火种的栽种作物很多，所以人们把它叫做“百宝地”。刀耕火种为什么具有栽培作物多样性的特征？这是因为：第一，山地交通不便，必须自给自足，所以要尽量栽种各类必要的农作物；第二，山地的土壤、坡度、气候等自然条件复杂多变，所以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土地条件选择栽种不同的农作物；第三，多栽几种农作物，遇上自然灾害，不至于全无收成，是一种防灾措施。刀耕火种农业产出丰富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不仅有益农地的产出，而且还有休闲地的产出。土地抛荒休闲，是为了恢复地力，生长树木，然而同时也会伴生出多种林产品。



关于刀耕火种农业栽培作物的多样性，许建初、龙春林等分别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的勐宋村和基诺山做过调查，兹将他们的统计资料引用于下。

表1 轮歇地栽培作物多样性编目（包括保留植物）^①

Table 1 Inventory of diversity of swidden crops in Mengsong
(including preserved useful plants)

作物种类	拉丁名	种植方式
旱稻	<i>Oryza sativa var. spontanea</i>	片状
玉米	<i>Zea mays</i>	片状
红薯	<i>Ipomoea batatas</i>	块状
芋头	<i>Colocasia esculenta</i>	带状间作
大芋头	<i>C. gigantea</i>	零星
木薯	<i>Manihot esculenta</i>	零星

^① 许建初等：《勐宋轮歇农业系统中作物物种及品种的多样性研究》，载裴盛基等主编的《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1版，48～5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引用时进行了修订和删减。）

(续上表)

作物种类	拉丁名	种植方式
山药	<i>Dioscorea esculenta</i>	立体间作
薏苡	<i>Coix lachryma-jobi</i>	地边
魔芋	<i>Amorphophallus konjac</i>	与旱稻间作
芭蕉芋	<i>Canna edulis</i>	零星
小芭蕉芋	<i>C. sp.</i>	零星
马铃薯	<i>Solanum tuberosum</i>	零星
向日葵	<i>Helianthus annuus</i>	带状间作
苏子	<i>Perilla frutescens</i>	间作
花生	<i>Arachis hypogaea</i>	块状
蓖麻	<i>Ricinus communis</i>	零星
绿豆	<i>Vigna radiata</i>	与玉米间作
南瓜	<i>Cucurbita moschata</i>	与玉米间作
地黄瓜	<i>Cucumis hystrix</i>	与旱稻间作
冬瓜	<i>Berincasa hispida</i>	与旱稻间作
荞	<i>Fagoyrum esculentum</i>	零星
烟草	<i>Nicotiana tabacum</i>	块状
豌豆	<i>Pisum sativum</i>	零星
四季豆	<i>Phaseolus vulgaris</i>	零星
大花纹豆	<i>Ph. sp.</i>	间作
矮生菜豆	<i>Ph. vulgaris</i>	与玉米间作
红花豆	<i>Ph. coccineus</i>	立体
白花豆	<i>Ph. sp.</i>	立体

(续上表)

作物种类	拉丁名	种植方式
豇豆	<i>Vigna sinensis</i>	间作
扁豆	<i>Dolichos lablab</i>	立体
苋菜	<i>Amaranthus tricolor</i>	零星
辣椒	<i>Capsicum annuum</i>	块状间作
小米辣	<i>C. frutescens</i>	零星
白菜	<i>Brassica pekinensis</i>	与旱稻间作
苦菜	<i>B. integrifolia</i>	与旱稻间作
苕菜根	<i>Allium sp.</i>	块状
韭菜	<i>A. tuberosum</i>	块状
甘露子	<i>Stachys sieboldii</i>	零星
苦瓜	<i>Momordica charantia</i>	立体
洋丝瓜	<i>Sechium edulis</i>	立体
萝卜	<i>Raphanus sativus</i>	间作
龙葵	<i>Solanum nigrum</i>	零星
茄子	<i>S. melongana</i>	块状间作
樱桃番茄	<i>Lycopersicum esculenta</i>	零星
树番茄	<i>Cyphonandra betacea</i>	零星
生姜	<i>Zingiber officinale</i>	块状
葱	<i>Allium fistulosum</i>	块状间作
莴笋	<i>Lactuca scariola var. sativa</i>	零星
香茅	<i>Cymbopogon citratus</i>	零星
芫荽	<i>Coriandrum sativum</i>	零星

(续上表)

作物种类	拉丁名	种植方式
臭菜	<i>Acacia pennata</i>	零星
姜黄	<i>Curcuma longa</i>	零星
茶树	<i>Camellia sinensis</i> var. <i>assamica</i>	块状
桃树	<i>Prunus persica</i>	零星
芭蕉	<i>Musa sapientum</i>	块状
香蕉	<i>M. nana</i>	块状
番木瓜	<i>Carica papaya</i>	零星
番石榴	<i>Psidium guajava</i>	零星
野樱桃	<i>Prunus majestica</i>	零星
板栗	<i>Castania mollissima</i>	零星
余甘子	<i>Phyllanthus emblica</i>	零星
香橼	<i>Citrus medica</i>	零星
佛手	<i>C. medica</i> var. <i>sarcodactylis</i>	零星
象腿蕉	<i>Ensete glaucum</i>	零星
野芭蕉	<i>Musa acuminata</i>	零星
柚子	<i>Citrus grandis</i>	零星
橘子	<i>C. reticulata</i>	零星
芒果	<i>Mangifera indica</i>	零星
菠萝	<i>Ananas comosus</i>	零星
李	<i>Prunus salicina</i>	零星
梨	<i>P. sp.</i>	零星
甘蔗	<i>Saccharum sinensis</i>	块状

(续上表)

作物种类	拉丁名	种植方式
小桐子	<i>Jatropha curcas</i>	零星
桑	<i>Morus alba</i>	零星
木瓜榕	<i>Ficus auriculata</i>	零星
糙叶榕	<i>F. hiopida</i>	零星
白花树	<i>Bauhinia variegata</i>	零星
竹子	<i>Bambusa spp.</i>	篱边
省藤	<i>Calamus spp.</i>	树边
短命树	<i>Trema orientalis</i>	零星
劲直刺桐	<i>Erythrina stricta</i>	零星

表 2 勐宋轮歇地旱稻品种编目^①

Table 2 Inventory of local upland rice varieties in Mengsong

名称	特征	米质	对土壤要求	温度要求
qixiu	粒大	上等, 黄	肥地 (yana)	热地
qiesuo	有香味	上等	肥地 (yana)	热地
wupsu	生长期短, 粒大	上等, 白	肥地 (yana)	热地
wobe	产量高	中等	中等, 第 2 年	热地

^① 许建初等:《勐宋轮歇农业系统中作物物种及品种的多样性研究》,载裴盛基等主编的《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1版,51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引用时进行了修订和删减。)

(续上表)

名称	特征	米质	对土壤要求	温度要求
qieguo	产量中		第3年, 贫瘠地	冷地
qiena	产量中, 米粒大	上等, 紫	第3年, 贫瘠地	冷地
qieba	水田也种	上等	第1, 2年	冷地
nawu	适应性强	上等	1, 2, 3年	冷地
qiege	花谷	最好吃	肥地 (yana)	中等
qiesa	草少	差	最后种	热地
nawuma	产量高	上等, 红	第1, 2年	热地
qiewu	难脱粒	上等	第2, 3年, 中等	热地
qieja	粒长	中等	肥地 (yana)	热地
qiejue	粒大而长	上等	肥地 (yana), 需雨多	热地
ximaqie	产量中	新米好吃	第1, 2年	热地
jebe	产量中	上等, 红	第1, 2年	热地
kapehonue	产量低	上等, 糯	第3年	热地
honuene	产量高	红糯	肥地	热地
honuena	产量中	上等, 紫糯	特肥地	热地
kaguhonue	花壳	上等, 带红	肥地	热地
maheihonue	粒圆	上等, 糯	肥地	热地

表 3 基诺山轮歇地中的栽培植物编目^①

Table 3 Inven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in Jinuo's Swidden Fields

中文名	当地名	拉丁名	使用部位	起源地
臭菜	pala	<i>Acacia pennate</i>	嫩茎叶	当地、东南亚
菜芋	ululu	<i>Amorphophallus sp.</i>	嫩叶、块茎	当地
西盟魔芋	sakuo	<i>A. ximengensis</i>	嫩叶、块茎	当地
攸乐魔芋	labong	<i>A. yuloensis</i>	嫩叶、块茎	当地
滇魔芋	bulaiduo	<i>A. yunnanensis</i>	嫩叶、块茎	华西南
菠萝	—	<i>Ananas comosus</i>	果	南美洲
花生	tuli	<i>Arachis hypogaea</i>	种子	南美洲
冬瓜	tuopulu	<i>Benincasa cerifera</i>	果	爪哇
苦菜	naotugemu	<i>Brassica integrifolia</i>	叶	亚洲
构树	wazhuo	<i>Broussonetia papyrifera</i>	叶、果	亚洲
小米辣	mahi	<i>Capsicum frutescens</i>	果	热带美洲
番木瓜	mabao	<i>Carica papaya</i>	果	中美洲
铁刀木	—	<i>Cassia siamea</i>	枝、干	东南亚
柚子	shemi	<i>Citrus maxima</i>	果	热带亚洲
黄果	mabulai	<i>C. sinensis</i>	果	热带亚洲
芋	bulaiche	<i>Colocasia esculenta</i>	块茎、叶柄	热带亚洲
紫芋	pobulai	<i>C. taroimo</i>	块茎、花序	热带亚洲

^① 龙春林等：《基诺族轮歇地中栽培植物的来源及其多样性研究》，载裴盛基等主编的《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1版，68-69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引用时做了修订和删减。）

(续上表)

中文名	当地名	拉丁名	使用部位	起源地
芫荽	jiechinaishuo	<i>Coriandrum sativum</i>	全株	地中海
香瓜	bao	<i>Cucumis melo</i>	果	非洲
版纳黄瓜	kuobo	<i>C. sativus var. xishuangbannaensis</i>	果	东南亚
南瓜	tuokele	<i>Cucurbita moschata</i>	果	中美洲
香茅草	shakai	<i>Cymbopogon citratus</i>	叶	东南亚
山药	me	<i>Dioscorea esculenta</i>	块茎	东南亚
蕹衣包	a-er	<i>D. pentaphylla</i>	块茎	东南亚
扁豆	luojie	<i>Dolichos lablab</i>	果荚	亚洲
刺芫荽	paboma	<i>Eyngium feotidium</i>	全株	东南亚
荞麦	—	<i>Fagopyrum esculentum</i>	种子	欧洲
黄豆	laochi	<i>Glycine max</i>	种子	东亚
陆地棉	—	<i>Gossypium hirsutum</i>	种毛	热带美洲
三叶橡胶	—	<i>Hevea brasiliensis</i>	乳汁	南美洲
红薯	—	<i>Ipomoea batatas</i>	块茎	热带美洲
葫芦	wopu	<i>Lagenaria siceraria</i>	果	非洲
丝瓜	sikuo	<i>Luffa cylindrica</i>	果	热带亚洲
番茄	makelema	<i>Lycopersicum esculentum</i>	果	热带美洲
芒果	mo	<i>Mangifera indica</i>	果	热带亚洲
木薯	azherne	<i>Manihot esculenta</i>	块根	热带美洲

(续上表)

中文名	当地名	拉丁名	使用部位	起源地
香蕉	ase	<i>Musa nana</i>	果、叶	亚洲
芭蕉	adu	<i>Musa sapientum</i>	果、假茎	亚洲
烟草	yakuo	<i>Nicotiana tabacum</i>	叶	南美洲
罗勒	zhiwei	<i>Ocimum basilicum</i>	全株	热带美洲
毛罗勒	pole	<i>O. basilicum</i> <i>var. pilosum</i>	全株	热带美洲
糯稻	guonie	<i>Oryza. sativa</i> <i>var. glutinosa</i>	种子	东南亚
旱稻	guona	<i>O. sativa</i> <i>var. spritanca</i>	种子	东南亚
豆薯	—	<i>Pachyrhizus erosus</i>	块根	墨西哥
西番莲	—	<i>Passiflora carulea</i>	果	非洲
白苏	laima	<i>Perilla frutescens</i>	种子	东亚
豌豆	—	<i>Pisum sativum</i>	果荚、种子	欧洲
毛桃	sheye	<i>Prunus persica</i>	果	东亚
番石榴	magui	<i>Psidium guajava</i>	果	热带美洲
芝麻	laibiu	<i>Sesamum orientale</i>	种子	热带非洲
茄子	make	<i>Solanum melongana</i>	果	南亚
肿柄菊	—	<i>Tithonia diversifolia</i>	茎、叶、花	热带美洲
毛枝荚蒾	—	<i>Viburnum sempervirens</i>	全株	东南亚
玉米	adu	<i>Zea mays</i>	种子	中美洲
姜	—	<i>Zingiber officinale</i>	根茎	东南亚

山地和坝子人类生态系统的第二个差异，是采集的差异。傣族也有采集，而且其水生植物的采集和利用是很有特点的，然而其采集食物在饮食中的比例不算太大，因为傣族的蔬菜主要还是依赖园圃种植。相比之下，山地民族对于采集的依赖程度要大得多，而且采集种类也更为丰富。采集活动之所以在刀耕火种民族之中特别地盛行，有以下几个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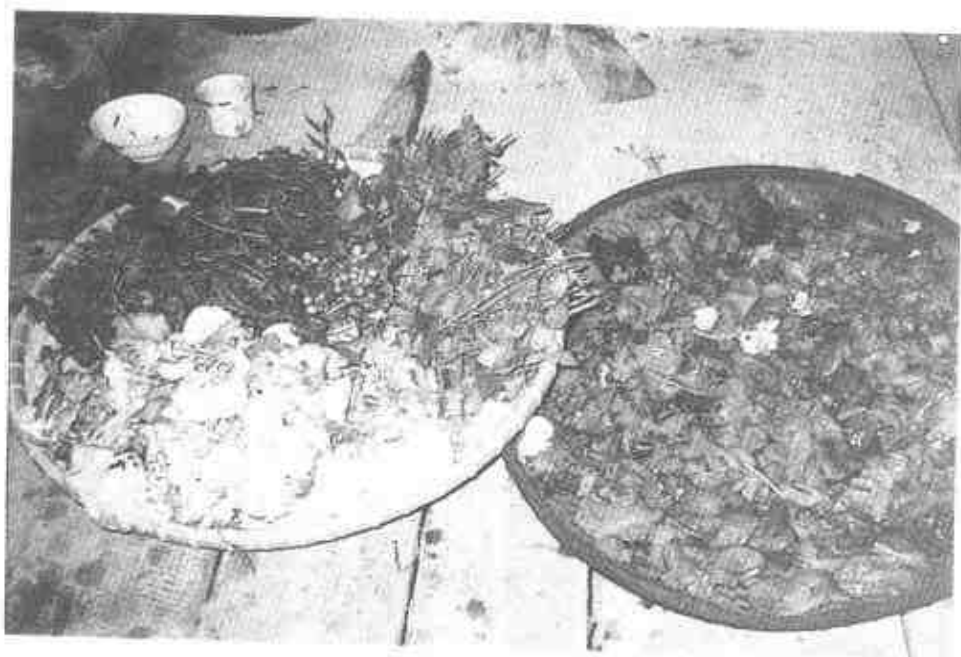
首先，大面积的森林和休闲地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采集食物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采集本身就是刀耕火种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次，采集是农业的补充，又可以节约农地和劳动力，而且还使得食物种类丰富多彩。

第三，每年的3月至8月这一期间，由于旧粮即将吃完，新粮又未成熟，即所谓“青黄不接”的时期，人们常常面临缺粮的困难，因此这一段时间的采集尤其重要，不仅仅只是解决“菜”的问题，而往往成为充饥度荒的手段了。

第四，刀耕火种农业常遭旱涝虫兽之灾（滇西北怒江峡谷涝灾频繁，常常不能按时烧地；南部山地多见旱灾，播种而无收获），灾害的年头，就只有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了。例如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的独龙族，每年3月至8月，粮食青黄不接，采集活动便主要集中于这个阶段。独龙族的采集食物主要有董棕、野山药、葛根、野芋、大百合、板栗、野蒜、各种竹笋、各类蘑菇、各种野蜂的蜂蜜和蜂雏等等。块根类个体大、数量多，又富含淀粉，饥荒年月是很重要的充饥之物。而独龙族对董棕（*Caryota urens*）的利用也是非常独特和有效的。大的董棕树高达10余米，其树皮可做纤维等有用材料使用，树芯富含淀粉，味道甜美，可做成粑粑烧吃，也可掺拌粮食煮吃。董棕树粗大，淀粉多，一棵大树能产淀粉数百公斤，是弥补粮食短缺的大宗采集食品，因此独龙族十分珍视这种植物，一棵大的董棕树，价值不

在一头壮牛之下。蜂蜜和蜂雏的采集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采集数量也是不少的，一巢野蜂，多者可获蜂蜜数 10 公斤、蜂雏约 50 公斤。



基诺族的采集食物

采集食物，有的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可以直接食用；而有的却味道苦涩，甚至含有毒素，所以必须经过加工处理之后才能食用。山地民族常用的去除苦、涩、麻、毒的方法，是用水泡或在水中加灰煮。例如对一些难以直接食用的野芋，要切成片状长时间地在水中浸泡，并不断更换新水。有的经过水泡之后，还要用掺有灶灰或石灰的水煮，然后再次用冷水浸泡，方能去除怪味和毒素。对于竹笋，则可晒制干笋，或腌于竹筒土罐之中，以供较长期地食用。

下面具体介绍两个民族采集食物的调查资料。

基诺族的采集食物^①

1. 块根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采集季节	加工方法
四棱	<i>Dioscorea alata</i> L.	5月~6月	切片泡水数小时去涩味，然后蒸或煮吃
青山药	不详	4月~5月	切片晒至半干煮吃最佳
绿山药	不详	4月~5月	切片晒至半干煮吃最佳
硬壳山药	不详	4月~5月	削皮后蒸或煮吃
黄山药	<i>D. arachida</i>	4月~5月	同 <i>Dioscorea alata</i> L.
蓑衣包	<i>D. pentaphyllo</i> L.	4月~5月	切片泡水去除涩味，然后煮或蒸食
山堆堆	<i>D. cirrhosa</i> Lour.	1月~12月	切片泡水一天，其间换水二三次，泡后切细煮，煮后再泡冷水，之后再煮或蒸，以去除涩味和毒素
山羊头	不详	1月~12月	同上
黄金	<i>D. bulbifera</i> L.	1月~12月	同上，亦可加石灰水或灰水煮，以去除涩、毒
芭蕉根	<i>Musa acuminata</i> Colla	1月~12月	切片泡水，然后蒸或煮
魔芋	<i>Amorphophallus yuloensis</i> H. Li	10月~12月	同上，亦可切片晒干舂成粉做魔芋豆腐
藤萝卜	不详	6月~8月	切片泡水后或煮或炒食

^① 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载《农业考古》，1988（2），390~394页。

2. 野菜 (常吃种类)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可吃部分	采集季节
象耳朵菜	<i>Ficus auriculata</i>	嫩叶、果	绝大部分一年四季可采集，但以一二季度采集最多，三四季度因有部分人工栽培蔬菜，故采集量减少
青树	<i>F. altissima</i>	叶、果	
犁板菜	<i>Parabaena sagitata</i>	叶、茎	
野芥菜	<i>Polygonum cuspidatum</i>	叶	
刺菜	<i>Acanthopanax trifoliatum</i>	叶、茎	
细苦菜	<i>Brassica integrifolia</i>	叶、茎	
水芹菜	<i>Oenanthe javanica</i>	叶、茎	
薄荷	<i>Mentha hyplocalyx</i>	叶	
苦凉菜	<i>Solanum nigrum</i>	叶、茎、根	
火草叶	不详	叶、茎、根	
谷叉草	不详	叶、茎、根	
奶浆草	<i>Campanula mekongensis</i>	叶、茎、根	
干结结菜	<i>Callipteris esculenta</i>	叶、嫩尖	
马蹄根	<i>Cantella asiaticae</i>	叶、根	
树头菜	<i>Crataeva unilocularis</i>	叶	
火筒叶	<i>Leea indica</i>	叶	
白花	<i>Bauhinia variegata</i>	花	
炮仗花	<i>Mayodendron igneum</i>	花叶	
野芭蕉	<i>Musa acuminata</i>	花、果	
满子盐细	<i>Eryngium foetidum</i>	叶	
烂潭菜	不详	叶	

(续上表)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可吃部分	采集季节
鱼腥草	<i>Houttuynia cordata</i>	根	绝大部分一年四季可采集，但以一二季度采集最多，三四季度因有部分人工栽培蔬菜，故采集量减少
野豌豆	<i>Pisum sativum</i>	叶	
野细豌豆	不详	叶	
臭菜	<i>Acasia mengaladena</i>	嫩枝尖	
麻芋杆	<i>Colocasia gigantea</i>	叶、茎	
野猫花	<i>Markhamia stipulata</i>		
香椿	<i>Toona sinensis</i>	嫩枝尖	
鸡屎绿叶菜	不详	叶	
甜草	不详	叶、茎	
董棕	<i>Caryota urens</i>	嫩尖、蕊	
藤蓆	<i>Calamus spp.</i>	嫩尖、蕊	
大苦藤叶	<i>Erythralium scandens</i>	叶	
细苦藤叶	不详	叶	
刺五加	<i>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i>	叶	
苦列留	不详	叶	
大刀豆	不详	豆、叶	
车皮藤	不详	嫩尖	
麻根	<i>Piper sp.</i>	根	
橄榄皮	<i>Phyllanthus emblica</i>	皮	

3. 竹笋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采集季节	加工方法
甜竹笋	<i>Dendrocalamus giganteus</i>	大部分笋类的采集时间在6月~10月,苦竹可早至4月	1. 新鲜吃法: 去壳, 洗净, 切成片或丝, 煮或炒食, 或煮后凉拌食; 苦笋等可直接烧食 2. 制作酸笋: 去壳, 洗净, 切成片或丝, 放入罐中, 加盐水, 并加少量米饭, 使其发酵变酸, 半年后可食用, 可贮存二三年 3. 压笋: 切成片后, 塞入竹筒压紧, 三四月后可食 4. 泡笋: 将笋尖切细, 泡两夜后煮食; 或将笋子剖为数瓣, 泡三夜, 冲洗, 用篾片串挂起来, 四五天后炒或煮食 5. 浪笋: 切成片, 放入垫有芭蕉叶的竹篮内, 冲水, 以芭蕉叶覆盖, 四五天后可食 6. 笋花: 切成细丝, 在沸水中稍微烫一下, 晒成干丝贮存, 吃时以水泡软后或炒或煮 7. 竹半笋: 把笋尖剖成两半, 煮后晒干贮存
黄竹笋	<i>D. Membranaceus</i>		
毛竹笋	<i>Gigantochloa Levis (Blanco) Merr.</i>		
白竹笋	<i>Dendrocalamus sericeus</i>		
苦竹笋	<i>pleioblastus amarus</i>		
斑竹笋	<i>B. multiplex (Lour.) Racusch. cv. siberetripe</i>		
金竹笋	<i>phyllostachys nigra</i>		
掉竹笋	不详		
大泡竹笋	<i>Schizostachyum funghonii</i>		
细泡竹笋	<i>Pseudostachyum Polymorphum</i>		
过江竹笋	不详		
娥篾竹笋	不详		
麻金竹笋	<i>Sinocalamus latifeorus</i>		

4. 蘑菇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采集季节
蚂蚁骨堆菌	<i>Termitomyces heimii</i>	多在6月~8月
鸡枞	<i>T. eurhizus</i>	
奶浆菌	<i>Lactorius volemus</i>	
大红菌	<i>Rossula sp.</i>	
小火炭菌	<i>R. nigricans</i>	
大火炭菌	<i>R. nigricans</i>	
辣菌	<i>R. piperata</i>	
马皮包	<i>Scleroderma sp.</i>	
牛舌头菌	<i>Fistulina hepatica</i>	
木耳	<i>Auricularia delicata</i>	
半个菌	<i>pleurotus sp.</i>	
筛子菌	不详	
白参	<i>Schizophyllum commune</i>	
酸菌	不详	
八大柴	<i>Lentinus squamulosus</i>	
脆脚菌	不详	

5. 果子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采集季节
芒果	<i>Mangifera sylvatica M. indica</i>	6月~7月
毛荔枝	<i>Nephelium chryseum</i>	6月~7月
三瓣果	<i>Baccaurea ramiflora</i>	7月~8月
歪屁股果	<i>Garcinia xanthochymus</i>	1月~12月
酸布灵	<i>Amalocalyx yunnanensis</i>	6月~8月
阿利阿思	不详	6月~8月
涩布拉	不详	11月~12月
哈旦	不详	6月~8月
禾努	不详	6月~8月
大酸苔	不详	9月~11月
黄桑果	不详	4月~5月
羊屎果	<i>Canthium parvifolium</i>	5月~6月
鸡嗦果	<i>Ficus semicordata</i>	6月~8月
公鸡卵果	<i>Eleagnus conferta</i>	7月~9月
象耳朵果	<i>Ficus auriculata</i>	4月~8月
白叶黑	不详	8月~10月
青果	<i>Canarium album</i>	8月~10月
山多依	<i>Docynia indica</i>	7月~9月
涩梨	不详	9月~11月
乌鸦果	不详	8月~10月

(续上表)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采集季节
篾不榴果	不详	6月~9月
金凉果	不详	5月~6月
细酸苔	不详	7月~9月
狼仑果	<i>Pouteria grandifolia</i>	3月~5月

除以上之外，还有芭蕉、黄果、橘子、泡果（柚子）、香瓜、黄瓜、木瓜、橄榄、油瓜等。

6. 虫类

采集虫类有油虫、蜘蛛、蚂蚱、飞蚂蚁、油肚子蚂蚁、蚂蚁蛋、牛屎螳螂、蟋蟀、竹虫、酸蜂等。

(注：以上拉丁语名称系昆明植物研究所龙春林研究员鉴定。)

景颇族的采集食物^①

1. 野菜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汉语名称	采集季节
阿耐木	<i>Elsholtzia cypriani</i>	香菜	1月~12月
王兰	<i>Oenanthe sinensei</i> <i>Sanicula Lameligeru</i>	水芹菜	1月~12月

^① 参见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1版，37~41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

(续上表)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汉语名称	采集季节
蒲棍	不详	不详	4月~5月
蒲满	不详	不详	3月~5月
格抓由	不详	圭令菜	4月~5月
拿久	不详	不详	1月~12月
采板	不详	不详	1月~2月
育合	不详	不详	6月~7月
崩补锐	<i>Sechium edulis</i>	丝瓜尖	5月~6月
蒲材	不详	不详	5月~6月
扑吐	<i>Ipomoea aquatica</i>	空筒菜	5月~6月
三格菜	不详	不详	4月~5月
吾落米	不详	刺竹笋	2月~8月
蒲腊哈	<i>Eryngium foetidum</i>	缅甸芫荽	2月~8月
哀古	不详	丝瓜果	5月~6月
亢正	<i>Phyllostachys nigra</i>	金竹笋	5月~7月
难旦	<i>Pleioblastus amarus</i>	苦笋	4月~6月
张年	不详	红酸椿	1月~12月
轻考	不详	不详	1月~12月
崩恰	<i>Zingiber zerumbet</i>	山姜	1月~12月
石笔	不详	不详	1月~12月
兰标好	不详	不详	1月~12月
作哄	<i>Buddleja officinalis</i>	染饭花	2月~3月

(续上表)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汉语名称	采集季节
格纯	<i>Pleocnemia winitii</i>	水蕨菜	3月~6月
得浪姆	<i>Pteridium aquilinum</i>	蕨菜	3月~5月
哦芒	不详	乔木酸	9月~11月
崖漏石笔	不详	不详	7月~8月
恩诺科贝	不详	不详	4月~5月
哦乍堵苦虐	<i>Melothria maderaspatana</i>	老鼠金瓜	5月~6月
丁耐	不详	不详	1月~3月
木云	不详	不详	3月~4月
科厅理	不详	不详	3月~4月
能彪	不详	桦菜	1月~12月
娃皮	不详	不详	1月~12月
纳巴	不详	不详	7月~10月
店张	不详	不详	1月~12月
难莫	不详	不详	10月~次年4月
可鸾	不详	不详	3月~4月
丁决	<i>Houttuynia Cordata</i>	鱼腥草	4月~5月
连胡哈	不详	毛叶子	1月~12月
邦喷满	不详	不详	2月~4月
石丙号	不详	炮仗叶	1月~12月
木宽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2. 菌类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汉语名称	采集季节
图山	<i>Auricularia auricula</i>	木耳	4月~8月
蟆菌	<i>Auricularia polytricha</i>	毛耳朵	4月~8月
马剪	<i>Boletus edulis</i>	不详	4月~8月
墨则	<i>Pleurotus palmonarius</i>	熬窝菌	4月~8月
乌迟	<i>Schizophyllum commune</i>	八带菜	4月~8月
酥勒马	<i>Collybia albuminosa</i>	鸡枞	4月~8月
马均	<i>Pleurotus Sapidus</i>	金钟菌	4月~8月
笔毛	<i>Laccaria laccata</i>	不详	4月~8月
禾炭毛	<i>Rassula densifolia</i>	黑菌	4月~8月

3. 野果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汉语名称	采集季节
松乃石	不详	山梨	2月~3月
木毛石	<i>Chaenomeles sinensis</i>	野木瓜	3月~4月
石苍木石	不详	不详	4月
施控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施洞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聘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施罗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施作石	<i>Myrica esculenta</i>	杨梅	5月~7月
汤虐石	不详	不详	2月~3月

(续上表)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汉语名称	采集季节
普占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漫仲石	不详	烟泡果	2月~3月
木棍石	<i>Actinidia kolomikta</i>	钮子果	2月
施谬石	<i>Rubus foliolosus</i>	酸泡果	2月~3月
施来石	<i>R. obcordatus</i>	黄泡果	4月~5月
杨梅石	<i>Myrica esculenta</i>	小杨梅	3月~5月
彪磨石	<i>M. nana</i>	酸杨梅	3月~4月
石蓬	<i>Pyrus Pashia</i>	梨	8月~9月
施可	<i>Rrunus salicina</i>	李	7月~9月
施胡	<i>Prunus Persica</i>	桃	7月~9月
施争	<i>Citrus Sinensis</i>	黄果	9月~10月
补石	<i>Juglans regia</i>	核桃	3月~5月
山坡石	不详	山坡金	2月~4月
洋娃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门车石	<i>Artocarpus heterophylla</i>	牛肚子果	5月~6月
木矮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毛着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门甘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木果石	不详	不详	7月~8月
王石	不详	不详	3月~4月
提苍石	不详	不详	3月~4月

(续上表)

当地名	拉丁语名称	汉语名称	采集季节
格拉石	不详	酸木瓜	3月~5月
施乌石	不详	不详	6月~7月
必吹石	不详	不详	5月~6月
木扎	<i>Eriobotrya japonica</i>	酸把果	7月~8月
难木普占石	不详	藤子果	1月~3月
格润果	<i>Vitis quinq-nangularis</i>	藤子果	1月~3月
争石	不详	尖梨	1月~3月
冷年石	不详	不详	1月~2月
施苍石	不详	不详	2月~4月

(注：表中拉丁语名称系昆明植物研究所龙春林研究员鉴定。)



福贡县傈僳族到高山打猎 (和永祥摄)

山地人类生态系统和坝子的差别，还表现于狩猎方面。傣族也打猎，但毕竟是坝居民族，不如山地民族那么盛行。山地民族

的狩猎同采集一样不可缺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采集更为重要。采集主要获取植物类食物，狩猎则获取动物类食物，采集属于一般劳动，而狩猎则带有危险性、刺激性和娱乐性。善于狩猎者会受到人们特别的尊敬，被视为英雄人物，所以狩猎是男人们重要的生活和娱乐内容以及智慧和勇敢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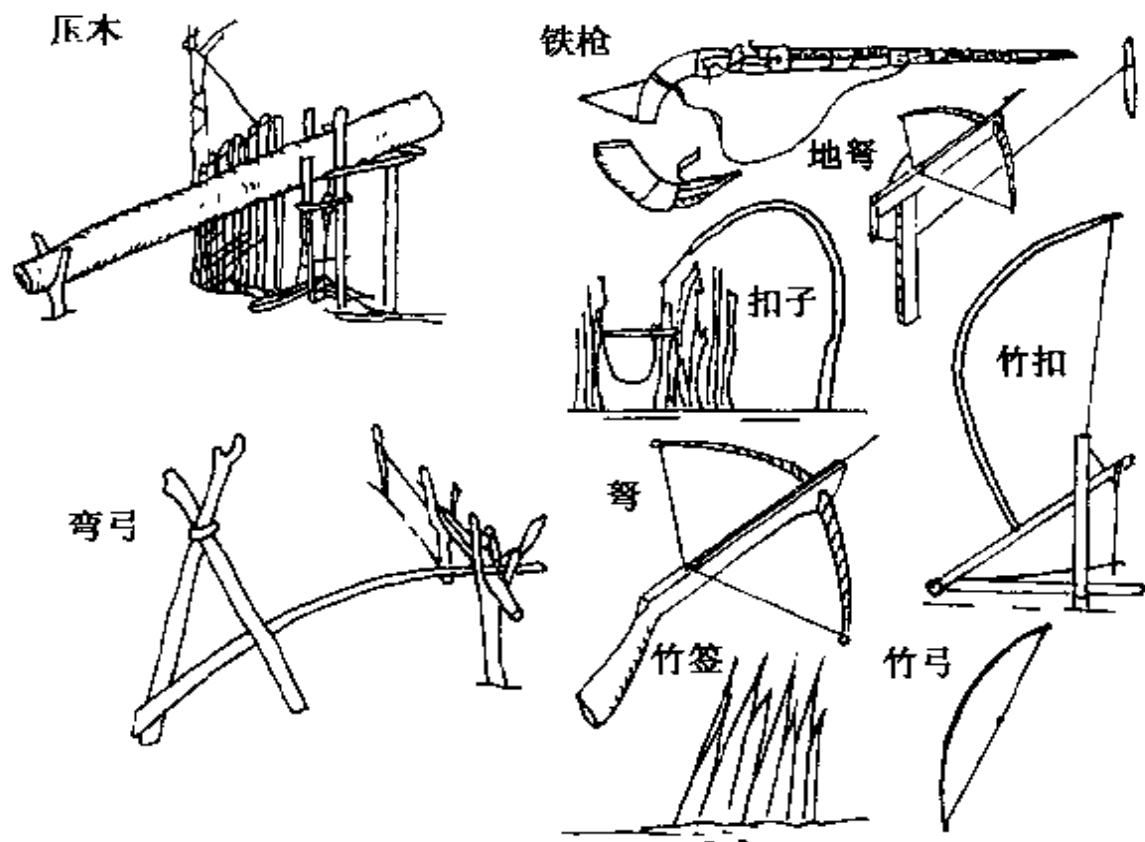
山地民族的狩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捕食鸟兽为目的的狩猎，一类是为了保护农作物的狩猎。狩猎的对象有野牛、野猪、山驴、岩羊、羚羊、鹿、麂、熊、虎、豹、獐、猴、野兔、松鼠、竹鼠、野鸡等。狩猎的工具种类很多，有火药枪、弓、弩、扣子、夹子、地弩、弯弓、压木等。

猎具无固定尺寸。

基诺族的猎具^①

名 称	长 度 (cm)
压木	直径可达 40~50、长度约为 400~500
弯弓	一般选直径 5~10、长 250~300 的小树做成
铁枪	一般长 120
地弩	长约 70
弩	长约 80
扣子	摔杆长约 150
竹夹	有大有小，大者长约 200，小者长仅 20~30
竹弓	长约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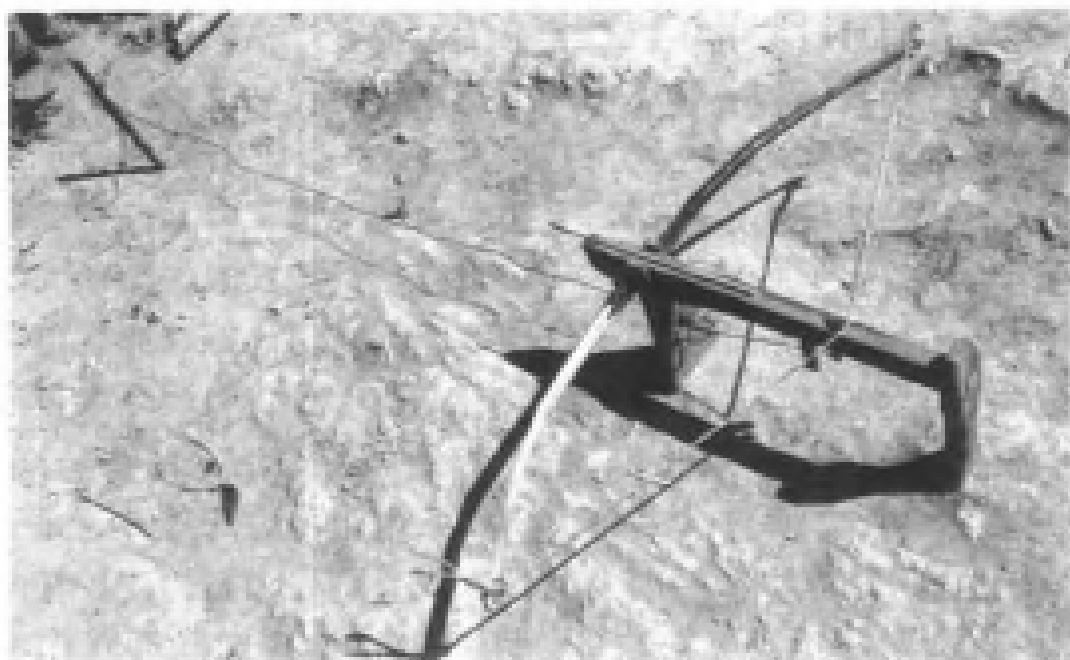
^① 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载《农业考古》，1988（2），390~408页。



基诺族的猎具

以捕捉鸟兽为目的的狩猎，通常有集体上山围追野兽的围猎，有埋伏于野兽经常出没的野果树下、水塘旁边（咸水塘边动物最多）、树木砍后和烧后的刀耕火种地边（动物喜吃青草和火灰）捕杀野兽的狩猎，有尾随野兽脚印进行追捕的方式，还有设置扣子、夹子、地弩、陷阱捕捉动物的方式等等。

滇西北峡谷和滇西南山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两地刀耕火种民族的狩猎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独龙江的独龙族的狩猎，主要在冬春两季进行。冬季农作物收获完毕，生产活动少，而且气候逐渐寒冷，高山上开始降雪，毒蛇纷纷下到江边过冬，大部分野兽也移到雪线以下，此时上山打猎，被毒蛇咬伤的可能性小，捕获率也比较高。独龙族的狩猎活动，有一些特殊的规矩。在滇南山地，大凡山林都是狩猎的场合，各民族并没有明确的“猎场”



山地民族的几种典型器具

这一概念，而且村寨对于狩猎的范围也没有严格的限制；而在独龙江地区就不同了，其猎场的范围是比较明确的。所谓村寨的猎场，就是指本村寨地界之内海拔大约1800米以上的地带。由于气温低，这一地带不适于作物生长，人迹罕至，森林茂密，所以各种动物比较多。一般情况下，村寨成员只能在本村猎场而不能到它村猎场打猎，除非在捕猎时动物逃到它村地界，那就可以一直追击，但捕获之后要向猎场所有者奉送部分兽肉。个人可以像号占林地一样号占打猎场所，亦是独龙族狩猎活动的特殊规矩。这种号占，当然只限于本村寨的猎场之内，号占的地方，是野兽经常出没之处。其方法一般有两种：以刀剥去大树树皮，在木质上刻出锯齿形花纹，或在路口以两棵木桩架成交叉形状作为标志。一经号定，其他人就不能再到此打猎。狩猎有集体组织围猎的方式，个体家庭和个人也常常单独进行。狩猎的工具具有弩、刀、矛、扣子、竹签等，狩猎对象有野牛、野猪、岩羊、山驴、鹿、麂、熊、虎、豹、獐、猴、兔、松鼠等。50年代以前，独龙族的狩猎捕获量是相当可观的。据王均等的调查，一个名叫茂



基诺族猎获的麂子

斗的老人与其父茂爪捧昔日一年捕获的野牛、岩羊、麂子、山驴等大动物数目都在 70 只以上，足够其家 13 口人吃 5 个月，有时父子两个人半天便能打到 3 只麂子；页明滴的父亲页明及，一年可猎获野兽肉 60 背~70 背，可供他家 12 口人吃 6 个月；一次他们集体狩猎时遇到野牛群去喝咸水，击毙数目竟多达 40 余头。^①除了冬春两季的狩猎外，夏秋两季配合守护庄稼，在地周围亦能捕获相当数量的熊、猴子及鼠雀等动物。



独龙族的鱼笼（云南民族博物馆提供）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1版，88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

独龙族沿独龙江居住，又有渔捞之利。独龙族将易于捕鱼的地方叫做“鱼口”，“鱼口”也可以实行号占。捕鱼工具有鱼网、鱼笼、鱼钩、鱼叉、鱼箩、溜洞等，并有筑坝捕鱼和以植物毒汁闹鱼等捕鱼方法。捕鱼旺季在夏天，7月江水上涨，鱼抢上水，成群溯江而上，8月鱼群复又转抢下水，一上一下是捕鱼的大好时机。9月之后，水枯江浅，鱼沉河底，渐难捕捞。50年代前，独龙族深受独龙江之惠，王均等的调查报告说，在夏天河水上涨时节，一人一天能捕鱼10多公斤，被调查者滴朗当、独扎两人一年捕鱼12背，约合360公斤，够一人吃一年。^①杨毓才等调查孔当、丙当、学哇当几个村的报告也说，那里每户每年最大的捕鱼量为200公斤，一般也不少于50公斤。^②1951年独龙江地区发生强烈地震，震后河鱼骤减，捕获量遂大不如前了。

滇南基诺族的狩猎，捕获量也相当可观。以巴卡小寨切资父子为例，切资老人1987年70余岁，过去每年平均猎获野猪等大野兽10余头，下扣子有时一天捕捉野鸡10多只；仅麂子一项，其猎获量累计已达100余头，一般小动物则不计其数。由于杀生太多，以致内心恐惧，生了病亦怀疑是野兽的魂灵报复，所以于60年代中期之后便不敢再打猎了。其子资切1987年40岁，近10年当了乡政府的干部没有时间打猎了，但30岁以前所猎麂子数量亦达到60余头。大多数基诺人，过去除了播种时节不能打猎之外，其他月份几乎每个星期都能吃到野兽肉。

以保护农作物为目的的狩猎，有撵山（村民集体出动追杀糟踏庄稼的动物）和在刀耕火种地周围挖陷阱，置地弩、弯弓、压木、扣子、夹子等。临近秋收的时候，则要守护于地里，不分白

^① 参见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88页，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年。

^② 同上，24页。

天黑夜，巡逻防范，使用弓箭猎枪射杀偷吃农作物的鸟兽。野兽危害严重，必须投入全部力量进行保护。例如 1958 年基诺区（当时的建制是区，后来才改为乡）政府做过一个统计，当年秋季，各生产小队都组织了打猎队，全区共设置弯弓 18 080 个，陷阱 68 900 个，猎获野猪、麂子等 964 头，捕杀山鼠 14 558 只。可见每年秋收季节的狩猎活动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很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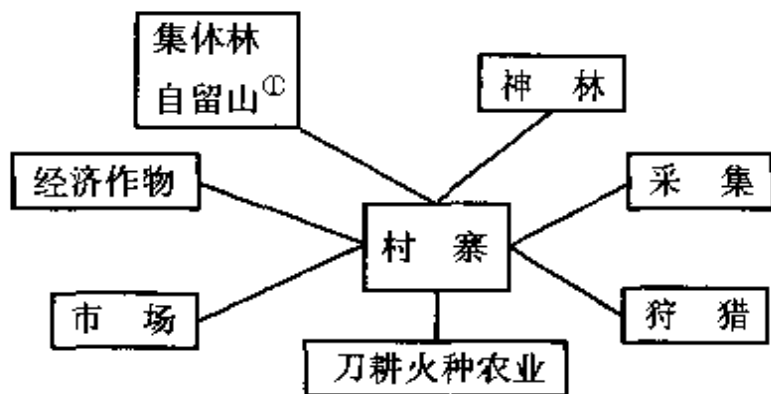


怒江怒族搬罾

除了刀耕火种农业、采集和狩猎之外，山地民族也有种植茶叶等经济作物的传统。最近 10 多年来，一些居住在海拔较低的山地的村寨，也像傣族一样，种植了不少橡胶和水果，而且还开垦了水田。山地民族的人类生态系统模式，可以简单图示于下。

山地民族的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很强的自给自足功能的系统，然而自古以来，该系统与坝区人类生态系统之间也具有比较密切的互补和互动关系。从经济贸易的角度看，山坝之间互通有无，互惠互利，一定程度地满足了各自的需求，对双方的发展都是有益的。具体而言，山地民族向坝子输出的商品既有林产品也有农产品，常见的林产品是木材、盖房子的茅草、药材、采

集食物以及兽肉和兽皮等，农产品主要是棉花，也有部分粮食和蔬菜。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山坝之间曾经一度盛行过十分红火的茶叶和鸦片贸易，而这两大商品的产区就在山地。另一方面，坝子输入山地的商品也不少，诸如陶器、铁器、西药、首饰、针、糖、盐等，都是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物品。随着时代的变迁、交通的改善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山地和坝子的联系和交流变得越来越密切、越来越重要了。



山地民族的人类生态系统示意图^①

比较云南西南地区山地刀耕火种民族和坝子傣族的人类生态系统，可知两个系统很不一样，差别很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差异性呢？通常认为这是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表现。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组织进行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的结论，独龙族、基诺族、布朗族、佤族等山地刀耕火种民族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而傣族则是封建农奴社会。从原始社会到

^① 集体林、自留山：1983 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名为“林业三定”的林业政策，将森林资源重新计量规划，划分为自然保护区、国有林、集体林、自留山和轮歇地（一般指刀耕火种地）五类。自然保护区和国有林属国家管理保护，不可采伐；集体林是划属于村寨管理和利用的森林；自留山是划给农户管理利用（建筑材料和柴薪）的林地；轮歇地是分配给农户耕种的林地。

封建农奴社会，中间还要经历一个奴隶社会，所以傣族社会比上述山地民族社会高出两个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的落后与先进，就是两个人类生态系统差异的原因。对于这样的理论，虽然还有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着，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50 年了，他们的传统的生产关系已经被彻底改变，社会形态的差别已经消除，那么为什么作为“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刀耕火种没有随原始社会一起消灭而一直延续下来呢？为什么山地和坝子的差别依然存在呢？显然，仅仅从社会进化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社会经济文化的多样性是远远不够的。讨论山地和坝子人类生态系统的差异，至少有两点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是生态环境的因素。山地和坝子自然条件不同，可利用的资源不同，人们适应自然的方式和食物生产方式就不可能一样。山地多森林，生活于森林之中，自然会选择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这样的生存方式。山地民族常常讲他们是“靠山吃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次，山地和坝子人类生态系统的差异，还有深刻的文化方面的原因。山地文化和坝子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尽管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各民族的文化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传统文化——包括世界观、宗教信仰、价值观、亲属制度、生产方式、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等却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全改变的，在很大程度上，传统文化仍然是支配社会运行的一种潜在的强大的力量。此外，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食物生产方式，乃是各民族千百年来在生产实践中总结积累的宝贵的知识、技术的结晶，它包含着各民族高度的智慧和独到的发明和创造，是各民族赖以生存的“传家宝”。中国是农业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绝大部分汉族尚且仍然沿袭着祖先传承下来的古老的农业生产方式，那么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各少数民族还将继续保持其传统的农耕文化，也就不足为怪了。总而言之，山地和坝子人类生

态系统的差异性，归根到底，其实是山地和坝子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不同的表现。



终章

文化、自然与发展

研究刀耕火种，总离不开这么三个问题：第一是它的历史和文化内涵，第二是它所反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三是刀耕火种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在本书行将结束的时候，打算再谈一谈这三个问题。

一、不应蔑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我的著作和论文中，曾反复主张刀耕火种是山地民族的一种生计，是他们对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方式，是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是一个山地人类生态系统，是一个文化生态体系。这样的主张和观点，有人理解和赞同，然而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持反对的意见。我总以为，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学术界已经打破了封闭，学术交流多了，视野开阔了，境界提高了，我们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文化人类学者，应该有所进步，应该懂得吃民族饭、吃文化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了，现在看来还远远不是这样。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或民族学者，首先，至少是首先，应该设身处地去理解他所调查研究的民族的行为方式，应该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的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参照去认识和分析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不少研究者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从事所谓“先进民族、先进文化”的立场去评判、教训、指责研究对象。而且，当生态环境保护成为热点之后，有的学者马上又成了“环保专家”，恨不得把山区的农地全变为森林，巴不得漫山遍野都是大象，而忘了森林中的民族也是要吃饭、要生存的，忘了一头大象一餐会吃掉几亩庄稼，还会把人抛到天上然后再用脚踩死。诚然，生态环境以及动植物资源都必须保护和珍爱，然而山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应该受到充分的尊重。此外，学者和科学家还有分工，研究刀耕火种，应该让人看得出你的学科背景，感受到来自你专业领域的独特见解，不要生态学家、植物学家、林学家、农学家、

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还有政府官员都说一种话，都唱一个调子，那是很不好的。大家都能说的话，一定很浅薄、很表面。所以对于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而言，研究刀耕火种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固然重要，然而最好不要忘记自己的本行和自身存在的价值，要多在历史和文化上下功夫。现在看来，由于时代的变迁等原因，云南的刀耕火种已经或正在失去存在的条件，走向消亡，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其消亡的速度还会越来越快，估计 20 年后，云南的大部分刀耕火种地区就将长刀入库，山火熄灭。面对这样的演变趋势，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人们仍然嫌它走得太慢，不能容忍其自然消亡的速度，而欲积极想办法取代它，希望它早一天销声匿迹，这是当前自然科学家的努力方向。而作为历史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除了可以去参与自然科学家的努力之外，是不是还应该有一点职业的敏感？就像长江三峡大水将至，其文化遗产必须迅速抢救一样，刀耕火种也面临着一个“抢救”的问题。所谓“抢救”，并不是提倡逆历史潮流而动去保护现存的刀耕火种，更不是要想办法去复活很多地区已经消亡了的刀耕火种，而是要趁着它在世的时候，在还能观察和体验它的时候，赶快把它尽可能完整客观地记录下来，不要让它不明不白地死亡掉，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糊涂账，不要为历史制造不应有的空白和遗憾！这是“抢救”的第一层意义。第二层意义，刀耕火种作为千百年来人们依赖的一种生存手段，必然蕴含着不少科学的道理，必然具有人类丰富的智慧结晶。从这个角度说，刀耕火种也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人们应该花力气认真地对其进行发掘和整理，将其“精华”继承下来，造福于人类。从我的调查研究来看，我觉得刀耕火种确实是一门大学问，值得研究、学习、继承的东西不少，以下所列诸项，就极富历史、文化和生态的意义。

1. 刀耕火种民族传统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及其功能。

2. 土地制度和习惯法。
3. 敬畏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和行为习惯。
4. 神林、水源林、风景林等的存在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5. 土地、土壤、植被的分类和利用知识。
6. 土地轮歇方式及其生态学的意义。
7. 植树造林（或称粮林轮作、混林农业）的方法、技术和生态学的意义。
8. 共耕和租借土地的方式对调整人地关系的意义。
9. 迁移耕种的方式及其文化、生态的意义。
10. 物候历与历法起源。
11. 农耕礼仪与原始宗教。
12. 刀、锄、犁的演变发展在农业史上的意义。
13. 砍树、烧地、防火和整地的方法和技术。
14. 农作物品种的分类、驯化、栽培、土地的配置以及间作、轮作的方法和技术。
15. 谷物收获、运输、储存及加工的方法和技术。
16. 可食用天然植物的分类、采集及加工食用的方法和技术。
17. 猎具制造和狩猎的方法和技术。
18. 发展水田农业、经济作物和商品经济对刀耕火种民族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
19. 50年来云南刀耕火种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历史意义。

以上 19 项，涉及很多领域、很多学科，足以说明刀耕火种是小看不得的。本书的研究，基本上涉及了以上各项内容，但是还很不充分、很不完备，还有待于更多的人去探索、去发现，去把这门学问做好。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刀耕火种，本来是山野村夫的生计行为，和都市人的生活距离很远，现在为什么会受到人们的关心和重视？原因就在于它严重地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就在于它突出地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那么，通过刀耕火种的研究，我们能否找出一些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带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因素呢？回答是肯定的。



在怒江山区，一个家庭生育三四个孩子的现象仍然存在

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口问题。关于人口过速增长的情况，本书第三章第一节已谈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云南盛行刀耕火种的几个地区，人口增长少的翻了一番，多的达到三四倍。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农业人口从320 367人（1952年）增加到829 100人（1995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农业人口从195 718人（1953年）增加到398 800人（1995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从199 300人（1953年）增加到817 800人（1995年）；思茅地区从1 044 322人（1953年）增加到

2 258 900人（1995年）。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多，这在云南历史上是空前的。本书曾多次说过，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的平衡，关键取决于人口与森林土地面积的比例。在亚热带山地，如果人均拥有30亩以上的可耕森林地，这个系统便能保持平衡和良性循环，如果少于此数，便难以为继，便会失去平衡，便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使人类陷于困境。因此，如何控制人口过速增长，如何维持人口与土地、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容量的平衡关系，不只是刀耕火种存在和延续的基础，也是包括水田灌溉农业、畜牧业、渔业等在内的所有生计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图中佤族妇女背负重物，手牵两个孩子，
怀中还抱一子，多儿是福还是苦



贫穷、多子，幼儿也要参加劳动

和人口增长过快一样，社会文化变迁过快、过激，也会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云南山地民族 50 年来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革命运动，诸如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学大寨等等，爆发于 60 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把运动的波澜推到了极至。我们可以想像，那些长期与世隔绝，深居山林，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完全不知外面世界的众多的山地民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还没有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卷入到革命运动的洪波大潮之中。借用社会形态论的话来说，那就是他们于一夜之间便“跨越了若干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一下子便“从原始社会跳跃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如此激烈的社会文化变迁可能会使少数民族感到难以适应甚至可能造成混乱的情况，当时中央和云南省政府是有所预见的，因此在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制定了“慎重稳定”的方针，并根据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即分别采取一些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然而，

这些方针和政策还未来得及很好地贯彻执行，1958年一场“大跃进”的风暴又席卷了全国，狂热无知容不下丝毫的理智，所谓“慎重稳定”、“分类指导”被激进的思潮所扫荡，边疆的少数民族也被要求和内地一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一来，千百年来治理村寨的长老、头人们被迅速赶下了神台，神圣的家族、氏族组织让位于合作社和生产队，传统的土地所有制随之改变，万物有灵、敬畏天地的崇拜和信仰被完全当做封建迷信、愚昧无知而遭到批判和禁止，刀耕火种则被定性为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而不容许带入社会主义……

几十年来，我国曾经十分流行这样一句革命口号：“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还有一句叫做“破旧立新，不破不立”。无数事实说明，砸烂和破坏是比较容易的，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扫“四旧”一样，往往几分钟几个钟头就可以把祖先留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砸得稀巴烂，破得惨不忍睹。而要建设新世界和恢复优良传统，就不那么容易了。尤其是要树立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等，那非得有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探索、积累和传承不可。这就是说，一方面是破得很快很容易，另一方面是立得很慢很难，在这一快一慢一易一难之间，就会出现空白，就会失控，就会产生混乱。例如破除了传统的信仰、规范和禁忌，傣族人民世代崇奉的龙山和山地民族长期保护的神林便遭到了无情地砍伐；废弃了传统刀耕火种的轮歇制度和资源管理方式，森林便很快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号称我国绿色宝库的西双版纳，20世纪50年代初期森林覆盖率达65%以上，30年后便下降到30%以下，这足以说明社会文化剧烈转型所带来的负面生态效果。基诺族的一位“下岗”头人曾对我谈起他对生态环境破坏的看法，他不无幽默地说道：“新社会什么都好，就是不信山神不好。”其实他的潜台词是说：大自然与没有信仰、禁忌和秩序的人们是不可能和睦相处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来的历史可知，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对于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也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云南刀耕火种民族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体制。家庭农业经营的好坏，农作物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土地的状况。土地休闲期长，树多林密，土壤肥沃，杂草少，农作物就长得好，收获就多；反之，便难以经营，收成也不可能保证。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论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私人还是属于家族和氏族，人们都能自觉地爱护和保护土地和森林，都能努力按照最佳的轮歇方式进行垦殖，而决不随意和轻易地乱砍乱伐树木和毁林开荒。

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云南的刀耕火种民族也和中国的其他民族一样，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传统的家庭农业经营体制，而改变为以合作社和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经营体制。从家庭个体经营变为社队集体经营，从私有制到公有制，可以说是一场内容深刻、涉及面很广的革命。别的不谈，只说利益谋取方式，就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如前所述，在传统的家庭经营体制下，人们每年获取农作物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耕种土地的好坏，即人们生活的好坏与土地生态的好坏是息息相关的。而实行集体经营体制之后，情况便不是那样了。在合作社和生产队的集体经营体制下，人们每年所获粮食的多少，与土地生态的好坏不能说没有关系，然而主要的影响因素，则是每个家庭劳动力（劳动人口）的多少和工分（劳动的天数）的数量。劳动力多，工分多，这个家庭的粮食和现金的分配额就多；劳动力少，工分少，粮食和现金的分配额就少。这种体制实行之后，很快便暴露出严重的弊病：第一，按人头和工分平均分配劳动成果，完全不能体现每个人在体能、技能、智能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差别，势必挫伤很

多人的劳动积极性。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大家都消极地对待生产，消极地对待生产资料，出工不出力，混日子吃“大锅饭”。第二，粮食和现金的分配主要与劳动力和工分挂钩，而与土地资源的好坏关系不大，这样便容易导致人们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和保护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第三，人们对如何搞好生产和资源保护没有积极性，生产率必然很低，农业产量必然下降，粮食不足的问题必然出现。而为了多产粮食，为了吃饱肚子，在没有其他办法可行的情况下，只有毁林开荒，扩大耕地利用面积。这样一来，又必然打乱正常的轮歇规划，使土地和森林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加剧水土流失和土地砂化，结果陷于更加困难的恶性循环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那么人与自然便难逃厄运，就将大难临头。这并非耸人听闻，中国 1958 年至 1962 年的历史，便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农业的集体经营体制，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实行了 20 多年。70 年代末期，一种叫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业经营体制，作为农村改革的试验，冲破了种种障碍和阻力，首先在中国的安徽省取得了显著成效，后来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边远的云南山地也随之进行了改革。历史曲折地绕了一个圈，又走到近乎于传统的方式上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与云南大部分刀耕火种民族 50 年代以前的经营体制极为相似，即农户虽然不具有土地的所有权（过去土地大部分属于氏族所有，现在则属于国家所有），但是却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之后，仅仅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中国广大农村便奇迹般地从死气沉沉、奄奄一息、贫穷饥饿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然而，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云南山区竟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股大规模砍伐森林、破坏生态环境的逆流。这一奇怪的历史现象，其原因并不在于家庭个体经营体制的重建，却是出于人们对于这种体制是否会长久

确立的怀疑而产生的结果。经过 20 多年几乎是连续不断的革命和政治运动暴风雨的冲击和折腾，即便是大山中的农民，也练就了敏锐的政治嗅觉，积累了丰富的应变经验。长期以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讲抓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讲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家庭个体经营体制取代集体经营体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极容易使人产生“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条件反射。为了防止政策再变，作为大部分农民的反应，一是谨小慎微，采取观望态度；二是抓住土地山林分配到户的机会，赶快把成材的树木砍掉，留作私用。就是在这样充满疑虑的气氛中，一场抢伐、乱伐树木的风潮像瘟疫般地迅速蔓延开来。然而，后来的事实说明，农民们这次对于形势发展的估计是错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推广开来并日益稳定。随着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发展，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态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因素，那就是文化取代的问题。

所谓文化取代，是指欲以外来文化置换土著文化的做法。本文所言，指的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们一直欲以中国内地汉民族的农业模式取代云南刀耕火种农业的努力。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的历史、社会、民族调查者们一经接触刀耕火种，便将其定性为原始社会生产力和原始农业，这样一来，刀耕火种毫无疑问便成了必须改革和消灭的对象。那么应该怎样改革和消灭呢？以中国内地先进的汉民族的农业模式为标准，并将其移植到刀耕火种民族之中，这在当时是极其现成的也是“理所当然”的途径。50 年以来对云南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改造，走的基本上就是这样一条路子。

对于上述这样的被绝大多数官员和学者认同的潮流，笔者却持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中国内地汉族的农耕文化和云南山

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文化，是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过程和自然环境中所创造、积累、形成的不同类型的农耕文化。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文化、生态的差异，而非“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或者说不完全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如果以“进化”的差异为依据而欲在短时期内以“先进”取代“落后”的话，那就错了，那样做不仅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还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负面的生态效果。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进行一番考察。

首先看不同文化的自然观。在刀耕火种民族的观念中，大自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神灵的世界。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他们敬畏大自然，敬畏天、地、山、河、树、石、风、雷……为此他们敬奉神山、神林、神兽、神石等等自然崇拜物，频繁地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包括内容丰富的农耕礼仪和狩猎礼仪，祭献各种神灵，乞求除灾得福，人丁兴旺，五谷丰登。他们深信只有敬畏自然，崇拜自然，谦恭地对待自然，约束和节制一切破坏自然的行为，与大自然和睦相处，才能得到平安和幸福。刀耕火种民族的自然观，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观之，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它所表达的人类必须充分尊重自然和适应自然的思想，却具有十分重要和积极的意义。

与此不同，工业时代的自然观认为，科学技术是主宰世界的力量，人类凭借自身的发明创造，不仅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而且可以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成为大自然的主宰。以工业时代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形成的自然观，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如果过度地迷信科学技术的力量而蔑视大自然的话，那么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近百年来工业社会严重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频频酿出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生态悲剧，业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无数惨痛的教训面前，在大自然的无情报复之下，人们终

于有所省悟了，意识到有必要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认识自然，重新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意识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不能为所欲为的，是不可随意进行破坏的，破坏了自然，其实就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此，人类应该学会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认识，在世纪之交于中国云南昆明举办的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得到了集中突出的反映。“人与自然——迈向 21 世纪”，昆明世博会的这一主题，表达了当代全人类对于未来的希望与追求。

经过时间的检验，当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自然观得到了升华之后，很自然地又会回过头来仔细体会刀耕火种民族的自然观，并对曾经对其粗暴否定的态度进行认真地反思。事实说明，文化是多元的，是相对的，每一种文化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绝对先进、优秀的文化是不存在的，因而文化的取代就是不科学和不可取的了。在对待大自然的问题上，如果我们充分尊重刀耕火种民族崇尚自然、爱护自然的行为规范，同时融入科学的世界观和当代的环保思想、伦理和科学技术，那么不仅不至于造成许许多多的生态恶果，而且对于创造一种集优秀传统和现代文明为一体的新型的生态文化，肯定是十分有益的。

其次看两种农耕文化的资源观。中国内地汉族的农业资源的核心，是土地。汉族人口众多，可耕土地资源有限，如何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养活日益增加的众多的人口，是几千年来汉民族面临的重大生存问题。而欲解决这一问题，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之下，只有不断地增加对于土地的劳力、技术和肥料的投入，尽可能地提高单位面积的农作物的产量，除此之外，别无它路。通过这样不懈的努力，早在一千多年以前，汉民族便创造了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形成了集约农业的模式，为人类农业文明作出了特殊的重大的贡献。与汉族不同，刀耕火种民族的农业资源的核

心并不是土地，而是森林。有森林，才可能有效地从事无灌溉的刀耕火种旱作农业；有森林，才可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和杂草繁殖；没有森林，土地就会贫瘠、荒芜，就只得抛荒弃耕。而且，刀耕火种民族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活资料，并非仅仅依靠农地的产出，农地的产出只是一部分，相当多的部分则是向森林索取的，诸如飞禽走兽、野生食物、木材、药材等等森林产品。由于森林是农业的命脉，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因而如何保护好森林，如何实现对森林资源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利用，便成为刀耕火种民族农耕文化的最本质和最有特色的内涵。和汉族的土地资源观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一样，刀耕火种民族的森林资源观也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农业技术体系。例如为了减少水、土、肥的流失和为了不伤害土地中树木的根系，而尽可能地采用粗放的刀耕即免耕技术；为了顺应不同森林植被的生态状况，而对土地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耕作技术；为了持续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亦即为了保证具有不间断的森林资源以资利用，而实行形式多样的土地轮歇制度等等。总而言之，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如果从外民族和外地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那是不可思议的，而如果从森林民族和森林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看，就不足为怪了，就容易理解和认同。因此，在不了解刀耕火种民族特殊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情况下，在不了解他们的资源观及农耕技术特色的情况下，如果贸然改革和取代其农耕文化，那么不仅不可能达到想像的目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历史的教训是不少的。别的不说，就说以固定耕地取代轮歇吧。所谓固定耕地，即不轮歇、不抛荒，连续长期地利用土地。从道理上讲，固定耕地既省力又能够大量节约土地资源，确实应该提倡。然而刀耕火种民族为什么非要轮歇、抛荒而不固定耕地呢？他们是不是智力有问题或者“尚未开化”呢？否。其实只要是农民，不管是什么民族，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懂得固

定耕地的好处，而且肯定为实现固定耕地的目的作过种种的努力。然而由于热带、亚热带山地自然条件特殊，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对旱地实行固定耕种具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别的不说，光说杂草成灾和土壤劣化这两大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正是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生态灾难，为了实现对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们才发明创造了土地轮歇制度。不懂得这一点，贸然取消轮歇之法而固定耕地，名为改革，实则盲动，自以为以进步取代落后，实际上是在走回头路，好心办坏事。50年来，在刀耕火种地区曾多次推行固定耕地的运动，然而在很多地方其结果是固定一块破坏一块，固定一片恶化一片，几年之后固定不下去，仍然不得不将其抛荒，而像这样经过固定而抛荒的土地，由于过度垦殖，很难再生树木，大都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目前在云南西南部山地，到处可以看到长满紫茎泽兰（*Eupatorium adenophorum Spreng*）等恶性杂草的荒山草坡，生态环境如此地恶化，固然有种种原因，然而盲目地提倡和推广异地民族的农业模式，以图进行农耕文化的取代，无疑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果。

通过刀耕火种的研究看人与自然的关系，除了以上诸方面之外，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因素，例如贫困与生态环境，就是一对以恶性循环为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孪生姊妹。从以上的分析和探讨不难看出，要保护自然，要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光有森林法、自然保护区和一般意义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建立适合国情、民情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制定富于远见的政策法规，注重继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效地节制人口增长，并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才可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人类社会才可能持续地发展。

三、生存和发展

研究刀耕火种，文化的发掘、探索是很有意义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必须高度重视的。然而，刀耕火种最本质和核心的问题，却是山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开了对人的关怀，其他问题便无从谈起。

多年来，山地民族一直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人口急剧增长，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生存资源日益短缺，社会激烈变迁，政治运动频繁冲击，民族文化迭遭破坏，传统经验、知识、技术不断丧失，一些地方温饱问题尚未解决，贫困状况依然普遍存在，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面对着如此艰难的处境，他们将怎样生存下去？将如何发展呢？

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山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也必须指出，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盲目、短期行为和变化无常的。因此，其结果与预期的目标差距甚远，也就不难理解了。迄今为止，对于山地民族和刀耕火种的改革，已经有过很多的措施、办法、方针、政策和战略。总结历史的经验，反思失败和教训，实事求是地进行探索，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如果完全排斥民族传统文化，脱离当地的自然条件等实际情况，那么无论多么先进、新奇的发展思路，多么惊人、宏伟的规划和目标，都是无济于事的。中国发展的路子摸索了几十年，现在终于明确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改革也探索了几十年，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了。这个方向也要强调“特色”，我认为那就是“有民族特色的改革之路”。特色怎么体现？关键要抓下面三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要继承和发展混林农业。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

种，经过了大约 50 年的改造、取代、禁止，仍然不绝于世，其生命力也可谓强了。令人吃惊的是，原以为 90 年代云南的刀耕火种只可能残存于西南部山地了，不料 1999 年 6 月笔者前往滇东南调查，竟然在盘龙江流域山区也看到大面积的刀耕火种。屡废不去、屡禁不止，说明还没有好的办法，好的出路替代它，说明人们还离不开它，还必须利用它。

近年来，在国内外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强调发展化学农业的呼声减弱了，提倡发展生态农业则成为新的潮流。为什么要提倡生态农业？那是因为化学农业是有毒的污染的农业，而生态农业则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有机农业。与此相对应，在云南，10 余年前曾经大力提倡“两化上山”（化肥和农药称之为“两化”），认为那是消灭轮歇耕作方式、固定耕地、提高产量的“法宝”。然而最近几年，这一强劲的鼓动和宣传已经偃旗息鼓、冷落式微了。原因何在？那是因为“两化”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对于短期内提高土壤肥力和除草十分有效；但另一方面化肥会导致土壤板结，而大量使用除草剂，则会污染、毒化农作物和生态环境，而且还会培育出抗药性很强的新的杂草。事实证明，在目前的情况下，欲完全依赖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这些新科技“法宝”改变山地农业面貌，还有很多问题，还不现实。面对这样的情况，最近有关方面开始把眼光转到混林农业上来了。例如在临沧地区一些专家说他们发现了一种“新型的农业模式”，即依靠栽种水冬瓜树（*Alnus nepalensis*）来提高土地肥力并改善生态环境的混林农业。无独有偶，据 1999 年 8 月 5 日《云南日报》报导，在盛行刀耕火种的独龙江地区，政府派驻的工作队经过较长期的调查研究，为独龙族制定了一个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每户必须种植 20 亩水冬瓜树。无论是专家还是工作队，现在能够认识到水冬瓜树的价值，能够将混林农业作为发展模式加以推广，无疑

是一个进步。为什么？因为利用水冬瓜树提高地力、进行粮林轮作或混林农业，从而保护资源和生境的战略，并不是现在的发明和创造，而是一些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的传统经典技术。现在我们的专家和干部能够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不再一味地眼光向外，而是开始注意（尽管有的是不自觉的）各民族传统经验、知识、技术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现象是很值得肯定的。其实，利用水冬瓜树从事混林农业只是传统刀耕火种的一种模式，除此之外，还有怒江峡谷勒墨人（白族支系）等种植漆树的混林农业和基诺族利用紫胶树木的混林农业等，都值得认真发掘、总结、继承和推广。由于混林农业既是山地民族熟悉的传统技术，又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利用的途径，因此只要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那么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很多地方贫瘠、荒芜的面貌就将得到很好的改善。

传统刀耕火种的有用技术，并不限于混林农业一项，轮作技术也是很值得重视的。基诺族等的轮作，可以连续进行五六年甚至近十年，其实这就是一种固定耕地的宝贵经验。轮作不是靠肥料的投入，而主要是靠栽培作物的活用。继承和发展轮作技术，不仅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而且对于保护栽培作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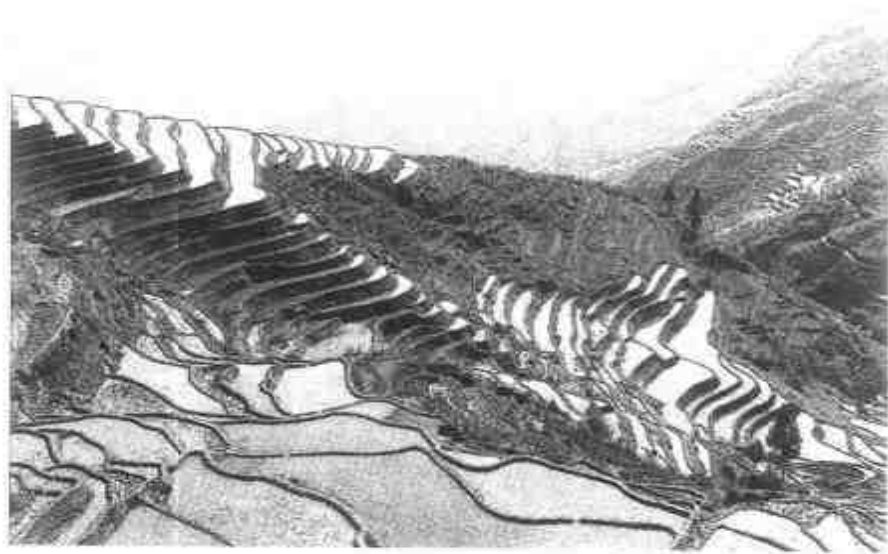
以上事实说明，探索山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路，首先必须从他们的传统生业入手，那里边有许多他们赖以生存了几千年的科学和有用的经验、知识和技术，只有很好地对其加以发掘和继承，并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才可能创造出切实可行的、独特有效的生存与发展的模式。而如果完全脱离和无视他们的优秀传统和智慧，盲目地进行文化移植，生搬硬套外来经验，并滥用尚不成熟和完善的科学技术，那么不仅无助于山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会给他们带来麻烦和伤害。

第二件事是必须发展水田农业。云南的山地民族，不仅创造



红河流域哈尼族开垦梯田历史悠久，
图为元江县小羊街哈尼族的梯田

了多种混林农业的模式，而且有的民族开垦利用水田的历史亦颇悠久。例如分布于红河流域山地的哈尼族，早在数百年前，便从刀耕火种转向了水田农业。他们在群山之中开垦的大规模的天梯一般的梯田，如今已成为滇南一大奇观。其成功的生业转型，应该成为其他山地民族借鉴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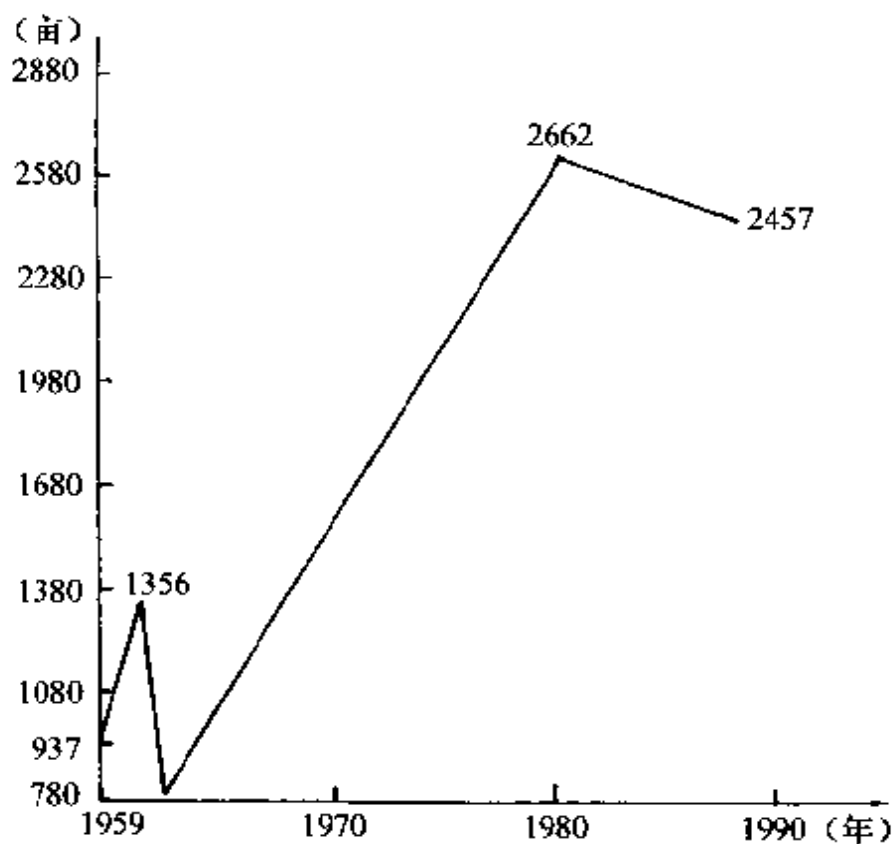


元阳县哈尼族的梯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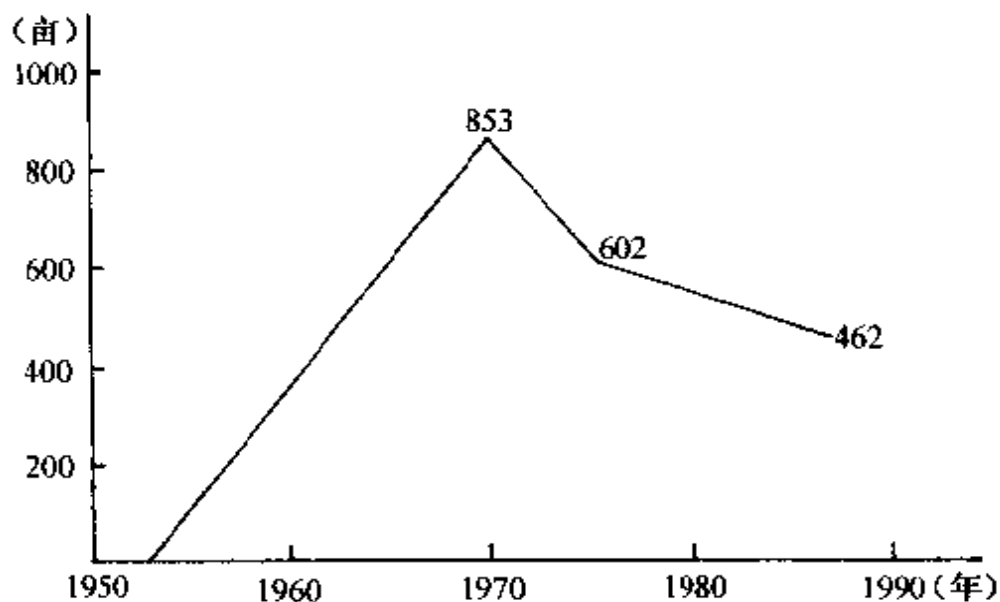
水田农业较之刀耕火种，具有不必轮歇，节约土地，不消耗森林资源，耕作省力，粮食产量高等优点。山地民族只要每人具有1亩水田，便可以少耕种10亩刀耕火种地，而如果每人拥有2亩水田的话，那么基本上便可以使刀斧入库、山火熄灭，不必再从事刀耕火种了。这是一个非常容易明了的道理，是一道极其简单的算术题。然而，这人均一二亩水田就这么难以开垦，这样一个似乎并不宏大的目标在很多地区就是无法实现。原因何在？关键的问题，是缺乏基本的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山区山高坡陡，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水利建设工程投入大，面对这些困难，很多分散、贫弱的小村小寨是绝对没有力量去克服的。回顾历史，同样是山地民族，有的经营水田农业很早，而有的至今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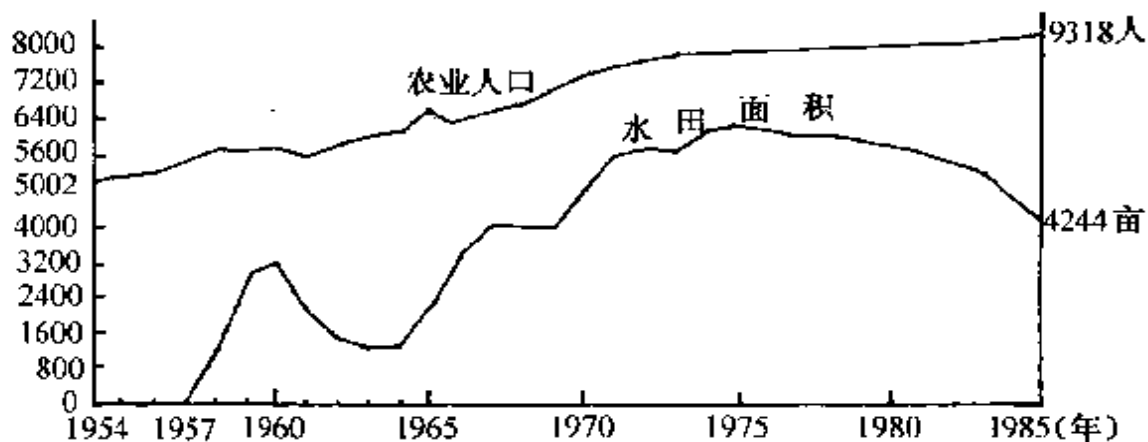
福贡县傈僳族、怒族近年来在怒江峡谷坡地上开垦的梯田



卡场地区景颇族的水田增长曲线图



独龙江地区独龙族的水田增长曲线图



基诺族的水田增长曲线图



福贡县高山地带傈僳族的旱地、梯田和林地

然没有水田，有的开垦了又废弃了。究其原因，并非是“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形态不同或文明进化的差异”使然，而主要是自然条件的关系。自然条件好，地势平坦，又有灌溉之利，不仅汉族、傣族，山地民族也容易成为水田稻作民；自然条件恶劣，人群又分散贫弱，就难以开拓和管理好水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水田农业在一些山区发展起来了，然而有的山地民族还是老样子。如果说这部分山地民族确实

需要政府和外界的帮助和支援的话，那么最需要的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财力和物力。多年来，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山区做扶贫工作，但是真正解决好农田基本建设的村寨并不多，这可以说是脱贫工作难以凑效和难以巩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明白，在滇西南广大山地，如果既不继承和推广混林农业，又不能发展水田农业的话，那么刀耕火种的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最近出台的“禁止砍伐天然林”的一项项决议和文件能否落到实处，也是值得怀疑的。而如果抓好混林农业和水田农业，那么就有可能完全解决山地民族的粮食问题，刀耕火种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大部分轮歇地就可以退耕还林，云南山地的生态面貌就将大为改观。



怒江峡谷岩石上的梯田

第三件事是要抓好绿色产业。如前所述，就目前的条件和情况而言，只有努力发展混林农业和水田农业，才能有效地解决山地民族的食粮问题，使他们的生存得到基本的保证，不再为饥荒而困扰。不仅如此，如果实现了从刀耕火种向混林农业和水田农业的转换，那么还将为充分利用山地资源、为发展商品经济、为山地民族的脱贫创造有利的条件。

人们说农业是基础，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解决不了，一切都无从谈起。但是还有一句老话，叫做“无商不富”，没有多种产业，没有商品经济，只有粮食，还是摆脱不了贫困。山地民族要摆脱贫困奔小康，还得充分利用千百年来靠山吃山的经验，大念山字经，面向市场，大力发展林业和经济作物栽培等绿色产业，增加收入，发家致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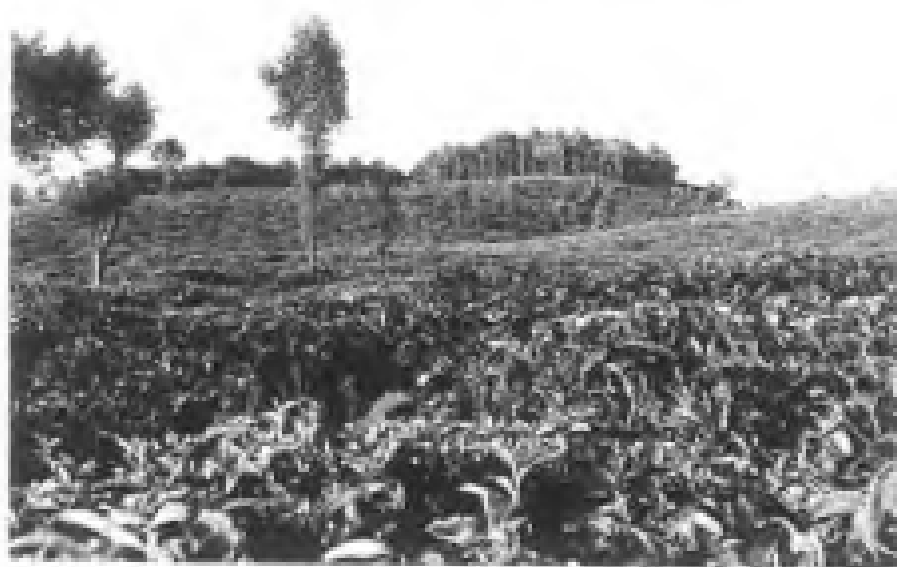


勐海县南糯山 800 年前的“茶树王”

其实，山地民族经营绿色产业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据文献记载和调查资料可知，有的民族的经济作物的采集种植业几乎是和农业同时产生的。例如很多历史文献记载怒江的怒族和独龙族时，都说他们是靠采挖黄连为生，其实他们不只是采集，而且还善于种植。用现在的话来说，黄连在历史上曾经是怒江峡谷民族的“支柱产业”。又如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等，他们栽培茶叶的历史极为悠久，可以称之为“茶作民族”。基诺族的一些老人甚至认为，他们的祖先是先会种茶然后才会种稻的。檀萃所著《滇海虞衡志》曾经记载说，明清时期今西双版纳、思茅地区有六大茶山，每天上山采茶的人数多达 10 万余人，那是一个多么兴盛的产业！目前闻名遐迩的“普洱茶”品牌，就是那个时候打响



景洪市基诺山的人工林、茶地和农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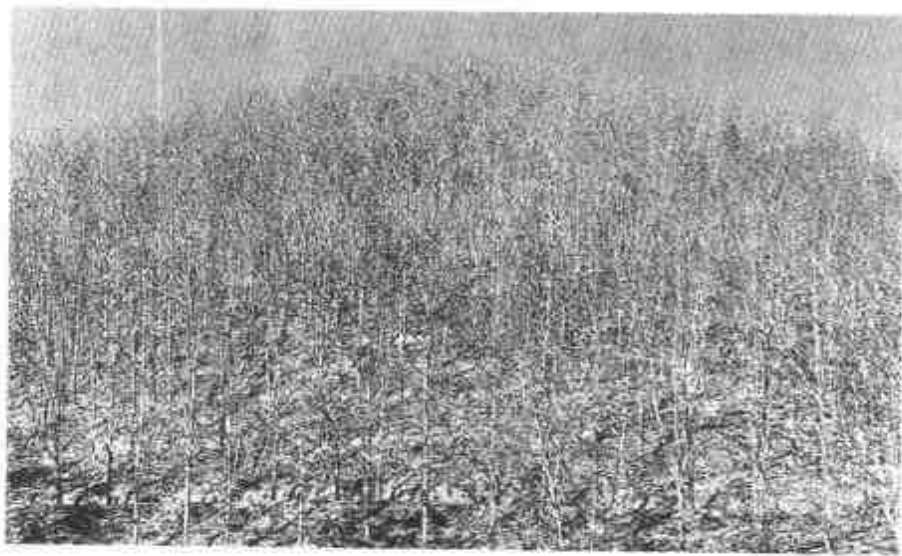
元阳县哈尼族的茶园

的。一些人不懂得山地民族的历史，认为 80 年代提倡“多种经营、发展林业”是新发明新创造，殊不知这早就是山地民族的重要生业，只不过在 50 年代以后被“以粮为纲”和“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运动所窒息而一度销声匿迹罢了。现在政策变了，强调发展，强调市场经济，恢复重视林业的传统，根据市场需求发展绿色产业，并引入科学技术手段提高生产效率，让绿色产业造福于山民，使之成为生财之道、绿色银行，把传统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路子算是走对了。



怒江峡谷近年来种植了很多油桐（宋立武摄）

经过几年的恢复与开发，滇西南各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怒江峡谷在继续种植黄连等药材和漆树的基础上，10 余年来，在峡谷中广为种植油桐，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德宏山地和西双版纳一样，有栽培茶叶的传统，现在经济作物种类多了，水果、甘蔗、胡椒、咖啡等都成了大宗产品。临沧、思茅、西双版纳山地，大力发展具有悠久历史的茶叶种植业；而在海拔 800 米以下的低山之地，经过 40 年的经营，已经成为橡胶林的世界；近年来，这几个地区又扩展了经济作物的种类，增加了甘蔗、水果、药材等的种植，而且大都制定了中长期的发展目标。红河流域和滇东南山地，则以种植香蕉、芒果、菠萝等水果



西双版纳的橡胶林



勐腊县克木人妇女练习割胶

为主，甘蔗也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此外还种植了很多诸如八角等经济林木。

发展林业产品和经济作物，具有很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也十分显著。80年代傈僳族等种植油桐，基诺族等种植砂仁，大家的钱包都着实鼓了几年；至于敢闯敢干、较早地跟随农场和傣族种了橡胶的人们，如今万元户已不在少数。最近几年，内地



西双版纳和德宏近年来大面积种植西香莲



出售芒果的红河傣族姑娘



河口县瑶族出售香蕉



河口县苗族出售香蕉

饮料公司纷纷到西双版纳和德宏大量收购西番莲，又给这些地区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这种过去只是在庭院少量栽种的水果，现在则无处不见了。毋庸讳言，目前山地民族的“绿色产业”，其实仅仅只是提供廉价的农林产品，没有深加工甚至没有基本的初加工，没有附加值，因而还谈不上“产业”，今后这种状况是应该有所改变的。而且由于种植业完全由市场主导，产品价格受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而起伏不定，风险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市场和经济的规律是可以学习的，通过不断地适应和把握市场规律，不仅能使山地民族的素质得以提高，而且还将使山区经济长期保持活力。

说到这里，应该有个总结了。研究刀耕火种，从现实的应用的角度来看，我们大可不必去讨论判定太多太宏伟的战略，只要抓好混林农业、水田开发和绿色产业，就将造福于山地民族，就会逐步改善业已严重破坏了的生态环境。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再固执地坚持民族和文化的偏见，一定要把别人的生业形态完全定位在“原始落后”之上，而应该以虚心的、科学的态度去做深入细致的探索研究，还其历史文化的本来面目。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我们则应该深刻地认识和揭示刀耕火种人类生态系统演变发展的过程和规律，从而努力建立良好的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谋求人类社会协调、健康、持续地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 尹绍亭：《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云南刀耕火种研究》，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 尹绍亭：《森林孕育的农耕文化——云南刀耕火种志》，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马曜：《云南简史》，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 尤中：《云南民族史》，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 《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编写组：《云南古代史略》，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
- 江应樑：《傣族史》，1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 游修龄：《中国稻作史》，1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 游修龄：《农史研究文集》，1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 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学史（初稿）》上、下册，1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7。
- 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
- 盖利·J·马丁原著，裴盛基、贺盖安编译：《民族植物学手册》，1998。
- 裴盛基、龙春林等：《应用民族植物学》，1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 裴盛基等：《西双版纳轮歇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研究论文报告集》，1版，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系统中的的人》，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一卷第四期，1984。
- 夏伟生：《人类生态学初探》，1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 周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绿色文化》，1版，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7。
- 颜思久：《布朗族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研究》，1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思茅行署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布朗族研究》，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 《独龙族简史》编写组：《独龙族简史》，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 刘达成：《独龙族》，1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 高力士：《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灌溉与环保研究》，1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

罗钰：《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1版，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1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国际稻作研究所著，华南农学院水稻援外班译：《陆稻的研究》，1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裴盛基：《用民族生态学的观点初探滇南热带地区的轮歇栽培》，载《农业生态系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

云南省编辑组：《云南方志民族、民俗资料琐编》，1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组）：《独龙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1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1985。

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二），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三），1版，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云南省编辑组：《景颇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三），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佤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三），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组）：《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三），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1986。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怒族社会历史调查》，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内部资料），1963。

-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崩龙族社会历史调查》，1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
- 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民族组：《拉祜族佤族崩龙族傣族社会与家庭形态调查》（内部资料），1975。
-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拉祜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云南小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 云南省编辑组：《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二）、（三），1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1986、1988。
- 云南省编辑委员会：《阿昌族社会历史调查》，1版，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
-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专刊，1983。
-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载《史前研究》，1985（4）。
- 王均：《独龙族的穴居和巢居时代》，载《民族调查研究》，1983（1）。
- 许本汉：《盈江山区刀耕火种问题研究》，载《民族调查研究》，1986（3）。
- 尹宜公：《云南省景颇族刀耕火种农业的初步分析》（“热带森林与农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7。
- 蔡家麒：《当代“刀耕火种”试析》，载《民族研究》，1986（5）。
- 陈宗仪：《关于西双版纳制止毁林开荒的探讨》，载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西双版纳经济问题研究专辑》，1987（10）。
- 于光远：《于光远给云南经济研究所的一封信》，载云南省经济研究所编《西双版纳经济问题研究专辑》，1987（10）。

- 罗钰：《云南景颇族旱地农业及其农具》，载《农业考古》，1984（2）。
- 宋兆麟：《泸沽湖畔摩梭人的农业》，载《农业考古》，1982（1）。
- 李根蟠、卢勋：《我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考》，载《农业考古》，1981（1）。
- 卢勋、李根蟠：《独龙族的刀耕火种农业——附论原始农业的早期阶段及其命名》，载《农业考古》，1981（2）。
- 李根蟠、卢勋：《苦聪人早期原始农业的生产和生活》，载《中国农史》，1982（1）。
- 李根蟠、卢勋：《从景颇族看原始农业的起源与发展》，载《农业考古》，1982（1）。
- 李根蟠：《我国少数民族对农业科技的伟大贡献》，上篇，载《农业考古》，1984（2）；中篇，1985（2）；续篇，1988（1）。
- 李根蟠等：《刀耕农业与锄耕农业并存的西盟佤族农业》，载《农业考古》，1985（1）。
- 杨德春：《黎族合亩制地区生产方式考略》，载《农业考古》，1985（2）。
- 王军：《基诺族的刀耕火种》，载《农业考古》，1984（1）。
- 周政华、盘剑波：《略论瑶族的游耕》，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3）。
- 胡启望：《试论瑶族游耕的发展》，载《云南社会科学》，1988（4）。
- 尹绍亭：《说“瘴”》，载《云南方志通讯》，1986（4）。
- 尹绍亭：《云南山地民族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载《云南文史丛刊》，1987（1）。
- 尹绍亭：《基诺族的社会制度及农耕礼仪》，载《云南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论文选》，1版，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尹绍亭：《基诺族传统刀耕火种经济文化的变迁》，载《民族工作》，1987（9）。

尹绍亭：《云南农业低湿地水稻起源考》，载《中国农史》，1987（2）。

尹绍亭：《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载《农业考古》，1988（1、2）。

尹绍亭：《云南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类型及人类生态学比较》，载《民族社会学》，1988（1、2）。

尹绍亭：《云南山地民族刀耕火种的变革及其问题》，载《民族工作》，1989（10、11）。

尹绍亭：《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载《农业考古》，1989（1）。

尹绍亭：《云南刀耕火种研究》，载《思想战线》，1990（2）。

尹绍亭：《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兼与云南其它刀耕火种民族的比较》，载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17卷2号，1992。

尹绍亭：《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的刀耕火种》（座谈记录）载《云南的生活和技术》（日文版），日本庆友社，1994。

尹绍亭：《云南的山地和民族生业》，载《思想战线》，1996（4）。

尹绍亭：《雲南刀耕火種民族の8種生存策略》，載日本《東南アジア研究》雲南特集，1997。

山田勇、尹紹亭：《石灰岩地帶生活的人們——雲南東南部生態文化的變遷過程》（日文），載日本《東南アジア研究》雲南特集，1997。

尹紹亭：《雲南刀耕火種農業的變遷》，載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調查報告》，1998（8）。

- 佐佐木高明：《熱帯の焼畑》，古今書院，1970。
- 佐佐木高明：《日本の焼畑》，古今書院，1972。
- 佐佐木高明：《東南アジア農耕論——焼畑から公稻作へ》，弘文堂，平成元年。
- 佐佐木高明：《日本農耕文化の源流》，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3。
- 佐佐木高明編：《農耕の技術と文化》，集英社刊，1993。
- 渡部忠世：《稻の道》，日本放送出版協會，昭和64年。
- 野本寛一：《焼畑民俗文化論》，雄山閣出版，昭和63年。
- 野本寛一：《生態民俗学序説》，白水社，1987。
- 野本寛一：《共生のフ，ークロア—民俗の環境思想》，青土社，1994。
- 福井勝義：《焼畑のむら》，朝日新聞社，1975。
- 古川久雄：《雲南民族生態誌——生態論理と文明論理—》，《東南アジア研究》35卷3號，1997。

后记

写刀耕火种，这已经是第三本书了。为什么老在一个领域中转悠？有以下一些缘由。自从走进了刀耕火种这一学术荒原，尽管冷清空寂，然而不论是苦苦耕耘还是冥冥沉思，总是不断有所收获，有所觉悟，于是也便总是感到早先的著述尚存不足，意犹未尽，所以情不自禁又在寻找机会，想把这口“井”再打深一点，把这块“地”再犁透一些，这是原因之一。刀耕火种争论了若干年，可至今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观点大相径庭。而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傲慢粗暴的态度，确实令人啼笑皆非、无言以对；然而另一方面，最近的某些迹象又使人欣慰和鼓舞，一种关心、重视土著民族经验、知识和技术的趋势，犹如一股暖流、一阵春风，正在国内外悄然兴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一次全方位地讨论刀耕火种的文化内涵，对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原因之二。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由于时代和各种条件的变化，刀耕火种民族很难再囿守古老的生存方式，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也应该和生态环境

问题一样受到人们的关心和重视。而怎样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这是原因之三。本书说过，刀耕火种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又是一个涉及当代生态环境的重大课题，因而拙著出版之后，产生了一些影响，引发了国内外同行的兴趣，日本、美国、越南均有学者希望翻译出版，既然如此，就应该给人家提供一个较好的本子。在以上诸因素的推动下，感到还有必要再花功夫、重新编写，结果就有了这第三本书。

本书归纳了前两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但并非是他们翻版。例如绪论加强了对研究背景和方法论的概括，第三章“比较研究”和终章是新的探讨和心得，其他章节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尽管如此，本书仍然不尽如意，原因主要是工作繁杂，不能静心写作。自然，路无止境，学无止境，研究著述也是没有止境的。为了不再拖延出版时间，只好就此打住了。

感谢云南教育出版社何学惠社长、张强编审，在他们的热忱关心和支持下，笔者组织了杨兆麟、街顺宝、蒋志龙三位先生的大作和拙著结成“边地文化丛书”一道出版。感谢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唐立（Christian Daniels）、立石谦次、白坂蕃、林红诸位先生和友人，承蒙他们热情地同步翻译拙著，现在我的中文稿完成了，他们的英、日译本也都接近尾声了。此外要感谢福特基金会和该会原项目官员郝克明先生（James S. Harkness），福特基金会十分重视本课题的研究，给予拙著英译本翻译和出版的资助，这对于促进生态人类学和刀耕火种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最后还要感谢担任本书责任编辑、校对和审读的高建勤、赵虎、张莉、马建生等女士、先生，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1999年8月28日识于
昆明海埂